







毛澤東

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16卷

毛泽东出版社



MAO ZE DONG QUAN JI

毛泽东全集

主任：流星
策划：树旺
编审：黄惠丽

主编：张迪杰
副主编：宋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革 杨健桉 听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颖 杨泽
编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利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中国共产党对苏日中立条约发表意见	1
(1941年4月16日)	
致周恩来电	3
(1941年4月17日)	
致彭雪枫电	4
(1941年4月17日)	
致贺龙、关向应等电	5
(1941年4月17日)	
致彭雪枫等电	6
(1941年4月20日)	
致彭雪枫等电	7
(1941年4月20日)	
致彭德怀、左权等电	8
(1941年4月20日)	
致周恩来电	9
(1941年4月20日)	
日苏缔约后英美及中国各派政治力量态度的分析	10
(1941年4月20日)	
关于国共继续团结抗日问题致周恩来电	12
(1941年4月26日)	

给任弼时的信	13
(1941年4月28日)	
发展上海到福州广大地区的游击战争	15
(1941年4月30日)	
为金茂岳题词	16
(1941年春)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18
(1941年5月1日)	
致周恩来来电	23
(1941年5月2日)	
致陈毅等电	24
(1941年5月5日)	
给周恩来的信	25
(1941年5月5日)	
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	26
(1941年5月8日)	
复周恩来来电	31
(1941年5月8日)	
当前形势与我们的方针	32
(1941年5月9日)	
致周恩来来电	34
(1941年5月10日)	
致陈毅、刘少奇电	35
(1941年5月12日)	
为护士节题词	36
(1941年5月12日)	

团结对敌有计划地配合友军作战	38
(1941年5月14日)	
关于华北我军配合国民党对日作战等问题的指示	39
(1941年5月14日)	
致廖承志电	41
(1941年5月14日)	
致彭德怀电	42
(1941年5月14日)	
致彭德怀、左权电	43
(1941年5月15日)	
八路军新四军均在敌后猛击敌人	44
(1941年5月15日)	
关于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工作的通知	45
(1941年5月15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刊词	47
(1941年5月16日)	
为《解放日报》题写报头	49
(1941年5月16日)	
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50
(1941年5月18日)	
改造我们的学习	55
(1941年5月19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67
(1941年5月20日)	
谨防扒手*	68
(1941年5月23日)	

延安评论家对时局之评论*	71
(1941年5月24日)	
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	72
(1941年5月25日)	
关于目前形势和统一宣传问题致八路军新四军各负责人电	73
(1941年5月25日)	
给王履孚、甄玉莹等的信	74
(1941年5月25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75
(1941年5月26日)	
致卫立煌电	76
(1941年5月26日)	
复周恩来电	77
(1941年5月26日)	
致彭德怀电	78
(1941年5月26日)	
谣言与烟幕*	79
(1941年5月28日)	
致周恩来电	83
(1941年5月30日)	
延安评论家称炉边闲话具有两面性*	84
(1941年5月30日)	
致周恩来电	86
(1941年5月31日)	
为“抗大五周年纪念特刊”题词	87
(1941年5月)	

为陈叔亮《解放区速写》画册题字	88
(1941年5月)	
军委关于陕甘宁边区部队生产工作的指示	90
(1941年5月)	
延安评论家之评论	92
(1941年6月2日)	
致周恩来电	93
(1941年6月6日)	
给凯丰、胡乔木的批语	94
(1941年6月6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95
(1941年6月7日)	
致彭德怀、左权等电	96
(1941年6月7日)	
与友军配合作战坚决破坏敌之进攻	97
(1941年6月9日)	
河北平原反“蚕食”斗争的政策	100
(1941年6月9日)	
目前我党方针是拉蒋抗战	102
(1941年6月12日)	
致彭德怀、左权、罗瑞卿电	103
(1941年6月13日)	
关于财政预算问题给林伯渠的信	104
(1941年6月13日、15日)	
国民党缺少什么	106
(1941年6月17日)	

致周恩来来电	110
(1941年6月17日)	
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	111
(1941年6月23日)	
复彭德怀、左权、罗瑞卿电	112
(1941年6月23日)	
当前时局与我们的方针	113
(1941年6月26日)	
抗战中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行一拉一打政策	114
(1941年6月28日)	
复彭雪枫电	115
(1941年6月28日)	
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的指示	116
(1941年6月)	
给周恩来的信	118
(1941年6月)	
在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上的讲话	119
(1941年7月1日)	
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121
(1941年7月1日)	
准备在战略上配合苏军作战	124
(1941年7月2日)	
给续范亭的信	125
(1941年7月2日)	
致周恩来电	126
(1941年7月5日)	

致周恩来电	127
(1941年7月5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	128
(1941年7月7日)	
为“七七”事变四周年题词	134
(1941年7月7日)	
致周恩来、廖承志电	135
(1941年7月8日)	
驳斥何应钦*	136
(1941年7月9日)	
帮助苏联红军我们决取广泛游击战的长期斗争方针	137
(1941年7月15日)	
给刘雪苇的信	140
(1941年7月15日)	
为中国医科大学第十四期毕业生题词	142
(1941年7月15日)	
八路军新四军应取长期斗争方针	144
(1941年7月18日)	
复周恩来、董必武电	146
(1941年7月22日)	
致彭德怀电	147
(1941年7月24日)	
给各兵团首长的指示	148
(1941年7月30日)	
自卫方针应准备长期坚持下去	149
(1941年7月30日)	

给林伯渠、谢觉哉的信	151
(1941年7月31日)	
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152
(1941年8月1日)	
给萧军的信	156
(1941年8月2日)	
军渡碛口线之河防应该加强	158
(1941年8月3日)	
给谢觉哉的信	159
(1941年8月5日)	
关于财经建设的基本方针给谢觉哉的信	160
(1941年8月6日)	
给谢觉哉的信	163
(1941年8月9日)	
给高岗、陈正人的信	165
(1941年8月9日)	
给萧军的信	166
(1941年8月10日)	
给谢觉哉的信	167
(1941年8月12日)	
给萧军的信	168
(1941年8月12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169
(1941年8月13日)	
给张冲家属的唁电	170
(1941年8月13日)	

接见绥德警备区学生参观团代表时的讲话	171
(1941年8月14日)	
派一个团带干部去发展中条山的游击战争	172
(1941年8月17日)	
对伪军的政策及对伪官兵的处理意见	173
(1941年8月17日)	
复陈毅、刘少奇电	175
(1941年8月17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176
(1941年8月18日)	
致彭德怀电	177
(1941年8月18日)	
给陈正人的信	178
(1941年8月19日)	
中共中央关于最近国际事件的声明	179
(1941年8月19日)	
征求华北各战略单位对军区建设的意见	182
(1941年8月21日)	
致彭德怀电	184
(1941年8月22日)	
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第二期工作报告上的批示	185
(1941年8月22日)	
关于总结财经工作经验给谢觉哉的信	186
(1941年8月22日)	
《鲁忠才长征记》一文按语	189
(1941年8月26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190
(1941年8月27日)	
致周恩来电	191
(1941年8月30日)	
和国民党联络参谋陈宏谟等的谈话	192
(1941年9月1日)	
致周恩来电	193
(1941年9月1日)	
致周恩来电	194
(1941年9月8日)	
配合国民党军作战争取时局好转	195
(1941年9月9日)	
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196
(1941年9月10日)	
关于农村调查	201
(1941年9月13日)	
给高岗、陈正人的信	208
(1941年9月16日)	
关于张季鸾逝世给国民参政会的唁电	209
(1941年9月18日)	
给续范亭的信	210
(1941年9月22日)	
致周恩来电	211
(1941年9月24日)	
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	212
(1941年9月26日)	

致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电	214
(1941年9月29日)	
接见陇东分区土绅参观团时的谈话	223
(1941年9月)	
致刘少奇电	224
(1941年10月3日)	
复刘少奇电	225
(1941年10月11日)	
给周恩来的信	226
(1941年10月15日)	
关于各地应即组织高级学习组的指示	228
(1941年10月18日)	
致周恩来电	229
(1941年10月18日)	
致刘少奇、陈毅电	230
(1941年10月18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231
(1941年10月20日)	
致周恩来等电	232
(1941年10月20日)	
致贺龙、周士第等电	233
(1941年10月20日)	
普遍设立炸弹制造厂	234
(1941年10月23日)	
致周恩来电	235
(1941年10月29日)	

在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上的讲话	236
(1941年10月30日)	
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分析新事物，解决新问题	238
(1941年10月30日)	
致周恩来来电	246
(1941年11月1日)	
理论研究阅读材料目录	247
(1941年11月1日)	
本年内学习任务及学习方法	249
(1941年11月4日)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	251
(1941年11月6日)	
和国民党联络参谋陈宏謨等的谈话	258
(1941年11月6日)	
关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广播讲演	259
(1941年11月7日)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	261
(1941年11月7日)	
致周恩来来电	269
(1941年11月10日)	
致周恩来、董必武电	270
(1941年11月11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271
(1941年11月12日)	
致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电	272
(1941年11月14日)	

致周恩来电 ······	273
(1941年11月16日)	
致周恩来电 ······	274
(1941年11月16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	275
(1941年11月17日)	
关于发理论材料目录等问题 ······	276
(1941年11月17日)	
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闭幕会上的讲话 ······	277
(1941年11月21日)	
各地高级学习组应根据组织条例实施 ······	278
(1941年11月26日)	
关于实施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致刘少奇电 ······	279
(1941年11月26日)	
致周恩来电 ······	281
(1941年11月30日)	
挽张冲先生联 ······	282
(1941年11月)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	283
(1941年12月1日)	
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 ······	284
(1941年12月9日)	
对国际战争形势的估计 ······	287
(1941年12月12日)	
关于敌后各根据地领导方法的指示 ······	289
(1941年12月12日)	

致周恩来来电	290
(1941年12月13日)	
给蔡畅的信	291
(1941年12月16日)	
为王观澜题词	293
(1941年12月16日)	
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	295
(1941年12月17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299
(1941年12月18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301
(1941年12月20日)	
给续范亭的信	302
(1941年12月23日)	
给任弼时的信	303
(1941年12月25日)	
一九四二年的中心工作任务	304
(1941年12月28日)	
关于中共党史学习问题致周恩来来电	306
(1941年12月30日)	
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节选)	308
(1941年)	
为中央党校的题词	317
(1941年冬)	
为军委机要工作题词	319
(1941年)	

为王履丰题词	321
(1941年)	
为延安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主办的青运工作展览会题词	322
(1941年)	
为门书明题词	324
(1941年冬)	
致周恩来等电	327
(1942年1月7日)	
复周恩来电	328
(1942年1月8日)	
在周恩来关于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情况的材料上加写的一段话	329
(1942年1月10日)	
致彭德怀等电	330
(1942年1月12日)	
《文化课本》序言	331
(1942年1月17日)	
为瞿宪文题词	332
(1942年1月18日)	
在审改的一份情况通报上加写的一段话	334
(1942年1月20日)	
致彭德怀等电	335
(1942年1月21日)	
致朱瑞等电	336
(1942年1月21日)	
在关于太平洋战争后沦陷区情况的通报材料上加写的一段话	337
(1942年1月22日)	

在欢迎七一七团晚会上的讲话	338
(1942年1月22日)	
印发和学习红四军九次党代表大会议决议	339
(1942年1月23日)	
致周恩来、董必武电	341
(1942年1月23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342
(1942年1月24日)	
中宣部宣传要点	344
(1942年1月26日)	
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	347
(1942年1月28日)	
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三周年题词	352
(1942年1月)	
整顿党的作风	354
(1942年2月1日)	
给周文的信	373
(1942年2月1日)	
给各地党部及军队负责人的通知	374
(1942年2月2日)	
复彭德怀电	375
(1942年2月3日)	
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	376
(1942年2月4日)	
以集资料写名人列传	381
(1942年2月4日)	

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决定的附件*	383
(1942年2月6日)	
延安观察家之评论*	388
(1942年2月6日)	
延安评论家称两年内击溃日寇*	389
(1942年2月6日)	
反对党八股	390
(1942年2月8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413
(1942年2月11日)	
在《中央宣传部关于进行反主观主义、反教条主义、反宗派 主义、反党八股给各级宣传部的指示》上的批示	415
(1942年2月11日)	
复陈毅、刘少奇电	416
(1942年2月13日)	
庆祝红军二十四周年	417
(1942年2月18日)	
目前应以整顿内部训练干部为工作中心	419
(1942年2月20日)	
关于时局估计、干部教育、财政经济等问题的指示	421
(1942年2月20日)	
在一份情况通报上加写一段话	423
(1942年2月20日)	
致刘少奇及华中局电	424
(1942年2月20日)	

讨论过去路线问题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425
(1942年2月21日)	
致彭德怀等电………	427
(1942年2月21日)	
致陈毅等电………	428
(1942年2月23日)	
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	429
(1942年2月28日)	
在中共中央白区工作总结委员会上的一段讲话………	435
(1942年3月2日)	
给谢觉哉的信………	436
(1942年3月2日)	
增长力量，准备反攻………	437
(1942年3月4日)	
为“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题词………	440
(1942年3月8日)	
为张浩题挽词………	442
(1942年3月9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445
(1942年3月11日)	
复彭德怀电………	446
(1942年3月12日)	
致王世英电………	447
(1942年3月13日)	
党报应吸收党外人员发表言论………	448
(1942年3月14日)	

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	450
(1942年3月19日)	
致刘少奇电	455
(1942年3月21日)	
致彭德怀、左权等电	456
(1942年3月24日)	
致周恩来、董必武电	457
(1942年3月24日)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	458
(1942年3月30日)	
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	471
(1942年3月31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473
(1942年4月2日)	
为儿童节题词	474
(1942年4月4日)	
给萧军的信	476
(1942年4月4日)	
为《八路军抗战烈士纪念册》题词	477
(1942年4月5日)	
给欧阳山的信	478
(1942年4月9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479
(1942年4月11日)	
给欧阳山、草明的信	480
(1942年4月13日)	

关于时局的报告	482
(1942年4月13日)	
给欧阳山、草明的信	483
(1942年4月17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485
(1942年4月17日)	
致陈毅电	486
(1942年4月19日)	
关于整顿三风	487
(1942年4月20日)	
准备应付反共高潮继续抓紧党内教育	500
(1942年4月21日)	
给萧军的信	501
(1942年4月27日)	
延安文艺座谈会请柬	502
(1942年4月27日)	
复周恩来电	504
(1942年5月7日)	

中国共产党对苏日中立条约发表意见^[1]

(1941年4月16日)

(一) 苏联根据其一贯和平中立政策，于四月十三日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这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又一次伟大胜利。这个条约的意义，首先在于巩固了苏联东面的和平，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全发展。而苏联的这种和平与发展，也即是全世界劳动人民与被压迫民族的利益。

(二) 苏日条约使苏联的国际地位极大的提高了，苏联无论在东方在西方都增大了他的发言权，这对于一切反动派都是不利的，而对于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与被压迫民族则都是有利的。

(三) 苏日条约没有限制苏联援助中国进行独立的正义的对日抗战，只要中国政府的方针是坚持民族解放的独立战争，只要中国政府对于苏联的援助是用以反对日本侵略者，而不是用以反对国内同胞，例如今年一月，在皖南消灭新四军及目前在安徽湖北等省大举进攻新四军之所为，只要不是这样，我们根据苏联的国策，深信苏联是会继续援助中国的。苏联的外交政策，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决不为帝国主义者的利益束缚自己援助被压迫民族的正义行动的手足。日本此次对于限制苏联援华的目的没有达到，是表示失望的！中国人民的希望，只要说到外援，便是首先寄托在苏联身上

[1] 这个意见是毛泽东起草的。

的，而苏联在这次条约上并没有使中国失望，也永远不会使中国失望。

(四) 至于苏日声明互不侵犯满洲与外蒙，这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所谓满洲国者，早为日本用为扰乱苏联与外蒙边疆的工具，张高峰、诺蒙坎两次战争，便是明证，苏联既与日本订立和平中立条约，便不能不把这一问题同时加以解决。在苏联，根据其和平中立政策，无论与日本订约与否，都是不准备侵入东四省的，而日本却屡图侵犯外蒙，而外蒙是与苏联订了互助条约的，现在苏日声明，却保证了外蒙不受侵犯，这不但对外蒙有利，即对全中国争取解放也是有利的。说到东四省的收复，原是我们自己的事，绝不能像有些投机家，总是希望苏联同日本打起来，以便坐收渔人之利，及见苏联声明不打满洲，他就认为苏联不对，这种人至少也是毫无志气的家伙。我们必须收复全国一切失地，必须打到鸭绿江边，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这是中国全民族的神圣事业，社会主义的苏联也必是赞助我们这种事业的。

(五) 在苏日条约之后，中国必须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三大方针。第一，任何对抗战的动摇是不许可的。第二，国共合作必须继续，解散新四军一类的分裂行动必须取消，以后再不可发生此类行动。第三，各种反动的对内政策必须停止。循此以行，外援方有所附丽，抗战才可期胜利。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则必至众叛亲离，危亡可立而待。我们共产党深望国民党当局实行深切的反省，善处当前的时局，则非仅国民党之利，民族解放事业实利赖之。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4月17日)

蒋介石历来认为苏联依赖他的抗日，他乃敢于放手反共，日苏条约对蒋给了一个严重打击。摆在蒋面前的是外交、财政、中间派三大困难问题，关于外交者是第一日本威胁加重，第二美、英重心在对德，第三苏联获得自由；关于财政者是收入不足十五分之一（五万万对七十五万万）；关于中间派者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地方实力派并不热心反共也不赞成投降。在日苏条约订立、苏联获得自由之后，蒋投降与反共将更加困难。

[1] 这是毛泽东关于苏日中立条约问题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雪枫电^[1]

(1941年4月17日)

陈锐霆^[2]团在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反对中国人打中国人等口号下光荣起义，起义后照外围军待遇。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彭雪枫电的主要内容。

[2] 陈锐霆，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十二军第一四二师第四二五团团长，1941年4月19日率部起义。

致贺龙、关向应等电^[1]

(1941年4月17日)

你们部队主力择适当地点集中整训，不要妨碍生产建设，以便坚持根据地。延安亦是这个方针（准备应付蒋之万一进攻，但不妨碍生产）。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贺龙、关向应并告彭德怀、左权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雪枫等电^[1]

(1941年4月20日)

陈锐霆团起义后不要改为八路军或新四军番号，可称九十二军独立旅，陈任旅长，保存外围军形式，归彭雪枫指挥。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彭雪枫并告陈毅、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雪枫等电^[1]

(1941年4月20日)

如昨电所说陈团起义后仍打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第九十二军的旗帜。对陈团内部须坚决执行一个路线的转变，使全团掌握在党的领导下，主要军职以党员与可靠分子充之，但须团结一切不反共的中间分子。惟有实行这种革命的两重性政策，才有利于争取国民党军队，也才有利于团结陈团中的中间分子。我对陈团的政策和对山西新军的政策是一样的，但和山东对一一一师的政策不同，山东没有采取内部坚决转变的方针。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彭雪枫并告陈毅、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左权等电^[1]

(1941年4月20日)

无论蒋介石是否马上进攻延安或增兵榆林，从聂荣臻处调两个旅至晋西北机动位置是必要的。两旅到后主要集结整训，并从事生产。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彭德怀、左权、贺龙、关向应、聂荣臻电的主要内容。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4月20日)

续范亭胃病甚重，似胃溃疡，来延医治，略有好转，请购药努
食丁二十盒航快寄来为盼。

[1] 这是毛泽东关于为续范亭购买药品问题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日苏缔约后英美及 中国各派政治力量态度的分析

(1941年4月20日)

周^[1]:

(一) 皓亥电^[2]悉，分析很对。在德国打击下，英国对苏邦交即
将好转，美国亦将大体上取英国步骤，决不能得罪苏联。中国英美
派，顽固派，中间派及进步派中之动摇分子，均将在英、美影响下
对苏献媚。惟顽固派中之死硬分子有被亲日派拉向投降的危险，这
是很可注意的，不过目前还不会。(二) 英、美总方针是先对德后对
日，决不敢对日本取强硬态度，将荷印^[3]让给日本，甚至停止援
华，都是可能的。只要德国占领苏伊士和轰炸伦敦袭击大西洋进一
步加紧，真正威胁英国生存时，只要日本同意不向英国开战，就有
这种可能。在这一情状出现时，你所指的英美派，顽固派，中间

[1] 周，指周恩来。

[2] 周恩来1941年4月19日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对日苏缔约后重庆方面各派政治力量的态度作了分析，指出中间派悲观，进步派中一部分人发生动摇，“看起来他们是在狭隘的民族情绪之下的一时的冲动表现，而顽固派则利用之以反苏，亲日派利用之以悲观，英美派利用之以亲美，虽然这都是一时现象”。

[3] 荷印，即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

派，及进步派中之动摇分子，就将发生大混乱，大分化，大动摇，他们将成为亲日派与共产派二者猛力争夺的对象，其时间或者在今年秋冬之间。我们方针是要争得蒋及国民党主体转变到亲苏、和共、改良的方向，而以维持他们的政权、承认我们的地位为条件。那时英苏、美苏之间可能成立互不侵犯协定（也许英苏协定不久就可签订）。（三）准备在日内发一次政治情报，当将你所说的解释狭隘民族观点说进去。（四）陈锐霆团^[1]决于日内起义，仍打九十二军旗子（称为九十二军独立旅），开到张爱萍^[2]区域整训。请准备对付国民党的可能询问，答以这是九十二军自己的事，凡对我攻击者我反击之，凡对我取友好态度者我以友好态度对待之，陈团对我友好，故我理应加以协助，但仍是九十二军，并非八路军。（五）请问国民党，对八路是否还准备发饷，如发则已，否则我们将向全国全世界（包括苏联在内）募捐，发起普遍的募捐运动（我们真正准备这样做），学叫化子讨饭吃的办法，因为国民党迫得我们没有路走，我们将要饿死了。

毛泽东

号亥

[1] 陈锐霆团，指陈锐霆任团长的国民党军第九十二军第一四二师第四二五团。

[2] 张爱萍（1910—2003），四川达县人。当时任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三支队司令员。

关于国共继续团结抗日问题致周恩来电

(1941年4月26日)

(一) 见蒋时可以提出你回延参加大会的要求，要他派机送你，并间他对我们大会有何意见。

(二) 表示我党愿意同国民党继续团结抗日，惟望国民党改变对内政策，并对八路发饷，合理解决新四军问题。

给任弼时的信^[1]

(1941年4月28日)

弼时同志，并转边区中央局：

施政纲领的最后修正稿付上二份，请在边区刊物上发表，并印多张广为散布于边区境内及境外。支部书记以上，班长以上，乡主席以上之干部须使之人手一张。群众报上，须为之逐条加以通俗解释，识字少些当作识字课本读熟。并张贴于通衢。

与此纲领发布同时，须由边局发一通知，亦同样在报上发表，在通衢张贴，并使干部人手一张。

[1] 1941年4月27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审查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拟在第二届参议会竞选时提出的施政纲领，决定按照毛泽东的修改通过，于五一劳动节发布。这是4月28日，毛泽东就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修改和发表问题，给任弼时并转边区中央局的信。5月1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共陕甘宁中央局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在《新中华报》正式发表。

任弼时同志并转中央局：

兹因原拟的报告已修正稿付上
二份，送中央审阅。兹将多种
修改意见附此函内。因之对文
中有关“政治性”，“经济性”，“社会性”之
提法，未予采用。④因之对文
中有关“批评性”的提法，未予
采用。且对批评性之
提法，予以取消。在此函致你布同时，须由你
转知，亦即你转达彼上层者，应通
该函件，且你转达时一并付去。

毛泽东致任弼时信的手稿。

发展上海到福州广大地区的游击战争^[1]

(1941年4月30日)

少奇、陈毅、小姚：

敌占宁波、奉化、温州、福州。如系久占，你们应注意组织各该地之游击战争。有地方党者指导地方党组织之，你们派少数人帮助之，无地方党者由你们派人组织之。从吴淞经上海、杭州、宁波直至福州，可以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上海、杭州线的军事领导不可仅委托谭震林^[2]，他一人管不到许多，有单独成立战略单位之必要（此区有大发展前途），可划为第八师^[3]区域。你们意见如何及如何组织，请考虑电告。

毛 朱 王 叶
三十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给新四军政治委员刘少奇、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和新四军政治部代主任饶漱石（小姚）的电报。

[2] 谭震林，当时任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治委员。

[3] 当时新四军序列只有七个师，即第一至第七师，后来没有成立第八师。

为金茂岳题词^[1]

(1941年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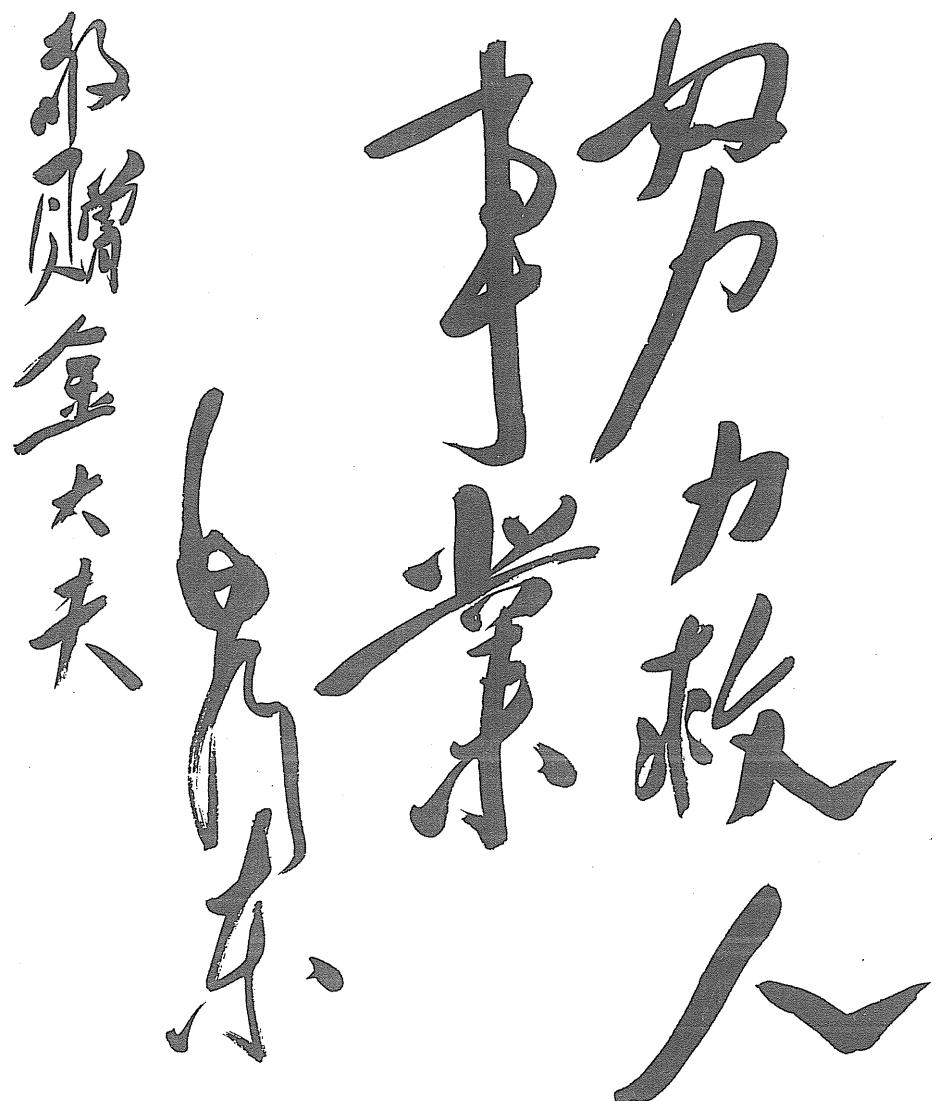
努力救人事业。

毛泽东



1941年，毛泽东在中央医院看望伤员。

[1] 这是毛泽东为1940年由国民党统治区到延安任中央医院妇产科主任的金茂岳所写的题词。



毛泽东为金茂岳的题词。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

(1941年5月1日)

为着进一步巩固边区，发展抗日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以达坚持长期抗战增进人民福利之目的起见，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特于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举行选举之际，根据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总理遗嘱及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向我边区二百万人民提出如下之施政纲领，如共产党员当选为行政人员时，即将照此纲领坚决实施之。

(一) 团结边区内部各社会阶级，各抗日党派，发挥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为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中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战。

(二) 坚持与边区境外友党、友军及全体人民的团结，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行为。

(三) 提高边区武装部队的战斗力，保障其物质供给，改善兵役制度及其他后方勤务的动员制度，增进军队与人民的亲密团结。同时加强抗日自卫军、少先队的组织与训练，健全其领导系统。

[1] 这个文件的绝大部分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他还为这个文件改拟了题目《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题下注“（中华民国三十年五月一日，中共边区中央局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

(四) 加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工作，彻底实施优抗条例，务使八路军及一切友军在边区的家属得到物质上的保障与精神上的安慰。

(五) 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

(六) 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1]、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除司法系统及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其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审问或处罚，而人民则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

(七) 改进司法制度，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不重口供。对于汉奸分子，除绝对坚决不愿改悔者外，不问其过去行为如何，一律施行宽大政策，争取感化转变，给以政治上与生活上之出路，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对于一切阴谋破坏边区的分子，例如叛徒分子、反共分子等，其处置办法仿此。

(八) 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同时实行俸以养廉原则，保障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必需的物质生活及充分的文化娱乐生活。

(九) 发展农业生产，实行春耕秋收的群众动员，解决贫苦农民耕牛、农具、肥料、种子的困难，今年开荒六十万亩，增加粮食产

[1] 这里的“政权”，指政治权利。

量四十万担，奖励外来移民。

(十) 在土地已经分配区域，保证一切取得土地的农民之私有土地制。在土地未经分配区域(例如绥德、富县、庆阳)，保证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及债主的债权，惟须减低佃农租额及债务利息，佃农则向地主缴纳一定的租额，债务人须向债主缴纳一定的利息，政府对东佃关系与债务关系加以合理的调整。

(十一) 发展工业生产与商业流通，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欢迎外地投资，实行自由贸易，反对垄断统制，同时发展人民的合作事业，扶助手工业的发展。

(十二) 调节劳资关系，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增强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纪律，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

(十三) 实行合理的税收制度，居民中除极贫者应予免税外，均须按照财产等第或所得多寡，实施程度不同的累进税制，使大多数人民均能负担抗日经费。同时健全财政机构，调整金融关系，维护法币，巩固边币，以利经济之发展与财政之充裕。

(十四) 继续推行消灭文盲政策，推广新文字教育，健全正规学制，普及国民教育，改善小学教员生活，实施成年补习教育，加强干部教育，推广通俗书报，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保护流亡学生与失学青年，允许在学学生以民主自治权利，实施公务人员的两小时学习制。

(十五) 推广卫生行政，增进医药设备，欢迎医务人才，以达减轻人民疾病之目的，同时实行救济外来的灾民、难民。

(十六) 依据男女平等原则，从政治经济文化上提高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发挥妇女在经济上的积极性，保护女工、产妇、儿童，坚持自愿的一夫一妻婚姻制。

(十七) 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

(十八) 欢迎海外华侨来边区求学，参加抗日工作，或兴办实业。

(十九) 给社会游民分子以耕种土地、取得职业与参加教育的机会，纠正公务人员及各业人民中对游民分子加以歧视的不良习惯，对会门组织实行争取、团结与教育的政策。

(二十) 对于在战斗中被俘之敌军及伪军官兵，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实行宽大政策，其愿参加抗战者，收容并优待之，不愿者释放之，一律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其有在释放之后又连续被俘者，不问被俘之次数多少，一律照此办理。国内如有对八路军、新四军及任何抗日部队举行攻击者，其处置办法仿此。

(二十一) 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的活动。其有因革命行动被外国政府压迫而来边区者，不问其是宗主国人民或殖民地人民，边区政府当一律予以恳切的保护。

高岗同志：希十虚病了使你更健康。希十二位高病
官助纪律一严，该加严肃。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中华民国卅一年五月一日中央社
中央高提上中央中央政治局会)

为着进一步巩固边区发展抗日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以适应新
时期扩大我增加人民福利之目的起见，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高特大
边正布二属参政会举行选举之球，根据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理论道
嘱及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向附近之西北人民提出
如下之施政纲领，如共产党者当选为行政人员时，即特此此纲领
坚决实施之。

(一) 团结边区内各社会阶级，齐心同党派，肃清一切人与物
之财力、智力，为保障边区、保障国民、保障中国、保障抗日、保障民主而
奋斗。

(二) 坚持共产国际以及党及革命全体人民的团结，反对民族分
裂倒退的行为。

(三) 提高边区各部党的部门，保障其地盘阵地，改善军民生活
及其他提高群众的生活制度，增加军民两人民的机智团结，同时加

毛泽东审阅修改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5月2日)

如陈^[2]至榆及向榆林增兵势必引起重大纠纷，如保持榆林现状，我可保证不向榆林、宁夏、内蒙作任何行动，否则引起纠纷责在彼方。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陈，指陈长捷，当时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副总司令。

致陈毅等电^[1]

(1941年5月5日)

蒋、桂在华中的防区方面有重大矛盾，各欲置对方于危险地带，置自己于有利地带。据汤恩伯称，已奉蒋令，该集团负责区域划定为淮河以北，平汉路以东，黄河以南，津浦路以西地区，亦可见蒋攻我之心未死，没有敌人大举“扫荡”，他是不会放手的。自苏日条约签订后，国民党苦闷彷徨，桂系亦感无出路，据重庆消息，白崇禧很苦闷，说蒋介石“反共无决心，和共亦无决心”，近日白、蒋间颇有隔阂。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关于国民党军在华中的动态及蒋介石同桂系的矛盾问题，致陈毅、刘少奇并告彭德怀、左权电的主要内容。

给周恩来的信

(1941年5月5日)

周恩来同志：

现急切需要下列各书报：

(一) 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重庆中四路九八号，附二号)出版的，有《四川经济参考资料》《贵州经济》《列强军事实力》《日本对支经济工作》以及该所出版的各期《中外经济年报》《中外经济拔萃》。

(二) 西南实业协会编辑的《四川工厂名录》。

(三) 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辑的《中华民国统计提要》。

请即妥人购买，运寄费都交各书店，由书店直接挂号寄来。如能一种购买两部或三部，可将一部托人带来，《西南实业通讯》已久未到，请订两份。桂林出版的《实用国民年鉴》，请就便购两三部。商务出版方显庭的《中国工业资本问题》前托购尚未收到，请查是否购得。关于各种统计公报及经济书籍，这里很需要，此后请指定专人多为购买。重庆运来书籍以此类较多为好，请嘱办事处同志注意。又云南出版的书报及桂版《大公报》，这里亦缺，请订购。各种书报订购至少一年为限。通讯处：延安新市场中山商店图书部。

毛泽东 陈伯达^[1]
微日

[1]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

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1]

(1941年5月8日)

这一次的反共高潮，正如三月十八日中央的指示所说，是已经过去了。继之而来的是在国际国内的新环境中继续抗战的局面。在这个新环境中所增加的因素是：帝国主义战争的扩大，国际革命运动的高涨，苏日的中立条约^[2]，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被击退以及由此产生的国民党政治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政治地位的提高，再加上最近日本准备新的对华大举进攻。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坚持抗日，并继续有效地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危险和反共逆流起见，研究和学习我党在英勇地胜利地反对这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所获得的教训，是完全必要的。

(一) 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全部地叛变投降，也决不能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上次反共高潮曾被一部分同志估计为马日事变，这次反共高潮又被估计为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但是客观事实却证明了这种估计是不正确的。这些同志的错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

[2] 指1941年4月13日苏联和日本在莫斯科签订的中立条约。

误，在于忘记了民族矛盾是基本矛盾这一点。

(二) 在这种情况下，指导着国民党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性的阶级，它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而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两面性。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地作战，不积极地反汪反汉奸，有时还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变和一月十七日的命令那种地步，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这些事实，也在这次反共高潮中再度地证明了。极端地复杂的中国政治，要求我们的同志深刻地给以注意。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既然还在抗日，其对我党既然还在一打一拉，则我党的方针便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1]，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只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天没有完全叛变，我们的这个政策总是不会改变的。

(三) 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战，需要一整套的战术，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人民革命力量的仇恨和残忍，不但为过去十年的反共战争所证明，更由抗日战争中的两次反共高潮特别是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的皖南事变所完全地证明了。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为蒋介石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除了对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便无他路可循。这次反共高潮中项英同志的机会主义^[2]的失败，全党应该引为深戒。但是斗争必须是有理、有利、有节的；三

[1] 这是宋朝的著名学者、理学家朱熹（1130—1200）在《中庸》第十三章注文中所说的话。

[2] 参见《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一文的题解。

者缺一，就要吃亏。

(四) 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将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没有或较少买办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最反动的大地主和开明绅士及一般地主加以区别，这是我党争取中间派和实行“三三制”政权的理论根据，这是去年三月以来中央就屡次指出了的。这次反共高潮再一次地证实了它的正确性。我们在皖南事变前所取《佳电》^[1]的立场，对于事变后我们转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即不能争取中间派。因为如果不经过反复多次的经验，中间派对于我党为什么必须向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为什么只能以斗争求团结，放弃斗争则没有任何的团结，就不能了解。地方实力派的领导成分虽然也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但是因为他们和统制中央政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分子有矛盾，故一般地亦须以中间派看待之。上次反共高潮中反共最力的阎锡山，这一次就站在中间立场；而上次居于中间立场的桂系，这一次虽然转到了反共方面，却和蒋系仍然有矛盾，不可视同一律。其他各地方实力派更不待论。我们同志中却有许多人至今还把各派地主阶级各派资产阶级混为一谈，似乎在皖南事变之后整个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叛变了，这是把复杂的中国政治简单化。如果我们采取了这种看法，将一切地主

[1] 《佳电》是中共中央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名义，于1940年11月9日答复何应钦、白崇禧《皓电》的电报。这个电报，揭发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阴谋，驳斥了何、白强迫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的荒谬命令；同时，为了照顾团结抗日的大局，委曲求全，同意将江南新四军部队移至长江以北，并且进一步要求解决国共间的若干重要悬案。这个电报，曾经取得当时中间派的同情，孤立了蒋介石。

资产阶级都看成和国民党顽固派一样，其结果将使我们自陷于孤立。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1]，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

(五) 有些同志由于对于中日矛盾是基本矛盾这一点发生动摇，并因此对国内阶级关系作了错误的估计，因而对党的政策也有时发生动摇。这些同志在皖南事变后，从其“四一二”和马日事变的估计出发，似乎感觉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中央的原则指示，已不适用，或不大适用了。他们认为现在需要的已不是包含一切主张抗日和民主的人们的政权，而只是所谓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权了；已不是抗日时期的统一战线的政策，而是像过去十年内战时期那样的土地革命的政策了。党的正确的政策，在这些同志的心目中，至少是暂时地模糊起来了。

(六) 这些同志，当着我党中央令其准备对付国民党的可能的破裂，对付时局发展的最坏的一种可能性的时候，他们就把别的可能性丢掉了。他们不了解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这次我们充分地准备着对付国民党的破裂，就使国民党不敢轻于破裂了。

(七) 还有更多的同志不了解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不了解统一战线政策和阶级政策，从而不了解统一战线教育和阶级教育的一致性。他们认为在皖南事变后需要特别强调所谓统一战线教

[1] 毛泽东的这个说法，是指领导革命的中国工业无产阶级和反动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中国社会总人口中都只占少数，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阶级在中国社会总人口中占了绝大多数。

育以外的阶级教育。他们至今还不明白：我党在整个抗日时期，对于国内各上层中层还在抗日的人们，不管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中间阶级，都只有一个完整的包括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两面性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即使是伪军、汉奸和亲日派分子，除对绝对坚决不愿悔改者必须采取坚决的打倒政策外，对其余的分子也是这种两面性的政策。我党对党内对人民所施行的教育，也是包括这两方面性质的教育，就是教导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如何和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各个不同的阶层在各种不同的形式上联合抗日，又和他们的各种不同程度的妥协性、动摇性、反共性作各种不同程度的斗争。统一战线政策就是阶级政策，二者不可分割，这一点不弄清楚，很多问题是弄不清楚的。

（八）还有一些同志，不了解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判断一个地方的社会性质是不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地是以那里的政权是否有人民大众的代表参加以及是否有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因此，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便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有些人以为只有实行十年内战时期那样的土地革命才算实现了新民主主义，这是不对的。现在各根据地的政治，是一切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人民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其经济是基本上排除了半殖民地因素和半封建因素的经济，其文化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因此，无论就政治、经济或文化来看，只实行减租减息的各抗日根据地，和实行了彻底的土地革命的陕甘宁边区，同样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复周恩来电^[1]

(1941年5月8日)

(一) 对于敌军进攻，须强调“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号召。(二) 对于国民党要求我们配合作战，须告以当然如此，不成问题。(三) 我们要求事项：(甲) 速解决新四问题；(乙) 速发饷弹；(丙) 停止反共；(丁) 派机送周回延开会。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当前形势与我们的方针

(1941年5月9日)

彭、左，陈、刘、赖，贺、关，荣臻，萧克，吕、程，刘、邓，任穷，朱、陈、罗，黎、罗，粟、刘，克诚，张、邓，雪枫，先念，震林^[1]：

(一) 敌正集中兵力，企图进攻河南、陕西、云南，打通平汉路，截断西南、西北两交通线。对豫、陕两方，闻调动兵力在四个

[1] 彭、左，指彭德怀、左权，当时分别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和副参谋长。陈，指陈毅，当时任新四军代军长。刘，指刘少奇。赖，指赖传珠，当时任新四军参谋长。贺、关，指贺龙、关向应，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和政治委员。荣臻，即聂荣臻，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克，当时任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吕，指吕正操，当时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司令员。程，指程子华，当时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政治委员。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和政治委员。任穷，指宋任穷，当时任八路军冀南军区政治委员。朱，指朱瑞，当时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陈、罗，指陈光、罗荣桓，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和政治委员。黎，指黎玉，当时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委员。罗，指罗舜初，当时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参谋处处长。粟，指粟裕，当时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刘，指刘炎，当时任新四军第一师政治委员兼苏中军区政治委员。克诚，即黄克诚，当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张，指张云逸，当时任新四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邓，指邓子恢，当时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雪枫，即彭雪枫，当时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先念，即李先念，当时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震林，即谭震林，当时任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治委员。

师团以上，日来平汉、同蒲各路运输甚忙，战事有在近日发生可能。

(二) 判断经此战役国民党反共气焰当大减杀，时局有好转希望。苏联援华不变，近到飞机百余架，炮二百门，中苏关系亦有改善可能。汤恩伯、胡宗南均准备对敌。国民党要求我军配合作战，惟仍想用激将法，谓中共如不与日妥协，便应在华北发动攻势，制止敌进。

(三) 我们方针，决不被其激将法所动，仍按我军现在姿态，巩固各根据地，耐心发展敌、伪、奸三种工作（这是极重要的）。按当地情况许可，拔取敌伪某些深入我区的据点。在接近豫、陕地区，应有相当部队配合友军作战，并极力发展统战工作，但不要乘机向国民党地区扩展，使蒋、桂各军放心对敌。对韩、沈、于、高^[1]各部亦暂时停止攻击。在战事发生时，应强调“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号召。

(四) 中央已电恩来同志，对国民党要求我军配合作战，告以当然如此，不成问题。同时提出（甲）速解决新四军问题，（乙）速发饷弹，（丙）停止反共，（丁）派机送周回延开会等项。

(五) 我八路、新四两军望按上述方针沉着地部署一切。

毛 朱 王 叶^[2]
佳

[1] 韩，指韩德勤，当时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沈，指沈鸿烈，当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于，指于学忠，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总司令。高，指高树勋，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新编第八军军长。

[2] 朱，指朱德。王，指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叶，指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5月10日)

已电总部拟具体配合中央军作战计划，惟新四、饷弹、反共三大问题，请蒋速予解决。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致陈毅、刘少奇电^[1]

(1941年5月12日)

敌占领郑州后意图不明，蒋令何柱国^[2]袭击陇海线，扰敌后路，兼有防我意。为减轻蒋对我恐惧起见，彭、邓^[3]所部，不应越过津浦线以西，仍在原地不动为要，张、罗^[4]亦不可抗击李品仙。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陈毅、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2] 何柱国，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

[3] 彭、邓，指彭雪枫、邓子恢。

[4] 张、罗，指张云逸、罗炳辉。

为护士节题词^[1]

(1941年5月12日)

护士工作有很大的政治重要性。

毛泽东

[1] 1941年4月，延安中央医院护士发起成立护士学会，并于5月12日召开护士节纪念大会。这是毛泽东为护士节写的题词。

伟大的护士节
政府重视有功
人民军队

毛泽东为护士节的题词。

团结对敌有计划地配合友军作战

(1941年5月14日)

德怀^[1]同志：

前电谅达。目前国民党非常恐慌，望我援助甚切。判断在日寇此次打击^[2]下，国民党不能不向我讨好，国共地位将发生根本变化，我党在抗战中将日益占据领导地位。因此，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但决不为国民党激将法所冲动，而是周密考虑情况，给以有计划地配合。恩来^[3]要求将晋东南、晋西北、五台、冀中、冀南、山东都包括在配合范围之内，我意主要配合区域应是晋东南与冀南，其他作为次要配合区域（即按寻常状态作战）。请加考虑作出一具体计划告我，以便转告恩来及总顾问^[4]。盼复。
(一切战报多发西安、重庆、延安)

毛泽东

寒酉

[1] 德怀，即彭德怀。

[2] 指1941年5月7日日军向晋南中条山地区国民党军卫立煌部发动的进攻。

[3] 恩来，即周恩来。

[4] 总顾问，指崔可夫。1940年12月后担任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和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总顾问。

关于华北我军配合国民党 对日作战等问题的指示

(1941年5月14日)

周恩来同志，并告德怀：

- (一) 各电均悉。
- (二) 已迭电前方配合作战。
- (三) 朱总已电熊彬，卫立煌，表示团结对敌，我已电伍永福^[1]、袁晓轩向各方表示此意。
- (四) 判断国民党在此次打击后，不能不向我们讨好，国共地位将发生根本变化，我党在抗战中将日益占据领导地位。
- (五) 要告诉总顾问^[2]及党外人士，武汉失守后，两年半来，日本政策是主要对共，放松对国，以利诱降，故两年半来，国民党对日打得很少，他也和日本一样，主要对共，放松对日，发动两次自毁藩篱的反共高潮给日本看，希望日本不再进攻，这个政策是根本错误了。我党对日则无日不战，对目前进攻，又决定配合作战。东条陆相在今年一月议会中声明，重庆政府自前年冬季攻势以来没有打什么仗，只有共产党作了有力反攻，就是证据。
- (六) 已电德怀，要他周密考虑情况，采取主动地有计划地配合

[1] 伍永福，即伍云甫。

[2] 总顾问，即苏联顾问崔可夫。

行动，但决不为国民党的激将法所冲动，此点亦要告诉总顾问，要他不要随便乱说。国民党至今还说我军游而不击，甚至说我对日妥协等鬼话，他将来还是要说的，我们决不为这些鬼话所动，我们总是主动的，坚定的，有步骤的作战。

(七) 李品仙的根据地立煌县^[1]已搬空，洛阳西安纷纷搬家，恐慌万状，令人可恨可笑。

毛泽东

寒酉

[1] 立煌县，县名，今为金寨县。

致廖承志电^[1]

(1941年5月14日)

(一) 日寇准备大举进攻, 我军决配合国民党作战。(二) 对鲁斯^[2]一类美国人可与之多联络, 表示我党坚决抗日到底, 武汉失守后主要抗战的是我党, 国民党打得很少。我党对内要求, 只有一个民主。对外交是主张与英、美联系的。

[1] 这是毛泽东致廖承志电的主要内容。

[2] 鲁斯, 美国援华委员会委员、作家和记者, 1941年5月8日到达重庆。

致彭德怀电^[1]

(1941年5月14日)

据报日军沿黄河增兵甚多，扬言渡河。又传日军于日前由平民抢渡，沿河民众甚为恐慌，西安粮价亦猛涨，正在疏散，人心惶惶。我军于此时机有在敌侧背给以打击以振奋国民党之必要，如何望告。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左权电^[1]

(1941年5月15日)

八路军总部应不断向蒋介石等通报敌情、战况，特别是胜利消息（包括全华北的），以影响其抗战决心，争取国共关系好转。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彭德怀、左权电的主要内容。

八路军新四军均在敌后猛击敌人

(1941年5月15日)

伍处长、袁处长^[1]:

(一) 敌军万一渡河时，你们须准备迁移，除笨重物件迁到适当地点外，云甫须同办公厅熊主任^[2]一起，随时向他请示，并要求他保护。晓轩须同卫长官^[3]一起。(二) 向各方表示，八路军新四军均在敌后猛击敌人，与正面友军配合作战，决不计较国民党的反共仇恨。惟饷弹两缺，希望政府接济。边区周围友军开至河防御敌后，边区八路留守部队坚持团结，仍守原防。(三) 随时将国民党动向电告。

毛泽东

删午

[1] 伍处长、袁处长，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伍云甫和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

[2] 熊主任，指熊斌，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办公厅主任。

[3] 卫长官，指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关于出版《解放日报》 和改进新华社工作的通知^[1]

(1941年5月15日)

五月十六日起，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事业亦加改进，统归一个委员会管理。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各地应注意接收延安的广播。重要文章除报纸、刊物上转载外，应作为党内、学校内、机关部队内的讨论与教育材料，并推广收报机，使各地都能接收，以广宣传，是为至要。

[1] 本篇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通知。

AA 立 考研有各電台（包括邊區各台及外國
立正規方針） 考察過（註明時間）
19 大字

附二 中央對東北局（五月初三日） 129 129
五月十三日起，將其擴大擴充，逐月增加開會
併，當版報發給各級，並普遍地宣傳，並加
強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工作，即要以政策，
將應急的，從而逐步地鞏固向全國宣傳，勿
忘形而忘神，而忘內外，及重要幹部教育，
各地黨組織接收黨委的廣播，重要文書（各項
報紙刊物等）外，各項為黨內外事務機關
部署內外事務及各項材料，並研究內外事務
以便隨時調整。
中央對東北局（五月初三日） 129 129
中央對東北局（五月初三日） 129 129

毛泽东起草的《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工作的〈中央书记处通知〉》的手稿。

延安《解放日报》发刊词

(1941年5月16日)

本报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就是本报的使命。在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这一使命是更加严重了。

现在的问题是：世界是帝国主义强盗互相屠杀的世界，还是世界人民和平的世界？中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中国，还是中国人的中国？这些问题，在现在帝国主义战争变为世界范围的战争，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最后灭亡中国之时，已经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了。

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不卷入战争（美国实际上已经参战），战争已以全球为屠场，全世界人民如不奋起反对战争力争人民的和平，则世界有陆沉之忧，人类有毁灭之祸。现在全世界人民反帝反战的斗争已经发展起来，这是世界真正光明的所在，各国共产党站在这一斗争的前线，这一斗争将援助着中国人民的斗争，中国人民有与世界人民相联系的任务。

日本帝国主义在四年战争中不能解决的中国问题，它现在企图来“最后解决”了，一切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加以轻视的意见是不对的，在这种意见之下，就是国共磨擦，就是反共高潮，就是两个战争。我们主张是国共团结，是消灭磨擦，是一个战争。须知只

有一个战争，一个专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才能打退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与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中国的外交政策必须是亲苏政策，虽然同时不放弃对英对美的外交。中国的内政政策，必须是民主政策，一切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反动政策，必须取消。

现在是中国存亡绝续的关键，全国一切抗日党派抗日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这个主要的敌人。中国共产党是站在这一斗争的前线的，过去如此，现在还是如此，将来还是如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始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国共产党是与人为善的，一切在抗日战争中犯过错误的人，中国共产党与以反省改悔的机会，仅仅对背叛民族利益而又绝对坚决不愿改悔的人，方才与以坚决的打击。而这乃是完全必要的，对于背叛民族利益而又绝对坚决不愿改悔的民族叛徒，如不与以坚决的打击，则民族抗战必然遭到失败。

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就是本报的使命，本报同人完全相信，由于世界人民与中国人民协力斗争的结果，世界必然要变成一个世界人民的光明世界，中国必然要变成一个中国人民独立自主的中国，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企图，我们是能够粉碎的。团结，团结，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武器，也就是我们的口号。今当本报发刊之始，愿掬至诚，以告国人。

为《解放日报》题写报头^[1]

(1941年5月16日)

解放日报



毛泽东为《解放日报》题写的报头。

[1] 1941年4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出版《解放日报》，并任命博古为报社社长兼主笔。《解放日报》报头4个字是毛泽东题写的，当时他大大小小共写了7份，供报社选用。图为《解放日报》后来选用的报头。

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1]

(1941年5月18日)

估计日本帝国主义动向的人，往往单从日对美急进派即法西斯派的主观需要出发，而忘记客观存在着的并且是主要决定日本动向的因素。三国同盟后，国民党人是这样的，其他人员也有是这样的。

目前国际形势中的主要特点有三个：一是德国大胜利，二是中国发展着的抗日战争，三是苏联的和平政策。我们一般地估计国际问题，特殊地估计日本问题，都不能离开这样三个特点。对于这三大特点熟视无睹的人，或过低估计它们的重要性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作出不正确或不大正确的结论。

德国帝国主义已征服了苏联除外的整个欧洲，又向非洲近东发展，又在英伦三岛继续大规模的轰炸，又向大西洋发展其潜艇战争，这就表示着德国帝国主义有夺取世界霸权的趋势，同他争夺这个霸权的英美，不能不起而拼命，美国的迅速准备参战，就是这一形势的结果。在此形势下，英美的帝国主义计划，是集中力量对德。他们估计，只要英伦三岛站得住脚，他们就可以利用其海上优势，并恢复制空权，迫使希特勒的火头向东边烧，使之与苏联相摩相荡，天从人愿，有一天挑动了德国内部的反苏派，爆发了德苏战

[1] 这是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

争，他们的“计划”就“成功”了。不让希特勒向西，不让苏联置身事外，又来一个欧洲慕尼黑，这就是他们的总方针。在远东，则利用三国同盟的内部矛盾，拆散东京柏林轴心，贿买日本，把日本拉到自己怀里来，再一次施行远东慕尼黑，利用中日矛盾与苏日矛盾，迫日向西向北，配合其迫使向东的西方政策。所有这一切，就是英美帝国主义者的“锦囊妙计”。德国愈胜利，愈引起英美绅士们苦心焦思寻找德国弱点与日本弱点的努力，而一切文章，都想到苏联身上去，每一次英美绅士们的危机，总是想从苏联身上打主意以求解脱，这是他们早已发明了的规律。对于日本，德国胜利给日本统治阶级全体以乘机图利的鼓励，因为他吸引着英美的精力日益向着大西洋而不是向太平洋。在这个问题上，日本统治者的三派（亲德意的法西斯派，亲英美的现状维持派，介乎二者间的中间派），虽则在政权分配上，各欲利用国际变动中每一不利于对方的形势，以求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在利用西方矛盾（英德、美德、苏德矛盾）以达日本扩展目的一点上，则是一致的，他们又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因为让希特勒去担负英美那一堆重担，让希特勒把苏联的注意力引到西方去，自己坐山观虎斗，然后乘机以图大利，他们认为是较有益的。日本在三国同盟中，和意大利之完全充当希特勒走卒不同，他具有着半独立的性质，仅仅与希特勒愿望相一致而与日本愿望相违反的命令，例如立即爆发太平洋战争之类，日本是不能服从的，日本的对华战争，日本的国力，日本统治者内部的矛盾都不许可他这样做。这件事就产生最近数月特别是最近一星期来日本与英美间互相勾搭的若干喜剧。对于这类喜剧，只能从英美与日本双方都愿意暂时（不是说永久）避开太平洋战争一点来解释，不过一方是为着集中对德，一方是为着集中对华并对西方坐山观虎斗以

便将来乘机图利，这个区别而已。但这件事对于中国国民党的若干统治人物则是一瓢冷水，因为他们在三国同盟后是每天盼望着日美战争来救命的，他们的罗斯福不愿鉴怜他们的哀乞，日本的意图也和他们的愿望相别扭。围绕着德国胜利一事而产生的国际情况之变化，我们认为是应该这样来看的。

对于中国发展着的抗日战争，很多人是估计过低的，有些人甚至这样觉得，似乎日本可以撇开中国不顾，一意南进，爆发日美战争。殊不知恰好相反，基本上决定日本的动向的正是中国，正是这个巍然站在日本面前、日益觉醒、日益强大的抗战的中国。中国现在是一堆民族革命的大火，在这里高一举着火炬的是几万万人，而共产党则站在这个火炬行列的最前线。日本统治者在武汉占领后，两年半以来，实行着集中对共放松对国以利诱降的政策，但这个政策是失败了，共既越打越巩固，国亦投降而未降。所可惜的，是我们友党中的统治人士们，不于此时期内修明政治，加强团结，却于此两年半中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抄袭日本人的做法，来一个集中反共，放松对日。其意若曰：我用全力反共了，你们日本人可以放手去同美国开战，不要向我再进攻吧。但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听这些话的，他要的是全中国，他不但要“反共”，而且要“灭党”。日本人说：要我不进，除非投降，除非爆发全面的国共战争，单单一个皖南事变是不够的。真的，皖南事变后，日本人确实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来挑拨国共战争。但由于共产党中央的力维大局，加上国民党主要领导人物也不愿上日本的当，日本的挑拨伎俩是破产了，迫得他调动军力来作他所不愿意的冒险的进攻，这就是近日突然紧张的战争形势之由来。我们可以断定地说：由于国共团结与日益发展着的人民抗日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火焰，只会越烧越高，日本

帝国主义将葬身于中国大火之中。自然，这件事帮了英美一个大忙，替他们牵制了日本的南进，便利于他们集中对德。但他们是并不爱惜中国的，他们是损人利己的帝国主义者，只要日本不发动太平洋战争，他是愿意给与日本很多东西的，橡皮呀，油呀，棉花呀，机器呀，应有尽有，还在其次，甚至牺牲中国与荷印，也是放在罗斯福丘吉尔之锦囊里面的，远东慕尼黑的新危险，决不是完全不可能的神经过敏之谈。可是只要中国争气，撑持下去，日本的旄头尽管西向，我们的火炬却大堆东抛，来一场伟大的决斗，战胜日本是完全有办法的。伟大的中国缠住了日本，使他只有暂时避开太平洋战争。基本上决定着日本动向的是中国，就正如基本上决定着中国动向的是日本，不过是一件事的两方面。

说到苏联的和平政策，那可以说，这是整个世界的制动机，他的力量将战胜一切帝国主义反动派的阴谋。英美幻想的希特勒烽火东烧也好，其他任何反苏阴谋也好，都将有一天被人看得见是一堆被打得粉碎的破铜烂铁。赫斯出奔，证明英美最近一次大阴谋又已失败，德苏新谅解又已成立，欧洲新慕尼黑危险又被打破，这是斯大林祭起了“东风”的胜利。西方如此，东方亦然。尽管英美又弄什么新的远东慕尼黑，把他们在日本的一切徒子徒孙们通通调动起来，也是无济于事的，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去。英美要拆抗日战争的台也是不行的，中国的抗日火炬自有斯大林来加油，并且是靠得住来加的。日本帝国主义如果冒冒失失地向中国西境乱撞乱碰，便将靠得住得一个焦头烂额，因为中国不但有一个并未被破裂的国共合作，还有一个日益增长的中苏合作。对于苏联的和平政策熟视无睹，或估价过低，也是确定地不正确的。

日本就不南进了吗？他是要南进的。但目前他第一要西进，他

妄想先解决中国问题。他想利用目前的时间，让希特勒向英美猛打，他却向中国猛打。他企图割断中国西北西南两条交通路，并打通平汉线。一阵猛打之后，他必又来一阵软攻，策动他的第五纵队（何应钦之类），大施拉拢手段，以达诱降目的，一打一拉，仍是日本的两大法宝。估计到某种时机，又有可能来一个投降危机，我们现在就应该警惕。日本的如意算盘大概是这样的：在不很长的时间内解决或大体解决中国问题，等到英美更加无法顾及东方了，要就是你们爽快地将太平洋交给我，要就是我向你们动刀枪，总之那时我是“如意”的。对于一切帝国主义者的主观算盘，都不可看成为结果，他们的主观算盘与最后结果之间，或者是根本相反的，或者是相差甚远的，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算盘也当作如是观。他又要“先解决”我们了，让他再来一次吧。他对中国的所谓“计划”，不知失败了多少次，让他再失败一次吧。这是完全可能的，世界上一切反动派都无法估计革命力量之发展，这一点是反动派们注定了的致命伤。

世界究竟是谁人的世界？帝国主义强盗们说一定是他们的世界，而人民则说一定是人民的世界。中国究竟是谁人的中国？日本帝国主义者说一定是他的中国，而我们则说一定是中国人的中国。“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呢？只有人民，只有我们，才能正确答复这个问题。对的，正确的，只会是人民，只会是我们，而决不是敌人，决不是他们。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我们是一切胜利把握的。

改造我们的学习^[1]

(1941年5月19日)

我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其理由如次：

—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

[1]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这篇报告和《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是毛泽东关于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在这些文章里，毛泽东进一步地从思想问题上总结了过去中国共产党内路线的分歧，分析了广泛存在于党内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作风，主要是主观主义的倾向，宗派主义的倾向，和作为这两种倾向的表现形式的党八股。毛泽东号召开展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即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原则整顿作风的运动。毛泽东的这个号召，很快地在中国共产党内和党外引起了怎样以从实际出发的观点而不是以教条主义的观点来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怎样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以及怎样对待1931年年初至1934年年底这段时期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样一些重大问题的大讨论，巩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党内外的阵地，使广大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了一步，使中国共产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则现在我们对于这些的认识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抗日战争以来，我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研究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是进一步了，研究中国历史也有某些开始。所有这些，都是很好的现象。

二

但是我们还是有缺点的，而且还有很大的缺点。据我看来，如果不纠正这类缺点，就无法使我们的工作更进一步，就无法使我们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

首先来说研究现状。像我党这样一个大政党，虽则对于国内和国际的现状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绩，但是对于国内和国际的各方面，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二十年来，一般地说，我们并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

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真理。

其次来说研究历史。虽则有少数党员和少数党的同情者曾经进行了这一工作，但是不曾有组织地进行过。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

其次说到学习国际的革命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

上面我说了三方面的情形：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

确实的，现在我们队伍中确有许多同志被这种作风带坏了。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具体情况，不愿作系统地周密地调查和研究，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这种主观主义的作风，不是还在许多同志中间存在着吗？

对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

荣。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捡来的。

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

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说，他们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他们既然违背了这条原则，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在延安学了，到富县^[1]就不能应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2]，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这样一来，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

[1] 富县在延安南面约80公里。

[2] 边币是1941年陕甘宁边区银行所发行的纸币。法币是1935年以后国民党官僚资本四大银行（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依靠英美帝国主义支持所发行的纸币。毛泽东在本文中所说的，是指当时边币和法币之间所发生的兑换比价变化问题。

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

当然，上面我所说的是我们党里的极坏的典型，不是说普遍如此。但是确实存在着这种典型，而且为数相当地多，为害相当地大，不可等闲视之的。

三

为了反复地说明这个意思，我想将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对照地讲一下。

第一种：主观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

综合的研究^[1]。我们的许多人却是相反，不去这样做。其中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

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

[1]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在这篇跋中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页）

你们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诊治自己的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副对子记下来；或者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壁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

第二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地周密地调查和研究。不是单凭热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1]。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

[1] 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九部分《工作作风》（《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2～275页）。

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如果有了这种态度，那就既不是“头重脚轻根底浅”，也不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了。

四

依据上述意见，我有下列提议：

(一) 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为此目的，就要引导同志们的眼光向着这种实际事物的调查和研究。就要使同志们懂得，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就要使同志们懂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夸夸其谈地乱说一顿和一二三四的现象罗列，都是无用的。例如关于宣传工作，如果不了解敌友我三方的宣传状况，我们就无法正确地决定我们的宣传政策。任何一个部门的工作，都必须先有情况的了解，然后才会有好的处理。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二) 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

(三) 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应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为中心的材料。《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

我们走过了许多弯路。但是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在此如此生动丰富的中国革命环境和世界革命环境中，我们在学习问题上的这一改造，我相信一定会有好结果的。



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改造我们的学习》(部分版本)。

三、改造我们的学习
（一）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讲话
（二）改造我们的学习和反对党八股文的初步意见
（三）改造我们的学习和反对党八股文的初步意见
（四）改造我们的学习和反对党八股文的初步意见

前，研究昨天的和明天的中国世界革命的
发展。所有这些，都是必须的读书。

但是我们也不能这样，而要有所选择的
读书，如果不懂得读法，没有读法而
的工作更进一步，读书方法的在那裏要到
斯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
结合起来的大事革中去读书。

首先来谈研究方法。像毛泽东所讲的
一个大政策，即对群众，国内国际问题的
研究，有某些成绩，但对新中国的国际问
题方面，特别是对国际政治、军事问题、

试验何等有限，何等贫乏，所以对国际问题的研
究，也搞得少。发现了许多错误的理论，一面
来是反动人物在搞阴谋，而什维德，模
索他们，而他们的真貌，是不能认识的。但是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才
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从而认识
了他们所犯的错误，而他们自己却从那时起
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反共的，宣而不行，
而且讲得。等到斯大林的真貌一露，和中
国革命的宣传完全相反后，迫使中国
革命方面周密之极。如斯大林，他根据
斯大林对新的普遍真理的研究和新的
实践实践，研究今天中国的世界，是毫一

半化的，这很不方便，我们所办的教材，都是些
空洞的，而他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多少的
二十多年来，一种办法，就是通过对于社会主
义下层和苏联材料的分析研究的途径，即
他们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空洞的理论，
脱离群众。同塞耶斯吉拉姆，麻吉，
萨子摸底，粗枝大叶，广泛的读，而没
有具体的分析，这种粗枝大叶的作风，已
经在许多干部同志中继续存在着。要是
不把领导干部们普遍的研究方法，以至
邓小平的实事求是，和毛泽东主义的改
造出来，中国的许多同志就将被虚无主义

毛泽东撰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手稿。

一
六

从这次运动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特别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广泛地开展了对日作战。不但在正面战场，在敌后战场上都有广泛的群众运动。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八路军、新四军）不断壮大，在斗争实践中的一月中诞生了晋察冀人民抗日游击军司令部，这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对日作战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如百团大战，平型关大捷等。但是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镇压，八路军和新四军都遭到了严重的损失。

其後行之，子雲兩汗平生，是其子也。

我們沒有商量過，你先到他們那

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三) —

高麗本寧宗之子。後歸附我朝，封爲平壤府尹。其子平壤王，又封爲平壤府尹。

卷之三

在山中游息于一處，遇一老翁同宿。老翁曰：「汝何不作此？」
余曰：「吾病而不能行，老而不能死，故不能作也。」老翁曰：
「汝病可服药而愈，老可服丹而長，吾有良藥，汝可服之。」
余曰：「吾服此藥，則病可愈乎？」老翁曰：「汝病已愈。」
余曰：「吾服此藥，則老可長乎？」老翁曰：「汝老已長。」
余曰：「吾服此藥，則能作乎？」老翁曰：「汝能作矣。」

上而我這三方面的研究：不鏽鋼研究現在，工業歷史研究，和鑄造技術應用，這些研究都應付十二個月的時間。

人，他們已經選出新任大會主席，並在會場上宣佈了選舉結果。之後，他們又選出新任大會秘書長，並在會場上宣佈了選舉結果。之後，他們又選出新任大會秘書長，並在會場上宣佈了選舉結果。

这种个性化、集约化、富于弹性的生产同其

对于自己所处的环境，其道德品质
不以善恶，而以美丑。这样看来，中国
五千年历史和传统都是以美为中庸之
中，即重于善而轻于恶。而西方的传
统，反而重于恶，而轻于善。史瓦布西
氏所讲的“中庸”是西方的“中庸”，

傳，深子矣。在三字子，則無所別也。
人情也。後唐莊宗不輕行也。
解得第，吉生也。不難知也。
八角形鑄，其側有五瓣，當成
八角形滿。這樣一來，就和子牙也
成了一个正方形，对中用不着而
之周也。然亦有正方形而四角缺
他門一旁者也。且是他的門也。此即
老子所謂「道隱於世」之意也。

首先，上层阶级的领导地位和对社会的控制力，不只表现在经济领域，而且表现在政治、文化、思想等领域。其次，上层阶级的领导地位和对社会的控制力，不只表现在经济领域，而且表现在政治、文化、思想等领域。

到美国的经济危机之后，中国开始大规模地向美国输出商品。而同时，美国对华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美国开始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即在华的列强和美国一起分享在华的权益。美国还通过《辛丑条约》获得了在华的特权。美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逐渐超过了英国和法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毛泽东撰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手稿。

度，拉低了整体的生产率。而且，美国的
高生产率是通过不断的技术革新、资本
积累和劳动力培训实现的。

11月11日，晴。去南平，途经建阳、崇安、浦城等地。在南平逗留一晚，次日晨起，乘船游武夷山，中午时分到达九曲溪中游，乘竹筏漂流于九曲溪中，两岸奇峰突兀，怪石嶙峋，水清见底，游人如织。午后，乘船返回南平，晚上在南平市内游览，品尝当地美食。

(3) 在区域行洪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应根据区域行洪能力的大小，将区域划分为不同的行洪区，而洪水量大的区域则划为行洪区，行洪区的范围应与区域的三面地形不完全一致，即行洪区的范围应大于或等于区域的三面地形的范围，但不能大于区域的全部范围。行洪区的范围应与区域的三面地形的范围相一致，即行洪区的范围应等于区域的三面地形的范围，但不能小于区域的全部范围。

中、英、美、法、德、日等国的封锁。然而，中国在经济上所受的“独立损失”是巨大的。从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中国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情况如下表：

（2）大行区革命根据地，主要产木材，第一大林地面积，原木量3393949立米。主要生产红松，红柳杉，红松，红柳，红柳皮等。同时还有红松，红柳，红柳皮等有利用价值的植物研究。

門市部是怎麼和你談的呢？
我們正進行着談話，說得滿頭
大汗，正說得起勁。忽然她說：
「你中國人為什麼要這樣子
說？中國人不是有句老話說：『
人情事故』？」我說：「這就是
我所說的『人情事故』。」

毛泽东撰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手稿。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1年5月20日)

大革命时期恽代英领导青年团是搞广大的群众运动。苏维埃时期形成狭小的组织是错误的第二党方针。抗战时期青年工作是有成绩的，但在组织问题上有缺点。现在群众运动发展了，我们的观点还落在后面。群众生活是广大的，我们了解的很少，主要错误是反映群众生活不够。我们对青年工作是重视的。中央青委的主要任务是政治领导，过去对掌握政策注意不够，而且要注意了解群众要什么政策。青年工作要提高一步，不是要搞基干组织，这次讨论否决了基干组织，而是要加强同群众的联系，把落后群众提高起来。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听取何凯丰关于青年工作的报告后讲话的一部分。

谨防扒手*

(1941年5月23日)

自从晋南战局紧张，全国军民，固无不淬砺奋发，若干幻想日寇侵华战争可以照原状不了了之的人们，也颇有如梦初醒模样。忧时之士，群以为中国的抗战大业或者会由此一变已往长时期的龟步，而得至到迅速地开展了。

但是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关系，还不容许我们立刻如此乐观。在我们的面前还存在着一大串问题，要求我们严重地警戒和密切地注视。其中尤其耐人寻味的，就是：在英美对德手忙脚乱的今天，其拍卖中国以换取日本让步的远东慕尼黑阴谋已经最后放弃了吗？在日本最近对中国的进攻与大轰炸的合奏里，会不会有出卖中国人民的“绥靖”乐曲在旧调重弹呢？不估计到这些问题就一味乐观起来，是危险的。

如同□□□所说，英美对于中国，一向就缺乏援助的诚意。英国对日妥协的危机，就是平素与英国来往还最密切的人物现在也不能不承认了，但是美国这位朋友的真面目，可惜许多人还是茫然。特别是在三国同盟以后，美国援华似乎起劲了些，虽然这种援助较之中国的需要是杯水车薪，较之苏联则望尘莫及，而朝野亲美援美之声，却颇已洋洋盈耳。这些先生们的眼睛自然是看到了他们所愿意看到的东西，但是却决没有看尽了他们所应该看到的。美国对日

本取消锌与橡皮的输出限制，在美国影响下的荷印与日本缔结煤油协定，日本国内英美派的暗中活跃，在表示美日当局双方的激烈词令，只是词令，“政策”还是政策。如果美国对日本的支持实际大于其对中国的支持，则美国的援华姿态谁敢断定不是和日本的南进姿态一样，只是觅寻美日妥协的一种必要的手腕？谁敢断定，在远东慕尼黑阴谋的死灰再燃时，我们的全国拜物教的教徒们能逃脱免死狗烹的悲剧？

美联社十一日透露的中国当局关于日本也欲和平必须经由美国提出条件的声明，以及苏联报纸十八日所揭发的日本正在“经由美国”调解中日战争的消息，十九日松冈招待美驻日大使格鲁于私邸，日情报局发言人并称格鲁极为仁爱，不幸证实了这种危机的存在。我们相信，已经英勇抗战了四年，拥有如此强大的抗日人民、抗日政党和抗日军队的中华民族，是不可能被出卖，不允许被出卖的，中华民族任何有骨气有自尊心的领导人物，即令在美日妥协实现时，也是不甘心做汪精卫第二，躬蹈身败名裂、众叛亲离的覆辙的。但是我们愈有击破这种阴谋的信心，就愈有击破这种阴谋的必要。我们提醒全国的军民说：在我们走向胜利的路上，不仅荆棘丛生，而且路旁随时有扒手在窥伺着，想乘我们的不备，窃取我们奋斗的果实而去。对于戴着朋友的面具的扒手，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警惕！

我们更要正告美国当局和国民党中一部分惟美国马首是瞻的先生们说：中国人民毫不迟疑地欢迎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这种援助愈多愈快愈实在愈好。“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中国人民从来就是懂得以朋友之道对待朋友的。但是他们同样懂得怎样去对待扒手及其同谋者的。这岂不合于你们所最爱鼓吹的“公道”（Fair

Play) 吗？其中中国人民是已经长成磐石了，但你们却硬说还是皮球，你们一定要踢开就请踢踢看吧。可是，留心你们自己的高贵的足趾。中国人民是要顽强地战斗下去的——直到其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之日！

延安评论家对时局之评论*

(1941年5月24日)

(一) 最近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调动兵力企图对我作重大新进攻，但另方面却在策动诱降的新阴谋。军事在前方紧急，而和谣又盛于港沪之间。日寇一打一拉的两面政策在同时双管齐下。(二) 某些帝国主义当局也还是两面政策：一方面给我一些微弱的援助，另方面则继续进行对日妥协调我投降的勾当，关于远东慕尼黑的新阴谋已从纽约交易所泄露到全世界。松冈格鲁的会谈不为无因。(三) 重庆若干当局也仍是两面政策：一方面继续抗战局面，另方面却还没有阻塞妥协的门路；一方面愿与八路军配合作战，另方面又还不放弃反共政策，不肯给八路军接济，并继续制造反共谣言。此种两面政策遂致对于抗战没有办法，并容易发生悲观情绪，助长混乱局面。最近合众社、海通社及其他通讯社所散布关于远东“和平”的消息，均未被中美日有关当局所否认，所以时局亟需国人注意，而克服各种可能危险的关键，固不在外而在内，即在国民党当局能毅然放弃有害抗战团结的两面政策是也。

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1]

(1941年5月25日)

(一) 日美妥协，牺牲中国，造成反共、反苏局面的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正在日美蒋之间酝酿着。我们必须揭穿它，反对它。

(二) 日本帝国主义以迫蒋投降为目的的军事进攻，现已告一段落，继之而来的必然是诱降活动。这是敌人一打一拉、又打又拉的老政策的重演。我们必须揭穿它，反对它。

(三) 日本和军事进攻同时发动了谣言攻势，例如所谓“八路军不愿和国民党中央军配合作战”“八路军乘机扩大地盘”“打通国际路线”“另立中央政府”等等。这是日本挑拨国共关系以利诱降的诡计。国民党中央社和国民党报纸照抄散布，不惜和日本的反共宣传互相呼应，其用意所在，甚为可疑。我们也应揭穿它，反对它。

(四) 新四军虽被宣布为“叛变”，八路军虽没有领到一颗弹一文饷，然无一刻不与敌军搏斗。此次晋南战役，八路军复自动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两周以来在华北各线作全面出击，至今犹在酣战中。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一切对于共产党的污蔑，其目的都在使抗战失败，以利投降。我们应发扬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反对一切失败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

关于目前形势和统一宣传问题 致八路军新四军各负责人电^[1]

(1941年5月25日)

日军发动此次小规模战争，现华中、华南已退返原防，晋南亦无大战，证明其目的仅在吓蒋，此次进攻似已至结束期。

目前西方新慕尼黑危险虽因苏联的坚强政策暂时被打破，但东方新慕尼黑危险却日见增涨，日、美、华妥协反共反苏反德的阴谋正在东京与华盛顿交换意见，国民党两星期来对国际局势一言不发，而只宣传共产党如何不配合作战，可见其正在沉机观变中。

在此时局动荡之秋，我党宣传必须统一于中央的宣传政策之下，因此我军各首长必须严格遵照中央二月一日指示^[2]不得随便发表意见。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关于目前形势和统一宣传问题致八路军新四军各负责人电的主要内容。

[2] 指中共中央1941年2月1日关于发表带全国性的通电、宣言和对内指示的规定。内容如下：一、凡无中央及军委及总政治部之指示，各将领各政治部一概不发有全国意义的通电、宣言与对内的普遍指示；二、各地各军上级机关在未得中央及军委同意前，不要命令各部发表带全国性的通电、宣言与对内的普遍指示；三、以后各将领、各中央局发有全国意义之通电、宣言及对内指示，须先得中央及军委同意。

给王履孚、甄玉莹等的信^[1]

(1941年5月25日)

比接正月十二日大札，具见关怀祖国，力主团结抗战，钦佩良深。

所可虑者，美、日妥协诱迫投降之说，近忽甚嚣尘上，远东慕尼黑之阴谋，死灰复燃，亲日派之活动，未可忽视。

所可告者，不论国际风云如何诡谲，敌伪与亲日派如何呼应，中共同人必与国内一切真诚抗日之党派团结抗战到底，不达民族解放之目的誓不休止。

[1] 这是毛泽东复旅美华侨王履孚、甄玉莹等信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1年5月26日)

—

目前西方慕尼黑阴谋，已经暂时被打破。由于德国对英战争的不断胜利，使英、美对日将有更大的让步，以便集中力量应付欧洲，因而东方慕尼黑的危险仍然存在。蒋介石在今年四月以前是以皖南事变来缓和日本的进攻，当时何应钦到西安布置“剿共”，企图以向我进攻来取得日本的停止进攻。最近日军对华的进攻是“游击战”，目的在于逼蒋投降，没有准备进攻洛阳与西安。目前，日本对于中国问题的办法尚未完全确定，国民党的态度也还未决定，最近三个星期没有发表谈话。我党应积极揭破和反对这种阴谋。

—

过去习惯对外宣传不统一，表现在各根据地宣传政策不统一，今后要统一起来。会议决定中央对外宣传工作统由秦邦宪负责。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时局问题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关于党的对外宣传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致卫立煌电^[1]

(1941年5月26日)

目前惟有国共团结并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实行亲苏外交，坚持抗日到底，方能挽救危亡，美国是靠不住的，日、美、华妥协阴谋必须拒绝。我们所希望于国民党的只是（甲）坚持抗日；（乙）民主政治；（丙）改善国共关系这样三点而已。关于改善国共关系又分三点，即（甲）对新四军问题予以解决；（乙）对八路军饷弹予以发给；（丙）对反共言论与反共行动予以停止。除此以外，并无其他要求。

赞同卫长官与胡宗南先生会见，时间约定后，我们即派南汉宸来洛，共商团结对敌大计。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致卫立煌电的主要内容。

复周恩来电^[1]

(1941年5月26日)

对国民党的第二个将军（第一个问我们是否配合作战，第二个问我们是否拥护国家中心，都是向我们将军），暂时应置之不理，你意与我们一致。

卫立煌对我积极配合作战甚为兴奋，他提议约胡宗南在洛阳会见，并派车接南汉宸去，共商团结抗战大计，我们已复电同意。

[1] 这是毛泽东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电^[1]

(1941年5月26日)

九个月来中央社第一次广播我军战绩，谓据洛阳讯，我军已截断正太路车不通等语，是卫处已起作用，望对正太、平汉两路战绩多报卫、蒋。

为答复国民党造谣污蔑，新华社已予以反击（反将一军），待国民党语调好转我亦放缓和此。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谣言与烟幕*

(1941年5月28日)

造谣惑众是市井无赖的惯技，而政治流氓就把这种卑劣的手段用之于政治斗争中，竟自称曰：“散布合理的流言。”

在社会政治斗争中，先进的阶级和先进的政党，它们手中握着正义和真理之旗，不害怕公开和坦白的向着广大的群众宣布自己的政纲、目的，表明自己的政治任务和政治行动的方向，进行公开和严肃的斗争来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他们用不着玩阴谋、耍手段、造谣言之类的下流无耻的办法，因为他们有自信：真理是在他们方面的，它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所以，它们的行动，光明磊落、坦白严肃。而那些政治流氓们，因为要维护其违反真理和正义的私利，而自知他们的主张、纲领、政治任务和政治目的是得不到广大人民的欢迎的，所以不敢堂堂正正地行动，只能鼠窃狗偷，鬼鬼祟祟，因而玩阴谋、耍手腕、造谣言之类，就成了他们的拿手好戏。造谣言——或者“散布合理的流言”，就为他们所癖爱，因为在公开坦白的政治斗争中既斗不过对手们，那么只好乞援于造谣了。何况，古书上说过，“曾参杀人，慈母投杼”，诗人亦唱过，“三人成市虎，浸渍能胶漆”，其效力不是很大吗？

不仅如此，谣言也还有别的作用，就是遮眼罩和烟幕弹的作用。不是有这么一个故事吗？当一个小偷偷了东西之后，被人发

觉，大呼捉贼。此君急中生智，亦高叫“贼在那边，在那边！”竟得脱身。政治上的没落人物在做亏心事的时候，亦常常借谣言来转移视线，来隐身的。

这种“造谣术”的最近例子，就是所谓：“十八集团军集中晋北不与友军协同作战”的广泛地有计划地发布的流言。这个谣言的最初散布者乃是专长此道的个中老手——同盟社。日寇于本月初发动了一个小规模的军事攻势，而同时却发动了一个大规模的谣言攻势。同盟社的广播连篇累牍地散布各种谣言，尤以八路军决不与中央军协同作战，八路军集中陕北准备乘机向西安出动，八路军乘机扩张势力收缴中央军枪械之类为特多。日寇这种军事攻势和谣言攻势的目的是很明显的，一个字足以尽之，曰：吓！或者说吓降，军事攻势在炫耀其兵力，其意若曰：你若不降，我将占你的故乡，占你的一切海口，歼灭你在中条山的几十万军队，进占你的洛阳、西安、昆明、重庆，你怎么办？谣言攻势在挑拨国共关系，描画一幅黯淡的画图来吓你说，你看国共关系恶劣至此，自力更生，还有什么希望呢？快降吧！“八路军不打日本”之类的谣言是烟幕，吓降诱降是目的。其技至浅，其理至明。

奇怪的是某些中国人，不是汪精卫之类双料的汉奸，而是抗战营垒中统治阶层里的某些风云人物，竟然亦一字一句地抄写同盟社的广播来替它作一次义务的传播。像大公报和中央社这类新闻机关，居然一方面说：“敌方所传大部出乎捏造自不能信，”另一方面又重复着“敌方所传”，称“十八集团军集中晋北迄今尚未与友军协同作战则为事实”。日本人一个钱不花，就有中国人义务地替他的谣言当留声机和见证人，宁非怪事！

可是“怪事”实际上是没有的。只要懂得我们上述故事中的贼

的急智，就可以理解这次谣言唱和中的“机”了。重庆军委发言人在本月二十三号就多少泄露了这个“机”的一部分，他说：“上周寇军全面发动，总计达三十万人之多，其结果不过如此，以此种方式而侈谈解决‘中国事变’，不但世无相信之人，即敌寇亦自知其不可能也。”这不就是说，此种（军事进攻）方式是不能解决的，换种方式吧！果然，同盟社接着就纷纷报告曰各战线军事当局均称第一期作战已结束。谣言唱和，这次竟完成了红叶题诗式的媒介作用。可惜的是，香港的一部分参政员竟为这个小小手法所迷惑。

我们认为在这里无须再事“辟谣”了，因为八路军共产党人对于抗战的坚持，对民族的忠忱，是决非谣言所能摇撼的事实，是不怕火烧的真金。尽管新四军被宣布为叛军，八路军两年没有领到一颗子弹，五个月没有领到半文制钱的饷项，然而新四军、八路军的将士们，没有一分钟停止过和敌人苦战，而为着策应晋南作战，八路军在华北正在全线出动浴血酣战。这是连造谣的人和传布谣言的人心里都深知的事。其所以造谣和传谣，都是别有怀抱的。

其怀疑为何？在造谣言者为诱降，在传谣言者为投降，而都想在共产党身上做文章，共产党成了他们题诗的红叶。日本人当春兴大发时，题诗一首于其上，从长江漂将下来，这边的人儿得了诗，果然打动春心，跃跃欲试，拾起红叶，转题一首，又从长江漂将下去，这就是同盟社与中央社近日抓着共产党问题一唱一和的由来。还有德国的海通社、美国的合众社、英国的路透社，为着各自不同的目的，将双方的情报到处传播，其目的均在“催装”，不过英美是为着反共反苏反德，德国是为着反英美，这个不同而已。“你们赶快结婚吧，好去发动太平洋战争”——这就是德国的目的。“你们赶快结婚吧，好造成反共反苏反德的东方慕尼黑”——这就是英美的目

的。我们不能不忠告中国国民党的领导人员们，这种结婚乃是“劫婚”，将来是不好过日子的，理应拒婚为上。从共产党身上做文章，也是做不出好文章的。不信，你们瞧吧！

全中国的同胞们！注意在这种谣言烟幕遮盖下的投降危机呀！远东新慕尼黑的极大危险在一天天的增长。以“吓蒋投降”为目的这次“军事攻势”，现在是暂时的过去了，继之而来的必然是诱降。这虽是日本人“一打一拉，又打又拉”的老把戏，但却包含着新意义，因为正在一九四一年五月至十月的时机中。全国同胞起来揭破他、粉碎他，乃是民族生命所关的巨大任务！

致周恩来来电^[1]

(1941年5月30日)

二十七日罗斯福炉边谈话^[2]仍具两面性，即迫使妥协与准备参战。对东方仍含日、美妥协阴谋。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炉边谈话，也称炉边闲话，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当时发表施政演说的一种方式。1941年5月27日，罗斯福发表炉边闲话说：“美国之国策首先就是当希特勒企图征服和威胁西半球时，美国必须在任何地区积极反攻之”。又说：“吾人不能容忍希特勒支配世界，同时亦不能容忍上次世界大战后即一九百二十年代的世界”。对日美关系，则说“尚未予以研究”。

延安评论家称炉边闲话具有两面性*

(1941年5月30日)

此谈话具有两面性，即迫使妥协与准备参战是也。目前的帝国主义战争已发展至一历史上之重要关节，在每个帝国主义国家面前都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或者是长期战争，则其结果有摧毁资本主义，引起世界革命的可能，或者是帝国主义和平，则可能将目前的战争转变为反苏战争。自赫斯出奔，德国内部的反苏派失败后，英美帝国主义的反苏阴谋，受一重大挫折。但此阴谋并未死灭，英美目的仍在巩固制海权，恢复制空权，压迫希特勒火头向东边烧。他们知道希特勒所畏唯美，故罗斯福发表此次谈话，并宣布非常状态以吓之。谈话中有“不能容忍希特勒支配世界，亦不能容忍二十年代之世界”一语，就是表示只要希特勒不攻英伦，不要制海权，可以容许他支配欧洲，取消凡尔赛束缚，求得帝国主义和平，以便进攻苏联，否则便将向德宣战，这就是迫使妥协的作用。但希特勒不但畏美，尤其畏苏，赫斯出奔后，德苏间已有新谅解存在，地中海战争异常激烈，英伦有入侵可能，丘吉尔告急之电必如雪片，美国统治者不得不计划在迫和不成后准备实行参战之一着，故罗氏谈话又有准备参战作用。罗氏谈话还包藏了一个远东慕尼黑阴谋。据同盟社称：罗斯福在谈话中对日美关系则说“尚未予以研究”，又称：“谈话范围意外狭小，乃为集中对德”等语，均是为日本留余地，实

包含着日美妥协牺牲中国的极大阴谋在内，深堪注意。我国王外长二十八日所发之声明中，口口声声“感激”罗斯福，全无警惕之意，实属不妥。在美国没有最后证明放弃远东慕尼黑阴谋以前，吾人之任务乃在提防被人出卖，至于“感激”，尽可不必云。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5月31日)

英、美方针在西方是迫德反苏，在东方是英、美、日、华妥协反共反苏，时局之紧张空前未有。赫斯走后^[2]略见好转，且看下文。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赫斯，德国国社党副领袖，于1941年5月只身一人驾驶一架战斗机自德国出奔英国。赫斯素与德国的倾向西方的路线有关，反对与苏联谅解。

为“抗大五周年纪念特刊”题词

(1941年5月)

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
牺牲自己的一切！

为陈叔亮《解放区速写》画册题字^[1]

(1941年5月)

西行漫画

五里烟村雾里滩，看山容易画山难。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

毛泽东

[1] 陈叔亮（1901年—1991年），原黄岩上陈村人（现属路桥区），当代著名书画家、艺术家。1938年秋，他离妻别子带着青年学生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在鲁迅艺术学校进行美术教育达八年之久。其间，他以革命斗争生活内容为题材所创作的《解放区速写》漫画册，受到毛泽东的赞扬。毛泽东为画册题字“西行漫画”，并题词转录宋代画家李唐题画绝句：“五里烟村雾里滩，看山容易画山难。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赠予陈叔亮。

毛泽东
为陈叔亮
《解放区速写》画册题字

毛泽东为陈叔亮的《解放区
速写》画册的题字。

军委关于陕甘宁边区 部队生产工作的指示

(1941年5月)

一、在生产工作的政治动员中，必须将自给自足的口号与抗战建国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基础的任务连接起来，使生产工作能够遵循着党的财政经济政策来进行，克服违反经济政策的行为与只顾自己不管他人的本位主义，并以此教育各兵团及机关学校连队做到先公后私。

二、提倡现品自给，并立即采取下列方法以增加必需品的产量：

A. 各机关部队均应将日常工作与生产劳动分开实行部分的兵工政策。

B. 各机关部队均需就驻地附近（留守兵团则在直罗镇，三五九旅及直属队则在南泥湾及延安附近）立即加紧夏耕工作，积极经营农业生产，多种秋菜，多饲养畜，保证全年的全部蔬菜油料及肉食自给。

C. 为了压低草料价格降低运输费用，各机关部队必须立即准备秋初的割草运动，保证马草自给，并进一步地做到有剩余的草料出卖，每人割干草五十斤，惟不可侵犯人民的私草。

D. 为了保证办公纸张的现品供给，各机关部队必须善用一切

闲散劳动力，立即从事收割马兰草、芦草、蒲草，和收集废纸破布烂麻绳汇交各造纸厂（直属队则交经济建设部纸厂），并酌给现品或现金为酬，一并责成经济建设部拟定具体办法另行公布。

E. 盐及油墨墨计概由供给部发现品。施行日期另行公布。

三、加强后勤所属各工厂的生产：

A. 由各部队抽调战士参加后勤供给兵站各工厂生产运输业，以增加其生产量及运输力。

B. 立即登记各种技术人材，汇报经建部，并不得隐瞒不报。

四、彻底实行贸易政策：

A. 一切公营商店必须一律加入公营商店联合会并接受贸易局的领导。

B. 严厉取缔一切公营商店投机操纵黑市取利的行为。

C. 整理公营商店。

甲、军事系统所属的公营商店统限于六月底以前重新向建设部登记。

乙、采取自愿原则的合作联营，减少门市单位。

丙、商业资本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超过此限资本必须转到手工业农业方面去。

丁、如有愿意迁到保安定边沿途开设的公营商店由后勤给以运输上的便利。

五、各机关部队必须随时将执行情形报告本会。

军委 毛 朱 王 叶^[1]

[1] 指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

延安评论家之评论

(1941年6月2日)

此为在远东慕尼黑阴谋酝酿中之一件有趣的插曲，其目的在以远期的空头支票来模糊中国人民对当前被人出卖的现实之危险认识与警觉。可是此种把戏也许会引起某些中国的金元拜物教徒之感激或拜服，然而对于广大的中国人民只会更增厌恶之感。他们将对山姆大叔说，与其你开这类远期空头支票，毋宁立即停止以石油钢铁及其他武器输日，不作日寇屠杀中国人之帮凶为愈。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6月6日)

中条山战事已告段落，敌人似在收兵休整，下一次进攻方向可能是河南。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给凯丰、胡乔木的批语^[1]

(1941年6月6日)

关于过去青年团，将白区、苏区加以区别，似更好些，如同意，请给洛、弼一阅。此决议抄正后付《解放日报》发表，并发广播，个别地方（包括重庆、香港）还发战报台。

[1] 这是毛泽东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草案给凯丰、胡乔木的批语，这个草案曾经在6月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1年6月7日)

目前大局，可能德国继续反英反美，美国参战，造成长期战争；中国则继续国共合作，造成长期战争，长期磨擦。因此，我们的战略方针，要准备继续四年的长期战争。现在华北、华中要支持长期战争，就要加强政治工作，实行七分政治，加紧敌伪军工作，不要像百团大战那样硬打。现在国民党的方针，也不是大打，桂系将采取守势，日军将继续进攻中国。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致彭德怀、左权等电^[1]

(1941年6月7日)

关于太岳军区问题，事关重大，中央正在慎重考虑中，日内即有答复，部队暂勿行动。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的主要内容。

与友军配合作战坚决破坏敌之进攻^[1]

(1941年6月9日)

德怀同志：

(一) 拟了给卫^[2]一电，如同意，请拍给袁晓轩^[3]。

(二) 袁处长转呈卫长官钧鉴：目前大局，非国共两党贵我两军密切合作不足以图存，敌于晋南得手后，有进图郑、洛、西安可能。八路决在委座及吾兄领导下与友军配合作战，坚决破坏敌之进攻，为保卫郑、洛、西安而战。惟配合友直接间接两种，直接配合则效速，间接配合则效迟。敝军担任平汉、平津、津浦、北宁、平绥、正太、白晋^[4]北段及同蒲北段、中段之破袭，从远后方、近后方牵制敌人，此间接配合也。八路以有力一部进入中条山及汾南三角地区，担任同蒲南段、白晋南段及道清路^[5]之破袭及黄河北岸之控制，从侧面打击与牵制敌人，以利贵军主力在黄河南岸西岸之力堵，此直接配合也。然此建议，在不谅解德等苦心之人，或以为出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给彭德怀的电报。

[2] 卫，指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3] 袁晓轩，当时任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主任。

[4] 平汉、平津、津浦、北宁、平绥、正太、白晋，即今北京至武汉、北京至天津、天津至浦口、北京至沈阳、北京至包头、正定至太原、山西祁县白圭至晋城（当时未完成）的铁路。

[5] 道清路，指河南滑县道口镇至博爱县清化镇的铁路。

于乘机扩大地盘之目的，实则真欲保卫郑、洛、西安。德等愚见，认为非有此一方面之部署，则牵制敌人难期速效。盖敌之重兵已集济源运城地域，仅作远道配合，究属远水难救近火，此次中条战役^[1]，其明证也。德等对于两党两军关系，实望有所改善，而绝对不愿增加故障，故对胡宗南^[2]兄所部从宜川、洛川一线撤往河防，即已谆嘱边区留守部队不得侵越原防一步。而对中条及三角地区方面明知有利于制敌，亦不许敝部自由行动，皆所以免误会，图合作也。今之建议，亦纯属进言性质，如以为可，则令行之，如以为不可，则弃置之。可否恳兄予以考虑并转呈委座予以鉴核之处，出自钧裁。抑犹有须声明者，在委座及吾兄批准上述建议之场合下，敝军到达中条及三角地区时，须请求允准发动民众组织抗日游击队，盖德等认为唯有此策为最有效。此次中条失利之原因固多，而无民众组织以障蔽敌之耳目，明快我之耳目，实为主因，并非兵不精将不勇或指挥不善之咎也。在上述建议不蒙批准之场合下，敝军仍然担任远后方之配合，亦决不有所推诿。谨此奉陈，敬祈裁示。弟朱德彭德怀佳。

（三）估计到上述建议可能不同意，我军仍须在不可不打（即必须打）又不可打得太凶（如百团大战^[3]那样）的原则下部署远后方

[1] 中条山战役，1941年5月，日军在山西省西南部中条山地区发动进攻，后国民党军溃退，日军随即占领中条山地区。

[2]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3] 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战役。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八路军出动100多个团，在广大民兵和群众的配合下，向华北敌后主要的交通线发动攻击，并配合各根据地军民进行反“扫荡”作战。这次战役持续三个半月，进行大小战斗1800多次，攻克敌人据点2900多个，歼灭日、伪军4.6万多人。

及近后方之配合。

毛 朱

佳午

河北平原反“蚕食”斗争的政策^[1]

(1941年6月9日)

刘、邓，并彭、左、罗：

(一) 敌在冀南之“蚕食”政策，其目的在于缩小我之活动地区，扩大其占领地，若不予以击破，则我在平原将立足困难。

(二) 击破这种政策的中心环节在于有正确的政策，主要应从政治上着手，而不能只是军事进攻或以军事进攻为主。

(三) 一般说我党我军在此种三角地带工作的出发点，应该是善于荫蔽自己，保存实力，处处为民众着想，要保护民众，使民众不致吃亏（也就是保存自己）。对于民众中某些被迫应付敌人的行动，不仅不应尖锐地反对（这不是右倾退缩），反而应该因势利导成为带有计划性的应付敌人的办法，甚至成为策略。我党我军应帮助民众想出这些办法应付敌人，只有如此才不致使群众脱离我们，打破敌人分离我军民团结的毒计。

(四) 单纯的军事斗争，表面上的尖锐对立政策，将引起敌人残酷的镇压，其结果恰恰是造成群众的恐惧，使敌寇得逞其阴谋。

(五) 在这些地区内应多采用两面派政策，加强伪组织伪军工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军委参谋长叶剑英给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并告彭德怀、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的电报。

作，多交朋友，不要大吹大擂（荫蔽自己），群众团体及政权只能采取荫蔽的方式，不能与根据地一样。总之，愈能保存自己，团结人民，孤立日寇，就愈能长久坚持。一切只着眼到一时的痛快拼命斗争而不知道转弯的办法都是有害的。

（六）健强由当地干部率领与地方人民有血肉联系的地方武装是坚持平原的基本条件，特别是这种三角地带其作用更为重大。若无此种地方武装，单靠把主力分散去进行游击是困难的。

（七）你们灰电的精神应该改变，同时希望你们严格检查在平原地区内这方面的政策，我们觉得在平原某些部队中最近发生的不断叛变情形与此是有关系的，必须引起你们的严重的注意。

毛 朱 王 叶

九日

目前我党方针是拉蒋抗战^[1]

(1941年6月12日)

朱，陈、罗，黎、罗：

据报：我一一五D六八六R^[2]及东进队一部曾于号日向仁和庄一带之张师王团进攻，我某某二团及沂蒙支队约二千，皓日向青沙湖唐家林一带常师蒙旅进攻，又一部约三千敬日向陈庄某家城新三十六D^[3]进攻，我许、鱼、彭^[4]等部约五千分向开城某山屋基一带赵师进攻等情。是否有此等事，请查复。目前我党方针在拉蒋抗战。我军应坚持党中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自卫”的原则。如有此种进攻行动，希即停止。并告彭、左，陈，刘^[5]。

毛 朱 王 叶

六月文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给朱瑞、陈光、罗荣桓、黎玉、罗舜初的电报。

[2] 即一一五师六八六团。

[3] 指新三十六师。

[4] 许，指许世友。鱼，不知是指谁，疑原抄件有误。彭，指彭嘉庆。

[5] 指彭德怀、左权，陈毅，刘少奇。

致彭德怀、左权、罗瑞卿电^[1]

(1941年6月13日)

抗大总校在目前各分校极端分散而又遥远的情况下很难进行领导，事实上各分校在各地区兵团的直接领导下仍可进行教育工作，教育方针与教材等归军委第四局负责，因此我们意见取消总校，将总校改为一个分校。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关于征求对取消抗大总校的意见致彭德怀、左权、罗瑞卿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财政预算问题给林伯渠^[1]的信

(1941年6月13日、15日)

林老：

预决算看了，今付还。

此类情况，以后请随时通知我，我虽不能为你分忧，但人事调整方面可多少帮你的忙。

今日所谈，系大政方针与人事政策，承你同意，以后必可办通。

有两点还请注意：（一）凡必不可免之钱，予以慨允，使受者得所。将来要塌台，让他塌去（实际上不会塌的），此时不与断断计较。其原则就是“必不可免”四字。弱小部分，予以扶助，亦包括在此原则内。（二）不管是中央的，军队的，地方的，一概包揽，为之统筹。军队不分国军、地方军（不立此名目），一概统筹。此次预算内无军队部分，以后请添进去。是否有当，还请卓酌。

并致谢老^[2]。

毛泽东

六月十三日夜

[1] 林伯渠，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

[2] 谢老，指谢觉哉，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

总之发展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又陈者：（一）追加预计，不可免的，因预先计划不可能，例如《解放日报》经费，在决定出报前没有人能预计者。故只能由你在预算中加重总预备费，尔后按需要（必不可免者）支用。（二）不必肯定边币只维持一千万，宜作千五百万之打算，较不束缚手足。（三）预算算中应把自力更生部分打进去，例如康生处^[1]月用57,000元，只支12,000元，自筹45,000元，要把此数也打进去。大概公支只三分之一，自筹占三分之二。预算算中遗落此种部分是不合实际的。因此须与党、政、军各部分的实际状况密切联系，了解其情形，方能算计。尤其是军。（四）商品货币流通量成正比例说，亦不宜坚持，宜估计到许多新条件，还待今后研究。如持之过坚，将来不准，有损信誉。以上各点，就感想所及，书备考虑。

毛泽东

六月十五日

[1] 指当时康生任部长的中共中央社会部。

国民党缺少什么

(1941年6月17日)

国民党缺少什么？飞机大炮吗？干部人才吗？抗日办法吗？是的，这些都不算顶多，但是最缺少的，却是民族的信心。

国民党的有些先生们，常常骂旁人（尤其是骂共产党）没有国家民族观念，但是共产党和人民既然对于抗战和民族解放从来没有消极过，这些骂人的文献无论花样怎样新奇，篇幅怎样浩瀚，也就徒然使人惊叹于这种纸张的浪费，与蒋介石先生所号召的节约运动是如何的不相符合罢了。但是这些先生们自己的国家民族观念的仓库里究竟还剩下基金几许，却是很值得怀疑的。我们不敢幸灾乐祸，只能够很严肃地忠告这些先生们说：请自己珍重，在这上面多加些砝码吧！这将于你们和我们，于你们和我们的最钟爱的国家民族，都有益的。

你们请平心静气想一想，你们如今对于美国的捧场和依赖已经到了什么田地？我们不要求你们放弃对美国的幻想，这是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但是孔子曰：辞达而已矣，过犹不及。你们硬要说中国和英国乃是美国的左右翼，说汉水和英伦海峡同是美国的边界，这又何苦来呢？你们又说美国和中国已超过了盟邦的关系。请问有史以来，美国对中国曾负过什么盟约的义务呢？而且还要超过，那该是种什么甜蜜的关系呢？未必小罗斯福大尉到中国来拜了几个千

兄义弟？你们把人家高捧入云，但是人家和日本的军用品贸易发展的曲线却在万耸入云；你们把赫尔的一纸空文当做观世音菩萨的灵符，人家却在和野村谈判如何命令中国停战。好像什么时候中国已经一股脑儿投奔到美国的荷包里一样！这才叫真正超过了盟邦的关系，真正把汉水当做密西西比呢。

不能不依赖美国吗？至少也不要依赖火星上的美国呀！地球上的美国，无论申包胥们怎样痛哭流涕，在美国国务院门口站他几十个七天七夜，目前也是只有把太平洋的舰队开往大西洋，但是你们过去曾把全部希望寄托于日苏战争，现在又托之于日美战争，全不管上穷碧落下黄泉，今天的议事日程上并无日美战争的踪迹。请问万一不幸，美国妥协竟成事实，你们这一幕喜剧将如何收场？人民责备你们今天所进行的乃是有计划的欺骗，你们如何能够否认？退一步说，即令美日妥协不成，美国对我又有何皇恩浩荡之处，使我堂堂奋斗中的伟大民族必须肉麻当有趣，自丧国格，自毁人格，至于斯极？你们的这一切宣传，究竟有多少民族观念？它们究竟出于孙中山先生民族主义的何章何页？出于蒋介石先生自力更生口号的哪一种字典的注解？

你们请再平心静气想一想，你们对于共产党和人民的摧残压制，造谣诬蔑，又已经到了一步什么田地？为了对付共产党和人民，你们建筑了一个何等庞大的机构！这个机构愈积愈大，现在是早已像寓言里的骆驼对待可怜的阿拉伯人一样，把一个抗战政府的其他作用都挤到帐篷外面去了。在强敌压境之际而采取这种政策，无论在古今中外，都绝对说不上兴国建国，而只能祸国亡国，这一点浅显的道理，你们岂能不明白？但是你们既然把异胞看做同胞，醉心于在纽约交易所建立你们的民族中心，就自然要把同胞看做异

胞，就自然不能从人民身上看出民族的无限力量和无限前途，而且不但如此而已，“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米，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你们还要把自己的同胞看成不共戴天的寇仇！你们在皖南事变和各种反共活动中是何等的勇敢！你们在制造谣言和各种反共舆论中是表现了何等的创造性、积极性！你们既然毫不迟疑地把人民和人民的先锋队都描写做奸匪叛贼，你们对于民族还能有什么信心呢？虽然受到一切不能忍受的敌视，但是只要你们继续抗战，共产党和人民还是爱护你们，还是愿意和你们合作的，不幸你们连这种信心似乎也很贫乏。你们这样的既不信任旁人，又不信任自己，究竟又有多少民族观念？这又是出于孙中山先生民族主义的何章何页，出于蒋介石先生自力更生口号的哪一种字典的注解？

“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移到那边，他也必移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在民族信心横遭蹂躏的今天，我们不能不借耶稣的这几句话来奉赠国民党。国民党里有许多人近来很悲观，甚至也知道依赖美国并不是出路。他们很奇怪为什么共产党在更艰苦的条件下却得到更大的胜利。无论国内国际的环境如何险恶，共产党确然总是风雨不动安如泰山地屹立着而且前进着。共产党究竟有什么秘密呢？共产党的全部秘密，就在于相信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因此始终和全民族的伟大人民群众在一起奋斗，而不去依赖任何外国尤其任何帝国主义国家。但是国民党有什么理由一定不能提高自己的民族信心，不能信任人民和信任自己，而非去膜拜那些心怀叵测的帝国主义阴谋家不可呢？国民党的许多“理论家”说，三民主义目前最需要的唯有一个民族主义，这大概也就是所谓一个主义了，国民党有什么理由连这一个主义也不全力加以坚

持呢？只要国民党能够坚决提高民族信心，坚决贯彻民族独立战争，国民党的一切困难都是可以解决的，国民党还是有光明前途的。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6月17日)

你的一文一信^[2]，《大公报》的复文^[3]（《大公报》此文很有意思，很可注意）都看了，你的信与文均在《解放日报》发表并广播，那封信写得很好。依你观察，此刻是否到了蒋转弯的时机，可否找张季鸾、王芸生开一次谈判。向他们申明只要不妥协不反共，我们是拥蒋（所谓国家中心）到底的，否则是蒋拒绝人家拥他，解散新四军，对八路不发饷弹，公开的普遍的反共言论与反共行动，叫人如何拥法？问他们有无改善国共关系的办法。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一文”，指周恩来为1941年5月25日《新华日报》撰写的代论《论目前战局》，同年6月14日《解放日报》转载了这篇代论。“一信”，指周恩来1941年5月21日写给张季鸾（重庆《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重庆《大公报》主笔）的致《大公报》的信，这封信在同年5月23日《大公报》发表，6月13日《解放日报》作为代论转载。

[3] 指《大公报》1941年5月23日的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

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1]

(1941年6月23日)

德国法西斯统治者已于六月二十二日进攻苏联。此种背信弃义的侵略罪行，不仅是反对苏联的，而且也是反对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的。苏联抵抗法西斯侵略的神圣战争，不仅是保卫苏联的，而且也是保卫正在进行反对法西斯奴役的解放斗争的一切民族的。

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在目前时期，一切力量须集中于反对法西斯奴役。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任务是：

(一) 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即用此以援助苏联。

(二) 对于大资产阶级中的反动分子的任何反苏反共的活动，必须坚决反抗。

(三) 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

复彭德怀、左权、罗瑞卿电^[1]

(1941年6月23日)

同意陈赓、薄一波^[2]统一太岳军队的指挥，同意组织太岳纵队。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谭政复彭德怀、左权、罗瑞卿电的主要内容。

[2] 陈赓、薄一波，此后分别任八路军太岳纵队兼太岳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

当前时局与我们的方针^[1]

(1941年6月26日)

英、美、华都站在苏联方面，现在是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阵线的对抗，其前途对苏对华有利。中国时局可能好转，我们方针是争取好转打击日寇。

[1] 这是毛泽东起草的一份电报的主要内容。

抗战中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实行一拉一打政策

(1941年6月28日)

少奇同志：

文日电悉，都是对的，都同意。惟在二段甲项内似有与乙项不调和的地方，请再检阅考虑一下。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包括一切还在抗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内的，是全民族联盟，不但是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在抗日一点上确是如此，在民主一点上则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坚决的反对力量，但在我根据地内则大地主大资本家为保存其经济利益向我作合法斗争亦可赞成我之民主政权。故在抗日过程中，不论在全国范围内在根据地内，除汉奸外，对大地主大资本家是一拉一打政策，拉其抗日，打其反共反民主，但目前拉还是主要的，打是辅助的，打是达到拉之手段。这一点与你在二段乙项中的意见是一致的，但与甲项似有些不调和，望加考虑为盼（在中国孤立大资产阶级与俄国孤立资产阶级不同，在中国只孤立其反共方面，在俄国则是绝对孤立政策）。对彭雪枫五月三日电的错误，我有一复电同时发给你，收到请告你的意见。

毛泽东
六月二十八日

复彭雪枫电^[1]

(1941年6月28日)

你五月三日电的观点是不适当的，是错误的，六月十五日电亦还未改变。蒋介石还在抗战，蒋在全国军队中，在中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中，还有很大信仰，目前抗战还少不了他，他也还没有破裂统一战线，他还是两面政策。罢工罢课的策略只能使自己陷于孤立，八路南下的策略也只能加深国共裂痕，与中央缩小裂痕的方针是不合的。我们对付蒋介石反共政策的方针只应该是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政策，你的意见却超越这个方针。

在苏德战争爆发后，我党对国民党态度尤须慎重，不可大意。

[1] 这是毛泽东复彭雪枫并告彭德怀、陈毅、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 抗战四周年纪念的指示^[1]

(1941年6月)

(一) 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

(二) 宣传要点：在党外要深入地宣传中共二十年来的历史，是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历史。他最忠实的代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今天无论在国际国内任何困难情况下，他都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到底，抗战到底，反对分裂，反对投降。要表扬八路军新四军四年抗战的战绩，与各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成绩，并着重宣传我们的施政纲领，是能坚持敌后抗战的正确办法，同时也是全国人民能够走向光明胜利的道路。

在党内要使全党都明了中共在中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在今天他已成为团结全国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决定因素，他的政策，关系全国抗战的成败与全中国人民的命运。因此每个党员都要正确懂得如何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方针，要加强策略教育，与学习党在二十年革命斗争中的丰富经验。

[1] 这个指示是有毛泽东起草的。

(三) 中央准备在“七七”发表宣言与文章，尽可能于“七一”前拍出，在全国各地刊物同时发表。因此各地方纪念文章，应侧重说明与当地具体任务有关联的问题。

中央书记处

给周恩来的信

(1941年6月)

恩来同志：

请即代购《西南实业通讯》一卷二期、三期、六期及二卷一期，并代订该通讯全年二份、《中行月刊》全年二份，《银行通报》全年二份，《农村报告》二份（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外经济拔萃》二份，及其他时事经济各种刊物各一年。

毛泽东^[1]

[1] 原抄件未署时间。

在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上的讲话

(1941年7月1日)

现在工人有地位了，农民也有地位了，你们参加了参议会，参加了政府。今天的政府是民主政府，是为人民办事的，以后你们还要给更多的人办事。以后的胜利是天天大，工作是天天广，需要人才也天天多，所以你们回到自己的岗位上时，要加紧学习政治，还要加紧学习业务，工人同志和农民同志更要大大的努一把力。



《宝塔山下》(油画)



《毛泽东在宝塔山下》(素描)

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1941年7月1日)

(甲) 中国共产党经过二十年的革命锻炼，现在已经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的决定的因素，然而放在我们面前的仍然是伟大而艰难的革命事业。这样，就要求我们更进一步地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的党，要求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织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没有这样坚强的统一的集中的党，便不能应付革命过程中长期残酷复杂的斗争，便不能实现我们所担负的伟大历史任务。因此今天巩固党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乙) 我们的党，虽然已有二十年英勇奋斗的历史，虽然已经是和广大群众密切联系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但是必须指出：我们的环境，是广大农村的环境，是长期分散的独立活动的游击战争的环境，党内小生产者及知识分子的成分占据很大的比重，因此，容易产生某些党员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的状态”“独立主义”与“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这些倾向，假如听其发展，便会破坏党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可能

发展到小组活动与派别斗争，一直到公开反党使党与革命受到极大损害。而有这些倾向的个人如不改正，亦会身败名裂。叛徒张国焘的结局，便是明显的历史教训。这些缺乏党性的倾向，今天在党内虽然还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在某些个别部分中，在某些同志中确实存在着的。上述的这些倾向，具体地表现在下列各方面：

- (1) 在政治上自由行动，不请示中央或上级意见，不尊重中央上级的决定，随便发言，标新立异，以感想代替政策，独断独行，或借故推脱，两面态度，阳奉阴违，对党隐瞒。
- (2) 在组织上自成系统，自成局面，强调独立活动，反对集中领导。本位主义，调不动人，目无组织，只有个人。实行家长统制，只要下面服从纪律，而自己可以不遵守。反抗中央，轻视上级，超越直接领导机关去解决问题。多数决议可以不服从。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在干部政策上毫无原则，随时提拔，随便打击，感情拉拢，互相包庇，秘密勾搭，派别活动。
- (3) 在思想意识上，是发展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一切从个人出发，一切都表现个人，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自高自大，自命不凡，个人突出，提高自己，喜人奉承，吹牛夸大，风头主义。不实事求是地了解具体情况，不严肃慎重地对待问题，铺张求表面，不肯埋头苦干，不与群众真正密切联系。

(丙) 为了纠正上述违反党性的倾向，必须采取以下办法：

- (1) 应当在党内更加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不允许任何党员与任何地方党部，有标新立异、自成系统及对全国性问题任意对外发表主张的现象。要求各个独立工作区域领导人员，特别注意在今天比任何时候更需要相信与服从中央

的领导。应当在党内开展反对“分散主义”“独立主义”“个人主义”的斗争。

(2) 更严格地检查一切决议决定之执行，坚决肃清阳奉阴违的两面性的现象。

(3) 即时发现，即时纠正，不纵容错误继续发展，才更能挽救干部，和不使工作受到损失，反对当面客气，背后指令，一切批评应当是正面坦白诚恳地提出，目的是为了挽救，而不是为了打击。应当强调党内团结互助，爱护干部，帮助干部在政治上进步。但对于屡说不改者，必须及时预防，加以纪律制裁。

(4) 要在全党加强纪律教育，因为统一纪律，是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要严格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基本原则。无论是普通党员和干部党员，都必须如此。

(5) 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要求每个党员，特别是每个负责领导的干部，都深刻反省自己的弱点。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任何人都不应有自满自足、自私自利的观念，要提倡大公无私、忠实朴素、埋头苦干、眼睛向下、实事求是、力戒骄傲、力戒肤浅的作风。要改造那些把理论与实践、学习与工作完全脱节的现象，这样来更加坚定自己的阶级立场、党的立场与党性。

(6) 最后，决定从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部的负责领导者，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组织生活，虚心听取党员群众对自己的批评，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

准备在战略上配合苏军作战^[1]

(1941年7月2日)

德怀同志：

(一) 前电谅达，日苏战争有极大可能爆发，中苏关系将好转。
(二) 如日本攻苏，敌军肃清后方计，将在华北加强镇压。(三) 我军须准备配合苏军作战，目前作此准备，以待时机成熟，即可行动，但此种配合，是战略的配合，是长期的配合，不是战役的配合与一时的配合，请在此基点上考虑一切问题。

毛 朱 王 叶

冬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军委参谋长叶剑英给彭德怀的电报。

给续范亭的信^[1]

(1941年7月2日)

重庆买的药已到两盒，送上应用，不知是你讲的那种无误否？
闻尊体有进步，大家都欢喜。我有些不适，近日已略好，勿以为念。

[1] 这是毛泽东致续范亭信的主要内容。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7月5日)

一、七七宣言今晚最后脱稿，明（六日）上午开始广播。二、宗旨主要拉英、美、蒋反德、日、意，但包括对蒋批评。三、你可将我党力主团结之方针告张冲，以影响他们的宣言。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7月5日)

苏联战局有渐趋稳定形势，日本似不是攻苏而是牵制英、美，英、美均同情苏联，国共关系有好转可能。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凡反法西斯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斯者就是坏的，以此来分界限，不会错的。目前反法西斯领导权，已握到苏联手中，只要苏联战局稳定，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都环绕于苏，这是很好的形势。对英、美主要是拉，批评可减少。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

(1941年7月7日)

全国同胞们，抗战将士们！

我伟大中华民族为抵抗日寇保卫祖国的神圣战争，已经整整四年了。当此抗战第五年到来之时，正值国际形势发生严重的变化，疯狂的德国法西斯罪魁希特勒已经大举进攻苏联，苏联政府正在统率二万万人民与数百万红军举行粉碎法西斯侵略的伟大战争。

同胞们，将士们！苏联这一反法西斯的战争，完全是和我们的抗日战争属于同一性质的，都是保卫独立、保卫自由、反抗侵略的正义战争。而在德国法西斯方面，则与日本法西斯进攻中国完全相同，乃是侵略的、奴役的、非正义的。因此，我们与苏联是完全站在同一战线上，成败与共，休戚相关。

自苏德战争爆发以来，对于苏联的同情，迅速散布于全世界。而在我国人民，则关切之情，尤为深至。一则因为苏联是扶助被压迫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四年抗战，助我最多最力者唯有苏联；再则因为苏德战争直接影响我国的抗战，希特勒如在苏联得逞，则中国即将遇到严重的危机。故我国人民，咸知苏联人民所进行的战争，不但是保卫苏联的，而且是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之自由独立的。苏联的成败，即是中国的成败，即是一切民族之民主与自由的成败。

由、独立与解放、公理与正义、科学与光明的成败。而希特勒则不但是苏联的敌人，而且也是一切自由民族特别是中国的敌人，因而打倒希特勒，不但是苏联人民与各国人民的任务，而且也是中国人民的任务。毫无疑义，法西斯希特勒的疯狂进攻，适足以加速其死亡，法西斯的敌人已遍布于全世界。一个强大的反法西斯侵略的阵线，正在全世界树立起来。目前是全世界法西斯阵线与反法西斯阵线的伟大斗争时代，双方的决斗已经开始了。

欧洲的法西斯国家，为着拉拢日本，巩固法西斯同盟，反对中、苏、英、美之目的，不惜明目张胆，承认中国叛逆汪精卫，希特勒、墨索里尼的魔爪现已伸向太平洋，其为我四万万五千万人民与全人类的公敌，实已暴露无余。而法西斯日本西陷中国泥淖，南与英美抗争，经济衰颓，民心怨愤，如又欲撕毁日苏中立协定，树敌于伟大之苏联，则其死亡崩溃之日，必愈益临近。惟其情况愈危迫，财横决以求一逞之心，必愈难阻遏，反苏之危险固已增长，灭华之方针则决不放弃，南进以侵犯英、美、荷、澳之野心，亦依然存在。法西斯同盟对于全世界的威胁，西方与东方同时增长。惟有建立于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基础之上的坚决的斗争，方能制凶焰于已燃，挽狂澜于既倒。一切幸灾乐祸侥幸取巧的心理，均属浅薄无识之表现。至于张伯伦覆辙的重寻，汪精卫后尘的学步，所谓绥靖政策与投降路线者，尤为愚不可及之下策，宜为中国与欧美民主国家所不取。中国人民对于远东慕尼黑的危险，是永远坚持反对的。

我伟大中华民族的神圣抗日战争，不独为了挽救自己祖国的危亡，亦且有助于国际反抗侵略的奋斗。四年以来，全国军民奋起抗战，不顾牺牲，不怕困难，前仆后继，再接再厉，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渡过了许多的难关，卒能使敌寇胆寒，环球心折，奠

定了民族复兴的基础，产生了新生中国的雏形。此皆我上下同心，军民协力，党派合作，友邦增援之所致，值得我们欢欣庆祝，大书特书。

然而敌人之进攻方兴未艾，协以谋我者，且有凶恶的法西斯同盟，南京之傀儡既为虎作伥，内部的亲日分子复倚张为幻，政治犹未澄清，民生愈见凋敝，党派仍有磨擦，民意尚未伸张，各种惊心怵目之暗影，竟有越来越大愈闹愈凶之势。尤可异者，反共成为政策，“异党”见于文书，军纪军令之美名，却假以打击抗日部队之最积极者，于是皖南事变发生了，新四军被解散了，特务横行，非法逮捕之事层出不穷了，抗战之元气为之斫丧，抗战初期之新气象因而挫折了。凡此阴暗方面，如不加以消除，则抗战四年的成绩有中堕之忧，全国军民有无所适从之感，而国际同情亦将失所附丽，这是国人应该深切警惕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当此抗战第五年开始，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之时，正我除旧布新的良好机会，全国人民必须执行许多重大的战斗的任务，从外交以至内政，皆宜有新的改革与建树，方足以适应目前形势，一新国人耳目，达成抗战建国之目的。本党不敏，谨陈如下各端：

(一) 拥护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促进中、苏、英、美及其他一切反对法西斯的国家民族一致联合，反对德、意、日法西斯同盟，拥护国民政府对德、意绝交的正确行动，并准备采取新的步骤。

(二) 加强反对汪逆傀儡政府的斗争，肃清汪逆余党，巩固抗日阵营。

(三) 加紧全部国军的整理训练，加强前线各军的配合作战，接济敌后各抗日部队军饷弹药，积极反攻敌人。

(四) 加强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设施，由政府予以援助，俾能长期坚持于敌后，使敌人无法抽调兵力西进、北进、南进。

(五) 加强各抗日党派的合作，调整国共关系，解决新四军问题，承认各抗日党派的合法活动，停止逮捕共产党员及一切爱国分子，消弭内部磨擦，培养抗战实力。

(六) 给一切爱国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发动民智民力，反抗敌寇。

(七) 改革政治机构，罢免贪官污吏，引用开明人员，从政府机关中淘汰暗藏的亲日分子，肃清敌人的第五纵队。

(八) 禁止贪官污吏、奸商劣绅囤积居奇，操纵国民经济，实行调剂粮食，平抑物价，以苏民困。

(九) 改革兵役动员制度，禁止敲诈、贿买、强迫、虐待，代以鼓励人民上前线的政治动员，以利抗战。

(十) 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信用本地人才，团结少数民族，以固后方。

本党认为上述各项，实为今日内政外交之基本方针，如能见之施行，则全国之气象必焕然一新，一切困难皆可克服，抗战建国之胜利便有了坚固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再一次声明：本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始终不变，愿与中国国民党及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人民团结到底，为抗战建国的共同目标而奋斗。对于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本党实为最忠实最坚决的执行者。本党对于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的宣言，实践到底，决无丝毫违误之处。八路军新四军始终是国军的一部分，最忠实最勇敢地执行抗战任务，抗击了半数以上的敌人，收复了广大的失地，建立了敌后的许多抗日根据地。在这些根

据地上，一步一步地实行了三民主义，实行了各党派、各阶层合作的三三制的民主政治，保证一切抗日阶层（包括地主、资本家在内）的人权、政权、财权，实行了一方面减租减息，一方面交租交息的农村政策，实行了一方面改良工人生活，一方面加强劳动纪律的劳动政策，实行了发展农工商业、改良人民生活的经济政策，实行了消灭文盲愚昧、提高民族精神的文化政策。凡此一切，无一不在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保卫祖国的先锋队，是言行一致的革命政党，是团结抗战的模范，是艰苦奋斗的典型。而敌人汪逆与亲日派则集矢于本党，务欲破坏之消灭之而后快，盖彼等深知本党之存在，实为其灭华计划之最大障碍，如不灭共，则断然不能灭华。所可怪者，一部分尚在抗战的国内人士，其污蔑陷害与破坏本党之心，竟与敌人如出一辙，称之为匪军，谥之为奸党，摧残镇压，不遗余力，大敌当前，相煎何急，诚有令人百思不解者。所望此等现象，迅速加以消除，回复抗战初期之状态，化戾气为祥和，易相克为相助，共以国家民族为重，则抗战前途，光明立见，抗战第五年的局面，必可变为团结进步胜利的局面，这就是本党所馨香祷祝的。

同胞们，将士们！抗战的第五年是决定世界命运的一年，也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年，大家应该警觉起来，特别团结，特别努力，坚持我们民族解放的旗帜，脚踏实地，向前奋斗，配合各国人民反抗法西斯的斗争，争取我们的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完全相信，只要我们坚持努力，不犯错误，我们的目的是能够达到的，最后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法西斯奴役！

援助苏联！

抗战胜利万岁！

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胜利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四一年七月七日

为“七七”事变四周年题词

(1941年7月7日)

团结。

致周恩来、廖承志电^[1]

(1941年7月8日)

我患肌肉性发炎，需用亚陀方耐尔，延安已无此针剂，别人亦需用，拟请设法购买若干，如有可能则买五十盒。

[1] 这是毛泽东关于购买药品致周恩来、廖承志电的主要内容。

驳斥何应钦*

(1941年7月9日)

何应钦为暗藏的亲日派首领，实制造解散新四军事件的祸首，中共中央曾经请求国民政府予以惩办者。皖南事变之前，举世均知新四军为忠勇抗战之军队。皖南事变后，新四军之十万健儿仍与敌人奋战于大江南北，亦为举世所熟知。而皖南事变之所以出现，正因该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二氏遵令北移，道经茂林地区所发生者。故一月十三日歼灭新四军皖南部队之行为与乎一月十七日军事委员会解散新四军之命令，均属颠倒是非违反抗战利益之反动的反革命的举措，千秋万世，难逃公论。皖南民谣有云：“军纪军纪，排除异己，命令命令，日本高兴”，可谓一针见血。当此抗战第五年开始之际，全国军民均要求加强民族团结，蒋委员长亦有“精诚团结”之宣示，何应钦卖国成性恬不知耻，复敢为此挑拨团结有利日寇之谗言，诚所谓陈叔宝全无心肝矣。所谓“破坏抗战局面，破坏抗日阵线”者，通国皆知并非他人，实系亲日派何应钦。朝有秦桧，岳飞不得不死，抗日阵线内部而有何应钦，忠勇之新四军乃不得不被解散。何应钦而仍继续窃据要津，抗战局面与抗日阵线势必被其破坏。故我们甚望国民政府站在抗战立场，罢免何应钦，迅速解决新四军问题，以利团结抗战，则不胜盼祷云。

帮助苏联红军我们决取 广泛游击战的长期斗争方针

(1941年7月15日)

恩来^[1]同志：

(一) 中央讨论了你的来电^[2]，关于军事准备，决定从学俄文，学自然科学及准备东北干部三点着手。(二) 关于香港，认为确实重要，准备派人，惟人选尚须斟酌，富春^[3]去尚觉不够，博古^[4]去如何？(三) 关于军事行动，自苏德战起，我们即刻加紧侦察和准备破坏交通，借以牵制敌人，我们决心在现在条件下以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但由于日寇在华北已占据了四年，对大城市、铁路、矿山等已建筑坚固工事，且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假若日本进攻苏联时，我们在军

[1] 恩来，即周恩来。

[2] 指1941年7月3日周恩来给毛泽东的电报。该电估计美以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经济特权等为条件使日本不用武力南进的政策不易成功，“拖”的可能更大，压迫中国仍是主要的。提出我们的对策是：在军事上提高接受新武器的条件，学自然科学，学俄文和近代军事知识等；在大后方更严密地下党组织；在海外要加强党的领导，以开展对各方面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与扩大民主运动等。

[3] 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4] 博古，即秦邦宪，当时任《解放日报》社长和新华通讯社社长。

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因此我们采取巩固敌后根据地，实行广泛的游击战争，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而不采孤注一掷的方针。如果我们能加强弹药、机关枪、大炮和炸药的装备，我们的行动效力就当更大些。尤其是步枪子弹等于至宝，因我们每枪平均只有二十发，机关枪极少，炮则更少，爆炸的黄色火药亦得不到。此条请告崔兄^[1]并请他转告远方^[2]朋友。（四）关于文电所述洛阳中条山二事已转知彭总^[3]注意。（五）关于见蒋^[4]，张冲^[5]既两次来催，似可一见，看他说些什么，如能释放叶挺^[6]及发八路几个月饷，国共关系即可开始转圜。但仍不可求之过急，急则反为无效，你的不急是有理由的。（六）英苏协定^[7]将成世界政治的枢纽，美国在政治上只能跟着这条路线走，不能操纵一切了。英苏协定将影响日本，增加其顾虑，亦将影响中国，促成中苏、国共的好转。（七）第三个星期的苏德战

[1] 崔兄，指崔可夫。1940年12月后担任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和国民党政府军事总顾问。

[2] 远方，指苏联。

[3] 彭总，指彭德怀，当时任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副总司令。

[4] 蒋，指蒋介石。

[5] 张冲，当时是国民党的谈判代表。

[6] 叶挺，新四军军长，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蒋介石无理扣押。

[7] 苏英协定，1941年7月12日，英国和苏联的全权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了《联合王国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为对德作战采取联合行动的协定》。双方约定在对希特勒德国作战中彼此给予援助和支持；不与敌单独媾和或停战。

争^[1]已成对峙局面，但决战尚在后头，危险尚未过去。如正面打不进，希特勒将向土耳其、伊拉克、高加索出击，这将是英苏海陆空三军主要配合作战的地区。（八）日本集中船只于太平洋，任板垣为朝鲜司令官，从中国调动部分兵力去满洲^[2]，似在准备反苏，但主要仍看德苏战争结果，目前似尚在观望中。

毛泽东

删午

[1] 苏德战争，1941年6月22日，德国纠集其附庸国突然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此后苏联人民开始了卫国战争。1941年10月，德军大举进犯莫斯科，苏军开展积极防御，并于12月发动反攻。1944年，苏军发起总反攻，全部收复沦陷的土地，并把军事行动转入敌人领土上进行。1945年年初苏军展开强大攻势，5月，苏军攻克柏林，迫使德国无条件投降。

[2] 满洲，指中国东北地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占中国东北地区，1934年3月建立傀儡政权“满洲帝国”。1945年8月，随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而被取消。

给刘雪苇^[1]的信

(1941年7月15日)

雪苇同志：

来信及提纲^[2]收读。虽然我提不出什么意见，但是赞成你写这本书。此复。致以
敬礼！

毛泽东

七月十五日

[1] 刘雪苇（1912—1998），贵州郎岱（今属六盘水市）人。当时任延安星期文艺学园副主任。

[2] 指刘雪苇写的中国新文学史讲授提纲。作者原拟按这个提纲写一本中国新文学史，后来缩写为他的《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一书的第一章（《新文学的历史说明什么》）。该书于1948年5月由大连光华书店出版。

雪苇同志：

航行及摄影极好。请将所
拍不出什么写回，但要写好航行
情况。此复。毛泽东
敬礼！

毛泽东
七月二日

毛泽东致刘雪苇的信的手稿。

为中国医科大学第十四期毕业生题词^[1]

(1941年7月15日)

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毛泽东

[1] 这是毛泽东为延安柳村店中国医科大学即将毕业的第十四期学员的题词。

救死扶伤堂
革命的人之上
毛泽东

毛泽东为中国医科大学第十四期毕业生的题词。

八路军新四军应取长期斗争方针

(1941年7月18日)

少奇同志：

文^[1]电悉。(一) 反攻口号是对的，七七宣言^[2]上已提积极进攻口号，将来可用带战略性的反攻口号。(二) 但八路、新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三) 全局决定于苏联打胜仗。苏之数百万后备军目前刚刚用上，或在数日内有一决战，制止德军攻势，则大局最有利。如列宁格勒、莫斯科两城不守，则日必攻苏，苏之困难加重，将变为长期战争，但英苏协定已奠定最后胜利基础，美德、美日冲突均不可免，大局仍不利于法西斯。(四) 乘机取利，制日制共，是蒋^[3]的方针，因此我们对蒋还是既不让又不攻的方针。让地盘给蒋在我既事实上不可能，他也决不会同日本拼，他是很机会主义的，很精巧的。(五) 你前电所提以《共产党宣言》《新民主主义论》两书作老干部文化课本，似不适宜，因太深读不懂。还宜重新编课本，中宣部在着手。(六) 你的两篇文章望从香

[1] 文，即十二日。

[2] 七七宣言，指1941年7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

[3] 蒋，指蒋介石。

港寄来，以资快睹。

毛泽东

巧

复周恩来、董必武电^[1]

(1941年7月22日)

(一) 我们决赞助他们的民主运动；(二) 国民党正在发动反共宣传，目的在杀鸡给猴看，打击各小党派，目前还谈不到对十二条的让步问题，仅在国民党真有好转诚意时，我们才准备谈判具体条文（对某几条可以商量）。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复周恩来、董必武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电^[1]

(1941年7月24日)

此次国民党发动反共宣传，全由何应钦一手主持，得蒋默认，但为英美派郭泰祺^[2]、王世杰等所反对！自我们联络英、美在华人员与英美派，集中揭露亲日派阴谋后，据恩来二十三日电告，彼方^[3]业已失败。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2] 郭泰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

[3] 指国民党。

给各兵团首长的指示^[1]

(1941年7月30日)

医务人材培养过程很长，且技术不易高深，我军医务建设在技术上进步不大，今后应尽可能地吸收大后方与广大沦陷区技术水平高深的医务人材。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关于尽量吸收医务人才的问题向各兵团首长发出的指示的主要内容。

自卫方针应准备长期坚持下去

(1941年7月30日)

克诚^[1]，并告胡服^[2]：

两电均悉。此次反共宣传是蒋^[3]密使何应钦^[4]干的，但为郭泰祺王世杰^[5]等英美派所反对，经恩来^[6]反击后已暂停止。蒋、何用意不外准备舆论，便于日攻苏时有理由迫我开黄河以北。但只要苏能胜德（两星期来德军已无进展），日必不敢反苏，只要英美苏合作（英苏已订同盟，美苏日益接近），蒋必不敢大举反共，整个形势于我有利。假如日冒险攻苏，蒋迫我北上，我之方针亦无变更，政治上仍是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军事上在武器未改变前仍是与敌人无时间的不冒险亦不消极的长期游击战争。华中山东部队决不北上，对蒋之进逼则取自卫政策，对国民党每一反共宣传与反共行动仍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方针，对蒋、何是何反我我亦反何，何停我亦停。此种方针应准备长期坚持下去，不为一时

[1] 克诚，即黄克诚，当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

[2] 胡服，即刘少奇。

[3] 蒋，指蒋介石。

[4] 何应钦，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

[5] 郭泰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当时任国民党国民参政会秘书长。

[6] 恩来，即周恩来。

一事所冲动，望注意为盼。

毛泽东

七月三十日

给林伯渠、谢觉哉的信^[1]

(1941年7月31日)

最近两次谈话，又读谢老两信，又得高岗同志转达二老意见，使我对现行边区财政经济政策的争论问题有更多的了解。我的了解仍不足，现行政策的几个根本点（预算分散，纸币，运盐）又尚在执行之中，最后的谁是谁非，还无法作结论。我现在不能断定纸币与运盐不失败，我同二兄谈过，如弄得不好，也要失败的。但我现在还不能同意停止现行政策，采用另一政策，因为另一政策也许要失败的，或失败得更大。

多从反面（即现行政策的正面）设想，现行政策固然已出了很多毛病，但另一政策是否即毛病较少？从相对性设想，勿只从绝对性设想（即只设想现行政策完全是错的，另一政策完全是对的）。注意检查自己工作中的缺点，例如在税收工作上，在纸币发行工作上，在领导方式上，我觉得都是有严重缺点的。

[1] 这是毛泽东关于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政策的争论问题致林伯渠、谢觉哉信的主要内容。

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1]

(1941年8月1日)

二十年来，我党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研究，虽然是逐渐进步的，逐渐增加其知识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抗战以来，我党在了解日本、了解国民党、了解社会情况诸方面是大进一步了，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作风也减少了。但所了解者仍然多属粗枝大叶的、漫画式的，缺乏系统的周密的了解，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作风并未彻底消灭。对于二十年来由于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由于幼稚无知识，使革命工作遭受损失的严重性，尚未被全党领导机关及一切同志所彻底认识。到延安来报告工作的同志，其中的多数，对于他们自己从事工作区域的内外环境，不论在社会阶级关系方面，在敌伪方面，在友党友军方面，在自己工作方面，均缺乏系统地周密地了解。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地周密地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还不知道，不但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调查研究，是如何的无微不至，就是国民党对于国内外情况，亦比我党所了解的丰富得多。还不知

[1] 这个决定是毛泽东起草的。

道，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为此目的，特决定办法如下：

（一）中央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

（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独立区域的区党委或省委，八路军、新四军之高级机关，各根据地高级政府，均须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有关该地敌友我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各该地工作的直接助手，同时供给中央以材料。

（三）关于收集材料的方法，举例如下：第一，收集敌、友、我三方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的各种报纸、刊物、书籍，加以采录、编辑与研究。第二，邀集有经验的人开调查会，每次三五人至七八人，调查一乡、一区、一县、一城、一镇、一军、一师、一工厂、一商店、一学校、一问题（例如土地问题、劳动问题、游民问题、会门问题）的典型。从研究典型着手是最切实的办法，由一典型再及另一典型。第三，在农村中，应着重对于地主、富农、商人、中农、贫农、雇农、手工工人、游民等各阶层生活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详细调查；在城市中，应着重对于买办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贫民群众、游民群众及无

产阶级的生活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详细调查。第四，利用各种干部会、代表会收集材料。第五，写名人列传。凡地主、资本家财产五万元以上者，敌军、伪军、友军团长以上的军官，敌区、友区县长以上的官长，敌党、伪党、友党县以上的负责人，名流、学者、文化人、新闻记者在一县内外闻名者，会门首领、教派首领、流氓头、土匪头、名优、名娼，以及在华外人活动分子，替他们每人写一数百字到数千字的传记。此种传记，要责成地委及县委同志分负责任，传记内容须切合本人实际。同时注意收集各种人员的照片。第六，个别口头询问。或派人去问，或调人来问，问干部、问工人、问农民、问文化人、问商人、问官吏、问流氓、问俘虏、问同情者，均属之。第七，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

(四) 除中央及各地的调查研究机关外，必须动员全党、全军及政府之各级机关及全体同志，着重对于敌友我各方情况的调查研究，并供给上级调查研究机关以材料。

(五) 向各级在职干部与训练干部的学校，进行关于了解客观情况（敌、友、我三方）的教育。鼓励那些了解客观情况较多较好的同志，批评那些尚空谈不实际的同志；鼓励那些既了解情况又注意政策的同志，批评那些既不了解情况又不注意政策的同志。使这种了解情况、注意政策的风气，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风气密切联系起来。在学习中反对不管实际只记条文的风气，反对将学习马列主义原理原则与了解中国社会情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互相脱节的恶劣现象。要提倡干部与学生看报，指导看报方法，指导他们分析时局的每一变动。要供给干部与学生关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各种情况的实际材料，把讲授与研究这些材料及其结论当作正式课程，给与必要时间，并实行考绩。

(六) 责成各级党部将本决定与中央七月一日所发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联系起来，向党的委员会及干部会议作报告，并讨论实施办法。

给萧军^[1]的信

(1941年8月2日)

萧军同志：

两次来示都阅悉，要的书已付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敬问
近好！

毛泽东

四一年八月二日

[1] 萧军（1907—1988），辽宁锦县人。当时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

萧军同志：

两次来信都收到，感谢
你已病上。但用烟去同你谈
话时，缺之不耐，有些空虚。
吸烟之后，又有关寒气得，轻
微作，反引起胸痛，吸烟
时流。肺有气管的毛病，
你对我吸烟，都体谅甚，都

改正。吸烟有害健康，
不用某些毛病，又要绝对戒烟。
烟，要有耐心，要连着吸烟，
人吸烟，要改掉吸烟的毛病。
自己吸烟，方有生吸，就
丢人现眼。吸烟天天吸烟，
其甚。你虽然吸烟，
但吸烟的烟，对身体有害。

这样之上。如再吸烟，
我将不再谈一面。敬候
近好！

毛泽东

一〇·一·一

毛泽东致萧军信的手稿。

军渡碛口线之河防应该加强^[1]

(1941年8月3日)

贺、周，并告彭、左^[2]：

据报，军渡、碛口线集敌四千余准备渡河，查王旅^[3]主力北调应付何文鼎^[4]，河防空虚，日寇极有可能乘虚渡犯，如河防不守影响极大。望贺周迅速布置，加强河防兵力，准备打击渡犯之敌，另以一部从侧面威胁，务使敌不得逞。如何布置，速告。应否派士第至佳县指挥，亦望酌告。

毛 朱 王 叶

江 亥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军委参谋长叶剑英给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贺龙、参谋长周士第的电报。

[2] 彭、左，指彭德怀和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

[3] 王旅，指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旅长兼政治委员王震。

[4] 何文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战区新编第二十六师师长。

给谢觉哉的信^[1]

(1941年8月5日)

你的各信我都转给弼时、王明、高岗、陈正人四同志看，使他们多了解你。他们都愿意多和你及林老谈，都愿把事情把关系弄得更好些。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对下情搜集亦然，须故意（强所不愿）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经验，用此方法，很多时候，前所认为对的，后觉不对了，改取了新的观点。客观地看问题，即是孔老先生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你三日信的精神，与此一致，盼加发挥。此次争论，对边区，对个人，皆有助益。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是。事情只求其“是”，闲气都是浮云。过去的一些“气”，许多也是激起来的，实在不相宜。我因听得多了，故愿与闻一番，求达“和为贵”之目的。现在问题的了解日益接近，事情好办。在短时间内，总结一下边区工作很好，请准备材料及意见。你身体有病，切勿过劳，暂时以休养为主很好。

[1] 谢觉哉，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这是毛泽东致谢觉哉信的主要内容。

关于财经建设的基本方针 给谢觉哉的信

(1941年8月6日)

觉哉同志：

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深刻，却觉其规律性或决定点似在简单的两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首先是发展农、盐、工、畜、商各业之主要的私人经济与部分的公营经济，然后是输出三千万元以上的物产于境外，交换三千万元必需品入境，以达出入口平衡或争取相当量的出超。只要此两点解决，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此两点的关键，即粮、盐二业的经营，如能增产二十万至三十万担粮与运三十万至四十万驮盐出境，即算基本地解决了两个问题。

按此两点来检查我们工作，则：（一）今年的八百万投资仅顾及公营事业，全没有顾及私人农业贷款与合作社贷款，仅是不得已的过渡时期的办法，今后必须停止公业投资，发动私业投资，即大放农贷与合作社贷款，兼放畜牧贷款与私商贷款，以达增加粮食产量、牛羊产量与相当繁荣商业之目的。如能投三四百万元于农业，加以政府的春耕秋收运动之动员，增产二十万至三十万担粮食，则

收二十万担粮税数千万斤草税而民不伤，或尚可向绥、榆^[1]输出数万担。如能使畜产繁殖及商业有相当繁荣，则年收二三百万元羊税与七八百万元商税而民不怨，财政的基本问题即解决了。今年之仅仅注意公业投资未能顾及私业投资，是由于等着公营事业救急的特殊情况，但由此产生的害则是与民争利（垄断）及解决不了大问题。明年决不能继续这个方针，仅有盐业投资是明年应该继续的，而其他公营的农、工、商业则只当作必要的一部分继续下去。（二）盐为达到出入口平衡之唯一的或最主要的办法，只要能年输三十万驮出境，换取三千万元（以每驮法币百元计）棉、布进来，即算平衡了出入口，因据银行告我，边区棉、布等入口年仅三千万元之数。如能输出四十万驮，除换取三千万元棉、布之外，尚有一千万元现币进口，则情况更好了。至收六百万至八百万元盐税以补一部分财政之不足，尚是第二个好处，盐的第一个好处是解决出入口平衡问题。出入口问题一解决，则物价、币价两大问题即解决了。据此以观今年盐的官督民运政策，不但是未可厚非的，而且是完全正当的，虽然是否能销出三十万至四十万驮尚不可必，然舍此并无解决出入口问题之其他办法，因而舍此便无法解决物价、币价两大问题，故此政策的根本方针是完全正当的。因为完全的自由贸易政策，在盐的问题上，今年是不能行的，原因是粮贵、草贵与国民党限制，今年与去年不相同，舍官督民运（半强制主义），便不能运三十万至四十万驮出境。

我前信未蒙林老^[2]复示，似以所提各点为不切肯要。然区区之意，在使此问题得到合理解决，以达意志统一与行动统一之目的，

[1] 绥、榆，指陕西的绥德县和榆林县。

[2] 林老，指林伯渠，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

过去数月的不统一，实在是非常之不利的。然统一首在对财经建设基本方针有一致意见，故就感想所及，提出如上论点，就正于你及林老。如你及林老觉得有错误，即祈毫不客气，一一指正，以归一是。昨日政治局会议决定委托我召集一次有关同志的会议，解决本问题。我想先作个别商讨，然后再开会议，较为有益，未知你意如何？

敬候

日安！

毛泽东
八月六日

给谢觉哉的信

(1941年8月9日)

谢老：

八日信及安塞报告均收，已看一遍，尚待详看。准备开的总结会议是积极的，非单为辩论个别问题，请准备一积极建议，包括全部财经问题，分列若干条，今年如何办，明年如何办，均列入之，拟好时请交我，以便先加研究，交换意见，然后讨论。林老前有三年计划，亟欲一阅，林老昨示谓待增修重拟，不知在十天左右能脱稿否？大家希望能统一意志与统一行动，我意须确定一行动纲领，否则无法统一。而此行动纲领，非根据一方案交换意见，过细研究，无法讨论与确定。我是毫无研究的人，为欲开此会，故愿加以了解，你的各信我都过细地读了。在不妨碍你健康条件之下，如能一条文式的方案，或即就林老三年计划，根据新近经验与研究加增饰，那是最好的。我此刻尚未睡，上午如能睡好，下午或派车接你来谈，那时再定。即致
礼！

毛泽东

八月九日早

富春正人^[1]各有一意见书，前时粗看未经意，亦想细看，你看过此两件否？

[1] 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正人，即陈正人，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组织部部长。

给高岗、陈正人的信^[1]

(1941年8月9日)

谢老八日信及所附从安塞来的报告，均附上，请察阅。如安塞报告，情形是很坏的，是否属实？你们有此类调查否？是否你们所得的仅偏于好的一面，而事情之实际则基本是坏的，即是说运盐是行不通的。又报告中所说“向友区迁徙”“收成已坏”“无人锄草”等项是否属实，统请见告。

[1] 这是毛泽东致高岗、陈正人信的主要内容。

给萧军的信^[1]

(1941年8月10日)

我现在有时间，假如你也有暇，请惠临一叙。

《解放日报》不给登，你不是自己办了一份《文艺月报》吗？你可以登在《文艺月报》上啊！

[1] 这是毛泽东致萧军信的主要内容。

给谢觉哉的信

(1941年8月12日)

谢老：

十一日信悉。

劳役须经政治动员是完全对的，这就是我们的劳役与国民党的劳役之原则的区别，我们的特点是革命加战争。

边府党团^[1]不应与政府委员会混同，党团只须三、五人，任务是掌握政策，有事即谈，谈通了，或拟成了计划，商得西北局同意（或常委通过）就提在政府委员会上通过。党团会由你召集，也不必各厅都有人，以能考虑政策的人为限。此事请考虑。

副主席问题可考虑。

敬礼！

毛泽东

八月十二日

[1] 指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党团，当时是中国共产党在政府、工会、农会及其他群众组织中建立的党的领导机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党章中，党团改称“党组”。

给萧军的信

(1941年8月12日)

萧军同志：

昨晚未晤罗、舒^[1]二同志，此刻不知他们二位及兄都有暇否？又艾青^[2]同志有暇否？又各位女同志有暇否？如有的话，敬请于早饭后惠临一叙，我们谈通一些问题，是很好的，很必要的。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八月十二日早

[1] 罗，指罗烽（1909—1991），原名傅乃琦，辽宁沈阳人，作家。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舒，指舒群（1913—1989），原名李书堂，黑龙江哈尔滨人，作家。当时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

[2] 艾青（1910—1996），原名蒋海澄，浙江金华人。当时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1年8月13日)

现在边区财经问题主要有两个矛盾，即生产的人民与消费的人员的矛盾，人民一百四十万要供给八万人的生活，军队、机关等自己生产只能供给五分之一，尚有五分之四须人民负担；其次是出入口不平衡，相差甚大（八百万元）。解决矛盾的方针是（一）发展经济；（二）使出入口平衡。发展经济，今年投资多在公营事业，今后要投资数百万元于民营的工、农、商业。发展经济的原则，主要民营，部分公营。扩大国营企业不是新民主主义前期的事，而是新民主主义后期的事，只有在有了大工业时才能办到。平衡出入口，要使盐大量出口，现在采用组织人民运盐的官督民运办法，是平衡出入口的好办法。运盐要不违农时，进行政治动员，组织劳动力。能够解决发展经济与平衡出入口这两个问题，就能使边币稳定。劳役问题，由于陕甘宁边区有革命的民众，劳役是可能的；由于战争，劳役是必需的。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给张冲家属的唁电

(1941年8月13日)

张淮南先生家属礼鉴：

惊闻淮南先生逝世，至深哀悼，特电致唁。

毛泽东

元

接见绥德警备区学生 参观团代表时的讲话^[1]

(1941年8月14日)

我们共产党想把中国干好，这和你们的希望是一样的，盼你们回去后，把这意思转告绥米父老姊妹们，并努力学习，帮助改进当地工作。

[1] 1941年8月14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接见绥德警备区学生参观团代表十余人，向他们了解绥德、米脂的民情及民众呼声，解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这是毛泽东对他们讲话的一部分。

派一个团带干部 去发展中条山的游击战争

(1941年8月17日)

德怀^[1]同志：

中条山十县既只有敌伪全无友军，派一个团带干部去发展游击战争是很对的。如有必要还可酌量多派一点，以不使卫^[2]感到威胁为度。阎锡山^[3]与蒋^[4]矛盾甚大，向我们拉拢，王靖国^[5]部队东进，目的在占地盘吃饭，我们应让他占一部分地盘，不与磨擦。

毛泽东

十七

[1] 德怀，即彭德怀。

[2] 卫，指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3] 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4] 蒋，指蒋介石。

[5] 王靖国，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对伪军的政策及对伪官兵的处理意见^[1]

(1941年8月17日)

陈、刘：

关于鱼电^[2]对伪军的政策及对伪官兵之处理，有以下意见：

一、对待伪军应采德威兼施办法。不打不能迫使其就范建立我军的威权，但专打则势必结成生死冤仇。不打与专打两个极端政策对我们都是不利的。

二、伪军中两面派分子事实上是存在的，也是必然会有的。我们应当承认两面派的地位，控制他使他不完全倒在敌人方面来反对我。这是很必要的认识。

三、对伪军俘虏不分官兵与社会出身，原则上一概不杀。对我成见深放了又来打我的分子也可以不杀，即再捉再放的办法比杀的办法要好，效果要大。释放俘虏一律不要取保，也不要他们发誓说以后不当伪军，但可要他们发誓以后不真正帮助日本人来反对新四军。即使他们违背誓言助日本打我，则我们应耐烦地采取七擒孟

[1] 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覃政、傅钟给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和政治委员刘少奇的电报。

[2] 似指陈毅、刘少奇和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1941年8月6日（或7日）给中共中央华中局副书记饶漱石、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刘少奇并转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的电报。电报提出处理新四军第一师新近俘获大批伪军李长江部官兵的各项原则。

获^[1]政策。

四、对李长江^[2]部队的俘虏应多进行工作，并从中争取一批去瓦解分化李之内部。

毛 王 谭 傅

篠

[1] 三国时，诸葛亮为巩固蜀汉后方，平定南中（今四川南部、云南贵州等地），曾七次生擒孟获，又七次释放，使孟获心悦诚服。事见《三国志·蜀·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2] 李长江，曾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苏鲁皖边区游击军第一路游击军指挥官，1941年2月13日率其七个纵队投降日军，编为伪第一集团军。

复陈毅、刘少奇电^[1]

(1941年8月17日)

十日电^[2]悉，领导机关在最困难时移至皖东是可以的必要的，但不能大举向西发展。目前中苏英美、国共两党均亟需联合对付法西斯，桂系李、白亦与何应钦有区别，故不宜大举西向。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陈毅、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2] 陈毅、刘少奇8月10日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提出“敌伪如再扫荡”，我主力在苏北即甚难活动。因此我华中今后发展方向应转向西，以皖东为基础，沿长江两岸逐渐向西发展，与李先念联系，以便将来能向大别山同皖南、赣北、鄂南山地发展”。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1年8月18日)

罗丘宣言证明美国决心参加反侵略战争，对英、美、苏、中等都是有利的。这一宣言对德国没有和平的余地，但对日本留有妥协的余地。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8月14日罗斯福、丘吉尔联合宣言讲话的一部分。1941年8月1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大西洋的纽芬兰海面会谈后发表的共同宣言，又称“大西洋宪章”。

致彭德怀电^[1]

(1941年8月18日)

王世英回延，称阎已允与陕甘宁边区通商（已开始运盐），又允我再设电台，声称华北仅余我们两家，宜好好合作等语。阎之目的在求生存，希望在河东占一地盘而我不打他。判断阎现时不会投敌。我应利用阎蒋矛盾，给阎以生存余地，请善处之。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利用阎锡山、蒋介石之间矛盾的问题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给陈正人^[1]的信

(1941年8月19日)

正人同志：

我要朱理治^[2]写了一报告书，很有些价值，不知他抄了一份给高岗^[3]和你没有？如未，请向他索一份，以作你们起草财经纲领的参考。在起草此文件前，请与南汉宸，高自立，叶季壮，^[4]朱理治及粮食局贸易局诸人加以研讨，他们是实际经手人员，从他们收集各方面确实的材料与意见，起草的东西方更准确。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八月十九日

[1] 陈正人（1907—1972），江西遂川人，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组织部部长。

[2] 朱理治，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银行行长。

[3] 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

[4] 南汉宸（1895—1967），山西洪洞人，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厅长。高自立（1900—1950），江西萍乡人，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兼建设厅厅长。叶季壮（1893—1967），广东新兴人，当时任八路军总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

中共中央关于最近国际事件的声明

(1941年8月19日)

关于罗斯福丘吉尔宣言及行将召集的莫斯科会议，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如下：

八月十四日美国大总统罗斯福及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联合宣言及提议在莫斯科召集三国会议，乃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从此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阶段。罗丘宣言及其提议召集莫斯科会议，表示了英美打倒法西斯主义的决心，这种决心是完全有利于苏联，有利于英美，有利于中国，有利于世界的。因为过去与现在的最大危险，是英美内部一部分亲法西斯的反动派，企图违背人民意志，接受法西斯和平，但是宣言拒绝了这种和平。或者主张隔岸观火，让苏联独负消耗法西斯的重担，以便将来乘机取利，但罗丘提议召集莫斯科会议以便具体分配战争任务与战争资材之行动，则打击了这种消极的企图。只要英美承认“解除各侵略国武装是必要的”，主张“纳粹的最后崩溃”，同意分配战争任务与战争资材，便保证了苏联与英美的胜利，保证了中国与全世界的胜利。斯大林在其七月三日的著名演说中所谓苏联信守条约、德国毁约攻苏之事实，造成了一个长期政治因素，这种因素实为军事胜利的基础，这一真理，在此次罗丘宣言中及召集莫斯科会议的提议中，完全证明了。罗丘宣言及其提议召集莫斯科会议，特别表明了美国对于参加

反抗法西斯侵略的神圣战争，已经下了决心。而美国的这种决心，即是表明了全世界反抗法西斯侵略的伟大战斗阵线已经在政治上完成，而莫斯科会议则将在组织上完成之。法西斯侵略阵线，已经处于孤立状态中，法西斯失败的前途已经确定。目前的这一形势，在一九三九年秋季欧战爆发之前是没有可能的，因为当时苏联及全世界人民虽然力主组织保障国际安全的反法西斯阵线，但当时英美方面还存在着害人害己的慕尼黑政策，只在残酷战争的教训之后，这一错误政策才改变过来。从直接的因素说来，这是苏联人民英勇斗争的结果，红军阻止了德军的攻势，使得罗斯福丘吉尔有勇气举行了此次会议，发表了此次宣言。这又是英美人民英勇斗争的结果，这种斗争打击了英美内部一部分亲法西斯的反动派，使得罗斯福丘吉尔敢于拒绝法西斯和平的引诱，发表了此次伸张人类正义的宣言，决定了英美苏三大强国坚固联合这种具有政治远见的政策。这又是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结果，中国阻止了日本法西斯匪军的进攻，使得英美有勇气声明解除一切侵略国的武装。宣言未提日本之名，宣言的第四条暗示可与日本通商及供给原料，第七条暗示允许日本移民，仍在企图拉拢日本现状维持派，表示其愿与日本妥协的一面，但宣言的第二条反对强制变更领土，第三条主张恢复被剥夺权利的国家，特别是第八条承认解除一切侵略国武装的必要性，这些都是积极反日的。总之，全中国人民都欢迎英美宣言，欢迎行将在莫斯科召集的英美苏三国会议。中国人民相信，这不但是英美苏三国人民从法西斯威胁下获得解放的国际基础，而且是全世界人民获得解放的国际基础，而且是我们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国际基础。中国人民的任务在于坚持团结与抗战，克服抗日阵线内部企图破坏团结抗战的反动因素，积极组织对日寇的反攻。中国内部存在着敌

人的第五纵队，这就是亲日派及亲德派，他们违背民族利益与人类利益，在国内倡言反共，完全是响应希特勒的“反布尔什维克十字军”，为日本法西斯肃清道路。当此全世界反法西斯大团结实行建立之时，此辈第五纵队如尚毫无觉悟，继续其反共反人民反民族反人类的罪恶行为，必为全国全世界所不齿。我们相信，只要全国人民增强努力，肃清第五纵队，则团结便能巩固，抗战便能坚持，反攻便能实现，中国是有资格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线而成为一个有力的方面军的。全中国与全人类的命运关系于这一向法西斯主义的决斗，中国各党派应该善处此种千载难逢的时机，团结全国人民，一致向好的进步的方向努力，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所深切期望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九日

征求华北各战略单位 对军区建设的意见^[1]

(1941年8月21日)

华北各台：

在抗战现阶段，为了坚持敌后抗日根据地及准备主力军的新的机动，军区建设工作更为重要。同时由于平原与山地军区建设的条件有种种不同，为了研究军区工作起见，特将下列问题，征求各战略单位首脑机关的意见，望研究并电复我们。

- (一) 正规军与地方军互相区别的主要标志是什么？
- (二) 已无可能进行运动战的若干平原地区，是否需要有正规军？尚在该地区之正规军应怎样办？
- (三) 军区与正规军的指挥机关应如何（兼或不兼）？
- (四) 军区武装（除正规军外）的建制与指挥关系应如何？
- (五) 在平原地区的军分区是否有必要指挥两种部队（正规军与军分区武装）？
- (六) 在平原地区的县区游击队，在军事行动的指挥上应归军分区或归本县区的党政机关？
- (七) 平原地区的部队编制，大团制和小团制，何者为好？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军委参谋长叶剑英给华北各战略区的电报。

- (八) 地方部队的政治工作制度，应有些什么特点？
- (九) 地方部队政工机关的编制应当怎样？
- (十) 对于实行征兵制的意见如何？

毛 朱 王 叶

(八月)

致彭德怀电^[1]

(1941年8月22日)

国民党发动反共宣传，其目的似准备舆论，以便在日本攻苏时迫我北上；再则民族资本家对我同情，我党政治影响扩大；拉铁摩尔^[2]新来，有加以压抑之必要。我们将驳复国民党反共宣传。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2] 拉铁摩尔，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推荐给蒋介石的政治顾问，1941年7月到达重庆。

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1] 第二期工作报告上的批示

(1941年8月22日)

很好的一个报告。各同志阅后保存于秘书处。

延安的学校应照此种精神去办。这是理论与实际联系的学校，
不是单纯的概论学校。

[1] 日本工农学校，是八路军政治部1940年8月在延安创办的一所日本兵学校。学生大部分是战场上被俘的日本士兵，一部分是自动投诚的日本兵。

关于总结财经工作经验给谢觉哉^[1]的信

(1941年8月22日)

谢老：

二十一日示悉。我要的，就是林老^[2]令财建两厅起草的，不是另要别的计划。你说有了今年经验，计划会要实际些，是对的。今年有很丰富的经验，为此前所未有的。最大的一条经验，就是在公私合作中（八万人与一百四十万人合作）解决了问题，证明政策是对的，办法是有的。至于执行政策中的错误缺点（边币中，盐的产销中，粮食中，税收中，公营工商业中），都由于缺少经验之故，今后应该着力于纠正。今年之所以采取这些政策，首先是根据于革命与战争两个基本的特点，其次才是根据边区的其他特点（地广，人稀，贫乏，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等）。凡人（包括共产党员）都只能根据自己的见闻即经验作为说话，做事，打主意，定计划的出发点或方法论，故注意吸收新的经验甚为重要，未见未闻的，连梦也不会做。边区有了今年经验，明年许多事都好办了。今年经验教育了八万人，也教育了一百四十万人（富县报告可证），教育了干部，也教育了领导者。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边区有政

[1] 谢觉哉，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党组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

[2] 林老，指林伯渠，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

治、军事、经济、财政、锄奸、文化各项重大工作，就现时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而不要提民主或其他什么为中心工作。这些意见，未加深究，提出作为你的参考。高岗^[1]同志送来一个材料，值得注意，阅后请退还高岗同志。徐老^[2]生活的叙述看过，已交组织部，中央准备一般地解决这个问题，不但徐老一人。

此问

日安！

毛泽东

八月二十二日

周文^[3]可加入党团^[4]，共六人，请提出中央局。政府党团向中央局负责，是执行中央局决定的，其任务是掌握政策，总结经验，大事须经中央局批准。

我说盐的官督民运含有部分的强制劳动，不说半强制劳动，就是你说的公私交利之意。但必须承认这部分强制的必要性，第一，农暇必须去，非去不行；第二，公盐六万驮，不但今年，明年还是

[1] 高岗（1905—1954），陕西横山人。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

[2] 徐老，指徐特立，当时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

[3] 周文（1907—1952），四川荣经人。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长。

[4] 这里指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党团，当时是中国共产党在政府、工农会及其他群众组织中建立的党的领导机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党章中，党团改称“党组”。

必须的，应列入明年预算中。春耕秋收动员，也带部分强制性，但运盐的强制性，较之春耕秋收要多一些，与完全无偿的军事动员如运粮，经济动员如筑路则大有区别。但运粮筑路也是必须的，也得承认之。只反对劳民伤财有损无益的动员。又及。

《鲁忠才长征记》一文按语^[1]

(1941年8月26日)

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

[1] 这是毛泽东看了《鲁忠才长征记》调查报告后写的按语。这个调查报告记述了鲁忠才带领运输队到陕甘宁边区所属的“三边”（盐边、靖边、定边）地区长途运盐的情况。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1年8月27日)

我党干部的理论水平比内战时是提高了，现在干部中多读了些理论书籍，但对于理论运用到中国革命实际上还不够，对中国及世界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缺乏研究和分析。我们还没有各种问题的专家，对于许多实际问题不能下笔。延安的学校是一种概论学校，缺乏实际政策的教育。过去我们只教理论，没有教会如何运用理论，就像只教斧头本身，而没有教会如何使用斧头去做桌子。延安研究哲学是空洞的研究，不研究中国革命的内容与形式，不研究中国革命的本质与现象。首先应当承认我们党缺乏关于中国革命实际的理论，才能真正实行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我们要培养行动的理论家。改造学习要采用革命的精神，对干部教育、学校教育、国民教育都要有一个大的改造。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党内教育方针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8月30日)

太平洋局面似还是拖，日本和战皆难，你的观察如何？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9月3日，周恩来复电毛泽东，对于太平洋局势，认为罗斯福对日本采取哄与拖的政策，反映到中国仍是拖的局面。

和国民党联络参谋陈宏谋等的谈话^[1]

(1941年9月1日)

(一) 国民党方面释放叶挺，共产党方面即派董必武一人出席参政会，否则仍不能出席。(二) 共产党决不推翻国民党政府，决不越过现有疆界，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在敌后有发展权利，承认现有防地，承认边区；至于在敌后的国共两军，双方下令互不攻击。(三) 恢复新四军，发给欠饷，停止逮捕。(四) 何应钦停止反共，共产党即停止反何，并可重新来往，但何若再反共，共产党必再反何。

[1] 1941年9月1日，毛泽东和国民党联络参谋陈宏谋、郭亚生、周励武谈话4小时。陈等表示蒋介石、何应钦、张治中、吴铁城在国共关系上尚未愿转圜，要求朱德到重庆去一次。这是毛泽东和他们谈话的一部分。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9月1日)

如彼方找你时，请先谈释放叶挺与必武出席这一初步的交换条件及你回延开会事。

[1] 这是毛泽东9月1日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9月8日)

积极支持民主同盟的方针是很对的。香港甚重要，但目前派不出大员，还是由廖、潘维持，待七大后再讲吧。七大代表留此多者一年，少亦半年，专等你回开会，我们意见，一定要等你，你看年内有可能回延否？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配合国民党军作战争取时局好转^[1]

(1941年9月9日)

彭、左、罗，陈、刘，陈、罗^[2]：

敌攻湘北，又犯郑、洛，国民党正集中力量抗敌，我八路新四各部应向各重要交通线予以可能的袭击，配合国民党之作战。同时对国民党敌后各部应停止任何攻击性行动，仅在彼方举行攻击时取防卫手段。同时并向国民党各部发出通知，要求配合对敌。所有上述方针，其目的都为争取时局好转。

毛 朱 王 叶

九月九日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和军委参谋长叶剑英给彭德怀、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等的电报。

[2] 陈、刘，指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和刘少奇。陈、罗，指陈光、罗荣桓，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和政治委员。

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

(1941年9月10日)

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这些主观主义者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是假马克思主义。

在苏维埃运动后期，五中全会^[2]的精神，提倡搞社会主义革命，否认革命发展不平衡，认为当时的斗争是两条道路^[3]的决战。这些都比立三路线的“左”倾在政治上表现得更完备。

在军事上，立三路线尚未完全影响苏区，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则完全影响苏区，使红军遭受更大的失败。

在组织上，苏维埃运动后期打击干部、胡乱肃反等等，比立三路线更厉害。

主观主义者提出不合实际情况的任务，如要求扩大百万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等。

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共三年多的党的路线，尚未作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2] 指1934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

[3] 指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

总结，现在要准备在党的七大作总结。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苏区中央局的决议^[1]，是完全主观主义的东西。

一九三三年反邓、毛、谢、古^[2]“右倾机会主义”的一篇文章，实际上是指鸡骂狗的。当时认为“罗明路线”^[3]在福建，在江西，在建黎泰^[4]，整个中央苏区都弄成是“罗明路线”。这篇反“罗明路线”的纲领性的文章，认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主要错误是：（一）取消反帝运动，（二）放弃苏区，（三）富农路线，（四）官僚主义。

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

[1] 指《苏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

[2] 邓，指邓小平，1932年冬任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书记，1933年3月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毛，指毛泽东，1931年6月任永（丰）、吉（安）、太（和）中心县委书记，1933年3月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谢，指谢唯俊（1908—1935），湖南耒阳人，1933年3月任江西省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五师师长。古，指古柏（1906—1935），江西寻乌人，1933年3月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裁判部长和党团书记。1933年3月起他们被指责为“江西罗明路线的创造者”，后受到撤职等处分。

[3] 罗明（1901—1987），广东大埔人。1933年在担任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时，曾因提出闽西上杭、永定等根据地边缘地区的工作条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当不同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而受到党内“左”倾领导者的打击。当时这些领导者把他的意见错误地说成是“悲观失望论”“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并且开展了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

[4] 建黎泰，指福建的建宁、泰宁和江西的黎川。当时在这里建有中共县委。

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

六中全会^[1]对主观主义作了斗争，但有一部分同志还存在着主观主义，主要表现在延安的各种工作中，在延安的学校中、文化人中，都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同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是相对抗的。它的来源是：

- (一) 中国的传统，“左”的传统。
- (二) 外国的传统，过去共产国际如布哈林、季诺维也夫^[2]等人影响。

(三) 中国是科学不发达的、存在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国家。

现在，延安的学风存在主观主义，党风存在宗派主义。

克服这些不正之风的办法是：

(一) 要认识主观主义的严重性。延安处在和平环境的后方，主观主义表现严重，但在全国也存在着主观主义。

(二) 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

(三) 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

(四) 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

(五) 对于理论脱离实际的人，提议取消他的“理论家”的资格。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实际问题、能解决实际问题的，

[1] 指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2] 布哈林（1888—1938）、季诺维也夫（1883—1936），曾是共产国际的主要领导人。自1913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至1926年11月，季诺维也夫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布哈林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6年11月至1929年4月，布哈林接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

才算实际的理论家。斯大林说，脱离实际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1]。我认为空洞的理论是荒谬绝伦的理论。

对研究实际问题的文章，要多给稿费。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要多给津贴。

(六) 宗派主义现在也有。在延安，首长才吃得开，许多科学家、文学家都被看不起。宗派主义是排挤非党干部的一种风气，即排外主义。同时也排内。闹独立性、不服从决议、没有纪律的现象，必须整顿。

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

过去卫生部门一个负责人违反对专家的政策，本位主义，违反共产主义道德，所以被撤职。

(七) 对宗派主义、本位主义，必须从原则上开展斗争。要实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事务主义。

(八) 报纸上要多登文章，奖励辩证唯物论的文章，反对主观主义的文章。

(九) 实行学制的改革，把过去的一套彻底打碎。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以《联共党史》^[2]为学习的中心，多看反对主观主义的言论。

组织思想方法论的研究组，首先从政治局同志做起。

以思想、政治、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政治局的根本业务。

政治要注意时局动向，中央委员必须增加政治知识。

军事是目前战时必须研究的业务。

[1] 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三部分。

[2] 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

(十) 要用分析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这是过去资产阶级提出的科学方法，但还要综合。我们要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从整个事物中抽出问题来作分析，再加以综合。

(十一) 研究六大至七大的中央决议。

中央研究组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决议，毛泽东为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

(十二) 教育委员会（以洛甫^[1]为首）的工作，先进行调查，再进行改革。

(十三) 延安开一个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同志全体出马，大家都出台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十四) 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

(十五) 电告少奇、恩来，征询他们的意见。

(十六) 实行全党动员，除增强党性决定、调查研究决定^[2]外，再写些文章。

[1] 洛甫，即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

[2] 指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关于农村调查^[1]

(1941年9月13日)

一 情况是逐渐了解的，需要继续不断的努力

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列宁、斯大林也同样作了许多调查。

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可惜很多同志常是主观主义，自以为是，完全不重视调查研究工作。

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所以，我们的调查工作要面向下层，而不是幻想。同时，我们又相信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

我们的调查工作，是要有耐心地、有步骤地去作，不要性急。我自己认识农村，就是经过好几年的工夫的。

记得我在一九二〇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

[1]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对中央妇委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的讲话。

争》^[1]，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2]，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我做了四个月的农民运动，得知了各阶级的一些情况，可是这种了解是异常肤浅的，一点不深刻。后来，中央要我管理农民运动。我下了一个决心，走了一个月零两天，调查了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县。这五县正是当时农民运动很高涨的地方，许多农民都加入了农民协会。国民党骂我们“过火”，骂我们是“游民行动”，骂农民把大地主小姐的床滚脏了是“过火”。其实，以我调查后看来，也并不都是像他们所说的“过火”，而是必然的，必需的。因为农民太痛苦了。我看受几千年压迫的农民，翻过身来，有点“过火”是不可免的，在小姐的床上多滚几下子也不妨哩！

不过，在当时我对于农村阶级的结合，仍不是十分了解的。到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当然，今天是抗日民

[1] 指德国考茨基著的《〈爱尔福特纲领〉解说》，恽代英翻译，书名译为《阶级争斗》，1921年1月新青年出版社出版。

[2] 指英国克卡朴（今译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李季翻译，1920年10月新青年出版社出版。

族统一战线，不是剥夺地主、富农的所有权，而是减租减息。否则，是不能团结他们抗日的。

贫农与雇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那时才使我知道贫农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

所以，从我个人调查农村来说，是经过了六七年的时间的。现在你们有了过去同志们的经验，都可以走直路了，可以把六七年的工作，在几个月内完成。今天同志们的任务是脚踏实地去钻，去努力，只要不整天睡觉，一天就六小时的工作，也是可以获得很多成绩的，但需继续不断的努力。

二 方法

1. 对立统一，阶级斗争，是我们办事的两个出发点。当我们观察一件事物时，第一步的观察只能看到这件事物的大体轮廓，形成一般概念。好比一个初来延安的人，开始他对延安的认识只是一般的、笼统的。可是当他参观了抗大、女大以及延安的各机关学校之后，他采取了第二个步骤，用分析方法把延安的各部分有秩序地加以细细的研究和分析。然后第三步再用综合法把对各部分的分析加以综合，得出整体的延安。这时认识的延安就与初来时认识的延安不同，他开始看见的是整个的延安，现在看见的也是整个的延安，但与开始的了解不同了，现在他对延安就有了科学的认识和具体的了解。观察一个农村，也同样如此。

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写成的，先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各部分，然后加以综合，得出资本主义运动的规律来。

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分析。应该是分析而又综合，就是在第二

步骤的分析中，也有小的综合。古人说：文章之道，有开有合。这个说法是对的。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历史，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宋朝，也是对的。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个“四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

如果我们观察问题是走马看花的，各样都弄一点，这只是空花费了时间，一事无成。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这方面的观点，这种观点，就是对立统一和阶级斗争。像我上面刚才讲的分析法和综合法，就是用这观点。假如同志们把这观点用去分析农村，你就可以知道农村有些什么阶级，它们主要的特点是什么，以及它们彼此的关系怎样。同志们给我的问题中，有问到什么是富农。我以为地主是以收租为主；富农是以雇工为主，自己参加劳动；中农是以不出卖劳动力为主，经营自己的土地；贫农是一定要出卖劳动力，靠自己的土地不够生活；雇农完全出卖劳动力，没有土地。当然，这是指它们的主要标志。

这样分析了农村中的各个阶级、阶层及其生活概况，然后才能对农村有正确的全面的了解。

我们要用钻研的方法来分析客观，分析阶级。对实际问题不应当熟视无睹，应当捣毁“牛皮公司”，应当经过自己头脑深思熟虑，应当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

一九〇五年，列宁说推翻沙皇政府，俄国要组织工农政府，而托洛茨基则认为只能组织工人政府。这就是托洛茨基没有把理论与实践真正地结合起来。我们应当从实践中找出事物运动的规律来，产生新的理论。如中国抗战的持久性，长期性，就是抗战的规律。

今天同志们下乡去调查，就应该以这种观点和方法指导自己的实践，另方面又从实践中不断地充实自己的理论。

2. 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材料是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矛盾的主导方面）。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列宁研究帝国主义，都是收集了很多统计和材料，但并不是全部采取，而只是采取最能表现特点的一部分。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就有同志要问：“十样事物，我调查了九样，只有一样没有调查，有没有发言权？”我以为如果你调查的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末，仍旧是没有发言权。

今天中国主要的矛盾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成为次要的。西安事变前主要矛盾在国共两党之间，而西安事变后，主要矛盾则在中日之间。因此，今天无论解决任何问题，都应该以这个主要矛盾作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假若丢掉主要矛盾，而去研究细微末节，犹如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仍是无发言权的。

所以，我们做综合工作时，不要陷于狭隘的经验论。

三 答复几个问题

同志们提了很多问题，只能答复一部分。有些问题也不能答复，因为要全部答复了，同志们便可以不必下乡。而这许多问题又必须亲自下乡调查后才能了解，依据不同的具体对象和情况，而有不同的解决。

怎样开调查会？一个调查会不仅提出问题，而且要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参加调查会最好有三五人。我在兴国调查中，知道地主占

有土地达百分之四十，富农占有土地达百分之三十，地主、富农所共有的公堂土地^[1]为百分之十，总计地主与富农占有土地百分之八十，中农、贫农只占有百分之二十。但是，地主人口不过百分之一，富农人口不过百分之五，而贫农、中农人口则占百分之八十。一方面以百分之六的人口占有土地百分之八十，另方面以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则仅占有土地百分之二十。因此得出的结论，只有两个字：革命。因而也益增革命的信心，相信这个革命是能获得百分之八十以上人民的拥护和赞助的。

怎样找调查的典型？调查的典型可以分为三种：一、先进的，二、中间的，三、落后的。如果能依据这种分类，每类调查两三个，即可知一般的情形了。

如何收集和整理材料？都必须自己亲身去做，在做的过程中找出经验来，用这些经验再随时去改进以后的调查和整理材料的工作。

怎样使对方说真话？各个人特点不同，因此，要采取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但是，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群众不讲真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来意究竟是否于他们有利。要在谈话过程中和做朋友的过程中，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逐渐地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意，把你当做好朋友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群众不讲真话，不怪群众，只怪自己。

我在兴国调查中，请了几个农民来谈话。开始时，他们很疑惧，不知我究竟要把他们怎么样。所以，第一天只是谈点家常事，

[1] 公堂土地，指各种祠、庙、会、社占有的土地。这些土地主要掌握在地主、富农手里。

他们脸上没有一点笑容，也不多讲。后来，请他们吃了饭，晚上又给他们宽大温暖的被子睡觉，这样使他们开始了解我的真意，慢慢有点笑容，说得也较多。到后来，我们简直毫无拘束，大家热烈地讨论，无话不谈，亲切得像自家人一样。

其他问题也不必多谈，还是让你们早日下去亲自调查为好。

给高岗、陈正人的信^[1]

(1941年9月16日)

民族学院的困难须要设法解决，经费似宜增加一点改善其伙食。

[1] 这是毛泽东关于答复反映民族学院存在困难的一封来信致高岗、陈正人信的主要内容。

关于张季鸾逝世给国民参政会的唁电

(1941年9月18日)

张季鸾先生追悼会：

季鸾先生在历次参政会内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惊闻逝世，悼念同深。肃电致悼，借达哀忱。

毛泽东 陈绍禹 秦邦宪 吴玉章 林祖涵
巧

给续范亭^[1]的信

(1941年9月22日)

范亭同志：

大示敬悉。已交组织部陈云同志考虑，俟得覆后再行奉告，你的要求是正当的。我的风湿近日采用洗澡，晒太阳，按摩，吃水果诸法，颇有起色，知注敬告。关向应同志已动身来延，不日可到。

敬问

健好！

毛泽东

九月二十二日

[1] 续范亭(1893—1947)，名培模，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县)人。1947年9月12日逝世。临终前，遗书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经中共中央批准，追认为中共正式党员。遗著有《续范亭诗文集》。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9月24日)

我又找陈宏谋等谈了一次，欢迎他们去华北视察，看我们到底做了些什么，看一看没有八路军全国是否能继续抗战（他们要求去晋西北与晋东南，还未下决心），同时向他们证明我并未去苏联。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1]

(1941年9月26日)

(甲) 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与政治水平，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其成分以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之委员、八路军新四军各主要负责人，各高级机关某些职员，各高级学校某些教员为范围。全国以三百人为限，内延安占三分之一，外地占三分之二。

(乙) 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第一期半年，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以达克服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及形式主义），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

(丙) 延安及外地各重要地点，均设立高级学习组；军队至师、军区，或纵队为止，地方至区党委或省委为止。高级学习组设组长、副组长及学习秘书各一人。学习组之下分设若干学习小组，由小组长负责。延安及各地高级学习组统归中央学习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毛泽东为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管理指导，按时指定材料，总结经验，解答问题。

[1] 毛泽东在本篇卷首批示：“首道：印300份发学习组之100人及其他200个干部。毛泽东。”首道，即王首道，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本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丁) 在不妨碍各同志所负主要工作任务的条件下进行此种学习。

中央书记处

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六日

致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1]电

(1941年9月29日)

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各同志：

本组研究方针，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目的。关于实际方面的材料，请各同志看六大以来的文件（要目见另单）。关于理论方面，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请各同志首先看下列材料：

- (一) 《左派幼稚病》^[2]（用1939年解放社版）；
- (二) 艾译《新哲学大纲》^[3]第八章“认识的过程”（即《哲学选辑》第四章）；
- (三) 李译《辩证唯物论教程》^[4]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

[1] 中央研究组、高级研究组，又称中央学习组、高级学习组，是中共中央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于1941年8月和9月决定成立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的学习组；高级学习组以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之委员，八路军新四军各主要负责人，各高级机关某些干部，各高级学校某些教员为范围。各地高级学习组统归中央学习组指导。

[2] 《左派幼稚病》，即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至5月）。

[3] 指艾思奇和郑易里翻译的苏联米定、拉里察维基等所著《新哲学大纲》。

[4] 指李达和雷仲坚翻译的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等所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理学”；

(四) 河上肇^[1]《经济学大纲》的“序说”(已油印发出)。

中央研究组组长 毛泽东

副组长 王稼薈^[2]

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1] 河上肇 (1879—1946)，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2] 王稼薈，即王稼祥。

高级
中央研究组及
1941年1月1日
11416
2001
⑩ 陈(李井泉)

本组研究方针，拟即向各室及各研究组
（如：理论室、历史室、新闻室等）提出以下
大体精神。以后凡遇有新发现或新情况，
该组得随时通知本组，以便及时修改。

- 1-1 在高级组内（用1939年群众社版），
（一）行文于太白和延安两个主要报上（并
将行文样章存于中央图书馆内）；
（二）对于群众社的《群众》杂志，除定期阅读
外，并应随时提出批评意见；
- (⑩)

毛泽东起草的《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研究方针和阅读材料》的手稿。

附：六大以来文件选读以下各篇（加○者为最低限度）

- 第六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六大，二八年七月 文件集 3~21）
- 湘赣边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井冈山决议^[1]，二八年十月，在印）
 - 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二八年十一月，在印）
- 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古田会议，二九年十二月，77~101）
 -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三〇年一月，在印）
- 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立三路线，三〇年六月，102~110）
 - 四中全会决议（四中全会，三〇年十二月，111~115）
 - 目前的政治形势及党的紧急任务（三一年五月，125~128）
 - 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急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三一年九月，136~141）
 - 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三一年九月，142~145）
 - 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三二年一月，168~171）
 - 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上海斗争，三二年二月，172）
 - 在争取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中中共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三二年四月，在印）
 - 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三

[1] 本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二年四月)

苏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三二年五月，130~134）

○ 革命危机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北方会议，三二年六月，在印，已油印）

开展游击战争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北方会议，三二年六月，在印）

关于帝国主义四次围剿与我们的任务的决议（三二年六月，192~199）

○ 苏维埃经济政策（王明，三三年 月^[1]，在印）

○ 为党的路线而斗争（罗迈，三三年五月，在印）

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三三年七月，253~258）

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福建事变，三三年十二月，297~299）

○ 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五中全会，三四年一月，304~315）

○ 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中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十三次全会，王明，三四年 月^[2]，347~379）

关于国际十三次全会提纲的决定（三四年四月，391~392）

○ 四川省委接受十三次全会提纲与五中全会决议的决定（四

[1] 原文如此。这篇文献收入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一书时未标明具体月份。

[2] 原文如此。这篇文献收入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一书时未标明具体月份。1982年人民出版社内部发行的《王明言论选辑》收入该篇时标明时间为1933年12月。

川，三四年六月，在印，已油印）

○ 为着实现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做了些什么和将做些什么？（博古，三四年七月，在印）

○ 西北政治危机与党的紧急任务（西北，三四年 月^[1]，在印，已油印）

陕甘边委关于陕甘边党的任务决议（西北，三四年七月，在印，已油印）

○ 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三五年一月，410~419）

○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三五年八月，420~423）

关于改变对付富农策略的决定（三五年十二月，在印）

○ 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瓦窑堡会议，三五年十二月，467~478）

○ 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 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刘少奇，三六年四月，在印）

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三六年七月，在印）

致中国国民党书（三六年八月，462~466）

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毛泽东，三六年秋，在印，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三章）

○ 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决议（九月决，三六年九月，479~482）

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三六年十二月，

[1] 原文此处空一格。

485 ~ 486)

○ 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三七年二月，488）

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三七年三月）

○ 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刘少奇，三七年三月，在印）

○ 苏区党大会报告及结论（党大会，三七年五月，505 ~ 518）

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三七年七月，520 ~ 521）

○ 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定（洛川会议，三七年八月，533 ~ 534）

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刘少奇，三七年十月，544 ~ 558）

○ 上海太原沦陷后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任务（三七年十一月，559 ~ 564）

○ 对时局宣言（十二月宣言，三七年十二月，565 ~ 566）

○ 目前抗战形势与争取抗战胜利的方针（彭德怀，三八年春，567 ~ 573）

关于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政策问题（刘少奇，三八年二月，583 ~ 588）

关于徐州失守候华工作的指示（三八年五月，在印）

○ 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六中全会，三八年十一月，599 ~ 605）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六中全会，三八年十一月，在印，即论新阶段第七节）

战争与战略问题（六中全会，三八年十一月，606 ~ 612）

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三九年六月，在印）

抗战两周年对时局宣言（反投降，三九年七月，622~624）

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定（三九年十月，648~649）

○ 八路军致林主席蒋委员长电（四〇年一月，659~660）

○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第一次反共高潮总结，四〇年三月，677~681）

○ 关于策略问题对东南局及新四军的指示（四〇年五月，683~685）

○ 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七七决定，四〇年七月，686~690）

抗战三周年对时局宣言（四〇年七月，691~693）

○ 为挽救危亡顾全大局致何白佳电（第二次反共高潮，四〇年十一月，702~704）

○ 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十二月指示，四〇年十二月，708~712）

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四〇〈一〉年一月，在印）

○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四〇〈一〉年五月，736~738）

○ 第二次反共高潮经验教训（四〇〈一〉年五月，739~741）

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四〇〈一〉年七月，744~746）

○ 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四〇〈一〉年七月，在印）

○ 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四〇〈一〉年八月，在印）

中央研究组组长 毛泽东

副组长 王稼祥

一九四一年十月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聯的條約》(1949年1月1日)。

- 苏联对中共的批评(三月, 在印) (三三一年, 在印)

① 为党的路线而斗争(修正主义, 三三一年, 在印) (三三一年, 在印) (253-258)

关于帝国主义问题, 主张同新马共的统一战线的初步方案(三三一年)

为加速中苏共同纲领草案(福建方案, 三三一年十一月, 297-299)

② 中共全会通过决议案(三月, 在印) (三三一年十一月, 304-315)

③ 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三月, 在印)

关于国际十三次全会提案的决定(三三一年, 在印) (三三一年, 在印) (347-379)

④ 中共全会通过关于十三次全会提案的决定(三三一年, 在印) (三三一年, 在印) (391-392)

⑤ 中共全会通过关于十三次全会提案的决定(三三一年, 在印) (三三一年, 在印)

⑥ 为着实现武装民族革命战争, 中国共产党做些什么, 我们将做些什事? (三月, 在印) (三三一年十一月, 在印) (三三一年, 在印) (400-401)

⑦ 西北政治危机与党的紧急任务(三月, 在印) (三三一年十一月, 在印) (三三一年, 在印)

陕甘边委关于陕甘边委的报告决议(西北, 三三一年十一月, 在印) (三三一年, 在印)

⑧ 关于反对敌人三次围剿的报告决议(三月, 在印) (三三一年, 在印) (410-411)

⑨ 为执行中共全体纲领(三月, 在印) (三三一年八月, 420-423)

⑩ 关于改变对地主农策略的决定(三三一年八月, 在印) (三三一年八月, 在印)

⑪ 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三月, 在印) (三三一年八月, 在印) (467-478)

毛泽东修改的《六大以来文件选读以下各篇》的手稿。

接见陇东分区士绅参观团时的谈话^[1]

(1941年9月)

在谈到陕甘宁边区人民的负担较重时，毛泽东说：我们老百姓应该将眼光放远大些，今天中国抗战正处在困难阶段，边区建设也处在困难阶段，只要大家协力渡过这一时期，大家生活便可改善，负担也可减轻了。

[1] 这是毛泽东在接见陇东分区士绅参观团时关于陕甘宁边区人民的负担较重问题谈话的一部分。

致刘少奇电^[1]

(1941年10月3日)

中央决定刘少奇来延安一次，并望能参加七大。何时可以动身盼告。

[1] 这是毛泽东致刘少奇并告陈毅电的主要内容。

复刘少奇电^[1]

(1941年10月11日)

来电悉。(一)即来延安，既于目前工作不利，自宜缓期。(二)七大大约还需等半年才开，甚望你能到会，请与陈、姚^[2]各同志商，能否在两三个月内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两三月后动身来延参加七大，七大后你在延安休养，即在延安指挥华中。(三)依国内外大局看，蒋及国民党不会投降，亦不可能大举“剿共”，华中我军主要是对敌伪分散作战，你来延安指挥华中，似对华中工作不会有大损失，而你的身体得到休养，则有大益。以上请考虑见告。

[1] 这是毛泽东复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2] 陈、姚，指陈毅、饶漱石（小姚）。

给周恩来的信

(1941年10月15日)

周：

(一) 你处邮寄叶子龙^[1]、《解放日报》等处报纸、刊物、航空社论多数能收到。

(二) 各种报纸，除同意你寄送调查研究局三全份，毛主席、前总、解放日报、中组部、统战部、青委、军委、康生^[2]处、边区政府各一份外，并请为中宣部、中财部、中央书记处办公厅、西北中央局、马列研究院各增订一全份，其他延大、鲁艺、科学院等选订《大公报》等二三份。

(三) 各种杂志除为调查研究局订一全份外，请选择有实际材料如《时与潮文摘》等，及对中央各部委、各学校有关系的，按性质购订十余份，分赠各机关学校（请全部送新华书店转邓洁收，由书记处办公厅统一分配）。

(四) 调查研究局需要中外各地各种关于政治的经济的书报，此项工作希望重庆方面有专人负责搜集。经济的杂志现很缺少，如《中央银行月报》《金融周刊》等都没有，希望负责购买书报的同志注意财政评论后面的论文索引及西南实业协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出

[1] 叶子龙，当时任中央军委机要科科长、毛泽东的秘书。

[2]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版的书籍。关于新近出版的各种国际问题和中国经济政治的书籍，此地已很久未买到，亦请注意代买。是否可以推动中国文化服务社在延安办一分社，请考虑。

毛 任^[1]
十月十五日

[1] 任，指任弼时，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关于各地应即组织高级学习组的指示

(1941年10月18日)

北方局、及军分会、华中局及军分会、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晋西北区党委、一二〇师、一二九师军政委员会、聂区、吕、程^[1]：

请即根据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加以考虑，规定各该地参加高级学习组的名单（注明现任职务及党龄）及其组长、副组长、秘书，电告中央，以便指定材料，开始学习（重庆高级学习组已经建立，共二十五人，周恩来为组长，董必武为副组长）。

中央书记处
四一年十月十八日

[1] 聂，指聂荣臻。吕、程，指吕正操、程子华。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10月18日)

本定今天讨论，因材料不足（苏、德战况，日阁动向，英、美动向，重庆动向），须再看几天才有眉目，改于后天（号日）交换意见，请将你的观察见告。依大局看，似乎还不能说对苏对我已经是怎样不利的。但我们应准备不利情况的到来。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征询对时局的看法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致刘少奇、陈毅电^[1]

(1941年10月18日)

因西安交通被国民党严密封锁，知识分子来源已断，不但抗大三分校教育行将停顿，即军委机关及留守兵团亦得不到知识分子的补充。提议由苏北以至安徽各根据地内招收政治纯洁、体格强健、有中学程度之知识青年六百至一千人来延，不分男女，经你们初步审查之后，即可组织成队，经华北分批送达此间，如有熟练工人及技术人材更好。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关于从苏北、安徽各根据地招收知识青年到延安学习问题致刘少奇、陈毅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1年10月20日)

最近时局有到转变关头的味道。国民党说不要悲观，实际上有悲观情绪，蒋介石又提三北政策（即日军北进，国民党军北进，八路军新四军北进）。现在我们党员中也有悲观情绪，这种悲观失望是没有根据的。过去我们党的困难莫过于大革命失败后反动时期的游击战争和长征时期，但我们都渡过了，现在我们党有长期斗争历史和新的力量，是能够应付困难的局面的。我们的路线仍须继续过去的方针，坚持团结，要团结就要进行斗争，我们要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要保证党的独立性，只在文章中说要独立性是不够的。过去我们有的同志不了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使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使共产主义混同于三民主义，使我们失去独立性，这是非常危险的。现在莫斯科危急，但德国的进攻可能已到最高点，决定的关键在今后一二个星期内，一个星期后看形势发展更会明显。

日本新内阁（东条英机内阁）应估计为直接准备战争的军人内阁，本有北进的危险，但尚未与英、美妥协还不敢北进；南下可能性大，但日本要准备战争，也不会立即南下，目前不会对我国有大军事行动，但今后仍有大的进攻形势。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时局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致周恩来等电^[1]

(1941年10月20日)

东条内阁是一个直接准备战争的军人内阁，它是直接准备战争的，但还不见得马上动兵。其战争趋向有北进危险，但南进的可能性并未丧失。国民党正肯定北进，我们不必与之一致。无论日本北进南进，其对华侵略决不放松，此点我们应加强调。关于德苏战争，莫斯科一线虽尚未脱离被侵略危险，但苏联还是能坚持的，德国的情况并不怎样好，美、英、苏、中的合作必能胜法西斯。当此党内外都生长着悲观情绪之时，我们应坚持正确立场反对这种悲观情绪。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反对对目前时局的悲观情绪致周恩来并告廖承志电的主要内容。

致贺龙、周士第等电^[1]

(1941年10月20日)

原驻桃力民的何文鼎师南下接收现驻安边地区的邓宝珊部新十一旅防务。这一着对边区威胁极大，决抽调王震旅及留守兵团部队（三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归王震、贺晋年指挥，阻止何师南下，一二〇师驻佳县之五团亦归王震指挥。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关于为阻击何文鼎师南下致贺龙、周士第并告彭德怀、左权电的主要内容。

普遍设立炸弹制造厂^[1]

(1941年10月23日)

彭、左，陈、罗，贺、关，聂、唐，陈、刘、赖，吕、程^[2]：

(一) 军委拟号召敌后各根据地普遍设立炸弹制造厂，以为武装敌后民众的主要武器。请将你处关于创办炸弹厂的经验及其意义作用，电告我们参考。

(二) 请于日内将你处手榴弹最近制造情形，每月平均产量，按何比例分配给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使用及现有工具、工人数目等一并详细电告军委。

毛 朱 王 叶
一九四一，十，梗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军委参谋长叶剑英给彭德怀、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等的电报。

[2] 陈、罗，指陈光、罗荣桓，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和政治委员。贺、关，指贺龙、关向应，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和政治委员。聂、唐，指聂荣臻、唐延杰，当时分别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和参谋长。陈、刘、赖，指陈毅、刘少奇、赖传珠，当时分别任新四军代军长、政治委员和参谋长。吕、程，指吕正操、程子华，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10月29日)

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决定调何文鼎师进驻安边，则定边、盐池将不保，经济来源将断绝，我们决定用武力自卫，请向军委会交涉停止调动，否则引起冲突责在彼方。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在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上的讲话

(1941年10月30日)

这个会一定开得很好，今天报告和讨论一定有很大的收获，各民族都能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是很好的现象。我想大会的主要目的就是团结，促进各民族团结，共同打倒法西斯，日本和希特勒之所以能小丑跳梁，猖獗一时，就是因为他们抓住我们的弱点。这弱点就是不团结，在中国，在东亚，在全世界都有过这个弱点。

现在中国就因为是团结的，所以才能抗战，但是还团结得不够，因为有一部分人表面打日本，暗中破坏团结；另一种人，一面抗战，一面磨擦。这两种人是不同的，前一种人是汉奸，后一种人是不懂得大势。延安是专讲团结的地方，这里有清真寺，有蒙古文化促进会，有民族学院……这里能够举行反法西斯的民族大会。

今后还有更大的仗要打，法西斯野心很大，力量还有，还要疯狂地侵略；希特勒在英美苏的大团结中到处乱打，自然在战争中，都有困难存在，所以同法西斯斗争还有一个困难时期，这一点大家要看清楚，现在只有五六分困难，十分困难还在后面。这个会议有意义。莫斯科和远东都在开会。我们这个会也为的克服困难，而法西斯正利用这些困难。我的看法，法西斯占地越多，危险也越大，如拿破仑，如马其顿王亚力山大，如蒙古，……。现在只要我们团

结，把法西斯一只手一只脚地撕碎是不难的，日本正要向南北侵略，大体上是要来的。……现在我们有三条统一战线，一条是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条是东方的ABCD阵线，一条是英美苏的联合行动，有这三条统一战线，法西斯一定会打倒的。我们要了解情况，克服困难，不要害怕，要有信心，革命的人民是活的，在历史上是有生命的，法西斯是会死亡的，人民大众的斗争，必须经过困难，才能走向胜利。

法西斯快要死了，我们人民正在青春少壮时代，今天全世界反法西斯需要实际工作，研究问题，加紧学习，……甚至多种一点小米都是好的。不要夸夸其谈，法西斯是没有灵魂的，我们是有灵魂的，我们紧拉着手，团结起来，亲爱互助，那么就会把法西斯活活挤死了。我庆祝大会成功，讲平等，讲亲爱团结。

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 分析新事物，解决新问题^[1]

(1941年10月30日)

我是来作个报告，也是讲一点意见。

最近中央有两个决定，一个是增强党性的决定，一个是调查研究的决定。

我们革命的目的，是要打倒我们的敌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但敌人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恐怕还不知道，不知道敌人是什么样子，敌人就打不倒。

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从大革命时就喊起，经过十年苏维埃运动，以至抗战，帝国主义一个还没有打倒。

有人说，亡国亡家，我说还要亡头。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敌人，闭着眼睛捉麻雀，不但要亡党亡国，而且要亡头，连自己的脑壳都会亡掉！

—

理论，观念，概念，原理，原则，都是从实际中得来的，这叫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

做唯物论，这是马克思主义起码的一条。理论正确不正确，要拿到实践中去，看是否行得通，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这是大家知道的，但碰到实际，就把这一条忘了。不从客观现实出发，从主观幻想出来的“理论”是会弄出好多乱子来的。如过去有人说，中国有两个前途，一个是苏维埃，一个是殖民地，除此而外其他是没有的。要在上海建立苏维埃，而看到某一地方的工人运动就作出中国的“统治阶级不能继续统治下去，被统治者已不能照旧生活下去”（套列宁的话）的结论。还有的想把全国的苏区都连在一起。从马恩列斯的书本里找出些道理，把外国的东西生硬地搬过来当现成用，不加以研究消化。发的许多决议指示，印的许多标语口号，不管行得通行不通，只从书本出发，从主观幻想出发，不从实际出发，不顾现实，这就是教条主义、主观主义。

小孩子看到麻雀在天上飞，他自己也想飞，但人没有翅膀，一件事情没有一定的条件是做不到的。许多人未经调查研究，未经分析，个把星期就发一个命令、决议，经常有指示，指示信长得连篇累牍，夸夸其谈，结果都是一纸空文。二十年来许多人都在幻想着革命明天就会胜利，但革命还没有胜利。这样的人和小孩子急得想飞上天去一样的幼稚可笑！

一切都要从客观的实际情况出发。懂得了这一点，便不会再发空洞的决议、写长篇文章，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调查、分析与研究了客观情况之后，所得出的结论、真理，那还不一定就是真理，还要在实践中行得通，才是真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是真理，不但因为它是根据实际斗争从客观情况的研究中产生的东西，还因为它经过几十年的革命实践的考验，证明了它是真理，它在实践中行得通，用得着。

对中央的决议和指示，并不是叫同志们闭着眼睛去执行，而是要根据各地不同的实际情况去执行。如中央取消青委的决议是正确的，但在冀中不取消青委又是正确的。举一个例子：如军队侦察了敌人的据点，发现有敌人，应当进攻，发这个攻击令是正确的；但我们的部队赶到以后，敌人已经走了，这个徒劳往返、耗费力量的责任不应该由这个发命令的人来负。这是说上级的决议应该执行，但要根据实际情形，不能机械地执行。

理论（真理）——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懂得了这两条，便不会再做空洞的决议，讲空话，做错事，说错话。

二

我们要反对主观主义，提倡唯物主义，从客观的物质条件出发，看现实的各方面，不能只看一面当成全面，把局部当成整体。比如看干部，一个干部有他的过去，有他的现在，而现在又有变化发展；他的思想有这一部分、又有那一部分，不能拿住一部分，做出整个的结论。又如我们现在延安机关、学校的许多支部书记，大概都很懂得辩证法，开个支部会报告工作，一是优点，二是缺点，但只是主观地套公式，而对于支部的实际客观环境，却不深加研究。

对一切都要加以分析，这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现在的世界可分为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阵线。反法西斯阵线内，又可分为进步的与不进步的。中国，整个说来是个统一体，但又可分为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共产党与国民党。共产党与国民党都是抗日的，这是共同点；有民主与不民主，这又是区别点。边区延安和陕西

安，同是抗日的根据地，这是共同点；一个是抗日民主根据地，一个是抗日封建根据地，这是区别点。边区人口中有共产党员、非共产党员，而这些非党员中又可以分为工人、农民、地主、商业资本家，而农民中又有富农、中农、贫农、雇农之分，而每一种农民中又是可以分的，这个老百姓的情形是这样，那个老百姓的情形又是那样。又如讲一段话中，有中心的，有次要的，有讲错的，有讲对的。

矛盾和统一，分析和综合，这叫做方法论，也叫做辩证法。说起来大家都晓得，但到实际使用的时候就忘掉了。我们同志在观察与处理问题上，常容易只强调一面，只看到一面，而把其他多方面丢掉了，犯了片面看问题的毛病。边区是全国的一部分，和全国是统一的，但又是对立的，与蒋介石是对立的，他讨厌这个边区，但在抗日方面却又是统一的，我们对日本不骂蒋介石。如一个同志犯了错误，好的方面他还是同志，坏的方面是他的错误。如边区的反官僚主义，也要加以分析。有些人，人是很好的，忠实为党为国的，但工作方法不好；有一种人不仅工作方法不好，连人也是坏人。有些人好议论别人的长短，这也是分析，因他有长有短，但轮到自己就不分析了。清朝的乾隆皇帝说，他是“十全老人”，“十全”是没有的。任何人都有优点、缺点这两方面，运用不好，会使错干部，打击错干部。

找出矛盾的对立，这叫做分析。年岁小时长住在乡村，看见人都是人，不知道有阶级。看了《共产党宣言》，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回去，乡村就变了样，才知道农村有地主与农民、城市有工人与资本家的阶级对立。地主有大地主、小地主，资产阶级有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共同点，就是它

也剥削人，剥削的多少也有差别；和劳动群众的共同点，则是都受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在中国，广大的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同盟者，民族资产阶级则是摇摆于革命与反动营垒之间；中国革命如果忽视团结小资产阶级，照顾中间阶层，不把中间分子同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就不能胜利，就是极大的危险。大资产阶级则有亲日派与亲英美派，亲英美派要抗日，又要反共，如蒋介石这个大资产阶级的头子，对反共又是一打一拉，不是光打，也不是光拉，这叫做两面政策。我们可不可以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呢？当然是可以的。我们拥护他抗日，这就是拉，反对他反共，这就是打，这是一种矛盾。有人说，共产党为什么这样矛盾呢？不矛盾，共产党就不得了啊！这是说地主与资产阶级及我党对他们的政策。再说农民有贫农、雇农，工人有贵族工人、产业工人、手工工人，国际有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把代表贵族工人的机会主义的第二国际与代表广大阶级群众的布尔什维克的第三国际不加以分析区别，就是策略路线上的错误。

三

怎样做调查研究？理论是唯物的，方法是辩证的。矛盾的统一与阶级斗争，一是辩证唯物论，一是历史唯物论。矛盾的统一就是辩证法，辩证法运用在社会方面就是历史唯物论。

譬如要分析延安的社会，首先应分做自然的与社会的两方面。自然界包括地理、山水、植物、矿产，连野草、沙子、石头都在内。社会方面就是各阶级及其政治组织，延安主要可分党政军三大系统。得了这个大概分析后，又可以专拿一个部门来加以研究，如

研究军事系统，从留守处着手。留守处可分为军事部门与政治部门，政治部门又可以分成组织、宣传等四部。丢开各部专找一部，一部又分几科，如锄奸部中有侦察、逮捕、审讯、处罚等四个部分。分析研究了这四个部分，再把锄奸部综合起来。研究了锄奸部后，再研究其他部，然后再把整个留守处综合起来。研究了留守处，再研究边区政府、西北局，然后再把延安的社会综合为统一的整体，得出它的结论。又如研究边区，首先要从老百姓、乡政府、区政府，一步一步研究起，然后你才知道边区确是抗日的民主的根据地。这样的结论是从调查研究中得来的，是有根据的。一样一样地分析，搞了这样，再搞那样，样样都弄清楚了，然后再加以综合，得出结论。前面说过的，真理是从实践中得来的，你不把客观实践分析清楚，真理从哪儿来呢？

有个旅长对我说：八路军到了某地后，把一切苛捐杂税免除了。我问他，原先都有些什么苛捐杂税？收多少？怎么收的？他却连一样都不知道。

不调查不研究就不得了，就要亡国亡党亡头。中国共产党搞了二十年，当然有成绩，但对敌人从来缺乏调查、研究、分析。打帝国主义打了二十年，打国民党也打了好久，却连对方究竟有多大、多强都不知道。近来专门设了一个机关，叫做敌伪研究会，收集资料，专门研究敌伪方面情形，如日本人物、各地情况、阶级关系等。我们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那样的神气，打了它几年还不知道，还要喊打倒人家，但人家对我们的调查是无所不至的。这种不调查、不分析、不研究，不知道敌人和自己，就叫做粗枝大叶，这是一种危险。

分析一件事物的特性、特征、特点，它与别的事物的共同点与

区别点，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光做文章、发空议论是不行的。

四

上面我说的这些，并不是说我们光做实际调查，把书本完全丢开，不要理论了，理论还是要学的，而是要把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不要做书面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去分析新的事件，解决新的问题。如果仅仅只有马克思主义就够了，列宁为什么还要写《帝国主义论》^[1]呢？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真理与方法，到处都用得着。我们要根据实际环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而不是不问实际情况套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列宁曾根据马克思主义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现在的《联共（布）党史》^[2]就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了俄国的实际，这叫做布尔什维主义。我们中国却一样都没有。中国近百年来革命发展的历史是很丰富的，但这种事情还没有人来做，对于中国的历史、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都没有很好地有系统地研究与著作。

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是很容易的，只要你认得字、读得书本就可以。但只会读不会用，就是把它读个千八百遍，背个烂熟，那连一文钱都不值。读马克思主义的书，为的是要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与方法来分析中国的实际，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学而不

[1] 《帝国主义论》，即列宁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发表于1917年4月。

[2] 《联共（布）党史》，即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1938年编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用就叫做“无的放矢”，我们要做到“有的放矢”，用马克思主义这个“矢”去射中国革命之“的”。

和培元^[1]读了三个月的陕公，写了《边区实录》《日本在沦陷区》等好几本书，称为青年哲学家。有些人读了三年马克思主义，还是一事不识，不会解决实际问题，不知道调查研究，叫他做什么呢？叫他做青年“无用家”！

不论年岁好大，如林老、谢老^[2]，研究精神都是很好的。

留守处政治部最近开了个宣传会议，把宣传工作分为一条一条分组讨论，这都是很好的办法。

[1] 和培元，当时是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2] 林老，指林伯渠（1886—1960），湖南临澧人，当时任陕甘宁边区主席。谢老，指谢觉哉（1884—1971），湖南宁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局副书记、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11月1日)

何文鼎如不停止南下，我们决心消灭之，请告蒋介石、刘斐立即制止。如何师不停止南下，我们必须向边区增兵。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理论研究阅读材料目录

(1941年11月1日)

各地高级学习组组长、副组长：

兹规定各地高级学习组理论部分的研究材料如下：

(一) 季米特洛夫之国际七次大会报告、结论及闭幕词（解放社季氏文选一至一百六十五页）

(二)《联共党史》的结束语

(三) 法英美德意五国共产党史的传播与研究及对马列主义的宣传所作的决议（《解放》一百〇五期）^[1]

(四) 联共中央关于《联共党史》出版后应如何进行宣传的决议（《解放》七十九期）^[2]

(五)《斯大林与〈联共党史〉》（《解放》一百廿八期）^[3]

(六)《左派幼稚病》（解放社版）^[4]

[1] 即《论共产国际各支部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底传播与研究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底宣传》。景林译自1939年8月12日德文《国际通讯》第八卷第四十五期，载《解放》第一〇五期。

[2] 即《联共（布）中央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党底宣传的决议》。载《解放》第七十九期。

[3] 即《斯大林同志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载《解放》第一八期。

[4] 即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的幼稚病》。

以上各件请先看，最好背精读一部至两遍^[1]，由组长或副组长对于每一件材料提出要点加以讨论。

(七) 艾译的《哲学大纲》^[2]第八章“认识过程”即《哲学选辑》第四章

(八) 李译《辩证唯物论教程》^[3]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

(九) 河上肇《经济学大纲》^[4]序说（陈豹隐译）

以上□□^[5]可后看。

(十) 《联共党史》全书

以上一部可后看，看及讨论办法同前。

毛泽东 王稼祥

十一月一日

[1] 抄件原文如此，可能是：“最好能精读一遍至两遍”。

[2] 即艾思奇和郑易里翻译的苏联米丁、拉里察维基等所著《新哲学大纲》。

[3] 即李达和雷仲坚翻译的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等所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4] 河上肇（1879—1946），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经济学大纲》是他1928年发表的著作。

[5] 电文有脱漏，可能是“三件”二字。

本年内的学习任务及学习方法

(1941年11月4日)

各地高级学习组组长、副组长：

- (一) 中央学习组及各地高级研究组第一步均以列宁主义的政治理论与我党六大以来的政治实践为范围。
- (二) 学习材料已由党务广播台电告（是否收到请告）。现定在本年内先将季米特洛夫在国际七次大会报告及列宁《左派幼稚病》二书与六大以来八十三个文件通读一遍。这种通读，目的在于获得初步概念，以便在明春可进到深入研究阶段。
- (三) 在通读期间不求详细讨论，但各组长必须负责采取适当办法检查全体组员是否确实读过指定材料，解答阅读中的疑难。
- (四) 六大以来八十三个文件中各地必有许多找不到者，可先将找到者阅读，或由组长就能记忆者作报告。
- (五) 关于思想方法论的研究暂不进行。

中央学习组 毛泽东 王稼祥
支



《在毛主席身边成长》(油画)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

(1941年11月6日)

各位参议员先生，各位同志：

今天边区参议会开幕，是有重大意义的。参议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也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中国。现在的中国不能有别的目的，只能有这个目的。因为现在我们的主要敌人不是国内的，而是日本和德意法西斯主义。现在苏联红军正在为苏联和全人类的命运奋斗，我们则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还在继续侵略，它的目的是要灭亡中国。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就是要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和全国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合作，只要不是汉奸，都要联合一致，共同奋斗。共产党的这种主张，是始终一致的。中国人民英勇抗战已有四年多，这个抗战是由国共两党的合作和各阶级、各党派、各民族的合作来支持的。但是还没有胜利，还要继续奋斗，还要使革命的三民主义见之实行，才能胜利。

为什么我们要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因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直到现在还没有在中国实现。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要求实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当然是一个更好的制度，这个制度在苏联早已实行了，但是在今天的中国，还没有实行它的条件。陕甘宁边区所实行的是革命的三民主义。我们对于任何一个实际问题的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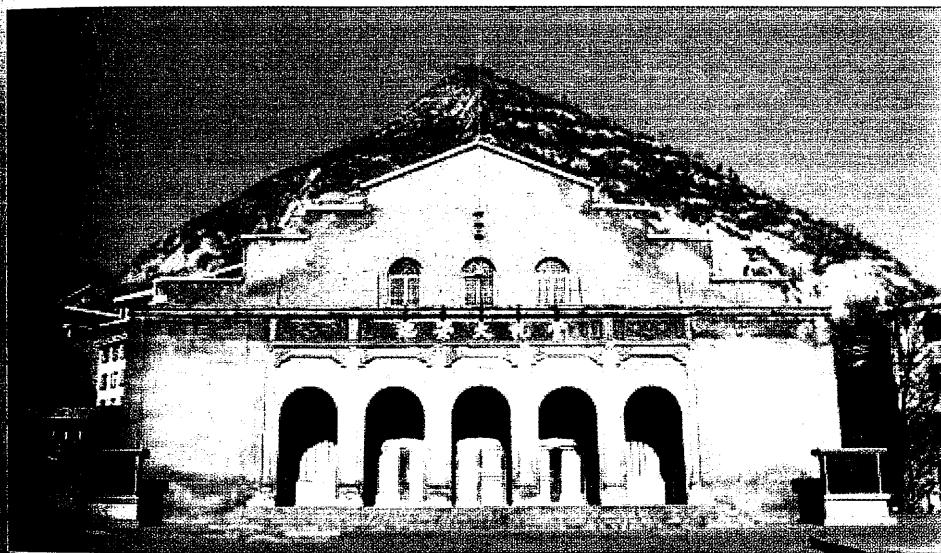
决，都没有超过革命的三民主义的范围。就目前来说，革命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其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就是要为全国一切抗日的人民谋利益，而不是只为一部分人谋利益。全国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参与政治的权利和保护财产的权利。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总之是要各得其所。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顾及一切抗日的阶级，而特别是顾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的。共产党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政策。在土地关系上，我们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使农民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部分的交租交息，使地主也能过活。在劳资关系上，我们一方面扶助工人，使工人有工做，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发展实业的政策，使资本家也有利可图。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合力抗日。这样的政策我们叫做新民主主义的政策。这是真正适合现在中国国情的政策；我们希望不但在陕甘宁边区实行，不但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并且在全国也实行起来。

我们实行这种政策是有成绩的，是得到全国人民赞成的。但是也有缺点。一部分共产党员，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还保存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的作风。他们还不明白共产党员有义务同抗日的党外人士合作，无权利排斥这些党外人士的道

理。这就是要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要联系人民群众，而不要脱离人民群众的道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上有一条，规定共产党员应当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就是针对着这一部分还不明白党的政策的同志而说的。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除了勾结日寇汉奸以及破坏抗战和团结的反动的顽固派，这些人当然没有说话的资格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有说话的自由，即使说错了也是不要紧的。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各位代表先生们，各位同志们，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只要社会上还有党存在，加入党的人总是少数，党外的人总是多数，所以党员总是要和党外的人合作，现在就应在参议会中好好实行起来。我想，我们共产党的参议员，在我们这样的政策下面，可在参议会中受到很好的锻炼，克服自己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我们不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小宗派，我们一定要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善于同别人商量问题。也许到今天还有这样的共产党员，他们说，如果要和别人合作，我就不干了。但是我相信，这样的人是极少的。我向各位保证，我

党绝大多数的党员是一定能够执行我党中央的路线的。同时也要请各位党外同志了解我们的主张，了解共产党并不是一个只图私利的小宗派、小团体。不是的，共产党是真心实意想把国事办好的。但是我们的毛病还很多。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

各位参议员先生不辞辛勤，来此开会，我很高兴地庆祝这个盛会，庆祝这个盛会的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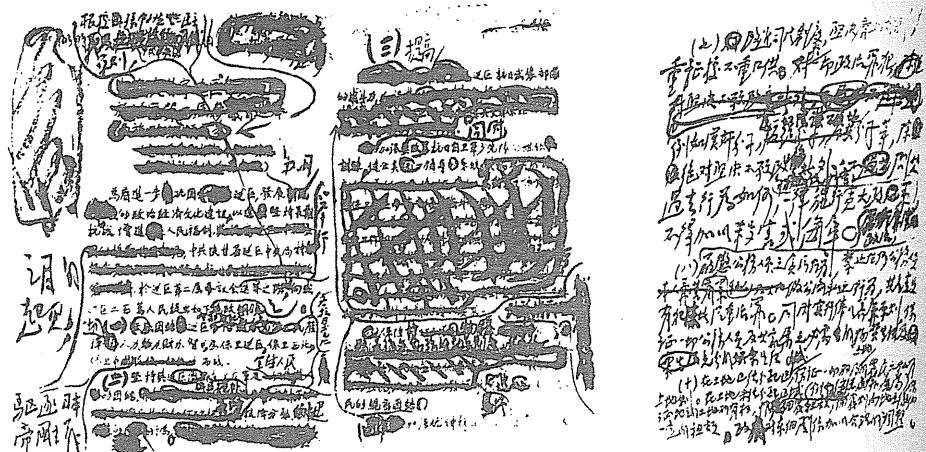
1941年11月6日至21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新落成的参议会礼堂举行。图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礼堂旧址。



1941年1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讲话。



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选举李鼎铭为边区政府副主席。
图为中央领导人在延安。



1941年11月，毛泽东高度评价了李鼎铭的“精兵简政”。图为1941年12月，毛泽东关于精兵简政指示的修改稿。

澤毛東活頁文選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的会演說



華北聯合大學教務處印選

华北联合大学教务处选印的毛泽东活页文选《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

和国民党联络参谋陈宏谋等的谈话^[1]

(1941年11月6日)

(一) 何来必打；(二) 放人、发饷二事做一，我方即出席参政会，否则我方请假不作别的表示，以示不与国民党为难。

你们不要以为只有共产党困难，可以欺负，须知国民党还有极大困难在后头，我向你们保证，只要国民党抗日，不论国民党有何等危险困难，共产党决不趁火打劫，仍与你们合作的。

[1] 这是毛泽东在出席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开幕会时，和应邀出席开幕会的国民党联络参谋陈宏谋、周励武、郭亚生关于何文鼎部进攻边区及共产党参政员出席参政会二事谈话的一部分。

关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 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广播讲演^[1]

(1941年11月7日)

如同中国共产党所曾再三指出的，目前全世界人类的任务是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而全中国人民的任务则是团结起来反对日本的进攻。现在这两种团结都有大大加强的必要。

站在人类的立场上，我们以为英国和美国应该用一切方法拿更多的飞机、坦克来供给苏联，拿更多经费和武器来援助中国，拿更大的力量来援助在德、意蹂躏之下的各国人民的起义。美国应该毫不踌躇地向德国宣战，这是一个绝对不可回避也不应回避的步骤，实现得愈迟就只有让德国炸沉更多的美国船。同时，美国绝不应听信日本的阴谋，与日本订立任何的妥协，美国应和中国及英国一道，以实力制裁日本法西斯。很显然的，我们的这种希望是和英国、美国大多数人民的希望相符合的，可惜在这两个国家的政府和国会方面，都还有一部分不明大义的人，阻挠着人民的意志的实现。因此，英、美的人民现在必须努力去战胜这种时代的障碍，把世界反法西斯的斗争推向更高的阶段。

中国的情形，同样处在向前更进一步的转折点。日本法西斯虽

[1] 这是毛泽东1941年11月7日在延安发表的广播讲演。

然同时在准备着南进和北进^[1]，但是无论他们采取哪一条冒险的道路，西进以求消灭中国是必然的。日本在晋察冀边区和长沙、郑州等地遭遇失败^[2]以后，现在正准备着对中国的新的进攻。我们全国的人民和全国的军队，一定要保卫我们每一个抗日阵地，一定要打碎敌人的进攻阴谋。全国人民一定要更好地团结起来，拥护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到底，准备一切反攻的条件，以便及时地驱逐日本强盗出中国。我们共产党人一向是呼吁加强团结的，处在这个敌人新进攻的前夜，改善抗战营垒中各方面的相互关系，更为迫切的需要。我们希望国民党当局能够迅速地当机立断，为了这个目的迅速地采取各种必要的措置。我们相信，只要全国真正地团结一致，日本的进攻必能阻止，反攻的准备必能办到，驱逐敌人的目的是必能实现的。

[1] 向南扩大侵略，与英美争夺南太平洋和东南亚各国的霸权，同时，伺机向北进攻苏联，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长期战争目标。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日军大本营在《适应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中确定，继续向南扩展，并“根据形势演变解决北方问题”。同年8月初，日军大本营宣布，放弃“北进”企图，专心向南扩展，加紧了对英美作战的准备。

[2] 1941年8月至10月，敌后抗日军民顽强抵抗日本侵略军对晋察冀边区北岳、平西地区进行的疯狂“扫荡”，共歼敌5000余人，敌被迫撤退。9月下旬和10月初，日军曾一度进攻长沙、株洲和郑州几个城市，遭到中国军队顽强抵抗，占而复退。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

(1941年11月7日)

一 一般问题

(一) 敌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我军人力、物力、财力及地区之消耗，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敌我斗争，进入新的更激烈的阶段。

(二) 在这一新阶段中，我之方针应当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从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两面派的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武装实力与民众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因此必须反对悲观失望，害怕困难，对游击战争消极，对敌屈服的右倾观点；同时又应反对空喊运动战（在武器未改变前，运动战的可能日益减少甚至不能），空喊决战，急躁盲动，缺乏忍耐持久的韧性的“左”倾观点。

(三) 在这一新阶段中，我根据地的军事建设，必须适合新的客环境。每个根据地的军事机构均应包含三部分：(甲) 主力军，(乙) 地方军，(丙) 人民武装（即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及民兵）。在根据地建立时期，集中主要注意力于主力军之扩大与巩固是正确

的；然而最近敌我形势改变了，因此目前军事建设的中心注意力，应放在地方军及人民武装的扩大与巩固上，而这方面恰恰是我们的弱点所在。我们的观点还停留在前一阶段上（抗日战争与过去国内战争不同，没有集中最大力量对敌进行消灭战的可能）。由于人力物力的限制及运动战的可能绝对减少，主力军应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其工作重心是提高其政治军事技术的质量，缩编与充实编制。项英在前一阶段就主张精兵主义是错误的，但如我们在现在阶段还不提出主力的精兵主义，也将犯错误。

（四）无论将来有无大的变动，在山地根据地内主力军与地方军（人民武装不在内）数量上的比较，一般应以二与一之比为原则，在平原根据地内则以一与一之比为原则。在某些最困难的区域（如冀东、大青山、苏南），应当打消主力军与地方军的区别，全部武装地方化。至于人民武装（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应当包括人民的最大多数，其中之骨干（即民兵、模范自卫队及青抗先或青年自卫队）数量应超过地方军与主力军之全部数量。而每个根据地脱离生产者全部数目（包括党、政、军、民、学），仍只能占我统治区全人口百分之三左右。当然这些比率是大概的，要根据各地具体情况而具体化。为坚持对敌斗争，我根据地之党、政、军、民、学各种组织，必须一致努力，来进行上述的军事建设。

二 地方军及军区问题

（一）主力军与地方军之间虽有区别，但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一般的说，主力军与地方军之区别，在于前者是精干的正规部队，担任较大的战斗任务；后者是游击性极大的地方部队，担任分散游

击的任务。前者是统一指挥的，不限于地区的部队。后者是分散指挥的，限于一定地区的部队。

(二) 在根据地创立与扩大的阶段，集中全力扩大主力，主力兼军区地方军之指挥，建制亦属主力军，是必要的；但现在情况已变，故主力军与地方军之关系也要改变。地方军应有独立的建制及指挥机关，即军区与军分区。但主力帮助地方武装之责任，不但仍旧不变，且应较前加重。主力军在缩编（不是扩编而是缩编）与充实自己的编制时，应依照前面“一般问题”中所说的比率，以相当部分部队划归地方军建制（但部队名义不一定要改），主力军应给地方军以许多的干部、枪械、弹药等等。在作战时，主力军应规定地方军的一般作战任务，在这个意义上地方军是受主力军指挥的。主力军应帮助地方军训练部队。但主力军与地方军的建制又是彼此独立的，主力军绝对不应该吞并地方军。至于主力军按照比率，遇有损失应加补充时，须由自卫队、民兵、地方三方面酌量动员抽补，以维持相互间应有之比率的原则。

(三) 地方军之数量，按照前述比率建设之，但一般最低数目，仍有特别指示之必要。兹规定区应有约五十人枪的区游击队，县应有约二百人枪的县游击营，分区应有约二千人枪的独立营团。区游击队归区的党政机关指挥；县游击营归县的党政机关指挥；分区则应成立指挥部，不由主力兼，地委书记应兼分区政委；军区则由主力兼，或单独成立指挥，但无论主力是否兼任军区一级，主力军与地方军之建制仍是各自独立的。在战争频繁地区，区武装应坚持本区，县武装坚持本县，分区武装坚持本分区，反对逃跑主义（因真正情况不利，暂时移动者，不在此例）及随便调跑。在根据地腹地，区县游击队应同时受分区指挥，到游击区去活动，以锻炼自己

和准备将来。在山岳中心地区，过去敌人少到的，应估计到今后必到，迅速建立区县武装，不可再缓，但其人员武装数量，可较少于平原地区及边境地区。

(四) 地方军必须真正地方化，其主要成分尤其主要干部应是本地的，故培养本地干部，由地方党输送优秀的本地干部到地方军去，乃是头一等的重要任务。地方军之斗争方法、政治工作、服装等等，均应适合本地情况（即尊重地方性、游击性）。故空喊正规化，机械地将主力的一套搬运到地方军中去的办法，是不妥当的；限制地方军之独立活动，授以不能胜任的作战任务的指挥方法，亦是不妥当的。

三 自卫队及民兵问题

(一) 为加强各根据地广大民众的自卫武力，以适应新的战争形势，必须更加认真地建立自卫队和民兵，这是目前敌后根据地军事建设上一个极大的问题。但迄今各根据地（除晋察冀外）在这一工作上尚未收到应有的成绩。今后务须加紧努力来完成这一任务，否则各根据地必将遭受莫大的损害。

(二) 自卫队和民兵（包括模范自卫队和青抗先）都是广大民众保卫家乡、保卫抗日根据地、不脱离生产的武装自卫组织，但二者的范围与任务却互有不同。在根据地内凡年在十六岁至五十五岁者，不分阶级、性别、种族、宗教、信仰，均应登记，编为一般自卫队队员或妇女自卫队队员（当然要注意政治动员，不能单靠强制）。此种自卫队之基本任务是进行群众游击战争，维持根据地内的治安，担任抗战勤务（如运输、担架、送信、封锁消息、坚壁清

野等)。

(三) 民兵则是自卫队的骨干，它是下层人民武装中的高级组织，是由模范自卫队与青年抗敌先锋队两种群众性的组织，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所有身强力壮、愿意武装杀敌的男子，均可按自愿原则加入。其任务是侦察敌情，独立自主作战，及配合主力作战，袭扰敌人，封锁与围困敌人的据点，破坏敌人交通，打击少数敌人与武装汉奸之活动，在敌人进攻时领导自卫队掩护群众转移等。

(四) 自卫队是全民的群众组织，应按队员居住地区编队，分为中队、分队、小队，人数可不划一。而民兵的编制，则应在可能范围内力求各单位有比较整齐的人数，以便于作战与训练。

(五) 自卫队与民兵应由各级(由边区到县)人民武装委员会统一领导。这种委员会是由各级人民武装代表大会所产生的民主集中的组织，不应采取委派办法。在边区范围内，在武委会的统一领导下，民兵应有其独立的组织系统，县区村各级应分设队部，内部生活应悉依民主原则，各级负责人员均应由选举产生，切勿委派。

(六) 整个下层人民武装均应有其独立的组织系统与内部生活的民主制度，军政机关不得干涉与代替。但在执行各项基本任务时，应由政府经过同级队部指挥之。民兵平时在总的意图下，应受政府指挥，进行独立自主的活动；在配合主力作战时，应接受正规军或游击队的指挥。各级武委会也不能干涉各种人民武装组织的独立性，其权力只在于统一指挥、武器分配、统一经费与统一教育。

(七) 自卫队的武器主要的是大刀与梭镖。民兵的武器主要的是各种各样的新旧枪械(快枪、鸟枪)、手榴弹(各根据地甚至各县均应设手榴弹厂，大量制造手榴弹，分配民兵每人二个至四个)、地

雷、土炮、挨丝炮等。同时在民兵中应专门进行对敌铁道、矿山、火车、公路、工厂的破坏技术训练，以便开展群众性破坏工作。主力军务须有计划地拨出一批枪支武装民兵，千万不可吝惜。手榴弹与地雷这两种主要武器尤应大量制造，普遍发给。

(八) 自卫队和民兵的干部，应该是土生土长，与群众有血肉联系的。各地区应从地方上有计划地抽调大批干部，给以专门训练。各地抗大分校或其他军事学校，应负起这个责任来。

(九) 最后，中央军委特再重复指出，民兵建设与自卫队建设的中心一环，在于民主集中制度的建立，任何官办委派，都会妨害其发展，妨害其自动性、积极性的发扬。同时应指出，在分配任务时，应估计到民兵是人民武装的基干部分，应使用于对敌斗争方面，而一般的抗战勤务，则应多由自卫队担任之。

四 关于军队与民兵的武器问题

(一) 敌后抗战的武器补充日益困难：国民党已两年未发一颗子弹，将来发给的可能也很小；与日寇作战，弹药消耗很大，而缴获则较少（这与国内战争大不相同）；且日寇“扫荡”频繁，后方不巩固，根据地财力亦日见涸竭，故军工生产日益不易。这种情形应当引起我们的极大注意。

(二) 在敌我工业技术水平悬殊与根据地极不巩固之条件下，我们的军工生产当然处于劣势地位，欲求山地敌我装备平等，大规模建设军事工业及希望新式武器之生产等，都是无实现可能的空想。在目前条件下，军工生产的基本方针应当是修理枪械、翻造子弹，特别是大量生产手榴弹、地雷等，大量发给军队、民兵及居民，以

便到处与敌斗争，以量胜质。假若对于大量生产这种群众性的，较低级、较落后的武装忽视，而集中力量于制造步枪、机枪、炮等进步武器，则将来一定会吃大亏的。

(三) 在大量制造手榴弹、地雷等的方针下，必须：

1. 不仅主力军应设炸弹厂以供主力需要，地方军及民兵指挥机关亦应在分区及各县设立炸弹厂，以供自己的需要。这些炸弹厂规模应小，应分散办理，分别隶属于地方军及民兵的各级指挥机关或各级政府，但主力军的兵工厂应在技术上给各地方军及民兵的炸弹厂以各种帮助。

2. 不惜重价延聘制造手榴弹的工人技师，并开办炸弹工人技师训练班，以培养此种专门人才。

3. 搜集铁与硫磺等制造炸弹的原料。

4. 炸弹之生产要力求充足，除供给主力及地方武装外，特别要做到民兵每人两个手榴弹。

5. 民兵中应普及使用手榴弹之教育，主力军及地方军应随时随地派出干部以此教练民兵及居民。

6. 多造各式地雷专给民兵使用。

(四) 此外民兵及居民并应尽量采用一切其他落后的武器如梭镖、土炮、土枪等等，并设法制造之。

(五) 主力军除炸弹厂外并应努力解决翻造子弹的问题，即采取黑色火药亦可。延安三酸厂，可给附近根据地以无烟火药的帮助。

(六) 中央军委特再重复地强调群众性、落后性武器——手榴弹、地雷、土炮等——之重要性。我们一无飞机、大炮、坦克，再则我们的步枪、机枪质量也差，子弹也日益困难；想要单靠我们自己力量办到有极优良的步枪、机枪，有极充足的子弹，在目前条件

下，已是完全的空谈，更不必说飞机、大炮、坦克了。因此，只有下决心依靠群众、民兵及部队之抗日坚决性、积极性，依靠全民皆兵，依靠群众性的落后武器，依靠这些武器的数量，使敌人到处因我们的手榴弹、地雷、土枪、土炮而疲于奔命，同时主力军除炸弹外并积极设法修理枪械与充实自己的子弹。只有这样，才是在今天坚持敌后艰苦卓绝的斗争之唯一道路。



1942年11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进一步规定了根据地内实行主力军、地方军和人民武装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图为毛泽东和民兵在一起。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11月10日)

连日侦察，何文鼎尚在桃力民未动，王震、贺晋年已集中了约六千兵力于三边，有可能吓住何文鼎不来。你处可不再进行交涉，如彼方说减少兵力^[2]，决不要答应他。至于蒋以破裂吓人，只是瞎吹牛皮，他决不敢的。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周恩来11月9日致电毛泽东、朱德，告以刘斐向他转达的蒋介石的两点意见：一、何文鼎部接防命令已下，不能改变；二、何文鼎部决不进攻陕甘宁边区，如我向他进攻，必变成全面破裂。收回成命不可能，只能将来减少兵力。

致周恩来、董必武电^[1]

(1941年11月11日)

放叶、发饷，必作一件，方能出席。否则请假。空言不算数。
坚持不变。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建议周恩来直接和蒋介石谈判出席参政会的条件问题，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致周恩来、董必武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1年11月12日)

提议组织计划起草委员会，由李富春负责，彭真为顾问，限三天写出边区一九四二年度财政经济计划，交政治局通过。实行半统筹统支，统筹的主要项目是粮食、草料、被服、食盐、药材、纸张六项，从一九四二年一月起实行。一九四二年动员运输公盐十二万驮。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致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电^[1]

(1941年11月14日)

寒午电^[2]悉。我们是被聘的参政员，蒋介石决无强迫我们出席之理，我们绝对不能在蒋介石压迫下出席参政会。请以下函即刻送达参政会。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王秘书长勋鉴：同人等因事不克出席本次参政会，特此请假，敬希谅解。毛泽东、陈绍禹、林伯渠、吴玉章、秦邦宪、董必武、邓颖超十一月十五日。因事二字请勿漏，并请你们即刻准备对付蒋介石从各方面给予我们的压力。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起草的致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电的主要内容。

[2] 周恩来11月14日致电毛泽东，转达崔可夫希望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的意见。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11月16日)

接共产国际来电，主张我们出席参政会。请要王世杰担保放叶、发饷，则在渝两个参政员的请假书可以撤回，并准备出席。^[2]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起草的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周恩来、董必武11月16日致电毛泽东，说张治中、王世杰已担保在参政会后释放叶挺，故决定董必武、邓颖超向参政会报到。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11月16日)

三个联络参谋确做了许多有利团结的工作，周、郭到渝时望接待之。八路军已切断何师到安边通路，这是彼方决定何师缓调的主要因。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1年11月17日)

财政经济方针须实行下列两大原则：一、精兵简政，调整人员。裁减的人员须使之各得其所。二、扩大收支，发展事业。扩大必要事业如文化事业等的经费。这次会议确定了精兵简政的方针。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计划
案讲话的一部分。

关于发理论材料目录等问题

(1941年11月17日)

周、董^[1]:

佳、文^[2]电均悉。我们并未发出辩证法提纲，只发了一个理论材料的目录，其中包括政治理论及思想方法论两部分。中共党史提纲容考虑，现已印了一本中共六大以来文件选集，有便人即可寄上。七大报告即季米特洛夫报告。此复。

中央学习组 毛 王^[3]

稼^[4]

[1] 即周恩来、董必武。

[2] 韵目代日，指9日、12日。

[3] 即毛泽东、王稼祥。

[4] 韵目代日，指17日。

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 闭幕会上的讲话^[1]

(1941年11月21日)

本届参议会的胜利成功，除通过了很好的决议外，第一是暴露了我们很多东西，暴露了我们的好东西，同时也暴露了我们许多缺点。第二，这次参议会是个很大的学习，在乡、县、边区三级参议会中，党内外人士亲密合作，可以克服我们许多同志的关门主义弱点。

[1] 这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闭幕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各地高级学习组应根据组织条例实施^[1]

(1941年11月26日)

各中央局、各区党委、各军分会、各军政委员会：

近因各地高级学习组组织或宽或严，未能一致，由中央逐一审查批准，势不可能，特制定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2]。各地收到后，即根据此条例加以审查，决定去取，除组长、副组长、秘书三人须向中央报告其姓名、业务^[3]外，其余可只报人数。关于学习经过，则须由组长、副组长负责，随时报告。

中央书记处

十一月二十六日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电报。

[2] 指中央书记处1941年11月25日制定的《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的规定》。

[3] 抄件原文如此，疑为“职务”之误。

关于实施高级学习组 组织条例致刘少奇电

(1941年11月26日)

少奇同志：

中央已规定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日内即拍发），凡合此条例的即可由华中局决定为组员，不必中央批准。

书记处

廿六日

1788

刘少奇：中央已收到^{u1001}高级干部犯
组织错误（内部推荐），现将此
错误的严重性报告中央，并请
中央决定处理。书记处拟办

毛 毛
四月一日，毛

毛泽东为书记处起草的致刘少奇电的手稿。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11月30日)

据陈长捷二十六日致朱绍良电称，已令何文鼎师向安边开动。请质问刘为章所谓何师缓调是否缓兵之计，我军直至今天未放一枪，如何师一定南下则将坚决自卫，一切责任由彼方负之。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挽张冲先生联^[1]

(1941年11月)

大计赖支持，内联共，外联苏，奔走不辞劳，七载辛勤如一日；
斯人独憔悴^[2]，始病热，继病疟，深沉竟莫起，数声哭泣已千秋。

[1] 1941年8月11日，国共两党谈判，国民党代表张冲病逝。8月13日，毛泽东为张冲逝世发给其家属唁电，电文是：“惊闻淮南先生逝世，至深哀悼，特电致唁。”同年11月9日在重庆夫子池新生活运动服务所礼堂举行追悼会。毛泽东和吴玉章、陈绍禹、邓颖超等7名中共参政员联名送了这副挽联。张冲（1902—1941），字淮南，浙江乐清人，国民党员。早年专攻俄文，并赴苏联考察，曾与冯玉祥等发起组织中苏文化协会，推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抗日战争期间，任大本营第六部主任秘书，后任军委办公厅顾问处处长。1941年3月兼国民党中央组部副部长。1941年8月11日病故于重庆。

[2] 斯人，此人。憔悴，困顿萎靡的样子。斯人独憔悴，语出唐代杜甫《梦李白之二》：“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这里指张冲积劳成疾。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1年12月1日)

这个草案很好，但有缺点，只强调研究实际，未说明研究理论的重要，只说要有的放矢，没有强调矢的重要。过去的教育，主要缺点是只教学没有注意教人家去用。最容易的是只教学，最难的是教用。要教会人分析问题，研究中国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如学木匠，要学三年才能用，如果只教规矩、绳墨只要三个钟点就教好了。草案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联系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对于各种问题要先做分析工作，准备若干年做过分析工作之后再作综合的理论工作。要将这个草案写成两个决议，一个是延安适用的，一个是给全国用的。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草案时讲话的一部分。

中共中央关于 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

(1941年12月9日)

(一) 如同本党中央对太平洋战争的宣言所说，英美及太平洋各国的抗日战争是正义的解放的战争，英美对日的胜利就是民主与自由的胜利。因此，我全国人民，全体海外侨胞，及南洋各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的中心任务，就是建立与开展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广泛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应当包括反对日本侵略的一切民族的政府、党派及一切阶层的人民，日本国内的反战人民和日本殖民地朝鲜、台湾、越南的人民在内。这个统一战线，应当是上层的，同时又是下层的，是政府的，同时又是民众的联盟。应当实现中英美及其他太平洋各国的反日军事同盟，应当建立宗主国政府与土著民族的亲密合作，同时应当改善各土著民族的政治、经济地位，组织其民众，提高其积极性，并开展一切日本占领区内的游击战争。没有这些，战胜日寇是不可能的。

(二) 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的统一战线特别有重大的意义。一方面，在与英美合作之下，消灭日寇是中国民族解放的必要前提；他方面，中国内部团结一致，改革政治军事，积极牵制打击敌人，积极准备战略反攻，又是英美战胜日寇的重要条件。为此目的，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

作，以增加英美抗战力量，并改进中国抗战状况。

(三) 必须大大地开展南洋与英美各地的华侨工作。华侨工作的方针应当是团结全体华侨，团结其各阶层各党派，共同进行反日斗争，宣传并拥护祖国的团结抗战，赞助并参加当地政府一切抗日的设施与行动。应该纠正侨胞中及一部分共产党员中的过“左”倾向，要求他们与当地中国使馆、领事馆及国民党部合作。但对亲日、亲德分子分裂侨胞团结、妨害抗日工作的行为，必须坚决地但是适当地反对之。

(四) 必须努力开展华南敌占区、海南岛、越南及日本在南洋一切占领区域的抗日游击战争，并应尽可能与各抗日友军及英美等抗日友邦的军事行动协同一致，及取得他们在各方面的赞助。游击队所实施的各种政策应该符合于反日统一战线的要求，应该注意防止并纠正各种“左”的倾向。

(五) 在南洋各地的工作，应与当地民族的共产党取得联系，并帮助他们纠正存在着的“左”的倾向，广大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和民族團結，是中國人民對抗敵人、打倒日本法西斯的最強大的武器。我們要繼續地發揮這武器的作用，使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為着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奮鬥。我們要繼續地發揮這武器的作用，使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為着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奮鬥。

（一）在反對日本法西斯的戰爭中，我們要繼續地發揮這武器的作用，使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為着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奮鬥。我們要繼續地發揮這武器的作用，使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為着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奮鬥。

（二）在反對日本法西斯的戰爭中，我們要繼續地發揮這武器的作用，使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為着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奮鬥。我們要繼續地發揮這武器的作用，使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為着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奮鬥。

（三）在反對日本法西斯的戰爭中，我們要繼續地發揮這武器的作用，使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為着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奮鬥。我們要繼續地發揮這武器的作用，使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為着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奮鬥。

（四）在反對日本法西斯的戰爭中，我們要繼續地發揮這武器的作用，使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為着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奮鬥。我們要繼續地發揮這武器的作用，使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為着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奮鬥。

（五）在反對日本法西斯的戰爭中，我們要繼續地發揮這武器的作用，使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為着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奮鬥。我們要繼續地發揮這武器的作用，使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為着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奮鬥。

（六）在反對日本法西斯的戰爭中，我們要繼續地發揮這武器的作用，使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為着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奮鬥。我們要繼續地發揮這武器的作用，使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為着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奮鬥。

中國共產黨爲太平洋戰爭宣言

本日八日日本法西斯政府已經對華軍國宣戰，而在延安、浙津滬、香港與新加
坡、南洋與全國抗敵。中國人民革命軍民對日宣戰，太平洋戰爭已
經開始了。在原來的兩國戰爭中，太平洋戰爭，由日本法西斯爲了侵略美國及國及其他各國而發動的非正
義的戰爭，而在美國及其他各國起而抵抗的一方面，則是爲了保障獨立自由
和平的戰爭，而在英國及其他各國起而抵抗的一方面，則是爲了保障和平與他一年以來對於中國的
一切抗日民族的統一戰線，堅持到底，繼續地發揮這武器的作用，使全國人民團
結起來，爲着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奮鬥。我們要繼續地發揮這武器的作用，使全國人民團
結起來，爲着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奮鬥。

（一）中國與英美等國一樣，都是反對日本法西斯的戰爭的領導者。日本法西斯是與他一年以來對於中國的
一切抗日民族的統一戰線，堅持到底，繼續地發揮這武器的作用，使全國人民團
結起來，爲着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奮鬥。我們要繼續地發揮這武器的作用，使全國人民團
結起來，爲着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奮鬥。

1941年12月，毛泽东主持讨论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为太
平洋战争的宣言》。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对国际战争形势的估计

(1941年12月12日)

周^[1]:

(一) 香港、泰国、马来、缅甸、菲律宾、关岛、中途岛、婆罗洲^[2]、荷印^[3]、澳洲^[4]、新西兰均有被日军在冬季内占领之可能，在半年内英美均非日本之敌，但只要留得新加坡、马尼拉、达尔文等二三据点，即可在半年后造成对日相持局面，以待日军之敝，然后举行反攻。(二) 英美的总方针可能是对日取守，而对德取攻，先集合英美苏力量解决德国，然后集合英美苏中力量解决日本，而两方面苏联都将是决定力量。如若在数月后欧洲出现第二条战线，便可较快解决德国，这是真正有利的方针，但不知惰性甚深的英美军政人员有此毅力否？(三) 德国目前进入了进退维谷的歧途，但东线^[5]既已无路可走，便有迫使希特勒在东线取守势，在南线或西线^[6]取

[1] 周，指周恩来。

[2] 婆罗洲，即加里曼丹岛，位于东南亚，是世界第三大岛。

[3] 荷印，指当时被荷兰殖民者侵占的印度尼西亚，又称“荷属东印度”。

[4] 澳洲，指澳大利亚大陆及附近的塔斯马尼亚岛等。

[5] 东线，指当时的苏德战场，北起列宁格勒（芬兰湾），南至黑海边的刻赤。

[6] 南线，指当时德意联军与英军争夺北非和地中海控制权的战线。西指当时德军与美英军队争夺大西洋海上交通线的战线。

攻势的可能，如此则是希特勒自己造成第二条战线，也就有了迫使英美采取集中主力（英是海陆空主力，美是空军与资源主力）打德之可能性。（四）太平洋战争^[1]对中苏两国其利有六：第一，华北华中的敌军势将逐渐减弱，即是说无大举增兵之可能了；第二，国民党进攻边区的可能性会减少；第三，给亲日亲德两派一个致命打击，我们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可能性更大了；第四，中国民主政治的前途也更大了；第五，苏联可从东方抽调一部兵力向西；第六，欧洲有迅速造成第二条战线之可能。以上是在八号政治局会议上的一种估计（内部的，不发表的），你的看法如何盼告。

毛泽东

十二月十二日

[1] 太平洋战争，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法西斯同盟国家与日本在太平洋地区进行的战争。1941年12月8日，日本未经宣战，以强大的海、空军突然袭击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主要海、空军基地珍珠港，使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到惨重损失。12月8日，美英对日宣战，德意对美宣战，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日本军队先后侵占了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以及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屿，后来在太平洋地区各反法西斯国家武装力量的沉重打击下，不断遭到失败。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战争结束。

关于敌后各根据地领导方法的指示^[1]

(1941年12月12日)

德怀、瑞卿同志：

估计到敌后各根据地间交通已经很困难，今后更加难于通过，来往费时间，因此要求我们对各根据地的领导方法上注意下列各点：（一）详细研究各地之书面报告及电报。（二）与各地来往人（不管其职务如何）详细谈话及调次要负责人受训，利用机会收集材料。（三）派人及组织巡视团，到各地检查工作搜集材料。（四）全华北的高干会议、政治工作会议不宜召集，因主要负责人来往费时，得不偿失。（五）召集晋东南、冀南的各种会议（如锄奸、敌伪等会议），做出结论，介绍给其他根据地。领导方法之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就是利用一切可能进行调查，收集材料，对敌后抗战的各个具体问题加以深入研究，得出具体结论。

毛 朱 王 谭 傅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谭政、傅钟联名给彭德怀、罗瑞卿的信。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12月13日)

英大使等既要我们派人去新加坡，正宜利用此机会派人去，请你考虑派必武或其他适当人去的问题。去人目的不但在新加坡并在指导整个南洋工作。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给蔡畅^[1]的信

(1941年12月16日)

蔡畅同志：

李六如^[2]同志入党时间我记不清楚了，只记得他是一九二一年入团的。此复。

毛泽东

十二月十六日

[1] 蔡畅（1900—1990），湖南湘乡永丰镇（今属双峰县）人。当时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小组工作。

[2] 李六如，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

蔡畅兄：

特此通知，你所托办的外记不
便登门，只记得他在一九二一年入
围时。此度。

毛泽东
七月三日

毛泽东致蔡畅信的手稿。

为王观澜^[1]题词

(1941年12月16日)

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付慢性病的方法。就是急性病，也只好让医生处治，自己也无所用其着急，因为急是急不好的。对于病，要有坚强的斗争意志，但不要着急。这是我对于病的态度。书之以供王观澜同志参考。

毛泽东

十二月十六日

[1] 王观澜（1906—1982），浙江临海人，原名金水，字克洪。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色中华》总编辑、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土地部副部长。后任中共中央农委主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陕甘宁边区统战委员会主任等职。

舜生之列安之自己
定全名。身一。底體內懷：
生長抵抗力和工作力。
直至最後能完全勝之。止是
对付慢性病的方瘧。○能治
慢性病。其效還勝過中藥治
自己也。年所用其方法。因着
急。不外行。對於病
要有效。但
不容易。這就是
然矣。○這就是
王觀瀾。周易卷之三。

毛泽东为王观澜的题词。

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

(1941年12月17日)

(一) 目前延安干部学校的基本缺点，在于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的脱节，存在着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严重的毛病。这种毛病，主要表现在使学生学习一大堆马列主义的抽象原则，而不注意或几乎不注意领会其实质及如何应用于具体的中国环境。为了纠正这种毛病，必须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使学生能够正确地应用这种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为了书本上各项原则的死记与背诵。第一，必须使学生区别马列主义的字句与马列主义的实质；第二，必须使学生领会这种实质（不是望文生义，而是心知其意）；第三，必须使学生学会善于应用这种实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而抛开一切形式的空洞的学习。为了这个目的，除正确地教授马列主义的理论之外，同时必须增加中国历史与中国情况及党的历史与党的政策的教育，使学生既学得理论，又学得实际，并把二者生动地联系起来。党地委以上、军队团级以上的干部（在解决了文化问题之后），应以《联共党史》为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教材，特别应注意于具体应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观点（不是其大堆的抽象原则）的学习，借以克服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这种极端恶劣的毛病。

(二) 各学校没有明确规定自己的具体目的，亦是缺点之一。为

此特规定：

(甲) 中央研究院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

(乙) 中央党校为培养地委以上及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党的实际工作干部及军队政治工作干部的高级与中级学校。

(丙) 军事学院为培养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军事工作干部的高级与中级学校。

(丁) 延大、鲁艺、自然科学院为培养党与非党的各种高级与中级的专门的政治、文化、科学及技术人才的学校。

上述各校的课程教材与教学方法，必须与各校具体目的相适合。

(三) 为加强各校的具体领导及使各校教育与中央各实际工作部门联系起来，决定中央研究院直属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直属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军事学院直属军委参谋部，延大、鲁艺、自然科学院直属中央文委。各校主管机关，应把自己直属学校的工作，当作该机关业务的重要部分。中央宣传部对各校课程、教员、教材及经费，应协同各主管机关进行统一的计划、检查与督促。

(四) 为实现各校具体目的，使党的有限精力财力收到最大效果，各校对招收学生应采取少而精的原则。各校及其主管机关应重新审查学生成分，凡不合各校具体目的的学生，以分配工作或转学他处为原则。

(五) 改善教员质量是学校办好的一个决定条件。凡地委及团级以上干部的教育，应由中央委员及中央各机关负责同志亲身担任指导。对现有各校教员，应根据新的标准分别审查处理之。中宣部应给各校专任教员以实际帮助，提高他们的质量。对教员的政治的与物质的待遇，应改善之。

(六) 没有较高的文化水平，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是不可能的。

凡文化水平太低而又需要与可能学习的县级营级以上工农出身的老干部，应先补习文化。这种补习，不应只限于识字之多少，而应包含阅读写作能力、历史地理常识、社会政治常识与自然科学常识的获得。文化班编制的标准，应依照学生的文化水平，而不依照其工作职位。

(七) 凡带专门性质的学校（例如军事的、政治法律的、财政经济的、自然科学的、文艺的、师范教育的、医学的等等），应以学习有关该项专门工作的理论与实际的课程为主。文化课、政治课与专门课的比例应依各校情况决定之。一般说来，专门课应占百分之五十（不须补习文化之学校，则专门课应占百分之八十），文化课应占百分之三十，政治课应占百分之二十。坚决纠正过去以政治课压倒其他一切课目的不正常现象。

(八) 凡担任学校教育工作的同志，均应认真地研究教课内容与教学方法，使理论与实际一致的原则，在教课内容与教学方法中贯彻起来。在教学方法中，应坚决采取启发的、研究的、实验的方式，以发展学生在学习中的自动性与创造性，而坚决废止注入的、强迫的、空洞的方式。在教学中，陕甘宁边区及其邻近地区的实际材料，应经过各种调查研究的方式充分地利用之。

(九) 关于马列主义的教授与学习，应坚决纠正过去不注重领会其实质而注重了解其形式，不注重应用而注重死读的错误方向。学校当局及教员必须全力注意使学生由领会马列主义实质到把这种实质具体地应用于中国环境的学习。学生的是否真正领会（理解、认识、懂得），以学生的是否善于应用为标准。这里所说的应用，是指用马列主义精神与方法去分析中国历史与当前的具体问题，去总结国革命的经验，使学生养成这种应用的习惯，以便在他们出校之

后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的精神与方法去分析问题与指导实践。

(十) 在学校政治教材方面，应该充分利用《解放日报》、中央文件及中央各部委出版的材料书。各种必要的课本及辅助读物，应该有计划地编印或翻印。中央宣传部应协同出版机关及财政机关制定一九四二年有关教育的出版计划及经费预算，交中央批准实行。

(十一) 各校学生生活及教育设备，应按现有条件作必要的改善。

(十二) 学校行政组织以短小精干为原则。学校内党支部的任务，是在保证学校教育计划的完成，纠正支部与行政并立的不正确现象。支部对学校行政的建议，可经党的路线提出，但不能出于干涉。在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内，应纠正党员包办一切的党化作风。

(十三) 应在学校内养成学生自由思想、实事求是、埋头苦干、遵守纪律、自动自治、团结互助的学风，而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好高骛远、武断盲从、夸夸其谈、自以为是及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恶习。关于这种学风的养成，教职员应该以身作则。

(十四) 本决定适用于延安。但本决定中的一切基本原则，同时亦适用于各抗日根据地。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1年12月18日)

过去情况尚未弄清楚，因莫斯科危险未过去，日苏战争、国共关系也未明朗化。现在已明朗化了。自罗斯托夫胜利开始，苏德战争的好转已确定。日美战争爆发后已解除日苏战争的危险。过去蒋介石估计是三北政策，现在是三南政策了，对蒋不利。日军可能截断滇缅路，使蒋向南。日美战争爆发，对中苏两国有利之处有六点：第一，华北华中日军的“扫荡”势将逐渐减弱，即是说无大举增兵之可能了；第二，国民党对边区的进攻可能会减少；第三，给亲日亲德两派一致命打击，我们使国民党既不投降又不能“剿共”的可能性更大了；第四，中国民主政治的前途也更大了；第五，苏联可从东方抽调一部兵力向西；第六，欧洲有建立第二条战线之可能。将来战争欧洲会短些，东方会长些。日美战争前途，最初对日会有利，战争会延长，将要二三年后英、美准备好才能决战。英、美可能集中力量先打败德国，然后英、美力量均向东打败日本。今后将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我们的政策要一打一拉，有硬有软。过去有人认为对国民党硬会坏事，这是不对的。当硬时应该硬，使它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例如打败了阎锡山的旧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时局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军，因此阁对我们代表客气。关于工作布置，提议由中央发一指示。要加强南洋华侨工作，廖承志应大胆地在香港与英国建立关系。要加紧训练干部，经华北调一批高级干部来训练，两年内培养出四五万个高级干部。在谈“三三制”时，他说：过去并没有做好，没有使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三三制”一是分化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扩大其矛盾；二是打破共产党的关门主义，集中民众的意见，要与非党干部接近才能感觉新的问题。对地主的政策，不要说削弱大地主的话，现在不应削弱。说削弱富农更是错误的，要让富农发展，不能削弱。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1年12月20日)

国民党反共后，我们提出荫蔽精干的政策，精干是小而精，荫蔽是要求公开合法，但都做得不好。过去我们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口号是提出了，但没有具体的组织方法。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主要是秘密问题、公开合法问题与领导方法问题。决定草案认为过去组织不巩固，这种估计不好。过去发展党的组织是对的，不能说庞大无力。我们不可能设想绝对巩固的党，因为世界上没有绝对巩固的东西，而只是我党工作做得好些，能适应社会环境，就会巩固些。党的组织要达到精干的目的，不完全在于党员的社会地位的高低，党的组织只是上层见得是精的。我们在国民党区域战略上是退却，总方针是保护自己，但在战术上要有进有退。关于领导方式，对下层组织我们应少管，应指示他们要保存力量，少死人，多交友，发挥其独立性和创造性。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陕西国民党区域党的组织及陕西省党的工作决定草案讲话的一部分。

给续范亭的信^[1]

(1941年12月23日)

两示敬悉。电已照发，所见很对。承馈酒蜜，即与若飞分尝。我臂部十愈五六，是洗澡晒太阳之功，再过一时，或可全愈。尊恙有起色，大家欢喜。惟不宜急于求愈，不宜即准备行动，我看你的身体至少再休养一年，以为如何？住地以适为主，中央医院如有房子自好，否则即住现处，有林、谢、高、南^[2]诸人谈谈可慰寂寞。元旦此间有一小晚会，如有兴致可来看看，我派车子接你。

[1] 这是毛泽东致续范亭信的主要内容。

[2] 林、谢、高、南，指林伯渠、谢觉哉、高岗、南汉宸。

给任弼时的信^[1]

(1941年12月25日)

土地指示我改造了，改成能够公开发表的，请你审阅付缮交各同志去看。原文提得不清楚不明确，又有许多重复及遗漏之处，改造后似乎好些。参考意见三件亦有些问题，待修改后再交你。

[1] 这是毛泽东关于修改《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指示第一号》草案，致任弼时信的主要内容。

一九四二年的中心工作任务

(1941年12月28日)

八路军、新四军及党的主要负责同志：

太平洋战争是长期战争，日寇将在南太平洋愈陷愈深，目前正在从华北、华中抽兵南进，将来还有抽调一部可能。重庆政策是仅用游击队对敌，不用主力与敌对峙，让敌撤走，我军亦应取此政策。一九四一年我根据地受了很大损害，应乘一九四二年敌人忙于太平洋对中国采取战略守势之际，集中精力恢复元气。坚决执行中央十二月十三日指示^[1]，精兵简政，发展经济，发展民运，发展敌占区工作，发展对敌伪的政治攻势，有计划地训练干部。在军事上是粉碎敌人可能的“扫荡”（任何“扫荡”必须坚决粉碎之），收复敌人撤退地区；对深入我区之据点，尽可能使之陷于孤立，自动撤去；对某些最必要的地方，可以个别地采取强攻收复手段，但不可采取大规模攻势，反而抑留敌人，引起报复“扫荡”，非徒无益，而又害之。部队中及地方上可能发生的冒险精神，务须防止。世界大势及国内大势迫使国民党要作某种政治上的转变，但其过程仍是慢的。我党我军的宣传，务须避免刺激国民党，静观变化，少作批评，极力忍耐，不要躁急。总之，明年的中心任务在于积蓄力量，恢复元

[1] 从文内所述的指示内容看，应是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

气，巩固内部，巩固党政军民。对敌伪以政治攻势为主，以游击战争为辅。对国民党以疏通团结为主，以防制其反共为辅。如敌人不攻苏联，我们即取此政策以待敌军之弊。如敌攻苏联或苏联攻敌，我们即有充分精力配合苏军作战。务望各同志研究实行之。

中央书记处
中央军委
十二月二十八日

关于中共党史学习问题致周恩来电

(1941年12月30日)

恩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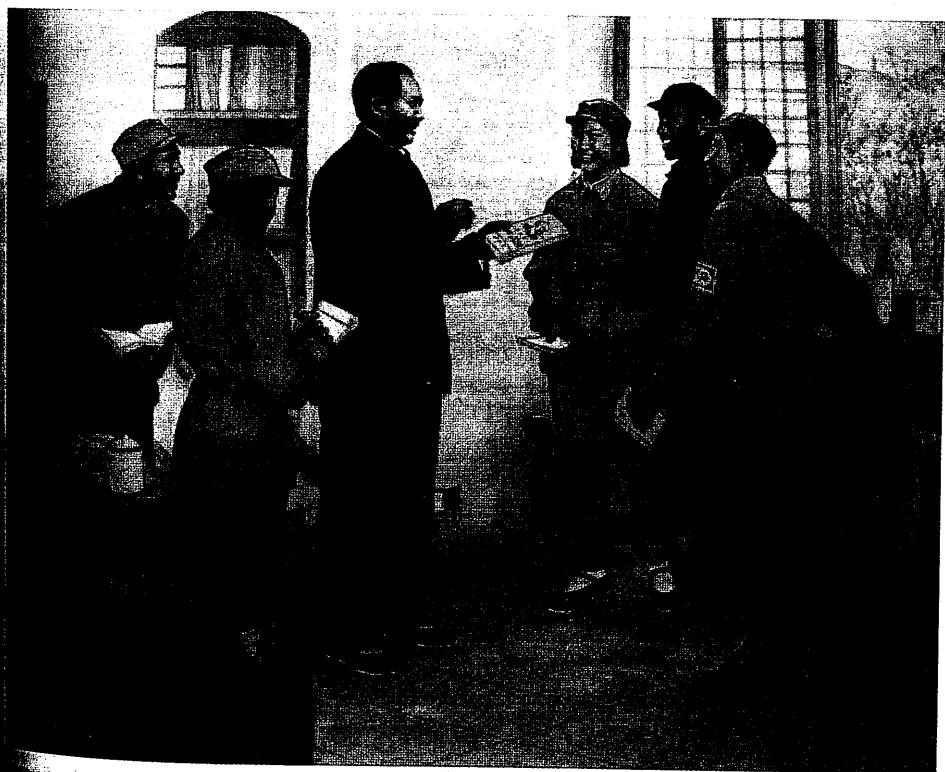
中共党史的学习请先从讨论六大以来的文件入手。

毛 王^[1]

陷^[2]

[1] 即毛泽东、王稼祥。

[2] 韵目代日，指30日。



《毛主席教导我们学理论》(中国画)

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节选）

（1941年）

—

据我们历来的想法，所谓对于情况的估计，就是根据我们对于客观地存在着的实际情况，加以调查研究，而后反映于我们脑子中的关于客观情况的内部联系，这种内部联系是独立地存在于人的主观之外而不能由我们随意承认或否认的。它有利于我们也好，不利于我们也好，能够动员群众也好，不能动员也好，我们都不得不调查它，考虑它，注意它。如果我们还想改变客观情况的话，那就可以根据这种真实地反映了客观情况内部联系的估计，规定行动方针，转过去影响客观情况，把它加以改造。这时，如果客观情况是有利于我们前进的，我们就向群众说：你们前进吧！如果是不利于我们前进的，我们就向群众说：你们暂停吧（近乎“等待主义”），或说：你们退却吧（大有“机会主义”嫌疑）！据我想，这就叫做马克思主义的起码观点呢！

—

必须明白，在日本人与国民党有巩固统治的一切地方（这种地

方占全国十分之九以上的区域），绝对不能采取流血的武装斗争形式，而只能采用不流血的和平斗争形式。

和平斗争也有两种，一种是合法的公开的斗争，又一种是非法的秘密的斗争，但都是不流血的、不暴动的、非武装的斗争形式，二者统一起来，就是在敌人统治区域的策略路线。

一切日本人及国民党有巩固统治的区域都必须采取合法的公开的斗争形式。中国虽然不是民主的法治的国家，人民没有政治自由，尤其在日本统治区域对人民压迫得更厉害；但是政府的法律、社会的习惯，依然有很多地方可以利用，有很多矛盾、间隙、漏洞是可以被我们利用的。必须采取合法的能够公开的各种各色的斗争形式，才有人来，才能一般地避免政府的逮捕与解散，才能保全力与积蓄力量。临时中央^[1]却是拼命反对这种形式。有许多本来是非法的斗争，也要采用公开合法的形式才有胜利可能。例如罢工，是非法的，如果我们要争取胜利，避免失败，就必须利用当时当地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条件，可罢则罢之，不可罢则已之，罢而不胜则停之。做得入情入理，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才能存在与胜利。而临时中央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是下令“用一切力量组织反日罢工”。又如反日，是非法的，但亦可以利用社会的舆论与各种政治间隙去进行某些工作。临时中央却只是高叫一顿，乱撞一顿，结果是任何稍为广大的、稍为持久的反日运动也做不起来。

公开工作之外，还要有秘密工作与之相配合，这就是党的秘密组织工作，群众的秘密组织工作（作为群众公开组织的核心），党派秘密联合行动，秘密的情报工作，公开组织与公开斗争的事先秘

[1] 指1931年9月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在上海成立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

密准备等。没有这一方面的工作，是不能存在于敌人统治区域的，公开工作也失了灵魂。临时中央则不但不愿意进行公开合法工作，也不愿意认真进行秘密工作，凡事爱暴露，爱显劲，爱称英雄，爱在明天早上胜利，结果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在敌人统治区域把党闹个精光，一点群众力量也闹个精光。

由此看来，临时中央的所谓“各种形式”，只是一句空话，其实他们只有一种形式，就是打、闹、叫，此外一点也没有。他们完全不知道中国的特点是武装斗争与和平斗争的统一，在和平斗争方面，又是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的统一。这是极复杂的政治科学的一整套，中国共产党人如不学会这一整套政治科学，是无法胜利的。照临时中央的单纯的片面的冒险的干法，怎么能够“使工人阶级成为反日运动的骨干”“使无产阶级成为中国民族的领导者与组织者”呢？不，是使工人阶级成为无用的长物，使无产阶级成为中国民族解放的空唤者与束手无策者。为什么有些同志连民族二字都不敢提呢？老爷^[1]们既然提倡打倒一切，采取极端狭隘的关门主义与极端冒险的盲动主义，还吹什么民族呢？提了民族二字又有什么用处呢？

三

请问老爷们：为什么分配一切土地给一切人，就叫做“十足机会主义的观点”，叫做“完全忽视无产阶级领导权”呢？咳，我倒要叫老爷们听训了！你们一点什么都不懂，根本脱离农民群众，硬把所谓“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路线强迫推行于苏区，自

[1] 指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

封为“明确的阶级路线”，而把南方如像江西等地的农民群众所赞成所拥护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法，名之曰“富农路线”，“十足机会主义”，强迫取消，是何道理呢？你们也知道吗？地主不分田者，肉体上消灭地主之谓也，这是出于哪一条马列主义的？你们在理论上，既不主张破坏地主们的消化器，就得让他们吃饭。听说十月革命后，列宁曾把一些地主送到西伯利亚搬木头，给他们以劳动与吃饭的机会，这是真正的列宁主义。我们的“列宁主义者”则不然，既无木头叫地主搬，又不给地主一份土地去耕种，其结果，便是迫着他们去当绿色游击队，手执武器向苏维埃拼命，这有什么好处呢？富农分坏田，把富农降到赤贫，让这一部分农民也反对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在民主革命还未胜利时期，在强大敌人进攻、革命谁胜谁负还未决定时期，就要用不分田、分坏田的政策对待地主富农，这是属于哪一条列宁主义的呢？你们的这一套，就可以叫做领导权吗？否！这是毁灭权，这是毁灭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办法，这是毁灭革命的办法啊！

在土地问题上，六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认为：“在有很多失业和贫苦的农民的地方，必然发生‘平分土地’的运动，如果这一口号为大多数农民群众所拥护时，共产党应加以赞助，因为这是彻底肃清一切封建余孽的口号，并且是直接动摇私有制度的。”这些话大部分是正确的，因为它适合中国这类地少人多的情况（在北方每人平均只有三亩地，在南方每人平均只有一亩地）。这一段话里，只有最后一句不妥当，因为“平分土地”的结果，并没有动摇全部私有制，只动摇了封建主义的私有制，使之变为农民的私有制，而且在农村中仍然摆着走资本主义道路或走社会主义道路两个前途，更不要说没有动摇城市中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私有制了。六大

决议又说，要向农民说明在现时条件下没有实行真正平等的可能，因此不要把农民引向绝对平均主义（例如侵犯中农利益，分田后不允许土地买卖，即不允许新富农产生）。临时中央违反六次大会，发明一条“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连同政治、军事、组织路线的错误，结果闹出一场革命的失败，其亦可谓“完全正确”也已矣。

四

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造出的。但不认识世界就不能改造世界，“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1]，这一方面，我们的老爷是茫然了。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是必须经过认识与改造两个过程的。欧洲的旧哲学家^[2]，已经懂得“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个真理。马克思的贡献，不是否认这个真理，而是在承认这个真理之后补充了它的不足，加上了根据对必然的认识而“改造世界”^[3]这个真理。“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是旧哲学家的命题。“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

[1] 参见列宁《怎么办？》第一章第四节（《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1页）。

[2] 指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和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等。

[3] 参见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19页）和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编第十一节《道德和法。自由和必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4页）。

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说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1]。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而这些图样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得来的关于客观实际情况的能动的反映（关于国内阶级关系，关于国内民族关系，关于国际各国相互间的关系，以及关于国际各国与中国相互间的关系等等情况的能动的反映）。我们的老爷之所以是主观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的一切革命图样，不论是大的和小的，总的和分的，都不根据于客观实际和不符合于客观实际。他们只有一个改造世界或改造中国或改造华北或改造城市的主观愿望，而没有一个像样的图样，他们的图样不是科学的，而是主观随意的，是一塌糊涂的。老爷们既然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老爷们对于中国革命这个必然性既然是瞎子，却妄欲充当人们的向导，真是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

[1]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原文是：“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2页）

五

从“九一八”至遵义会议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所谓两条战线斗争是主观主义的。这首先是因为他们拿了衡量一切的他们自己的路线，是不根据于客观实际而仅仅根据于主观愿望，胡乱制造出来的。以机会主义的思想去衡量别人的思想，于是到处都发现“机会主义”，正如有鬼论者到处见鬼一样。第二，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既用这种方法造出了他们自己的主观主义的政治路线，又用这种方法造出了他们自己的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于是对于凡不合他们胃口的一切人都看作是“机会主义者”。他们对于事既不用唯物的辩证的方法，对于人自然也不用这种方法。而要作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如果离开了唯物的辩证的方法，就会只是胡闹一顿，决无好结果可言。第三，他们连什么叫做“两条战线斗争”也是一点不懂得。他们不知道两条战线斗争，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就是对于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着的一定事物的过去与现在的发展状态加以分析与综合，因而可以肯定它的暂时安定性（即该事物的本质及其属性）的一种方法。例如为要认识中国现存社会的性质是什么，就必须对中国社会的过去状况与现在状况加以科学的具体的分析，懂得它既不同于独立的封建社会（第一条战线上的斗争），也不同于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第二条战线上的斗争），然后才可作出综合的结论，说它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独立的）半封建的社会。又如要认识现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就必须从中国社会是特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一点出发，加以科学的分析，懂得它既不同于没有民族压迫只有封建压迫而无产阶级又未觉悟的国家，如像二百年前的法兰西那样，是由资产阶级领导推翻封

建阶级专政、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第一条战线上的斗争），也不同于由于无产阶级觉悟而在推翻封建阶级之后社会条件与政治条件容许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如像十月革命时的俄国那样，是由无产阶级领导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第二条战线上的斗争），然后才可作出综合的结论，说现时的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对于每一件具体的事，每一个具体的人，如果要认识它的性质，就必须使用这种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加以具体的分析与综合的调查研究，才能做出肯定的结论。稍一离开这种方法，稍一不合该事该人的实际，就没有法子做出正确的结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者们主观地狂妄地采取所谓两条战线的方法，完全离开了具体的科学的研究工作，故其结论不能不是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主观主义的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把党内对于这个方法的思想弄得极其混乱与模糊起来了。许多人都晓得要作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但许多人都不晓得究竟如何做法，成了一句不值钱的口头禅。第四，“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主观主义的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亦即他们的乱斗法，自然就不能如《联共党史》^[1]在其结束语中所说的，既要同“党内机会主义集团——‘经济主义者’，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民族主义倾向者”作斗争，并将他们加以粉碎（结束语第四条）；又要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党与党员在工作中所犯的错误（结束语第五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乱斗法，没有可能将这二者（对付敌人和对付犯错误的同志）加以区别，而把用于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对付了同

[1] 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志，在党内造成了一种乱斗的习惯，不分青红皂白，大事小事，一律都是“最坚决无情的斗争”，到处都是“仇恨”与“斗争的积极性”，造成党内离心离德、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这种反科学的小资产阶级主观主义的乱斗法，如果不肃清，党要达到真正的团结与统一是不可能的。

为中央党校的题词

(1941年冬)

实事求是。

毛泽东

实 事 求 是

毛泽东为中央党校的题词。



《光辉的题词》(版画)

为军委机要工作题词

(1941年)

保守机密，慎之又慎。

毛泽东

保
家
國
民
主
生
活
毛
東

毛泽东为军委机要工作的题词。

为王履丰题词^[1]

(1941年)

奋斗。



毛泽东为王履丰的题词。

[1] 在1941年暑假，王履丰等代表陕北爱国知识青年到延安参观学习，在中央西北招待所召开的座谈会上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接见。

为延安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主办的 青运工作展览会题词

(1941年)

困难二字是我们所不知道的。

毛泽东
所长
通过
向你

毛泽东为延安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主办的青运工作展览会的题词。

为门书明题词^[1]

(1941年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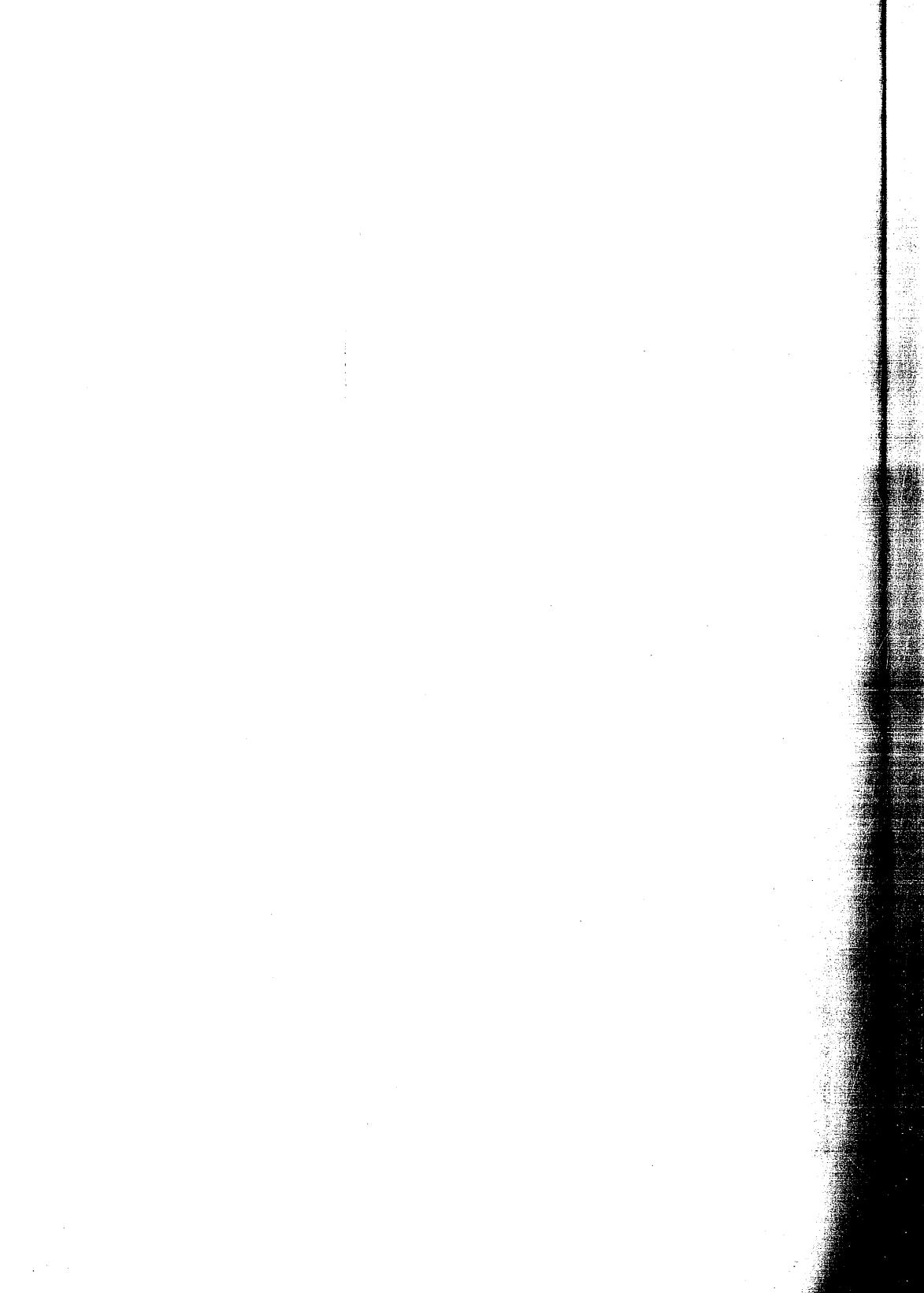
学习一番再工作。

[1] 门书明，曾在八路军后方政治部机关工作，后调到毛泽东身边任警卫人员的文化教员。1941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毕业后调到甘肃省庆阳县地方工作。1941年冬，门书明前往中央党校学习，毛泽东为其题词：学习一番再工作。

1942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



致周恩来等电^[1]

(1942年1月7日)

关于大后方党的工作，中央拟作一决定，特征求二兄意见，请将政治、组织两方面意见见示为盼。

[1] 这是毛泽东和陈云致周恩来、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复周恩来电^[1]

(1942年1月8日)

我们方针是巩固自己，沉机观变。

今年内德、意会向下，日本还会向上，英、美会削弱，国民党会分化。

[1] 这是毛泽东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在周恩来关于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 情况的材料上加写的一段话^[1]

(1942年1月10日)

九中全会表现了国民党的极大动摇性，这种动摇，似要待到法西斯失败时才会起变化，那时变好变坏，当依国际国内条件来决定。

〔注〕这是毛泽东在周恩来关于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情况的材料上加写的话。

致彭德怀等电^[1]

(1942年1月12日)

敌后各根据地要注意领导方法。领导方法之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利用一切可能进行调查收集材料，对敌后抗战的各个具体问题加以深入研究，得出具体结论。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谭政、傅钟致彭德怀、罗瑞卿电的主要内容。

《文化课本》序言

(1942年1月17日)

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没有这个基础，就是说不识字，不能看，不能写，其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限于直接见闻的范围，这样的人，虽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虽然也能学到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学得好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有大批精明忠实但缺乏文化基础的干部，将来也必然还会有大批这类干部，他们急切需要解决文化基础问题，但课本问题迟迟没有解决。现在文化课本出版了，这是一大胜利，这是凯丰、徐特立、范文澜^[1]诸同志的功劳。不管课本内容还须随时改正缺点，推陈出新，但有了这个课本，就打开了学习文化的大门。文化课本的出版，是广大干部的福音，我相信，我们大群的干部会以极大的热忱来欢迎这个课本的。

[1] 凯丰，即名何克全（1906—1955），江西萍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徐特立，当时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范文澜，当时任延安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

为瞿宪文题词^[1]

(1942年1月18日)

老当益壮。

瞿老同志六十寿辰。

毛泽东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管理局为抗战爆发后来延安行医的瞿宪文六十寿辰举办的茶话会上所写题词。

瞿宪文同志
七十年
毛泽东

毛泽东为瞿宪文的题词。

在审改的一份情况通报上 加写的一段话

(1942年1月20日)

由于我集中兵力于定边、安边、靖边，并占领蒙边军事据点，迫得重庆取消何文鼎师进驻安边之命令，边区北部暂告平静，我增防部队已返原防。

致彭德怀等电^[1]

(1942年1月21日)

日本在满洲放出北进空气，如新加坡不守，日军与希特勒配合进攻苏联的危险是存在的。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致彭德怀、左权、聂荣臻、贺龙、关向应电的主要内容。

致朱瑞等电^[1]

(1942年1月21日)

中央派刘少奇去山东解决存在的问题，请你们先行准备总结山东工作的一切必要材料。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致朱瑞、陈光、罗荣桓并告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在关于太平洋战争后沦陷区情况的 通报材料上加写的一段话

(1942年1月22日)

总之，极端毒狠的殖民地政策，现已推行于租界，不分阶级，有财即掠，表示了日本法西斯最后挣扎时期的紧张性。

在欢迎七一七团晚会上的讲话^[1]

(1942年1月22日)

你们这次在三边，完成了一个重要任务。你们到了那里，顽固分子就不敢来了，你们没有打仗，就赢了一个大胜仗。边区是个好地方，顽固分子可不喜欢这个地方，所以才把你们从前方调回来，有事就打仗，没事就生产和学习。

[1] 这是毛泽东在欢迎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第七一七团晚会上的讲话的一部分。

印发和学习红四军 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

(1942年1月23日)

谭政、莫文骅^[1]二同志：

将四军九次大会决议^[2]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3]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4]，叫他们当作课材加以熟读。（各级干部均须熟读）

毛泽东

一月二十三日

[1] 谭政、莫文骅，当时分别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和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

[2] 四军九次大会决议，指1929年12月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又称古田会议决议。

[3] 留守部队，指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所辖之部队。

[4] 1942年4月6日，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向各部队发布训令，训令指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不仅对当时中国红军的建军有着很大的意义与决定作用，对今天

八路军新四军的建设，仍然有着伟大的实际意义。我后方留守兵团和保安部队，在工作中所以尚存在不少缺点，党内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与错误倾向尚有某些残余存在等等，主要是由于我们没有彻底执行这个决议。因此，留守兵团及保安部队，要把这个决议当作今后改进工作的指南，无论是高级指挥员还是一般干部都要熟读与灵活运用这个决议于工作之中，用它来检查我们过去工作的优缺点。训令还对教育方法和检查方法作了若干具体的规定。



1942年，毛泽东和贺龙在延安。

致周恩来、董必武电

(1942年1月23日)

周、董：

(一) 全国各地日报暂订二份，一寄乔木^[1]，一寄陈伯达，均由延安新华书店转；(二) 各种书籍刊物（不论普通的、专门的）请各买三份，寄新华书店转乔木或富春^[2]、首道^[3]收，次间收到后统筹分配；(三) 其他需要的特别书籍，均由书记处办公厅电告，以兹统一；(四) 经费请你筹拨支付，每年即超过一百元亦所不惜。

毛 任 李^[4]

一月廿三日

[1]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

[2] 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

[3] 首道，即王首道，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

[4] 指毛泽东、任弼时、李富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2年1月24日)

—

社论、新闻、广播三者应并重。重视社论与专论，并出题目分配中央同志写文章，报社要组织写文章的工作。报纸的第三版和第四版应贯穿党的政策，题材应切实，文字应通俗。要组织新闻，在新闻中表现党的路线。中央各部委应组织自己的新闻，要写新闻稿、评论稿。广播比三千份报纸更重要，要成为第一位的工作。党务广播材料，要求中央各部委、西北局每月至少一条。

—

中宣部要利用一切宣传工具，熟悉宣传干部，这是宣传指导的中心问题。干部教育，主要是指导与编印课本。延安高级学习组约三百人，认真地教育这三百个高级干部，是政治局与中宣部的责任。国民教育，应研究和指导根据地的国民教育，包括四千万人，

[1] 本篇一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关于《解放日报》工作的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中央宣传部工作的讲话的一部分。

还要研究全国的国民教育。中宣部的业务之一是指导文学革命，六中全会指出党八股必须废除，空洞抽象的言论必须纠正，教条主义必须休息。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

中宣部宣传要点^[1]

(1942年1月26日)

(一) 本部宣传要点，以前偏重党外宣传，从本期起，决定加上党内宣传，希各地同志注意。

(二) 鉴于遵义会议以前，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错误给予党与革命的损失异常之大，鉴于遵义会议以后党的路线虽然是正确的，但在全党内，尤其在某些特殊地区与特殊部门内，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残余，并没有肃清，或者还很严重地存在着，故在去年内，中央政治局多次地着重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发表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开展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干部学校的决定与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此外，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央的决定，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了反对宗派主义的演说。这些决定及演说，已在全党起了指导的作用，已引起了很多同志的注意，已在具体纠正至今尚存在着的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残余，这是好的现象，这是一方面的现象。但在另一方面，中央的决定及中央同志的演说，在另外许多同志中，并没有引起深刻的注意。其原因，或则是有些同志过去犯了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相当的严重，一时尚没有深刻认识自

[1] 这是毛泽东在全党即将开展普遍整风之前起草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宣传要点。接着，毛泽东于1942年2月1日作了《整顿党的作风》讲演，2月8日作了《反对党八股》讲演。

己的错误，不愿意作深刻的自我批评，不愿意迅速地改正自己的错误；或则是有些同志自以为过去并没有犯过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路线错误，因此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不知在他们自己过去与现在的思想中行动中，也曾有过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因素，也曾犯过某些错误。例如容易冲动，以感想代政策，对于敌、友、我三方情况懂得很少也安之若素，对客观事物缺乏科学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精神，而有自以为是的精神，这些便都是主观主义的错误因素。再则，例如在党内闹独立性，把发扬独立工作能力、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这些正确的东西，与不服从上级、不服从多数、不服从中央、将个人与党对立、个人超过了党（个人突出）、个人英雄主义（与民族英雄主义、群众英雄主义相区别的）这些错误的东西，混淆起来。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上，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上，在本军干部与友军干部的关系上，在老干部与新干部的关系上，不注意互相帮助互相团结，而是一个轻视一个，甚至一个欺负一个。在这里，没有加重外来干部、军队干部、本军干部及老干部的责任，而对本地干部、地方干部、友军干部及新干部则没有多加原谅，多加帮助，以期团结他们提拔他们，在斗争过程中克服各种弱点。许多地方既尚存在着各种不正常的内部关系，这些便都是宗派主义残余在党内的表现。至于党员与非党员，党的干部与非党的干部之间的关系，则更加存在着非常之大的隔阂，不了解，不关心与轻视，而其责任则主要应由党员及党的干部担负之，“三三制”^[1]在各根据地并没有完满地彻底地十分认真地实行，就是这种宗派主

[1] “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的政权政策。这一政策规定，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大体占1/3，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1/3，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1/3。

义存在的表现。在党内与党外的关系上存在着十分严重的宗派主义错误这一点，并未为一切或大多数同志所深刻注意，这是真确的事实。凡此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如不來一个彻底的认真的深刻的斗争，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而要进行斗争，加以克服，非有一个全党的动员是不会有多大效力的，因此希望全党全军的各级领导机关与各级领导同志对于这个问题加以注意，进行宣传，进行工作。本部对这个问题将陆续给以上述材料，以为同志工作的参考。

中共中央关于 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

(1942年1月28日)

抗战以来，我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土地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也就是一方面减租减息一方面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这一政策，在各根据地实行以后，曾经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团结了各阶层的人民，支持了敌后的抗战。凡在比较普遍比较认真比较彻底的实行了减租减息，同时又保障交租交息的地方，当地群众参加抗日斗争与民主建设的积极性就比较高，而且能够保持工作的经常状态，安定社会的生活秩序，那里的根据地就比较巩固。但是这一政策，在许多根据地内还没有普遍的认真的彻底的实行。在有些根据地内，还只在一部分地方实行了减租减息，而在另一部分地方，或则还只把减租减息当作一种宣传口号，即未发布法令，更未动手实行。或则虽已由政府发布了法令，形式上减了租息，实际并未认真去做，发生了明减暗不减的现象。在这些地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发扬，也就不能真正将群众组织起来，造成热烈抗日的基础。在这些地方，抗日根据地就无法巩固，经不起敌人的扫荡，变成软弱无力的地区。但是在另外若干地方，则又犯了某些“左”的错误，虽然这种错误只发生在一部分地方，并且经过中央指示后已经大体上纠正了，但是还有引起各地同志加以注意之必要。

当此抗战进入更加艰苦的时期，要求各根据地更加发动广大群众的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更加团结一切抗日阶层来坚持敌后的长期斗争。中央在详细研究各地经验之后，特将我党土地政策作一总结的决定。另有关于执行土地政策的具体办法，作为附件，随此决定一并发下，以供各地采用。务望各地同志加以研究，认真执行。

（一）承认农民（雇农包括在内）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故党的政策是扶助农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保证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抗日的与生产的积极性。

（二）承认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一部分开明绅士并是赞成民主改革的。故党的政策仅是扶助农民减轻封建剥削，而不是消灭封建剥削，更不是打击赞成民主改革的开明绅士。故于实行减租减息之后，又须实行交租交息，于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之后，又须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只是对于绝对坚决不愿改悔的汉奸分子，才采取消灭其封建剥削的政策。

（三）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社会成分与政治力量。富农的生产方式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抗日与生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富农，不但有抗日要求，而且有民主要求。故党的政策，不是削弱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不是削弱富农阶级与富农生产，而是在适当的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之下，同时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与联合资产阶级，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但富农有其一部分封建性质的剥削，为中农贫农所不满，故在农村中

实行减租减息时，对富农的租息也须照减。在对富农减租减息后，同时须实行交租交息，并保障富农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一部分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土地的地主（所谓经营地主），其待遇与富农同。

（四）上述三条基本原则，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土地政策的出发点。四年以来的经验证明，只有坚持这些原则，才能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正确的处理土地问题，才能联合全民支持民族抗战，而使日寇完全陷于孤立。一切过“左”过右的偏向，都是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的。

（五）在农村统一战线中，地主与农民间的矛盾，例如地主反对或妨碍农民关于民主民生的要求等，必须按照上述原则作适当的处理。双方的合理要求必须满足，但双方都应服从于整个民族抗战的利益。在处理农村纠纷中，党与政府的工作人员，不是站在农民或地主的某一方面，而是根据上述基本原则，采取调节双方利益的方针。

（六）“三三制”政权，就是调节各抗日阶级内部关系的合理的政治形式。这一制度，必须在参议会系统中与政府系统中坚决的认真的普遍的实行。认为这一制度不过是一种敷衍党外人士的办法的那种观点，是不正确的。

（七）政府法令应有两方面的规定，不应畸轻畸重。一方面，要规定地主应该普遍的减租减息，不得抗不实行。另一方面，又要规定农民有交租交息的义务，不得抗不缴纳。一方面要规定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与财产所有权仍属于地主，地主依法有对自己土地出卖、出典、抵押，及作其他处置之权。另一方面，又要规定当地主作这些处置之时，必须顾及农民的生活。一切有关土地及债务的契约的

缔结，须依双方自愿，契约期满，任何一方有解约之自由。

(八) 抗日经费，除赤贫者外，一切阶级的人民均须按照累进的原则向政府交纳，不得畸轻畸重，不得抗拒不交。

(九) 减租减息实行之后，给予了提高农业生产的必要的前提，而农业生产是抗日根据地的主要的生产，党与政府的工作人员必须用最大力量推动发展之。政府应举行大量的农业贷款，以解决农民借贷的困难。

(十) 农救会的任务，在减租减息之前，主要的是协助政府实行减租减息的法令。在减租减息之后，主要的是协助政府调解农村纠纷与发展农业生产，而不是以自己的决定代替政府的法令，不是以农救代替政府。在调解农村纠纷的任务上，应取仲裁的方式，而不是专断的方式。在发展农业生产的任务上，应动员所有农救会员起模范的领导的作用。

(十一) 既然减租减息与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是我党土地政策的第一个方面，既然各根据地内尚有许多地方并未普遍的认真的彻底的实行减租减息，而其原因，不是地主抗不实行，就是党与政府的工作人员采取漠不关心与官僚主义的态度。因此，各根据地内党与政府的工作人员，必须对自己工作加以严格的检查，派员下乡分途巡视各地实行的程度，加以周密的调查研究，全盘的总结各地经验，发扬正确实行的例子，批评官僚主义的例子。须知发布口号、发布法令与实行口号、实行法令之间，是常常存在着很大的距离的，如不严惩官僚主义，反对右倾观点，就无法使口号法令见之实行。

(十二) 既然交租交息与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是我党土地政策的第二个方面，既然各根据地内曾经发生过忽视这

一方面的“左”倾错误，而其原因，不是农民不了解我党的土地政策，就是党与政府的工作人员也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我党的政策。为着防止今后重复这种错误，就必须在党内、在农民群众中明确的解释党的政策，使他们明白现在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是与内战时期的土地政策有根本区别的，使他们不限制于眼前的狭隘的利益，而应把眼前利益与将来利益联系起来，把局部利益与全民族利益联系起来。必须劝告农民，在实行减租减息与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之后，同时实行交租交息与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正如在减租减息与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的问题上，必须劝告地主不应该限制于眼前的狭隘的利益，而要顾及将来与全民族的利益，是一样的。

为《八路军军政》 杂志创刊三周年题词

(1942年1月)

准备反攻。

毛泽东

八路军军政

毛泽东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三周年的题词。

整顿党的作风^[1]

(1942年2月1日)

党校今天开学，我庆祝这个学校的成功。

今天我想讲一点关于我们的党的作风的问题。

为什么要有革命党？因为世界上有压迫人民的敌人存在，人民要推翻敌人的压迫，所以要有革命党。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说来，就需要一个如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如果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人民要想推翻敌人的压迫，简直是不可能的。我们是共产党，我们要领导人民打倒敌人，我们的队伍就要整齐，我们的步调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那末，敌人就不会被我们打倒。

现在我们的党还有什么问题呢？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是没有问题的，党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党有几十万党员，他们在领导人民，向着敌人作艰苦卓绝的斗争。这是大家看见的，是不能怀疑的。

那末，究竟我们的党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呢？我讲，还是有问题的，而且就某种意义上讲，问题还相当严重。

什么问题呢？就是有几样东西在一些同志的头脑中还显得不大正确，不大正派。

这就是说，我们的学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党风还有些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说。

不正的地方，我们的文风也有些不正的地方。所谓学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主观主义的毛病。所谓党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宗派主义的毛病。所谓文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党八股^[1]的毛病。这些作风不正，并不像冬天刮的北风那样，满天都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现在已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作风了，这不过是一股逆风，一股歪风，是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笑声）但是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一种风，是不好的。我们要把产生这种歪风的洞塞死。我们全党都要来做这个塞洞工作，我们党校也要做这个工作。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三股歪风，有它们的历史根源，现在虽然不是占全党统治地位的东西，但是它们还在经常作怪，还在袭击我们，因此，有加以抵制之必要，有加以研究分析说明之必要。

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

[1] 八股文是中国明、清封建皇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它内容空洞，专讲形式，玩弄文字。这种文章的每一个段落都要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党八股是指在革命队伍中某些人在写文章、发表演说或者做其他宣传工作的时候，对事物不加分析，只是搬用一些革命的名词和术语，言之无物，空话连篇，也和上述的八股文一样。

现在我来讲一讲主观主义。



1942年整风运动在全党开展起来。2月，毛泽东在延安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图为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印行的单行本。

主观主义是一种不正派的学风，它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它是和共产党不能并存的。我们要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所谓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

现在有些糊涂观念，在许多人中间流行着，例如关于什么是理论家，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理论和实际联系等等问题的糊涂观念。

我们首先要问，我们党的理论水平究竟是高还是低呢？近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翻译的多了，读的人也多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否就可以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已经是提得很高了呢？确实，我们的理论水平是比较过去高了一些。但是按照中国革命运动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二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一般地说来，我们的理论还不能够和革命实践相平行，更不去说理论应该跑到实践的前面去。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阶段。你们看，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我们究有多少人创造了可以称为理论的理论，算得科学形态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理论呢？特别是在经济理论方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一百年了，但是还没有产生一本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书。像在中国经济问题方面，能不能说理论水平已经高了呢？能不能说我党已经有了像样的经济理论家呢？实在不能说。我们读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能不能就算是有了理论家

呢？不能这样说。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根据实际创造出来的理论，从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中抽出来的总结论。我们如果仅仅读了他们的著作，但是没有进一步地根据他们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没有企图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我们就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如果我们身为中国共产党员，却对于中国问题熟视无睹，只能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的结论和个别的原理，那末，我们在理论战线上的成绩就未免太坏了。如果一个人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了，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样是不是就算得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呢？这还是不能算理论家的。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我们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假如要做这样的理论家，那就要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真正领会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学说，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样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家。

现在我们党的中央做了决定，号召我们的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这个责任是担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党校的同志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成死的教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

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现在我们的党校也要定这个规矩，看一个学生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怎样看中国问题，有看得清楚的，有看不清楚的，有会看的，有不会看的，这样来分优劣，分好坏。

其次讲一讲所谓“知识分子”的问题。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文化不发达，所以对于知识分子觉得特别宝贵。党中央在两年多以前作过一个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决定^[1]，要争取广大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是革命的，愿意参加抗日的，一概采取欢迎态度。我们尊重知识分子是完全应该的，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但是我们晓得，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于是有人说：“哈！你弄颠倒了，乱说一顿。”（笑声）但是，同志，你别着急，我讲的多少有点道理。

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此外还有什么知识呢？没有了。我们现在看看一些学生，看看那些同社会实际活动完全脱离关系的学校里面出身的学生，他们的状况是怎么样呢？一个人从那样的小学一直读

[1] 指193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即《大量吸收知识分子》。

到那样的大学，毕业了，算有知识了。但是他有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还没有参加任何实际活动，还没有把自己学得的知识应用到生活的任何部门里去。像这样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呢？我以为很难，因为他的知识还不完全。什么是比较完全的知识呢？一切比较完全的知识都是由两个阶段构成的：第一阶段是感性知识，第二阶段是理性知识，理性知识是感性知识的高级发展阶段。学生们的书本知识是什么知识呢？假定他们的知识都是真理，也是他们的前人总结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写成的理论，不是他们自己亲身得来的知识。他们接受这种知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必须知道，就一定的情况说来，这种知识对于他们还是片面性的，这种知识是人家证明了，而在他们则还没有证明的。最重要的，是善于将这些知识应用到生活和实际中去。所以我劝那些只有书本知识但还没有接触实际的人，或者实际经验尚少的人，应该明白自己的缺点，将自己的态度放谦虚一些。

有什么办法使这种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变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这样就可以达到目的。

我这样说，难免有些人要发脾气。他们说：“照你这样解释，那末，马克思也算不得知识分子了。”我说：不对。马克思不但参加了革命的实际运动，而且进行了革命的理论创造。他从资本主义最单纯的因素——商品开始，周密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商品这个东西，千百万人，天天看它，用它，但是熟视无睹。只有马克思科学地研究了它，他从商品的实际发展中作了巨大的研究工作，从普遍的存在中找出完全科学的理论来。他研究了自然，研究了历史，研究了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和

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这样，马克思就成了一个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最完全的知识分子，他和那些仅有书本知识的人有根本的区别。马克思在实际斗争中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概括了各种东西，得到的结论又拿到实际斗争中去加以证明，这样的工作就叫做理论工作。我们党内需要许多同志学做这样的工作。我们党内现在有大批的同志，可以学习从事于这样的理论研究工作，他们大都是聪明有为的人，我们要看重他们。但是他们的方针要对，过去犯过的错误他们不应重复。他们必须抛弃教条主义，必须不停止在现成书本的字句上。

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斯大林曾经说过，脱离实际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1]。空洞的理论是没有用的，不正确的，应该抛弃的。对于好谈这种空洞理论的人，应该伸出一个指头向他刮脸皮。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但是许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却把它看成是死的教条，这样就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

另一方面，我们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如果误用了他们的经验，也是要出毛病的。不错，这样的人往往经验很多，这是很可宝贵的；但是如果他们就以自己的经验为满足，那也很危险。他们须知自己的知识是偏于感性的或局部的，缺乏理性的知识和普遍的知识，就是说，缺乏理论，他们的知识也是比较地不完全。而要把革

[1] 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三部分《理论》。新的译文是：“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9～200页）

命事业做好，没有比较完全的知识是不行的。

这样看来，有两种不完全的知识，一种是现成书本上的知识，一种是偏于感性和局部的知识，这二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结合，才会产生好的比较完全的知识。

但是，我们的工农干部要学理论，必须首先学文化。没有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就学不进去。学好了文化，随时都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我幼年没有进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1]一套，这种学习的内容虽然陈旧了，但是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何况现在不是学的孔夫子，学的是新鲜的国语、历史、地理和自然常识，这些文化课学好了，到处有用。我们党中央现在着重要求工农干部学习文化，因为学了文化以后，政治、军事、经济哪一门都可学。否则工农干部虽有丰富经验，却没有学习理论的可能。

由此看来，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必须使上述两种人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面发展，必须使两种人互相结合。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两者都是主观主义，是从不同的两极发生的东西。

所以，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他们都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如果不注意，如果不知道这种片面性的缺点，并且力求改正，那就容易走上错误的

[1] 这是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语录《论语》的开头一句话。

道路。

但是在这两种主观主义中，现在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因为教条主义容易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把他们俘虏起来，充作自己的用人，而工农干部不易识破他们；也可以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我们如果把教条主义克服了，就可以使有书本知识的干部，愿意和有经验的干部相结合，愿意从事实际事物的研究，可以产生许多理论和经验结合的良好的工作者，可以产生一些真正的理论家。我们如果把教条主义克服了，就可以使有经验的同志得着良好的先生，使他们的经验上升成为理论，而避免经验主义的错误。

除了对于“理论家”和“知识分子”存在着糊涂观念而外，还有天天念的一句“理论和实际联系”，在许多同志中间也是一个糊涂观念。他们天天讲“联系”，实际上却是讲“隔离”，因为他们并不去联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

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

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地对他说，你的教条一点什么用处也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经反复地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些人偏偏忘记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话。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如果只是口头上讲联系，行动上又不实行联系，那末，讲一百年也还是无益的。我们反对主观地片面地看问题，必须攻破教条主义的主观性和片面性。

关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全党的学风的问题，今天讲的就是这些。

现在我来讲一讲宗派主义的问题。

由于二十年的锻炼，现在我们党内并没有占统治地位的宗派主义了。但是宗派主义的残余是还存在的，有对党内的宗派主义残余，也有对党外的宗派主义残余。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铲除这两方面的祸根，才能使党在团结全党同志和团结全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畅行无阻。

什么是党内宗派主义的残余呢？主要的有下面几种：

首先就是闹独立性。一部分同志，只看见局部利益，不看见全体利益，他们总是不适当当地特别强调他们自己所管的局部工作，总

希望使全体利益去服从他们的局部利益。他们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他们忘记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张国焘是向党中央闹独立性的，结果闹到叛党，做特务去了。现在讲的，虽然不是这种极端严重的宗派主义，但是这种现象必须预防，必须将各种不统一的现象完全除去。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

闹这类独立性的人，常常跟他们的个人第一主义分不开，他们在个人和党的关系问题上，往往是不正确的。他们在口头上虽然也说尊重党，但他们在实际上却把个人放在第一位，把党放在第二位。刘少奇同志曾经说过，有一种人的手特别长，很会替自己个人打算，至于别人的利益和全党的利益，那是不大关心的。“我的就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大笑）这种人闹什么东西呢？闹名誉，闹地位，闹出风头。在他们掌管一部分事业的时候，就要闹独立性。为了这些，就要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资产阶级政党的庸俗作风也搬进共产党里来了。这种人的吃亏在于不老实。我想，我们应该是老老实实地办事；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实态度是根本不行的。什么人是老实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是老实人，科学家是老实人。什么人是不老实的人？托洛茨基、布哈林、陈独秀、张国焘是大不老实的人，为个人利益为局部利益闹独立性的人也是不老实的人。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态度办事的人，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很聪明，其实都是最蠢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我们党校的学生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集中的统一的党，一切无原则的派别

斗争，都要清除干净。要使我们全党的步调整齐一致，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我们一定要反对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

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必须团结，必须反对宗派主义倾向。因为许多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新四军到后才创立的，许多地方工作是外来干部去后才发展的，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必须加以很好的注意。我们的同志必须懂得，在这种条件下，只有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完全团结一致，只有本地干部大批地生长了，并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我党在根据地内才能生根，否则是不可能的。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必须互相取长补短，才能有进步。外来干部比较本地干部，对于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这些方面，总要差些。拿我来说，就是这样。我到陕北已经五六年了，可是对于陕北的情况的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联系，和一些陕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得多。我们到山西、河北、山东以及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同志，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不但如此，即在一个根据地内部，因为根据地内的各个区域有发展先后之不同，干部中也有外来本地之别。比较先进区域的干部到比较落后的区域去，对于当地，也是一种外来干部，也要十分注意扶助本地干部的问题。就一般情形说来，凡属外来干部负领导责任的地方，如果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弄得不好，那末，这个责任主要地应该放在外来干部的身上。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同志，其责任就更大些。现在各地对这个问题的注意还很不够，有些人轻视本地干部，讥笑本地干部，他们说：“本地人懂得什么，土包子！”这种人完全不懂得本地干部的重要性，他们既不了解本地干部的长处，也不了解自己的短处，采取了不正确的宗派主义的态度。一切外来干部一定要爱护本地干部，经常帮助他们，而不许可讥笑他们，打击他们。自然，本地干部也

必须学习外来干部的长处，必须去掉那些不适当的狭隘的观点，以求和外来干部完全不分彼此，打成一片，而避免宗派主义倾向。

军队工作干部和地方工作干部的关系也是如此。两者必须完全团结一致，必须反对宗派主义的倾向。军队干部必须帮助地方干部，地方干部也必须帮助军队干部。如有纠纷，应该双方互相原谅，而各对自己作正确的自我批评。在军队干部事实上居于领导地位的地方，在一般的情形之下，如果和地方干部的关系弄不好，那末，主要的责任应该放在军队干部的身上。必须使军队干部首先懂得自己的责任，以谦虚的态度对待地方干部，才能使根据地的战争工作和建设工作得到顺利进行的条件。

几部分军队之间、几个地方之间、几个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必须反对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本位主义的倾向。谁要是对别人的困难不管，别人要调他所属的干部不给，或以坏的送人，“以邻为壑”，全不为别部、别地、别人想一想，这样的人就叫做本位主义者，这就是完全失掉了共产主义的精神。不顾大局，对别部、别地、别人漠不关心，就是这种本位主义者的特点。对于这样的人，必须加重教育，使他们懂得这就是一种宗派主义的倾向，如果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问题。抗战以来，我党有广大的发展，大批新干部产生了，这是很好的现象。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老干部通常总是不多，比所需要的的数量少，而且由于宇宙自然法则的关系，他们已部分地开始衰老死亡下去。”他在那里讲了干部状况，又讲了自然科学。我们党如果没有广大的新干部同老干部一致合作，我们的事业就会中断。所以一切老干部应该以极大的热忱欢迎新干部，关心新干部。

不错，新干部是有缺点的，他们参加革命还不久，还缺乏经验，他们中的有些人还不免带来旧社会不良思想的尾巴，这就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残余。但是这些缺点是可以从教育中从革命锻炼中逐渐地去掉的。他们的长处，正如斯大林说过的，是对于新鲜事物有敏锐的感觉，因而有高度的热情和积极性，而在这一点上，有些老干部则正是缺乏的^[1]。新老干部应该是彼此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以便团结一致，进行共同的事业，而防止宗派主义的倾向。在老干部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地方，在一般情形之下，如果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弄得不好，那末，老干部就应该负主要的责任。

以上所讲的局部和全体的关系，个人和党的关系，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关系，军队和军队、地方和地方、这一工作部门和那一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都是党内的相互关系。在这种种方面，都应该提高共产主义精神，防止宗派主义倾向，使我们的党达到队伍整齐，步调一致的目的，以利战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整顿党的作风，必须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我们如果不不要主观主义，要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就必须扫除党内宗派主义的残余，以党的利益高于个人和局部的利益为出发点，使党达到完全团结统一的地步。

宗派主义的残余，在党内关系上是应该消灭的，在党外关系上也是应该消灭的。其理由就是：单是团结全党同志还不能战胜敌人，必须团结全国人民才能战胜敌人。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全国人民

[1] 参见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第3部分第2节。（《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0页）

的事业上，二十年来做了艰苦的伟大的工作；抗战以来，这个工作的成绩更加伟大。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所有的同志对待人民群众都有了正确的作风，都没有有了宗派主义的倾向。不是的。在一部分同志中，确实还有宗派主义的倾向，有些人并且很严重。我们的许多同志，喜欢对党外人员妄自尊大，看人家不起，藐视人家，而不愿尊重人家，不愿了解人家的长处。这就是宗派主义的倾向。这些同志，读了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之后，不是更谦虚，而是更骄傲了，总是说人家不行，而不知自己实在是一知半解。我们的同志必须懂得一条真理：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员相比较，无论何时都是占少数。假定一百个人中有一个共产党员，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中就有四百五十万共产党员。即使达到这样大的数目，共产党员也还是只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非党员。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和非党人员合作呢？对于一切愿意同我们合作以及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我们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一部分党员却不懂得这个道理，看不起愿意同我们合作的人，甚至排斥他们。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给了我们这样的根据吗？没有。相反地，他们总是谆谆告诫我们，要密切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中国共产党中央给了我们这个根据吗？没有。中央的一切决议案中，没有一个决议说是我们可以脱离群众使自己孤立起来。相反地，中央总是叫我们密切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所以，一切脱离群众的行为，并没有任何的根据，只是我们一部分同志自己造出来的宗派主义思想在那里作怪。因为这种宗派主义在一部分同志中还很严重，还在障碍党的路线的实行，所以我们要针对这个问题在党内进行广大的教育。首先要使我们的干部真正懂得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使他们懂得共产党员如果不同党外干部、党外人员互相联合，敌

人就一定不能打倒，革命的目的就一定不能达到。

一切宗派主义思想都是主观主义的，都和革命的实际需要不相符合，所以反对宗派主义和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应当同时并进。

关于党八股的问题，今天不能讲了，准备在另外一个会议上来讨论。党八股是藏垢纳污的东西，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害人的，不利于革命的，我们必须肃清它。

我们要反对主观主义，就要宣传唯物主义，就要宣传辩证法。但是我们党内还有许多同志，他们并不注重宣传唯物主义，也不注重宣传辩证法。有些同志听凭别人宣传主观主义，也安之若素。这些同志自以为相信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却不努力宣传唯物主义，听了或看了主观主义的东西也不想一想，也不发议论。这种态度不是共产党员的态度。这使得我们许多同志蒙受了主观主义思想的毒害，发生麻木的现象。所以我们要在党内发动一个启蒙运动，使我们同志的精神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间解放出来，号召同志们对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加以抵制。这些东西好像日货，因为只有我们的敌人愿意我们保存这些坏东西，使我们继续受蒙蔽，所以我们应该提倡抵制，就像抵制日货^[1]一样。一切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货色，我们都要抵制，使它们在市场上销售困难，不要让它们利用党内理论水平低，出卖自己那一套。为此目的，就要同志们提高嗅觉，就要同志们对于任何东西都用鼻子嗅一嗅，鉴别其好坏，然后才决定欢迎它，或者抵制它。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

[1] 抵制日货是中国人民在20世纪上半叶所常常采取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一种斗争方法。例如，在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时期、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人民都曾经进行过抵制日货的运动。

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最后，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一个人发了阑尾炎，医生把阑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

趁着今天党校开学的机会，我讲了这许多话，希望同志们加以考虑。（热烈的鼓掌）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

给周文^[1]的信

(1942年2月1日)

周文同志：

来信收到，并已转中宣部、解放报^[2]各同志阅。你的意见^[3]很对，我们正着手改革，并准备专为此事开一次干部会。此复。
敬礼！

毛泽东

二月一日

望你向解放报写些关于此问题的文章，打击党八股与新文言。

[1] 周文，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

[2] 指延安《解放日报》。

[3] 可能是指周文关于改革文风的建议。

给各地党部及军队负责人的通知^[1]

(1942年2月2日)

中央现对若干重要问题正在研究，准备在二、三两个月内作成决定或指示发到各地，以便各地同志对于讨论与传达有所准备。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给各地党部及军队负责人的通知的主要内容。

复彭德怀电^[1]

(1942年2月3日)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今年可以解决，并在去年打下了基础。今年更有计划地组织了人民的、部队的及机关学校的劳动，生产运动可能向上发展，在不受灾的条件下不需外援。八路军前方拟支援边区的布匹、火柴等，可不必送来。银行较去年为好，边币已稳定，二元二角合一元法币，此间不能禁止法币。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复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中央关于如何执行 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

(1942年2月4日)

(一) 一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所通过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及其三个附件，是综合五年来各地经验而得的结论。他的基本精神是先要能够把广大农民群众发动起来，如果群众不能起来，则一切无从说起。在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后，又要让地主能够生存下去。所以在经济上只是削弱（但一定要削弱）封建势力，而不是消灭封建势力，对富农则是削弱其封建部分而奖励其资本主义部分。在经济上，目前我党的政策，以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为主，但同时保存地主的若干权利，可以说是一个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政策。在政治上，则实行三三制，使地主资产阶级觉得还有前途。所有这些，都是为着拆散地主资产阶级与敌人及顽固派的联合，争取地主资产阶级的大多数站在抗日民主政权方面，而不跑到敌人与顽固派方面去，跑去了的，也可以争取回来。

(二) 联合地主抗日，是我党的战略方针。但在实行这个战略方针时，必须采取先打后拉，一打一拉，打中有拉，拉中有打的策略方针。当广大群众还未发动起来的时候，一般地主阶级是坚决反对减租减息与民主政治的。在这种时候，我们必须积极帮助群众打击地主的反动，摧毁地主阶级在农村中的反动统治，确立群众力量的

优势，才能使地主阶级感觉除了服从我们的政策便不能保持他们的利益，便无其他出路。在这种广大群众的热烈斗争中，不可避免的要发生一些过左行动，而这些过左行动，如果真正是最广大群众自愿自觉的行动，而不是少数人脱离群众蛮干的（这是绝对不许可的原则问题），则不但无害，而且有益，因为可以达到削弱封建势力发动群众之目的。在这种时候，畏首畏尾，束缚群众手足，就是右倾错误，这是策略斗争的第一阶段（打的阶段）。但是这个阶段应被联合抗日的战略方针所限制，不能拖得过长，不能听其自然发展下去，以致使地主阶级跑到敌顽方面坚决反对我们，或跑去了也不愿回来，妨害抗日战争与妨害根据地的巩固。因此，党的策略，不是在事先限制这些过左行动不发生，以致妨害群众之充分发动与充分起来，而是在群众已经充分发动充分起来之后，能够及时的说服群众，纠正过左行动，给予地主以交租交息及政治上的三三制，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使其感恩怀德，愿与我们合作，达到团结抗战之战略目的，这就是策略斗争的第二阶段（拉的阶段）。在策略斗争的第一阶段中，也不是一切打倒，而是争取一部分倾向我们的地主（打中有拉），中立（麻痹）一部分动摇不定的地主，集中火力打击一部分最顽固的地主（但与内战时期打击地主的内容与形式都不相同）。在策略斗争的第二阶段中，我们必须极力表示宽大，认真实行三三制与交租交息，认真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公开批评自己内部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纠正过火行动。在这种时候，如不着重说服党员，说服农民，争取地主，就不能拆散地主与敌顽的联合，就有使我党与农民陷于孤立以至失败的危险。但在纠正过火行动与作自我批评中，必须同时注意到保护干部与群众的积极性、热烈情绪或热气，须知我们正确地批

评过火行动与宗派主义，决不是向这种热气泼冷水，以致造成干部消极，群众失望，地主反攻的局面。在正常的斗争过程中，应该有一个酝酿斗争的准备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地主过〈还〉是优势，农民还正在准备斗争。如果把这个作为第一阶段，则实行斗争（打）为第二阶段，团结抗日（拉）为第三阶段。在晋察冀区域，除了雁北及平西两区尚未普遍与彻底按照党的政策解决土地问题以外，其他基本区域是都经过了酝酿、斗争、团结这样三个阶段的，这是最正常的策略模范。在其他若干根据地中，也有这种模范。所有这些，都是为着执行联合抗日这个战略方针的总过程中，应该极力注意的策略阶段。

（三）各地过去在执行土地政策中所发生的过左错误，大体已经纠正。在今天，一切为广大群众所拥护，而地主又已不生严重争议的事件，应作为已经解决，不再变动，维持良好的抗日秩序。但对三三制之没有彻底实行及地主农民间尚有重大争议的事件，仍须着重纠正错误。

（四）目前严重的问题，是有许多地区并没有认真实行发动群众向地主的斗争，党员与群众的热气，都未发动与组织起来，这是严重的右倾错误。这种错误，不但在较差的根据地中，是严重存在着，就是在最好的根据地中，亦有一部分区域尚未实行减租减息与发动群众斗争。因此，目前应当强调反对这种右倾，要求一切没有实行减租减息，没有发动群众热情的地区，在广大农民群众自愿自觉而不是少数人包办蛮干的基础之上，迅速实行减租减息，迅速把群众热情发动起来。各地党部必须检查这一问题，对此问题如有某些人采取漠不关心与官僚主义的态度，就须向他指明加以纠正。

（五）在农民已经充分发动彻底执行了减租减息，经过了打的阶

段，因而进入了拉的阶段的地区，由于我们开展自我批评，纠正过火行动，彻底实行三三制与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地主阶级必然要抓住新政策之有利于己的方面，加以扩大，和农民作斗争。由于今天根据地内部在此阶段（拉的阶段）内，各阶级的争议只能采取民主的合法的说理的方式去进行，而文化落后的农民群众甚至区村干部，遂容易被老奸巨猾的地主所欺骗，或被地主收买操纵区村政权，或被地主打击而不敢回击。因此必须教育县区村三级干部，学会与地主作合法斗争的本领，熟习政府的法令，熟习拉中有打的策略，以便对付某些奸猾地主的无理进攻，同时须防止被收买。

（六）减租是减今后的，不是减过去的，减息则是减过去的，不是减今后的，大体上以抗战前后为界限。在减息问题上，第一，应当允许农民清算旧账（包括算公账与算私账），以此作为发动群众的手段。到了群众已经充分发动，才把双方争论加以调停，使归平息。第二，抗战以后，是借不到钱的问题，不是限制息额的问题。各根据地，都未认清这个道理，强制规定今天息额不得超过一分或一分半，这是害自己的政策。今后应该听任农村自由处理、不应规定息额。目前农村只要有借贷，即使利息是三分四分，明知其属于高利贷性质，亦于农民有济急之益。同时政府每年的建设费中，应以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投于农村，作为对农民的低利贷款（包括合作社贷款在内），以发展各根据地的基本的农业经济。而只以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投于公营工商业及私人商业。须知发展农业不但是农民的利益，而且就是扩大政府税收的最大与最可靠的来源，就是解决财政问题基本政策。

（七）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决定及其三个附件，都已公开发表，各地应即公布，广为宣传，认真实行。这是我党在新民主

主义革命阶段的长时期的土地政策，不但今天必须实行，而且还有很长时期要实行的。至于本指示，则是专门对党内的，不得公开发表。每一根据地内，应利用会议党校及文电，使党的基本干部懂得中央的战略与策略方针，然后经过他们，使下级干部懂得，使这种具体的策略教育确实收到成效。



延安整风运动期间的毛泽东和徐特立。

以集资料写名人列传^[1]

(1942年2月4日)

周：

(一) 黄炎培^[2]传写得很好，很有用处。(二) 望推动研究局收集材料写名人列传，如能对党、政、军、学、财、经、报、教各界深入调查，写一千个名人列传，必有大益。

毛泽东

四日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写名人列传事致周恩来的电报。

[2] 黄炎培，1941年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被推选为主席，同年10月辞去主席职务。

15号

084

周 情大行軍行軍
用兵以智行之。請收蘇
聯軍人列傳，如將對立政軍制
統報效行軍深入調查寫一冊
名列傳，有燈。印成的。

二月
四一二〇〇

2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手稿。

中共中央关于 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决定的附件*

(1942年2月6日)

由于各根据地情况不同及在一根据地内情况亦有不同者，故关于解决土地问题的具体办法，不能统一施行整齐划一的制度。中央在关于土地政策决定内规定了统一施行的原则，而在本附件内则根据此种原则提出具体办法，以供各地采用。本附件内所列各项，凡与各地实际情况相合者，均应坚决执行之。其有不合情况而须变通办理者，各地得加以变通，惟须将变通之点报告中央，并取得中央之批准。

附件一 关于地租及佃权问题

(一) 一切尚未实行减租的地区，其租额以减租低原租额百分之二十五（二五减租）为原则，即照抗战前租额减低百分之二十五，不论公地、私地、佃租地、伙种地，也不论钱租制、物租制、活租制、定租制，均适用之。各种不同形式的伙种地，不宜一律规定为依地主所得不超过十分之四，或十分之六，应依业佃双方所出劳动力、牛力、农具、肥料、种子及食粮之多寡，按原来租额比例，减低百分之二十五。在游击区及敌占点线附近，可比二五减租还少一

点。只减二成、一成五或一成，以能相当发动农民抗日的积极性及团结各阶层抗战为目标。

(二) 地租一律于产物收获后交纳，出租人不得向承租人预收地租。并不得索取额外报酬。

(三) 定租(铁租)，因天灾人祸，其收成之全部或大部被毁时，得停付或减付地租。

(四) 多年欠租，应予免交。

(五) 公粮公款，按累进原则，由业佃双方负担。土地税，由土地所有者负担之。

(六) 地租原约定以货币支付者，因纸币跌价而发生争议时，政府应召集业佃双方协议调解，并得将货币地租之一部或全部，改为实物地租。

(七) 如设有评租委员会等调解机关的地方，须有农民地主政府三方代表参加，但政府有最后决定权。

(八) 在租佃契约上及习惯上有永佃权者，应保留之。无永佃权者，不应强迫规定。但可奖励双方订立较长期的契约，例如五年以上，俾农民得安心发展生产。

(九) 无永佃权之地及契约期满之地，出租人有依约处置之自由，包括转让、出典、出卖、自耕，及雇人耕种等项在内。但在抗战期间，地主收地，应顾及农民生活，并须于收获前三个通知承佃人。原承佃人太穷苦者，应由政府召集双方加以调剂，或延长佃期，或只退佃一部。

(十) 出租人于契约期满，招人承佃或出典出卖时，原承租人同等条件有承佃承典承买之优先权。

(十一) 出租人出卖有永佃权或契约期限未满之地，原承租人

继续佃耕之权，非原约期满，新主不得另佃他人。

(十二) 承租人在二年内无故不耕，或力能付租而故意不付者，出租人有收回土地之权。

附件二 关于债务问题

(一) 减息是对于抗战前成立的借贷关系，为适应债务人的要求，并为团结债权人一致抗日起见，而实行的一个必要政策，应以一分半为计息标准。如付息超过原本一倍者，停利还本，超过原本二倍者，本利停付。至于抗战后的息额，应以当地社会经济关系，听任民间自行处理，政府不应规定过低息额，致使借贷停滞，不利民生。

(二) 债权人不得因减息而解除借贷契约，债务人亦不得在减息后拒不交息，债权人有依法诉追债务之权。

(三) 凡抗战后新成立的借贷关系，债务人到期不能付息还本，债权人有依约处理抵押品之权。如有争议，由政府判处。同一抵押品而担保数债权者，其卖得之价格，按各债权契约先后，依次并比例清偿之。抵押品如为土地（押地），照此办理。

(四) 凡典地尚未转成买卖关系者，出典人随时可用原典价依约赎回土地，不得用抽地换约的办法。如已转成买卖关系者，不得赎回。因纸币跌价而在赎回典地时所生之争议，由政府调处之。

(五) 凡抗战后成立的借贷关系，因天灾人祸及其他不可抗之原因，债务人无力履行契约时，得请求政府调处，酌量减息，或免息本。

(六) 因纸币跌价，债务人用纸币还债而生之争议，由政府适当

调处之。

附件三 关于若干特殊土地的处理问题

(一) 凡罪大恶极之汉奸的土地，应予没收，归政府管理，租给农民耕种，以示惩罚。其家属如未参加此种汉奸活动，或其情节较轻者，不在此例。

(二) 被迫汉奸的土地不应没收，以示宽大，争取其悔过自新。无人管理者，由政府代管，租给农民耕种，俟其回家抗日，即发还之。

(三) 凡逃亡地主，不论其逃至何处，其土地不得没收。无人管理着，由政府代管，招人耕种，并保存其应得地租，代交田赋公粮。原主回家时，将其土地及应得地租一并发还之。

(四) 凡没有税过契或没有纳过税的黑地，不许没收，而限期责令业主税契纳粮。如逾期仍不税契不纳粮时，由政府给予相当的处罚。

(五) 族地、社地，由本族本社人员组织管理委员会管理之，以其收入作为本族本社或本地公益事业之用。

(六) 学地留作教育经费，由政府或本地人员组织教育基金管理委员会管理之。

(七) 宗教土地（基督教、佛教、回教、道教及其他教派的土地），均不变动。

(八) 公荒，由政府分配给抗属、难民、贫农开垦，并归其所有。在一定期限内，免除或减少其税收。

(九) 私荒，不论生荒熟荒，应先尽业主开垦。如业主无力开垦

任其荒芜时，政府得招人开垦，并在一定期限内，免除或减少其租税。土地所有权仍属于原主，但开垦者有永佃权。

延安观察家之评论*

(1942年2月6日)

这不但是中国共产党所提倡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新民主主义在经济方面的具体化；而且是孙中山先生的土地政策、农民政策，在如此广阔地区上的首先实现。重庆各大报纸、杂志现正连篇累牍讨论土地问题，去年十二月国民党九中全会，并决定成立土地政会。中共中央适于此时公布这个文件，将给他们作一个很好的参考。特别有兴趣的一点，就是中共中央在其决定的附件中，规定减租，依照抗战前原定减去百分之二十五为原则，此与大多数国民党人所主张的二五减租，并无二致。按国民政府于十九年三月三十日所公布的减去谷物收获总额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并规定于二十五年三月一日施行；二十一年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的保障佃农办法原则，又重申此义。这些法令，虽为广大的农民与公正人士及很多三民主义信徒所拥护，可惜直到抗战以后，还只有中国共产党坚决加以执行。中共中央方面认为欲求团结全国各阶级，举行战略反攻，彻底战胜日寇，除军事上、政治上加以改革外，惟有采取合理的土地政策，取得农民群众的赞助，才能达到此目的云。

延安评论家称两年内击溃日寇*

(1942年2月6日)

中国人民除汉奸外，莫不认抗战为上策，当今惟有抗战一途挽救中国出于危亡。日本法西斯亦知中国已有共产党，但彼等应知明末还没有共产党，其时并且还没有国民党，还没有苏联，还没有丘吉尔、罗斯福，故明末满洲可以亡明，当今之日寇决不能亡中国。有一中国共产党存在，即决不许日寇逞其阴谋，何况还有全中国爱国人民与爱国党派，还有无敌的苏联与强大的英美。日寇在南太平洋的胜利，正是日寇崩溃的前奏，盖伴随其胜利而来者，乃是其力量的分散与消耗。日寇的短脚已经拉长了，并且还要拉长，愈长则愈瘦，只须两个年头，日寇就会被击溃。全中国人民正在警戒日寇的诱降阴谋，无论如何要坚持两年的抗战，两年内不但日本，整个法西斯都要塌台的。

反对党八股^[1]

(1942年2月8日)

刚才凯丰同志讲了今天开会的宗旨。我现在想讲的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怎样拿党八股做它们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以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它们还可以躲起来。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2]，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

一个人写党八股，如果只给自己看，那倒还不要紧。如果送给第二个人看，人数多了一倍，已属害人不浅。如果还要贴在墙上，或付油印，或登上报纸，或印成一本书，那问题可就大了，它就可以影响许多的人。而写党八股的人们，却总是想写给许多人看的。这就非加以揭穿，把它打倒不可。

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我们为什么又叫它做党八股呢？这是因为它除了洋气之外，还有一点

[1]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的讲演。

[2] “将一军”是中国象棋中的术语。中国象棋采取两军对战的形式，而以一方攻入对方堡垒捉住“将军”（主帅）作为赢棋。凡是一方走了一着棋，使对方的将军有立即被捉的危险时，就叫做向对方“将军”。

土气。也算一个创作吧！谁说我们的人一点创作没有呢？这就是一个！（大笑）

党八股在我们党内已经有了一个长久的历史；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有时竟闹得很严重。

从历史来看，党八股是对于五四运动的一个反动。

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总之，那时统治阶级及其帮闲者们的文章和教育，不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条式的。这就是老八股、老教条。揭穿这种老八股、老教条的丑态给人民看，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老八股、老教条，这就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个极大的功绩。五四运动还有和这相联系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大功绩；这个反对老八股、老教条的斗争，也是它的大功绩之一。但到后来就产生了洋八股、洋教条。我们党内的一些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则发展这种洋八股、洋教条，成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东西。这些就是新八股、新教条。这种新八股、新教条，在我们许多同志的头脑中弄得根深蒂固，使我们今天要进行改造工作还要费很大的气力。这样看来，“五四”时期的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反对封建主义的老八股、老教条的运动，后来被一些人发展到了它的反面，产生了新八股、新教条。它们不是生动活泼的东西，而是僵硬的东西了；不是前进的东西，而是后退的东西了；不是革命的东西，而是阻碍革命的东西了。这就是说，洋八股或党八股，是五四运动本来性质的反动。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

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但在共产党内也不是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发生偏向，马克思主义没有拿得稳，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这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是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这样看来，党八股这种东西，一方面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因素的反动，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或发展，并不是偶然的东西。我们懂得这一点是有好处的。如果“五四”时期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是革命的和必需的，那末，今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来批判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也是革命的和必需的。如果“五四”时期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独立的希望。这个工作，五四运动时期还不过是一个开端，要使全国人民完全脱离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统治，还须费很大的气力，还是今后革命改造路上的一个大工程。如果我们今天不反对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则中国人民的思想又将受另一个形式主义的束缚。至于我们党内一部分（当然只是一部分）同志所中的党八股的毒，所犯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如果不除去，那末，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没有了。

能启发，拿不正确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恶习就不能肃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而对于老八股和老教条在全国人民中间的影响，以及洋八股和洋教条在全国许多人中间的影响，也就不能进行有力的斗争，也就达不到加以摧毁廓清的目的。

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种东西，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而是剥削阶级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在我们党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节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它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洋八股，或党八股。

要做对于这些东西的肃清工作和打扫工作，是不容易的。做起来必须得当，就是说，要好好地说理。如果说理说得好，说得恰当，那是会有效力的。说理的首先一个方法，就是重重地给患者者一个刺激，向他们大喝一声，说：“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

现在来分析一下党八股的坏处在什么地方。我们也仿照八股文章的笔法来一个“八股”，以毒攻毒，就叫做八大罪状吧。

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那里还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负幼稚的人，在他们中间散布坏影响，造成坏习惯。去年六月二十二日，苏联进行那么大的反侵略战争，

斯大林在七月三日发表了一篇演说，还只有我们《解放日报》一篇社论那样长。要是我们的老爷写起来，那就不得了，起码得有几万字。现在是在战争的时期，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延安虽然还没有战争，但军队天天在前方打仗，后方也换工作忙，文章太长了，有谁来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欢写长报告。他们辛辛苦苦地写了，送来了，其目的是要我们看的。可是怎么敢看呢？长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么？也不好。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但是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或者有人要说：《资本论》不是很长的吗，那又怎么办？这是好办的，看下去就是了。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又说：“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文章和演说也是这样。我们反对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调，不是说任何东西都以短为好。战争时期固然需要短文章，但尤其需要有内容的文章。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演说也是一样，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演说，是必须停止的。

党八股的第二条罪状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有些党八股，不只是空话连篇，而且装样子故意吓人，这里面包含着很坏的毒素。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还可以说是幼稚；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鲁迅曾经批评过这种人，他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¹¹科学的东西，随便什么时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评的，因为科学是真理，决不怕人家驳。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东西，表现在党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却生怕人家

[1] 这是鲁迅《南腔北调集》中一篇文章的篇名，1932年作。（《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1页）

驳，非常胆怯，于是就靠装样子吓人；以为这一吓，人家就会闭口，自己就可以“得胜回朝”了。这种装腔作势的东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害真理的。凡真理都不装样子吓人，它只是老老实实地说下去和做下去。从前许多同志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常常有两个名词：一个叫做“残酷斗争”，一个叫做“无情打击”。这种手段，用了对付敌人或敌对思想是完全必要的，用了对付自己的同志则是错误的。党内也常常有敌人和敌对思想混进来，如《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第四条所说的那样。对于这种人，毫无疑问地是应该采用残酷斗争或无情打击的手段的，因为那些坏人正在利用这种手段对付党，我们如果还对他们宽容，那就会正中坏人的奸计。但是不能用同一手段对付偶然犯错误的同志；对于这类同志，就必须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这就是《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第五条所说的方法。从前我们那些同志之所以向这些同志也大讲其“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一方面是没有分析对象，一方面就是为着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论对什么人，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因为这种吓人战术，对敌人是毫无用处，对同志只有损害。这种吓人战术，是剥削阶级以及流氓无产者所惯用的手段，无产阶级不需要这类手段。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至于以装腔作势来达到名誉和地位的目的，那更是卑劣的念头，不待说的了。总之，任何机关做决定，发指示，任何同志写文章，做演说，一概要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要靠有用。只有靠了这个才能争取革命胜利，其他都是无益的。

党八股的第三条罪状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早几年，在延

安城墙上，曾经看见过这样一个标语：“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争取抗日胜利。”这个标语的意思并不坏，可是那工人的工字第二笔不是写的一直，而是转了两个弯子，写成了“互”字。人字呢？在右边一笔加了三撇，写成了“𠂇”字。这位同志是古代文人学士的学生是无疑的了，可是他却要写在抗日时期延安这地方的墙壁上，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大概他的意思也是发誓不要老百姓看，否则就很难得到解释。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许多人常常以为自己写的讲的人家都看得很懂，听得很懂，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他写的和讲的是党八股，人家哪里会懂呢？“对牛弹琴”这句话，含有讥笑对象的意思。如果我们除去这个意思，放进尊重对象的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讥笑弹琴者这个意思了。为什么不看对象乱弹一顿呢？何况这是党八股，简直是老鸦声调，却偏要向人民群众哇哇地叫。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吗？我们和无论什么人做朋友，如果不懂得彼此的心，不知道彼此心里面想些什么东西，能够做成知心朋友吗？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

党八股的第四条罪状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1]。上海人叫小瘪三的那批角色，也很像我们的党八股，干瘪得很，样子十分难看。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

[1] 解放以前，上海人称城市中无正当职业而以乞讨为生的游民为瘪三，他们通常是极瘦的。

憎，像个瘪三吗？一个人七岁入小学，十几岁入中学，二十多岁在大学毕业，没有和人民群众接触过，语言不丰富，单纯得很，那是难怪的。但我们要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语言，那就办不好。现在我们有许多做宣传工作的同志，也不学语言。他们的宣传，乏味得很；他们的文章，就没有多少人欢喜看；他们的演说，也没有多少人欢喜听。为什么语言要学，并且要用很大的气力去学呢？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我们不是硬搬或滥用外国语言，是要吸收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于我们适用的东西。因为中国原有语汇不够用，现在我们的语汇中就有很多是从外国吸收来的。例如今天开的干部大会，这“干部”两个字，就是从外国学来的。我们还要多多吸收外国的新鲜东西，不但要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们的新鲜用语。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由于我们没有努力学习语言，古人语言中的许多还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这是确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现在中党八股毒太深的人，对于民间的、外国的、古人的语言中有用的东西，不肯下苦功去学，因此，群众就不欢迎他们枯燥无味的宣传，我们也不需要这样蹩脚的不中用的宣传家。什么是宣传家？不但教员是宣传家，新闻记者是宣传家，文艺作者是宣传家，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也都是宣传家。比如军事指挥员，他

们并不对外发宣言，但是他们要和士兵讲话，要和人民接洽，这不是宣传是什么？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只要他不是哑巴，他就总有几句话要讲的。所以我们的同志都非学习语言不可。

党八股的第五条罪状是：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你们去看一看中药铺，那里的药柜子上有许多抽屉格子，每个格子上面贴着药名，当归、熟地、大黄、芒硝，应有尽有。这个方法，也被我们的同志学到了。写文章，做演说，著书，写报告，第一是大壹貳叁肆，第二是小一二三四，第三是甲乙丙丁，第四是子丑寅卯，还有大ABCD，小abcd，还有阿拉伯数字，多得很！幸亏古人和外国人替我们造好了这许多符号，使我们开起中药铺来毫不费力。一篇文章充满了这些符号，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不表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说来说去还是一个中药铺，没有什么真切的内容。我不是说甲乙丙丁等字不能用，而是说那种对待问题的方法不对。现在许多同志津津有味于这个开中药铺的方法，实在是一种最低级、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是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来分类，不是按照事物的内部联系来分类的。单单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使用一大堆互相没有内部联系的概念，排列成一篇文章、一篇演说或一个报告，这种办法，他自己是在做概念的游戏，也会引导人家都做这类游戏，使人不用脑筋想问题，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质，而满足于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既有问题，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你就得把问题提出来。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

题的过程。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地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这里所讲的分析过程，是指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常常问题是提出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因为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因而问题的面貌还不明晰，还不能做综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决问题。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这样，就不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能济事。因为这种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筋的形式主义的方法，在我们党内很流行，所以必须揭破它，才能使大家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所办的事才能办好，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胜利。

党八股的第六条罪状是：不负责任，到处害人。上面所说的那些，一方面是由于幼稚而来，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责任心不足而来的。拿洗脸作比方，我们每天都要洗脸，许多人并且不止洗一次，洗完之后还要拿镜子照一照，要调查研究一番，（大笑）生怕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你们看，这是何等地有责任心呀！我们写文章，做演说，只要像洗脸这样负责，就差不多了。拿不出来的东西就不要拿出来。须知这是要去影响别人的思想和行动的啊！一个人偶然一天两天不洗脸，固然也不好，洗后脸上还留着一个两个黑点，固然也不雅观，但倒并没有什么大危险。写文章做演说就不同了，这是要影响人的，我们的同志反而随随便便，这就叫做轻重倒置。许

多人写文章，做演说，可以不要预先研究，不要预先准备；文章写好之后，也不多看几遍，像洗脸之后再照照镜子一样，就马马虎虎地发表出去。其结果，往往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仿佛像个才子，实则到处害人。这种责任心薄弱的坏习惯，必须改正才好。

第七条罪状是：流毒全党，妨害革命。第八条罪状是：传播出去，祸国殃民。这两条意义自明，无须多说。这就是说，党八股如不改革，如果听其发展下去，其结果之严重，可以闹到很坏的地步。党八股里面藏的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毒物，这个毒物传播出去，是要害党害国的。

上面这八条，就是我们申讨党八股的檄文。

党八股这个形式，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这种文风，早已存在，但尚未充实，尚未得到普遍的发展。我们破坏了洋八股和党八股之后，新的文风就可以获得充实，获得普遍的发展，党的革命事业，也就可以向前推进了。

不但文章里演说里有党八股，开会也有的。“一开会，二报告，三讨论，四结论，五散会”。假使每处每回无大无小都要按照这个死板的程序，不也就是党八股吗？在会场上做起“报告”来，则常常就是“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部”，会是常常从早上开到晚上，没有话讲的人也要讲一顿，不讲好像对人不起。总之，不看实际情形，死守着呆板的旧形式、旧习惯，这种现象，不是也应该加以改革吗？

现在许多人在提倡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了，这很好。但是“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有些人则连“少许”还没有实

行，却在那里提倡“化”呢！所以我劝这些同志先办“少许”，再去办“化”，不然，仍旧脱离不了教条主义和党八股，这叫做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没有结果的。例如那些口讲大众化而实是小众化的人，就很要当心，如果有一天大众中间有一个什么人在路上碰到他，对他说：“先生，请你化一下给我看。”就会将起军的。如果是不但口头上提倡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化”不了的。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

今天会场上散发了一个题名《宣传指南》的小册子，里面包含四篇文章，我劝同志们多看几遍。

第一篇，是从《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上摘下来的，讲的是列宁怎样做宣传。其中讲到列宁写传单的情形：“在列宁领导下，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第一次在俄国开始把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当某一个工厂里爆发罢工时，‘斗争协会’因为经过自己小组中的参加者而很熟悉各企业中的情形，立刻就印发传单、印发社会主义的宣言来响应。在这些传单里，揭露出了厂主虐待工人的事实，说明工人应如何为自身的利益而奋斗，载明工人群众的要求。这些传单把资本主义机体上的痼疾，工人的穷困生活，工人每日由十二小时至十四小时的过度沉重的劳动，工人之毫无权利等等真情实况，都揭露无余。同时，在这些传单里，又提出了相当的政治要求。”

是“很熟悉”啊！是“揭露无余”啊！

“一八九四年末，列宁在工人巴布石金参加下，写了第一个这样的鼓动传单和告彼得堡城塞棉尼可夫工厂罢工工人书。”



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出版局召集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讲话。图为新华日报馆印行的单行本。

写一个传单要和熟悉情况的同志商量。列宁就是根据这样的调查和研究来写文章做工作的。

“每一个这样的传单，都大大提高了工人们的精神。工人们看见了，社会主义者是帮助他们、保护他们的。”^[1]

我们是赞成列宁的吗？如果是的话，就得依照列宁的精神去工作。不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不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也不是自以为是，夸夸其谈；而是要照着列宁那样地去做。

第二篇，是从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报告中摘下来的。季米特洛夫说了些什么呢？他说：“应当学会不用书本上的公式而用为群众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们的语言来和群众讲话，这些战士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都反映出千百万群众的思想和情绪。”

“如果我们没有学会说群众懂得的话，那末广大群众是不能领会我们的决议的。我们远不是随时都善于简单地、具体地、用群众所熟悉和懂得的形象来讲话。我们还没有能够抛弃背得烂熟的抽象的公式。事实上，你们只要瞧一瞧我们的传单、报纸、决议和提纲，就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常常是用这样的语言写成的，写得这样地艰深，甚至于我们党的干部都难于懂得，更用不着说普通工人了。”

怎么样？这不是把我们的毛病讲得一针见血吗？不错，党八股中国有，外国也有，可见是通病。（笑）但是我们总得照着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指示把我们自己的毛病赶快治好才行。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切实领会下面这条起码的规则，把它当作定律，当作布尔什维克的定律：当你写东西或讲话的时候，始终

[1] 以上三段引文参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1章第3节（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19页）。

要想到使每个普通工人都懂得，都相信你的号召，都决心跟着你走。要想到你究竟为什么人写东西，向什么人讲话。”^[1]

这就是共产国际给我们治病的药方，是必须遵守的。这是“规则”啊！

第三篇，是从《鲁迅全集》里选出的，是鲁迅复北斗杂志社^[2]讨论怎样写文章的一封信。他说些什么呢？他一共列举了八条写文章的规则，我现在抽出几条来说一说。

第一条：“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

讲的是“留心各样的事情”，不是一样半样的事情。讲的是“多看看”，不是只看一眼半眼。我们怎么样？不是恰恰和他相反，只看到一点就写吗？

第二条：“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

我们怎么样？不是明明脑子里没有什么东西硬要大写特写吗？不调查，不研究，提起笔来“硬写”，这就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第四条：“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

[1] 以上三段引文参见季米特洛夫1935年8月13日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结论《为工人阶级团结一致反对法西斯主义而斗争》的序言和第六部分《仅仅只有正确的路线还是不够的》。

[2] 《北斗》杂志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1931年至1932年间出版的文艺月刊。《答北斗杂志社问》载鲁迅《二心集》。（《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4～365页）

孔夫子提倡“再思”^[1]，韩愈也说“行成于思”^[2]，那是古代的事情。现在的事情，问题很复杂，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还不够。鲁迅说“至少看两遍”，至多呢？他没有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

第六条：“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我们“生造”的东西太多了，总之是“谁也不懂”。句法有长到四五十个字一句的，其中堆满了“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许多口口声声拥护鲁迅的人们，却正是违背鲁迅的啊！

最后一篇文章，是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论宣传的民族化。六届六中全会是一九三八年开的，我们那时曾说：“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说，必须反对空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活的共产党员，必须联系中国的革命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

“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

这里叫洋八股废止，有些同志却实际上还在提倡。这里叫空洞

[1] 参见《论语·公冶长》。

[2] 韩愈（768—824），中国唐代著名的大作家。他在《进学解》一文中说：“行成于思，毁于随。”意思是：做事成功由于思考，失败由于不思考。

抽象的调头少唱，有些同志却硬要多唱。这里叫教条主义休息，有些同志却叫它起床。总之，有许多人把六中全会通过的报告当做耳边风，好像是故意和它作对似的。

中央现在做了决定，一定要把党八股和教条主义等类，彻底抛弃，所以我来讲了许多。希望同志们把我所讲的加以考虑，加以分析，同时也分析各人自己的情况。每个人应该把自己好好地想一想，并且把自己想清楚了的东西，跟知心的朋友们商量一下，跟周围的同志们商量一下，把自己的毛病切实改掉。



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给一二〇师干部作报告。



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给一二〇师干部作报告。



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给一二〇师干部作报告。



1942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给一二〇师干部作报告。



1942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



《旁征博引，纵论天下事》（中国画）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2年2月11日)

—

报纸要以自己国家的事为中心，这正是表现一种党性。现在《解放日报》还没有充分表现我们的党性，主要表现是报纸的最大篇幅都是转载国内外资产阶级通讯社的新闻，散布他们的影响，而对我党政策与群众活动的传播，则非常之少，或者放在不重要的位置。《解放日报》应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中国抗战、我党活动和根据地建设上面，要反映群众的活动，充实下层消息。过去《红色中华》是以苏区建设为中心，《新华日报》受了限制。提议根本改变《解放日报》现在的办报方针，使它成为贯彻我党政策与反映群众活动的党报。

—

过去的在职干部教育存在以下四个缺点，应加以改正。一、没

[1] 本篇一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讨论《解放日报》问题时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讨论《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时讲话的一部分。

有着重本身业务的学习，今后应以业务教育为中心；二、对政治教育的忽视，今后应注重时事与政策的教育，对下级干部特别要着重当地政治情况及具体政策的教育；三、对文化水平低的工农老干部没有以文化教育为主，今后应强调文化教育；四、无组织无目的地进行理论学习，今后应学习实用的革命理论，真正做到理论与实际联系。

在《中央宣传部关于进行反主观主义、 反教条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 给各级宣传部的指示》上的批示

(1942年2月11日)

很好。发广播。登党的资料。抄给西北局宣传部、总政宣
传部。

复陈毅、刘少奇电^[1]

(1942年2月13日)

少奇返延，须带电台，并带一部分得力武装沿途保卫。

[1] 这是毛泽东复陈毅、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庆祝红军二十四周年^[1]

(1942年2月18日)

今年二月二十三日是苏联红军二十四周年纪念日。当这个日子到来时，特别使人回想起红军诞生的时候，红军是在反对德国帝国主义对列宁格勒的进攻中间诞生的。而今天的红军又正在与德国法西斯侵略者进行着决死的斗争。但也正是今年，红军的力量不但比它刚刚诞生的时候不知强大到若干倍，就是比它在去年六月二十二日以前，也是更加强大了。现在的红军，在它自己的历史上是最强大的，经过了八个月战斗的锻炼，又已经被证实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军队了。当此全世界划分为法西斯和反法西斯两大阵线并进行着最后决战的时候，红军便是人类绝大多数的主要希望所寄。今年的红军纪念日，乃是全人类共同庆祝的节日。我们中国人民将更加热烈的庆祝这个节日，则是因为红军在一九二五年的时候就是中国民族解放事业的忠实援助者，在五年的抗日战争中，红军又给了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援助，而中国最后战胜日本的主要援助者，又将期于红军。红军目前正发展着胜利的反攻以打击希特勒，希特勒军虽还没有退出苏联领土，但是离它崩溃之日已不远了。日本法西在不久的将来有进攻苏联的危险，红军须准备对付两面的敌人，

[1] 这是毛泽东在苏联红军成立二十四周年（2月23日）前夕撰写的一篇文章。

但是我们完全相信，日本法西斯如果敢于冒险，它是一定要失败的。有种种因素可以预断，一年之内会把希特勒打败，两年之内会把日本法西斯打败。这种种因素，便是苏联、英国、美国、中国和其他一切反对法西斯的人民，而苏联便是这一切国家的模范。红军的历史说明了一个无可置辩的真理：只有与人民群众相联系的武力才是不可战胜的力量。宣扬和学习这个真理，依照这个真理来加强反法西斯的战斗，使反法西斯的胜利快一些到来，这便是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在庆祝红军二十四周年中的任务。

目前应以整顿内部训练干部 为工作中心

(1942年2月20日)

恩来同志：

(一) 对时局估计电悉，与我们估计略同。柏林协定似以苏联为第一对象，春季后德、日各以陆空主力向北，而各以海军主力、陆空一部及意国海陆空主力向南。即使是这一局面，仍是有利的，因为德、日各有三条战线，意有两条战线，兵力太分散了。如日攻印，则更分散。整个轴心^[1]将失败在分散与消耗中。如日侵苏，蒋将迫我北上，我应准备对付他的压力。但滇缅路断，英、美接济须走苏联，对内必不敢与我决裂的。(二) 我们已定思想、政治、政策、军事、党务五项为政治局业务中心，而以掌握思想为第一项。掌握思想之实施为干部教育，已将党校改组，中央同志实行教课。已公布改造干部学校决定，不知你处收到否？在职干部教育决定日内亦可公布。高级学习组各地均已举办，此是极重要的关键。近来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口号，延安在动员中。(三) 财政经济今年亦有

[1] 指柏林—罗马—东京轴心。为争霸世界、发动战争，德、意、日三国于1937年11月正式结成反共同盟。1940年9月又在柏林签订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结成公开的军事同盟。

办法，边区现实行半统筹半自给制度，已走上轨道，不怕封锁了，各根据地尚未至十分叫苦程度，亦有办法。边区“三三制”大得周围各地好评，区内则团结了各阶级。精兵简政方针正在各地实行。（四）总之，目前是以整顿内部训练干部为基本中心，抓紧此点以准备应付时局的变化。（五）今年二月统计党员数目为八十万，去年九月统计军队数目为五十七万（包括游击队），对外守秘。（六）林彪^[1]返延身体好了许多，惟尚须休养。他在兰州、西安统战工作做得很好，与胡宗南^[2]诸人曾有深谈。据林说，国民党统战工作很可开展，要我告你注意。

毛泽东
号

[1] 林彪，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1938年冬去苏联治病，1942年初回国，途经新疆、兰州、西安，于2月回到延安。

[2]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关于时局估计、干部教育、 财政经济等问题的指示

(1942年2月20日)

少奇、德怀二同志：

兹将号日致恩来电发上以参考，原文如下。

(致周恩来电内容参见《目前应以整顿内部训练干部为工作中心》一文。)

毛泽东

号

（三）財政部爲了抑制通貨膨脹，已經採取了許多方法，如已
經實行了半統一和半自由的銀圓制度，即由中央銀行發行銀圓，
在全國各地開設半銀圓銀行，並發行半銀圓票，並有半銀圓票，
也有半銀圓銀圓，並內列開銷了若干萬億銀圓，
現在全國各地發行半銀圓票，並有半銀圓銀圓，
現在全國各地發行半銀圓票，並有半銀圓銀圓。

待他归国后便将他囚禁，英军趁机向
该岛进军，对内实行殖民地控制。
1=1949年巴拿马根据宪法和革命斗争得
到政权。并颁布了新宪法，规定国民
为第一源。掌握政权的青年一代也有领导
权，而且巴拿马的政府，中央及地
方都由人民选举产生。巴拿马人民对新制
度感到满意吗？在新制
度颁布后该岛国内部公布，高级
将领和士兵已经知道，从此巴拿马
军的反攻。后来巴拿马反对美国

4) 本年正月抵達此處，即將所帶金銀化。
（2）今年二月經計，共用去八十七
元七角。今年九月經計，重用去四
五十七元（包括前項），即
至年底，（即十一月底）止，本年
共用去一百一十五元。
在前，有兩個人多有僑疾，接
回人之經費，即約此數。
其餘均空。

毛泽东致刘少奇、彭德怀电的手稿。

在一份情况通报上加写一段话

(1942年2月20日)

日本确有准备攻苏讯，且有谓二月底即将发动者。我各地负责人应有精神上之准备，设想到日苏战争发生后的各种情势及我党任务，估计在国民党盼望已久之日苏战争爆发时，彼方很可能对我加强压力，迫我北上，我应准备对付此种局面。但滇缅路不久将断，英、美援华物资必经苏联，国民党亦更困难，对我决裂是不会的。

致刘少奇及华中局电^[1]

(1942年2月20日)

除吕振羽、贺绿汀外，其他高级文化人亦望调抽一批带来延安从事学术研究，他们在苏北游击环境无研究学术可能，不如来延成就较大。

护卫少奇的手枪班须是强有力的，须有得力干部为骨干。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致刘少奇及华中局电的主要内容。

讨论过去路线问题宗旨是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1942年2月21日)

恩来同志：

(一) 铊^[1]电悉。五中及遵义文件^[2]当电告。(二) 政治局在去年十月间曾详尽检讨了过去路线问题^[3]，一致认为四中全会至“九一八”中央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好几个严重原则错误^[4]。“九一八”至遵义会议（共三年又四个月）中央路线是错误的。遵义会以后中央路线是正确的。结论已写好，尚待七大前周^[5]及少奇、德怀

[1] 铊，指16日。

[2] 指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文件和遵义会议文件。

[3]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检讨党的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

[4] 这个提法应以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决议》指出：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的作用，其结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使它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不久，“新的‘左’倾路线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具体的运用和发展”。“九一八”以后，“新的中央对于这些事变所造成的新形势，一开始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

[5] 即周恩来。

回来方能讨论决定，交七大通过，在内部发表（对外不发表）。现在高级学习组中可以讨论过去问题，但不牵涉人的问题。研究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请加注意。

毛 王^[1]

马^[2]日

[1] 即毛泽东、王稼祥。

[2] 马，指21日。

致彭德怀等电^[1]

(1942年2月21日)

从员生中选择可任高级军政教育之教员及可资深造之学生共约二百名左右，由代远率领回延安。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彭德怀、左权、滕代远电的主要内容。

致陈毅等电^[1]

(1942年2月23日)

训练干部是当前大事，请你们考虑在不严重减弱斗争力量条件下，从华中及山东军队中地方上抽调一批高级干部来延安进中央党校与抗大总校的问题，如何抽调及抽调多少望电告。并望少奇加以组织。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致陈毅、刘少奇、饶漱石、朱瑞、陈光、罗荣桓等电的主要内容。

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1]

(1942年2月28日)

(一) 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而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也应该是第一位的。这是因为一切工作包括国民教育工作在内，都须经过干部去做，“在政治方针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一切的因素”，如不把干部教育工作看得特别重要，把它放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第一等地位，就要犯本末倒置的错误了。同时，着重的认真的办理干部学校，抽调许多干部，进入各种干部学校，施以系统的教育，当然是很重要的任务，对此决不应该稍有忽视。但最广大量的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还是在工作中，在人力财力与工作需要上，目前又不可能办理很多的干部学校；因此，对在职干部，就其工作岗位上，施以必需的与可能的教育，实是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第一位工作，应该引起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及其宣传教育部门的充分注意。游击战争的特点，不但允许我们这样做，而且必须这样做。

(二) 在职干部教育，自六中全会以来，已经引起党内相当的注意，在许多地方与许多部门的在职干部中引起了学习的热潮，这是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个文件，2月28日经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

极好的现象。但忽视的现象还是存在着。在有些地方与有些部门中，甚至还没有开始，没有强调业务教育。而大多数在职干部要求学习业务与精通业务的热情则是很高的。政治教育虽一般地注意了，但或者不得其法，或者轻重不分，或者没有经常性。文化教育，是我党多数工农出身的干部所迫切需要的，但也没有引起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的充分注意。高级干部的理论教育，或者至今没有引起注意，或者脱离实用，成了教条主义的东西；而理论教育的成败则是革命成败的第一个关键。所有这些，都是必须改革，或必须加强的。

（三）在职干部教育，应以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四种为范围。

甲、对一切在职干部，都须给以业务教育，实行“做什么、学什么”的口号。不论从事军事、政治、党务、文化、教育、宣传、组织、民运、锄奸、财政、经济、金融、医药、卫生及其他任何工作部门的干部，必须学会并精通自己的业务，这是第一个教育任务与学习任务。每一部门的领导机关及其负责人，必须指导所属干部，有秩序地进行学习，而各级党委各级政治部及其宣传等部门则负总领导的责任。其学习范围，包括以下五项：第一是关于与各部门业务密切关联的周围情况的调查研究。例如军事部门精细调查敌我友三方情况，加以分析研究，择其要点，编成教材，用以教育军事干部；其余类推。第二是关于与各部门业务密切关联的政策、法令、指示、决定的研究。例如财政工作人员应熟悉财政政策与财政法令；锄奸工作人员应熟悉锄奸政策与锄奸法令；其余类推。第三是关于各部门业务具体经验的研究。例如党的组织部门研究党的组织工作与干部工作的经验，加以分析和综合，抽出要点，写成文

件，教育所屬干部；其余类推。第四是关于各部门业务的历史知识。例如党的宣传部门将我党二十年宣传鼓动工作及其政策的变化发展，加以叙述与总结，编成教材，教育宣传工作干部；其余类推。第五是关于各部门业务的科学知识。例如军事干部研究军事学、医务干部研究医学等，每一部门均须研究自己的理论。对于上列各项业务学习，各部领导机关负有供给教材、指导学习及考查成绩的责任，务使所屬干部从理论与实际两方面，逐渐达到学会与精通自己职务之目的。轻视学习业务与精通业务的观点是错误的。

乙、对一切在职干部，都须给以政治教育。其范围包括时事教育及一般政策教育二项。关于进行时事教育的办法，包括督促所屬干部看报，对所屬干部讲解时事问题及以地区或部门为单位，召集干部作时事报告等项。关于进行一般政策教育的办法，或为一切干部所应普遍学习的，例如将中央对时局宣言，中央关于增强党性决定，关于调查研究决定及边区施政纲领等，督促干部阅读，加以解释或讨论等；或为虽与本部门业务无直接关系，但有间接关系，有使所屬干部加以研究之必要者，例如向军事指挥员解释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决定等。政治教育之目的，在于使干部除精通其专门业务局部情况与局部政策之外，还能通晓一般情况与一般政策，扩大干部眼界，避免偏畸、狭隘、不顾大局的弊病。必须指出，空谈一般政治而忽视专门业务的倾向是不对的；但局限于专门业务而忽视一般政治的倾向，也是不对的。又须指出，一般情况与一般政策虽为一切干部所必习，但其分量轻重应依各部门工作性质而有所不同。例如对于医生、技术专家、文学家、艺术家等，其分量应该减轻，而对于党务工作人员、宣传工作人员、政府工作人员及军队中政治工作人员等，则其分量应该加重。关于政治教育缺乏经常性的毛

病，党政军宣传教育部门应有计划地克服之。

丙、对于一切文化程度太低或不高的干部，除业务教育与政治教育外，必须强调文化教育，反对轻视文化教育的错误观点。对于他们，学习文化、提高文化水平，是他们全部学习的中心一环。其教育与学习范围，暂定为国文、历史、地理、算术、自然、社会、政治等课，宣传教育部门应负责解决课本问题。其教育与学习办法，在环境许可的地方，必须一律开办文化补习班或文化补习学校，或一机关独办，或数机关合办，或采取轮训制，轮流抽调干部集中一地学习，都是好的。在这些补习班或补习学校中，应有专任的教职员，辅之以兼任的教职员。在环境不许可的地方，则用小组学习制，以该机关某一文化程度较高的干部减少其日常工作，使他兼任教员，亦可专用教员。文化班或文化学校，可分为初级的及中级的两种。初级班为不识字及粗识文字的人而设，以学至大体相当于高小程度为合格；中级班为已有相当于高小程度的人而设，以学至大体相当于中学程度为合格。干部分班应以文化程度为标准，不以职位为标准。此外，某些从事宣传教育工作的干部，虽属知识分子，但尚有补习国文及文法之必要者，则用小组学习制或其他办法补习之。为着提高广大干部的文化水平，应在党政军机关内提高文化教员的地位，最好的文化教员应受到极大的欢迎与优待。对办理文化教育有功的人员应受到奖励。

丁、高级及中级干部之具有学习理论资格（文化程度、理解力与学习兴趣等）者，于业务学习与政治理论之外，均须学习理论。其学习范围分为政治科学、思想科学、经济科学、历史科学等项，依次逐步学习之。其学习方法，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原则，例如政治科学以马列主义论战略策略的著述为理论材料，以我党二十年奋

斗争史为实际材料；思想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为理论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的思想发展史为实际材料；经济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史为实际材料；历史科学则研究外国革命史与中国革命史。其具体进行，应采取高级学习组与中级学习组的办法，以自学为主，加以集体的讨论与指导。

（四）四种教育的时间分配及课程分配，使之互相联系而不互相冲突与脱节，由党政军宣传等部门负责调理之。

（五）不论任何工作部门，也不论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的任何方面，均须贯彻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的精神。一切材料均须由领导机关加以审查，任何包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毒素的东西，均须严格地加以清除或批判。

（六）在职干部教育是长期的，以发展其业务而不妨碍其业务并不妨碍干部健康为原则，在前方尤其不应妨碍战争。在情况许可的地方或部门，一律坚持每日两小时学习制。在情况不许可的地方或部门，学习时间可以伸缩。一切为着在职干部教育而耗费的时间，均算入正规工作时间之内，把教育与学习看做工作的一部分。在鉴定干部的时候，学习情况如何应作为鉴定标准之一。

（七）实行对于在职干部教育的考核、测验与赏罚制度，其办法由中央宣传部订定之。

（八）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应以极大的注意力放在干部教育（在职干部教育与干部学校教育）上面。为着干部教育而需用的人员（教员与职员）应加以严格的审查，并应首先调给之。各级领导人员有参加教课的责任。为着干部教育而需用的经费，应最大量地供给之。

(九) 对于从事干部教育的人员，尤其是教员，应加以教育。其办法由中央宣传部订定之。



1942年的毛泽东。

在中共中央白区工作 总结委员会上的一段讲话

(1942年3月2日)

中国有两个教条，一是旧教条，一是洋教条，都是思想上的奴隶。五四运动打破了旧教条的奴役，是一个重大的启蒙运动。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犯了洋教条的毛病，现在开展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同样是一个重大的启蒙运动，许多干部中毒很深，需要做启蒙工作。

给谢觉哉的信^[1]

(1942年3月2日)

县参议会的确宜改选，不必做成全边区普遍改选运动，而在今年秋收后先择若干县改选，其余则待明春，以便一县一县地指导改选工作，造成真正“三三制”的。

林老宜即休养两三个月，劝他不要急工作，要有放得开不怕塌台的精神，请告他下决心，不可大意。你亦宜带半休养性质，只抓大者要者，小而次者出入可也，保存精力长期斗争为上策。

[1] 这是毛泽东致谢觉哉信的主要内容。

增长力量，准备反攻^[1]

(1942年3月4日)

亲爱的同志们：

首先我们向你们全体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们致最亲热的慰问。回想从抗战开始，我八路军主力开往华北前线以后，四年以来，你们留守边区是有很大成绩的。你们曾经胜利地保卫了我全军后方，巩固了边区治安，屏障了整个西北。在四年当中，你们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军事技术、政治、文化的学习以及内部的工作上，都有了进步。你们并且辛勤劳苦，普遍地进行了生产运动，克服了生活上的重重困难，打下了自力更生的基础。这些成绩，首先应当归功于你们大家全体的团结努力。

现在已经冰解河开，春天来临，这是我们走上新的一年 的开始。苏联的工农红军要在今年打败希特勒匪军，全世界民主国家的人民都在为了打倒德、意、日法西斯匪军而紧张刻苦地工作着。我们则为配合全世界反对法西斯的战争准备反攻，要在今后两三年内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今天我们的面前还有种种困难。我们双肩上的担子还是很重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给八路军留守兵团
保安部队即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及所辖地方部队（1938年4月，划归八路
军留守兵团指挥）的慰问信。

的。敌人虽然已经被削弱了，但是还相当强大，并且非常狡猾狠毒；国内的亲日派还未肃清，时刻都在想破坏抗战，破坏我军，破坏边区。因此决不容许空洞的乐观与粗心大意。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坚守自己的岗位，严防敌寇汉奸的破坏扰乱行动，加强和友军的团结，密切与群众的联系，使边区更加巩固坚强。

其次，我们的军事技术和文化水平还须大大提高。全体战士和指挥员们，必须好好锻炼身体，加紧练习瞄准，投手榴弹，劈刺，各种武器的使用，学习各种战斗动作，提高战术水平。要以大力来组织文化教育，努力克服文盲，克服我军特别是干部中文化水平低下的弱点。

我们还须要加倍努力生产运动，这是我们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克服物资困难，改善部队供给的最有力的方法。要多多种菜、养猪、养羊，发展棉毛纺织，组织运输工作，我们的口号是大家动手，解决吃穿问题，达到完全自足自给的目的。

亲爱的同志们，摆在我门肩头的任务是很重大的。完成这些任务，必须要依靠我们全体更加百倍的团结和发扬忍苦耐劳，永不疲倦的战斗意志。我们应当在上下级间，在指挥员与战士间，在全体人员相互间，认真加强团结友爱，互相照顾的关系，克服其间的任何冷酷无情、不知友爱和隔阂与不团结现象，在这种钢铁般的团结与艰苦奋斗的努力下面，便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没有什么障碍不能战胜，没有什么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全体战士、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全体同志们！今年是我们增长力量、准备反攻的一年。我们希望由于我们大家的积极努力，能够早日举行反攻，到那时我们将把丑恶的敌人从我们祖国的土地上扫除干净，把我们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旗帜插遍全国，胜利的光

明已经在望，这个日子已经不远。我们在此伟大的年初，向你们大家致同志的慰问。希望你们更加团结一致，更加奋发努力。预祝你们今年在战斗、学习、生产和全部工作中，将得到新的巨大的胜利和进步。

谨致

敬礼！

毛泽东 朱德 王稼祥

民国三十一年三月四日

为“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题词^[1]

(1942年3月8日)

深入群众，不尚空谈。

毛泽东

[1] 这是毛泽东在1942年3月8日为《解放日报》的“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特刊所写的题词。

毛泽东
三八妇女节快乐

毛泽东为“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题词。

为张浩题挽词^[1]

(1942年3月9日)

忠心为国，虽死犹荣。



1942年3月9日，中共领导人集体为张浩抬棺送殡。

[1] 张浩，即林育英，是林彪表兄。1942年3月6日林育英在延安中央医院逝世。次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发表《中共中央委员张浩同志积劳成疾病逝》的消息。毛泽东为林育英题写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3月9日，在林育英下葬时，毛泽东、朱德、任弼时、徐特立等亲自把林育英的棺柩抬到安葬地。毛泽东还为他的墓碑题写“张浩同志之墓”。



1942年3月9日，毛泽东和朱德、陈云等在延安参加张浩的安葬仪式。



1942年3月9日，毛泽东为张浩葬礼执绋。



1942年3月9日，毛泽东和陈云、李富春等参加延安各界公祭张浩大会。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2年3月11日)

我党现有八十万党员，五十万军队，但党报是弄得不好的。我们自去年八月起已开始改造党的工作，但党报尚未实现彻底的改造。今年中央要抓住党校、党报、中宣部这三个重要部门的工作。党报是集体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对党内党外影响极大，是最尖锐的武器。要达到改造党的目的，必须首先改造党报的工作。报社的同志要了解经过党报来改造党的方针，现在报社的同志没有了解这个方针。报纸必须地方化，要反映地方情形。党报要反映群众，执行党的政策。党性是一种科学，是阶级性的彻底表现，是代表党的利益的，无论什么消息都要想想是否对党有利益。党报要允许同情者作善意的批评。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秦邦宪提出的改造《解放日报》草案时讲话的一部分。

复彭德怀电^[1]

(1942年3月12日)

六十一军横行，势必还击，但目前不宜组织大规模的战事，致招决裂，而应组织若干突击队坚决打击其个别出犯部队，以警戒其行动，以后再观其态度，决定对策。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关于阎锡山部梁培璜六十一军配合日军“扫荡”八路军太岳区，摧毁抗日根据地的严重事件复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致王世英电^[1]

(1940年3月13日)

请向阎锡山交涉，要求阎令六十一军撤回原防区，制止杀人掠地行动，以固团结。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致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处长王世英电的主要内容。

党报应吸收党外人员发表言论^[1]

(1942年3月14日)

周：

(一) 关于韩国临时政府情形请于日内电告。(二) 张申府纪念《新华日报》的文章^[2]表示对我党满腔热情，已在解放转载^[3]。他希望把党报变为容许一切反法西斯的人说话的地方，这一点是很对的，新华^[4]、解放都应实行。关于改进《解放日报》已有讨论，使之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新华日报》亦宜有所改进。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中央已准备了一个决定草案，下周可通过，党报应容纳党外人员说话亦包括在内。

毛泽东

三月十四日

[1] 这是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

[2] 张申府，是大学教授，民主人士。他的文章载于重庆《新华日报》1942年1月11日第三版，题目是《新华，新华，我看着你生长，长大——〈新华日报〉创刊四周年纪念祝辞》。

[3] 解放，指延安《解放日报》。该报于1942年3月9日转载了张申府的文章。

[4] 新华，指重庆《新华日报》。

1月11日²²电
新華社稿
特此請於內電悉。②
特此報知新華社及各文
章者。對此電請即轉發。
已在解放軍軍事委員會
之反動分子和反共黨人。③
該派的和地方上一些很对
的，新華社稿都已寫好。

關於隨進解放軍已有
討論之時。請即轉告反映
軍心，新華社稿亦宜有所改
進。關於生產發展之外
人民的關係，中央已經有一
千件電報，下週子通函，
並有應答內外人員谈话
和急務在內。即此為盼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手稿。

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1]

(1942年3月19日)

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任务是：除了汉奸及决心破坏抗战团结者外，一切阶层的抗日人民，不论是有党有派，或者无党无派，不论是同情我党的，或者只在一部分纲领上愿与我党合作的，也不论是已经与我党共事的，或者尚未与我党共事的，共产党员都必须和他们一致合作，共同为抗战建国的总目标而奋斗。我党长期地坚决地实行这一正确政策，是有了伟大成绩的，全民族的抗战赖以支持，全国的统一赖以实现。这些都是很好的情形。但在另一方面，不论是抗日根据地的党在政府、军队、党务、民运、文化教育部门内或者是秘密党内，都存在着一部分党员及一部分党组织与党外人员之间的严重的隔离现象，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的作风并未完全扫除。这些党员与党组织，至今还不懂得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内容与意义。他们违背我党密切联系民众的原则。他们不是密切联系民众，而是孤立于民众之外；不是站在民众之中，虚心体会民众的心理，而是站在民众之上，自以为是，称王称霸。他们不愿意倾听党外人员的意见，把党外人员看作无足轻重。他们不愿向党外人员学习，反以领导者自居。他们对于愿与我党合作的党外人员，或漠不关心，不予信任，或吹毛求疵，求全责备。他们对于政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草案。这个文件后来没有发出。

权的“三三制”不愿坚决实行，对于民众团体仍取包办态度。他们至今还不明白，国事是国家的公事，并非一党一派的私事。共产党的唯一任务，就在团结全体人民，奋不顾身地向前战斗，推翻民族敌人，为民族与人民谋利益，绝无任何私利可言。而共产党员自始至终都只是人民中的极少数，没有绝大多数人民了解我党主张，真心实意地愿与我党合作，我党主张便无从实现。因此，对于一切忠诚抗日的人员，共产党员只有与他们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为了认真地彻底地纠正各种不良现象，改造党的作风，必须在党内展开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即关门主义）的斗争，在一切地方与一切部门中展开自我批评，并将这种自我批评公开于党外人员之前，毫不姑息，毫不掩饰，以收彻底揭发与彻底纠正之效。同时，规定下列具体办法，要求一切党员与一切党组织认真地坚决地实行之。

（一）必须将关心和倾听党外人员的意见和要求及向党外人员学习，作为每个共产党员的严重责任。一切党员，都有责任经常地将党外人员的意见和要求（不论是正确的或不正确的）反映到党内及各工作部门内，而一切党组织与一切工作部门的领导人员都有责任考虑这些意见和要求，并须适时地列入议事日程，加以讨论及解决。

（二）在各抗日根据地内，政府系统、参议会系统及民众团体的各级领导机关中，均应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而使愿与我党合作的党外人员占三分之二。如当选的共产党员人数不足三分之一时，党组织不得指派未当选的党员去凑足三分之一，更不得排挤当选的党外人员。在这些机关中，共产党员必须与党外人员实行民主合作，倾听党外人员的意见，和他们一起，共同商量问题与决定问题，共同遵守少数服从多数、局部服从全体、下级服从

上级的民主集中制，并须使党外人士有职有权，敢于说话，敢于负责。

(三) 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在政府、参议会、民众团体及其他机关中，凡须经过人民民主选出的工作人员，其任免办法均按前条“三三制”的规定。其他不需经过民主选举的工作人员的任免，亦不应以是否党员为标准，而应以是否赞成抗战团结及本人能力、经验、学识与工作积极性等为标准，实行用人唯贤的正确方针。

(四) 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在政府、参议会及一切已有或应有党外人员工作的部门中，党支部的任务是：对于党员进行党的教育，领导党员成为工作的模范，团结党外人员，保证该部门工作任务的完成。支部不得直接干预行政领导，更不得代替行政领导。在行政关系上，党员必须服从行政的领导。在党外人员担负行政领导责任的部门中，该地或该部门的党组织及党员对行政工作有不同意见时，应取适当方式，与党外人员协商解决，不得直接处理。某些地方党政不分的现象，应该纠正。党员如有违犯行政法规者，应受行政的处分；其错误涉及党纪者，同时须受党纪的制裁。但在行政关系上，担负行政领导责任的党外人员，亦须服从上级行政的领导。

(五) 党员及党组织不得任意地无根据地怀疑党外人员，必须从友谊中细心了解自己周围的每个党外人员的历史和特性，细心了解他们对人民、对我党及对工作的意见和要求。对于他们的宗教信仰、思想自由及生活习惯，必须加以尊重。须知党外人员的愿与我党合作与我党的尊重党外人员，是彼此合作中不可缺一的条件。

(六) 任何愿与我党合作的党外人员，对我党和我党党员及干部都有批评的权利。除破坏抗战团结者的恶意攻击以外，一切善意批评，不论是文字的、口头的或其他方式的，党员及党组织都应虚心

倾听。正确的批评，应加接受，即使其批评有不确当者，亦只可在其批评完毕，并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加以公平的与善意的解释。绝对不可文过饰非，拒绝党外人员的批评，或曲解善意批评为攻击，而造成党外人员对党的过失缄口不言的现象。党外人员对于违犯政府法令或党的政策的党员及干部，除得向法庭或行政机关依法控诉外，并有权向各级党委控告，直到党的中央。

(七)《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报纸刊物，应吸收广大党外人员发表言论，使一切反法西斯反日本帝国主义的人都有机会在我党党报上说话，并尽可能吸收党外人员参加编辑委员会，使报纸刊物办得更好。党报工作者必须学会善于吸引党外人员在党报上写文章、写通讯的方式和方法。某些党报工作者的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态度，须受到批评。

(八)与我党共事的党外人员在工作中发生过失时，有关的党组织和党员必须加以慎重考虑，采取适当方式，以诤友的态度，适时地诚恳地告诉他以所犯过失的真确事实及正当理由，并与他协商改正的办法，帮助他改正过失。决不可采取缄默不言、听其积累或当面不说、背后议论的态度，须知这种态度是只会妨碍合作与不利于党外人员的。

(九)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凡与我党共事的党外人员，在法律上是与共产党员完全平等的。在工作上，应给以必需和可能的工作条件。在学习上，凡在一切有党外人员的机关、学校中，无论在职干部教育或学校教育，党外人员均与共产党员有同样的学习权利。在物质上，不是空唤优待，而是按工作情况、工作需要及现有物质条件给以真正必需的帮助，并须使党员了解这种帮助是应该的。

(十)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在机关、部队及学校中，党的一般支

部大会及小组会，允许在同一部门工作的党外同情分子到会旁听，并得发表意见。

(十一) 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必须有计划地召集党员与党外人员联合一起的干部会议及座谈会，与党外人员共同讨论各项抗日政策，并征求党外人员对党的意见。

(十二) 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在党的组织部或管理干部的部门内，设置管理非党干部的专门机关，担负对党外干部的接洽、登记、了解及照顾的责任。在党的各级保护健康委员会内，设置党外干部科，管理党外干部的保健工作。

致刘少奇电^[1]

(1942年3月21日)

必须路上有安全保障才能启程。

[1] 这是毛泽东致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左权等电^[1]

(1942年3月24日)

敌攻乡宁、吉县甚急，阎正坚决抵抗，要求我们援助。望令我军及时予以必要援助，以争取晋绥军之抗战，是为至要。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彭德怀、左权等电的主要内容。

致周恩来、董必武电^[1]

(1942年3月24日)

中央正在编印中共党史资料选录，请用一切方法找到下列各文件邮寄或送延安：（一）汪陈^[2]联合宣言。（二）彭述之著《中国革命根本问题》。（三）瞿秋白著《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四）五次大会决议。

[1] 这是毛泽东和任弼时致周恩来、董必武电的主要内容。

[2] 汪陈，指汪精卫、陈独秀。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

(1942年3月30日)

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这当然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统统搞清楚了才可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个工作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现在正在开始做。从《六大以来》发出到现在，高级干部学习组、中央党校已经读了半年，别的单位现在也已经开始读。这是一件好事，今天已开始看到了好的结果。同志们读了之后恍然大悟，发生了启发思想的作用。现在来考虑我们过去所走的路和经验，要有系统地去考虑。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虽然在走每一步的时候也曾考虑过昨天是怎样走的，明天应该怎样走，但是整个党的历史却没有哪个人去考虑过。去年八九月中央经过讨论，印了《六大以来》这本书，在中央高级学习组里研究。我们怎样研究呢？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我们要用这样的研究来使我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的讲话。

们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进步。

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段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

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我们党的历史，我觉得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大革命时期是第一个阶段；内战时期是第二个阶段；抗日时期是第三个阶段。这个分法是否妥当，大家可以讨论，我只是作为一个意见提出的，不是中央的决议。如果有更适合党的历史过程的分法更好。

革命的任务，三个阶段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第一个阶段直接的表现是反对北洋军阀，第二个阶段直接的表现是反对国民党，第三个阶段表现为反对日本侵略者及汪精卫汉奸。

联合的群众，第一个阶段是全国各民主阶级，是国共合作；第二个阶段是缩小了的统一战线，国共分裂，全国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在国民党的领导下，一部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互相对垒，进行内战；第三个阶段是全民族抗日，恢复国共合作的形式。

革命所打击的目标，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北洋军阀，我们的政策是广泛的统一战线。第二个阶段表现为反对国民党，我们的政策是狭小的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下层小资产阶级联合。第三个阶段就是现在的政策，日本侵略者和汉奸是我们的打击目标。革命的阵线是国共合作，全国各爱国力量。这是我们的路线。



1942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技术干部会议上讲话。

第一个阶段内我们有正确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正确的地方是实现了国共合作，打击目标是对的，革命队伍的组织是对的。后来发生了陈独秀路线，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党的路线就不对了。当国民党准备实行叛变革命，要把无产阶级和农民丢了，要把我们和革命群众丢了的时候，我们还和它联合，这是右的机会主义。情况变化了，我们的政策路线没有跟着变。右的倾向是一切联合反对斗争。陈独秀路线的根本特点，便是一切联合反对斗争，就是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叛变了的时候，还要同它联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策变了，而我们的政策不变。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打击革命了，我们的政策也还是不变。这就犯了右的错误。在联合中应该一方面与它联合，一方面与它斗争。第二个阶段中全国分为两个营垒。马日

事变以后，有过一种盲动主义，说是“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接着的立三路线是在不应该全国暴动时要暴动。“九一八”到遵义会议，当一个民族敌人打进来，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已经变化了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没有跟着变，还是过去的一套，这就发生了“左”的东西。那时的领导路线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九一八”以后情况变化了，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公开倾向我们，如孙科、黄炎培等。但是我们说他们是改良主义，说他们是我们的主要打击对象。把这些人当作主要的打击对象，是不对的。还有当时提出消灭富农，也是过左的。第三阶段既不是一切联合不要斗争，也不是一切斗争不要联合，而是联合与斗争的综合，联合是主，斗争是辅，要求统一下的独立性。统一就是联合，独立就是斗争。什么叫独立性呢？你站在这里，没有人叫你站开，这就不发生独立性的问题；在你站的位置上别人也想站，要赶你走，这就发生独立性的问题了。斗争、磨擦是为了统一，是统一的手段，这叫一打一拉，又打又拉，有理、有利、有节。在不妨碍统一下的独立自主，也就是希望团结得更好。

中共党史分成这三个阶段，就斗争目标、打击对象、党的政治路线讲，都合乎事实，都说得通。

在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大革命之前，还有一个准备阶段。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是大革命的直接准备，可以和一九二五年开始的大革命合成一个阶段。“七七”以前，国民党三中全会以后，国共合作的局面大体上已经形成，这可以考虑合并于第三个阶段，也不必再分。

说到革命的准备，一九二一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特别是五四运动，大革命的思想、干

部、群众、青年知识分子都是这时开始准备的。所以严格地讲，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这前面的部分扯远了嫌太长，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

辛亥革命发生在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觉醒，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全世界无产阶级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还没有实际革命行动，只是准备革命的时候；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还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后备军的时候。而五四运动是发生在欧洲大战、十月革命之后，这时的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已不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后备军，而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后备军了。五四运动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响应，所以比辛亥革命更深刻。辛亥革命只是在政治上推翻了清朝皇帝，没有彻底。我们写历史时常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其实并不能说完全失败，辛亥革命有它的胜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赖帝国主义的清朝皇帝。但后来失败了，没有巩固它的胜利，封建势力代替了革命，袁世凯代替了孙中山。那时无产阶级没有以一个觉悟的阶级走上政治舞台。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发生的。十月革命对世界的觉醒，对中国的觉醒，影响是很大的。五四运动时中国无产阶级开始有了觉悟，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一年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五四运动是广泛的统一战线，内部有左翼、右翼和中间势力。在“五四”以后一个月发生了六三运动，全国罢工、罢课、罢市。那时的罢工还是无产阶级自发的运动。我们应该把五四运动中工人的态度研究一下。那时罢工虽然没有共产党领导，但其中总有领头的人。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国民党没有在五四运动中起领导作用，它是站在旁边的。

五四运动准备了大革命，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大革命。中国共产党是产生在“五四”之后，五四运动又是产生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的号召之下组织起来的，是共产国际派人来帮助组织的，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有国际代表到会。

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现在有很多东西直接联系到那时候，比如反对党八股，如不联系“五四”时反对老八股、老教条、孔夫子的教条、文言文，恐怕就不能把问题弄清楚。

对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估价，需要研究。辛亥革命是完全失败呢，还是有些胜利？五四运动是有群众，还是没有群众？我认为五四运动是有广大的群众性的，比起大革命来自然是差些。那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统一战线，还没有农民参加，只有广大的工人。到大革命，就有农民参加了。土地革命时，参加的农民就广泛多了，但是统一战线不够广。到抗战，农民参加得更广泛了，比大革命时广，比土地革命时也广，同时有了比过去更广大的统一战线。

五四运动是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带着自发的性质。但是这种自发性和以前的不同，它多少有些觉醒，许多人赞成十月革命，赞成列宁的革命。孙中山曾说，列宁是革命的圣人，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他是作为同盟者来赞成共产主义的。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当时的人们有一个很大的觉醒。五四运

动发展到共产党的成立，工人运动向前发展了，这才有后来的国共合作。所以不说明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于共产党的成立和以后的历史，也就不能说得清楚。



1942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技术干部会议上讲话。

在说到辛亥革命时，如不说到当时国内国际的情形，就不能说明革命的发生。同样，不说明“五四”时代的政府是什么政府，也不能说明五四运动和六三运动的发生。所以当时的重要政治文件，像宣统皇帝退位的诏书，袁世凯、段祺瑞政府的一些文件，孙中山的几个重要宣言等，都要研究。

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这时期的斗争对象，是帝国主义和他的走狗北洋军阀。如不说明那时候地主怎样压迫农民，资本家怎样

压迫工人，帝国主义怎样分裂中国，北洋军阀怎样对付革命，那就很难了解当时的斗争。要研究当时的国共合作，如果只看共产党的宣言而不看国民党的宣言还不够。共产党那时是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的，国民党是一个大团体，如果不把这个大团体搞清楚，就不能了解当时的情形和后来陈独秀犯错误的要不得。关于“四一二”、马日事变的材料也要看。内战时，我们反对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如不讲国民党如何投降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如何同国民党一起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就看不到内战的必要。如果我们不知道主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土地和牛这些东西是在谁的手里，不把地主与农民对土地的所有关系搞清楚，就不会知道土地革命的必要。如果不把国民党在“九一八”以后还是继续打共产党不去打日本这些情形讲一讲，我们反对国民党就显得没有道理、没有根据。抗战是国共合作大家抗日，国民党发表了许多文件，共产党也发表了许多文件。国民党的抗日文件有些是好的，但是它又要反共。我们自己的文件要看，国民党的文件也要看。国民党的好的文件要看，反共的文件也要看。如果不看这些材料，就不了解反对国民党反共的根据。因为他们先发表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这些东西，闹磨擦，我们在不妨害团结、不致引起分裂的条件下强调斗争是有必要的，如果不强调斗争，那就会又来一个陈独秀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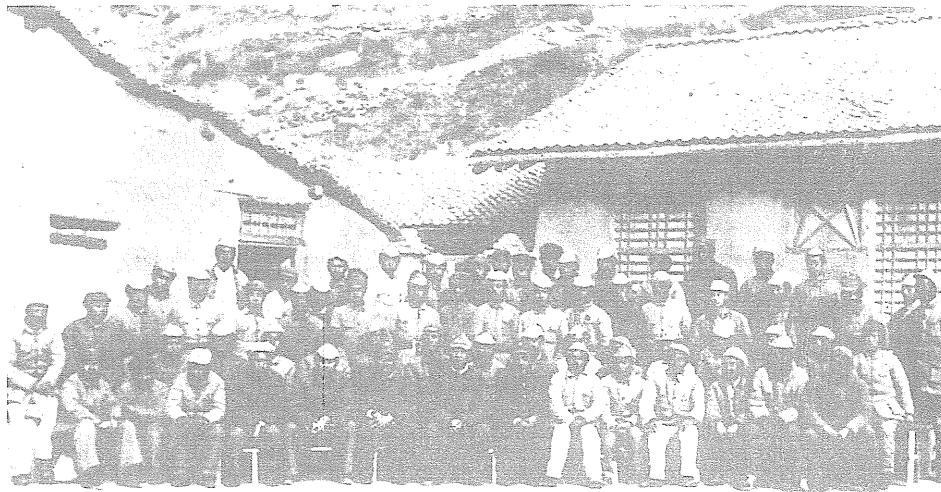
谈到中国的反帝斗争，就要讲到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如何凶恶地侵略中国。讲到中国无产阶级，就要讲到世界无产阶级，讲到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斗争，就要讲到马、恩、列、斯他们怎样领导国际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作斗争。这就叫“中外法”。中国是“中”，外国是“外”。借用这个意思，也可以说，辛亥革命是“中”，清朝政府是“外”；五四运动是“中”，段祺

瑞、曹汝霖是“外”；北伐是“中”，北洋军阀是“外”；内战时期，共产党是“中”，国民党是“外”。如果不把“外”弄清楚，对于“中”也就不容易弄清楚。世界上没有这方面，也就没有那方面。所以有一个“古今”，还有一个“中外”。辛亥革命以来，五四运动、大革命、内战、抗战，这是“古今”。中国的共产党、国民党，农民、地主，工人、资本家和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等，这就是“中外”。我想，为了有系统地研究中共党史，将来需要编两种材料，一种是党内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种是党外的，包括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等。两种材料都按照年月先后编排。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这就叫做“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我们研究党史，必须全面看，这样研究党史，才是科学的。我们研究党史，必须是科学的，不是主观主义。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只看客观原因够不够呢？不够的，还必须看到领导者的作用，那是有很大作用的。但是领导人物也是客观的存在，搞“左”了，搞右了，或者犯了什么错误，都是有客观原因的，找到客观原因才能解释。

现在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在研究历史时也应该注意历史上有没有这些东西。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才能学得一种科学的方法。这种科学的方法不是主观主义，不是宗派主义，也不是党八股。我们要应用这种方法，来研究我们党在各个时期的策略路线，研究各个个别的问题，如军事问题、肃反问题、农民土地问题等。

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世

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共党史的关系弄清楚，就是要看你的屁股坐在哪一边，如果是完全坐在外国那边去就不是研究中共党史了。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如果不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发展，党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研究就不会有结果。我们读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它告诉我们，布尔什维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和方法，创造了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布尔什维主义，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前没有过，这是列宁所领导的党在俄国创造的。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布尔什维主义，用这个理论和策略搞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斯大林接着又搞了三个五年计划，创造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我们要按照同样的精神去做。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比如说，我们党在大炮没有、飞机毫无的条件下创造了八路军、新四军，这就是中国自己搞出来的。



1942年3月，毛泽东和参加高级技术干部会议的成员合影。



1942年3月，毛泽东和参加高级技术干部会议的成员合影。



1942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技术干部会议上讲话。



《实事求是》(中国画)

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1]

(1942年3月31日)

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现在共产党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就是合乎人民公意的政策。在执行这个政策中，常常要遇到许多障碍，比如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为了纠正这些不良作风，我们提出了整顿三风。但要达此目的，非有集体的行动，整齐的步调，不能成功。今天这个会，大家发表了许多意见，今后就可在共同的目标上，一致前进。

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推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造。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利用报纸。

关于整顿三风问题，各部门已开始热烈讨论，这是很好的现象。但也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我们工作制度中确有许多缺点，应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则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

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召开的《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要点。

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2年4月2日)

讨论整顿三风报告与检查工作，开展自我批评，要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不应放任。思想斗争的火力，不是只对着老干部，而应对着新老干部双方的毛病，使新老干部相互批评之后，更进一步地相互了解与团结。态度一定要好，态度不好，就会引起人家不满意。不要暗箭，不要冷嘲，热骂还好，冷嘲就不好，因为它会搞得疑神疑鬼。这种空气不要在共产党里面增长，它不利于大家，它使党不团结，使党分裂。不要暗箭，应该是采取积极的态度上下夹攻。我们的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机关学校里面要开展民主，但还须有领导，使这个运动发展到正确的方向去。对于我们各部门的工作，这一次要来一个彻底的检查。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方法时讲话的一部分。中央决定指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8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等。

为儿童节题词^[1]

(1942年4月4日)

儿童们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新主人。

[1] 这是毛泽东为儿童节所写的题词。当时的儿童节为4月4日。

毛主席題詞
兒童節新學期開幕了
我們團結起來
學習習習新風
新主人

毛泽东为儿童节的题词。

给萧军的信^[1]

(1942年4月4日)

来信及附件收读，并转给几个同志看去了，感谢你的好意。

[1] 这是毛泽东致萧军信的主要内容。

为《八路军抗战烈士纪念册》题词^[1]

(1942年4月5日)

他们是为中华民族为中国人民而死的。

[1] 1942年十八集团军政治部出版了《八路军抗战烈士纪念册》。这是毛泽东为该纪念册的题词。

给欧阳山^[1]的信

(1942年4月9日)

欧阳山同志：

来信收到。拟面谈一次，如同意，请于今日惠临一叙，并盼与草明^[2]同志偕来。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四月九日

[1] 欧阳山（1908—2000），原名杨凤岐，湖北江陵人，作家。当时任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

[2] 草明（1913—2002），原名吴绚文，广东顺德人，作家。当时任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2年4月11日)

中国局面恩来估计正确。蒋介石的政策是外宽内紧，积极准备太平洋战争后的行动，现蒋经国^[2]已到西北。蒋介石对我们现已组织政治攻势与军事攻势，我们准备对付蒋的进攻。今后两年将是最困难的时期。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下星期一他在中央学习组讲时局问题。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目前时局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2] 蒋经国，当时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委员、赣州专员公署专员兼赣州地区保安司令等职。

给欧阳山、草明的信

(1942年4月13日)

欧阳山、草明二同志：

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赐示为盼！

毛泽东

四月十三日

欧阳山
草明 二月三日

欧阳山 草明同志好！
近来身体如何？工作忙不忙？
希望你早些回，已有两月未见了。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二月三日

毛泽东致欧阳山、草明信的手稿。

关于时局的报告^[1]

(1942年4月13日)

去年冬季国际形势有两件大事，一件是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了主动权；再一件就是爆发了太平洋战争，美国参战。日本反苏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大。如果日苏战争爆发，国民党有可能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他们布置很久了。今明两年是我党最困难的两年，我们准备在这两年中间地方缩小，人口减少，军队缩小，党员减少，财政经济缩小。我们的困难有两种，一种是反共高潮的困难，另一种是我们自己的经济困难。今天的困难，是黎明之前的黑暗，是胜利前夜的困难。在没有反共高潮时，要工作照常，加强干部教育。反共高潮来了，要应付反共高潮，但也不放弃教育。我们的干部在现在的状态下，是相当狭窄的，如不提高一步，就不能掌握将来的新的局面，所以为了将来要加强教育，为了现在也必须加强教育。再就是精兵简政，精兵简政是为了克服困难。中央指定了一个裁总委员会，要考虑如何达到精兵简政之目的，如何各得其所，还要同检查工作结合起来。

[1] 这是毛泽东根据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在中央学习组作关于时局的报告的一部分。

给欧阳山、草明的信

(1942年4月17日)

欧阳山、草明同志：

四月十五日来信阅悉，我现在尚不能够对你提出的问题作答复，待研究一下吧。如果你们在搜集材料，那很好，正反两面都盼搜集，最好能给我一个简明的说明书，不知文艺室同志有暇为此否？

敬礼！

毛泽东

四月十七日

欧阳山
草明/开:

欧阳先生行书，开及欧阳山
对信所提问题作简要答复，特
函复一下。如果信中所提的
事，那很好，正反面，我都同意
你所提出的一个解决问题的途径，不
知文稿的用处何在呢在此？

敬礼！

毛泽东
开及欧阳山

毛泽东致欧阳山、草明信的手稿。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2年4月17日)

(一) 在学习与检查工作中，要对干部的思想与组织观念（即言行）进行审查与鉴定工作。对各机关学校中的积极分子与落后分子不要平均看待，要使积极分子起模范作用。（二）在检查工作与审查干部中发现反革命分子，应加以清除，以巩固组织。这次高级组学习计划的改变，由研究历史到注意十八个文件的学习，到现在审查干部，是很有益处，很有必要的。现在先研究现实的文件二十二件，研究党的历史的学习计划暂停一个时期。在整风运动中，表现有老三风不正与新三风不正，现在须要纠正平均主义、极端民主主义等。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延安的学习与检查工作问题时讲话的一部分。

致陈毅电^[1]

(1942年4月19日)

关于韩德勤的军力与地区，以能维持韩生存又对我无危害为原则。因此，地区可划给一个适当的立足地。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致陈毅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整顿三风^[1]

(1942年4月2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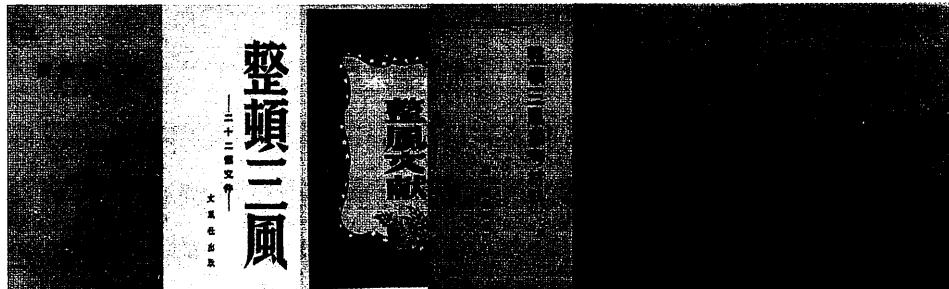
上次讲了时局的问题，今天讲讲延安现在所进行的教育工作的问题。现在教育工作的意义很大，为了对付目前的时局也好，为了迎接将来的时局也好，都必须加强教育。现在的时局是一个国民党反共高潮可能到来的时局。反共高潮来了，我们的困难更大；反共高潮不来，我们也是很困难的。今年明年，是最困难的两年，所以要加强我们内部的教育。国民党说我们在转变作风，整顿内部，巩固内部，这是说得完全正确的。为了现在，我们必须这样；为了将来，我们也必须这样。时局的黑暗只是暂时的，是要变化的。整个世界，整个中国，在不久的将来，都会有一个变化的，法西斯就要倒的。为了迎接光明，要加强我们的教育，要做思想的准备。报告时局，估计时局，这是思想准备的一种。我们把马列主义搞通，把主观主义扳倒，这是加强教育的更深刻的方法，更彻底的方法。如果我们全党干部在现在这一两年以内，能够把作风有所改变，扩大正风，消灭不正之风，这样一个目的达到了，我们内部就能够巩固，我们的干部就能够得到提高，我们也才能够有本事迎接将来的光明世界，掌握这个新的光明的世界。总之，对付黑暗需要加强教育，迎接光明也需要加强教育，无论怎样讲，我们都需要加强教育。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的报告。

从我们党的历史上来看，全面的、全党的、由中央领导进行的干部内部教育，过去还很少。从去年七月中央发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开始，我们才全体地、从上而下地、一致地注意了这个问题，这个意义非常之大。现在延安所进行的教育和学习，是有全国意义的。中央学习组^[1]在座的同志们，整个延安的工作干部，进行学习，这个意义不是局部的。一来是因为我们的机关是中央直属的，这里——陕甘宁边区是所有边区中政治意义最大的，这里的很多干部是做全国性的工作的。二来是全国许多地方的干部到这里来了，这些干部本来是全国各地的，他们之所以到延安来，或者是因为在原来地方立不住脚了，或者是因为有事情要到延安来办，或者是到延安来学习的。延安这个地方集中了全国的人才，所以我们的教育工作有全国性的意义。延安的干部教育好了，学习好了，现在可以对付黑暗，将来可以迎接光明，创造新世界，这个意义非常之大，这是全国性的。还有，延安这样一搞，搞得很好，消息传出去了，传到了各个根据地，传到了国民党统治区域，各地的党组织都会跟着我们干。现在我们还只是在这里干，我们要经过《解放日报》，经过新华通讯社把一些东西传播出去。现在新华社应该主要是广播教育材料，广播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广播斯大林的十二条^[2]、斯大林论检查、列宁论纪律、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这些

[1] 中央学习组，又称中央研究组，是中共中央于1941年8月决定成立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目的在于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

[2] 指斯大林1925年2月同德国共产党党员赫尔措格谈话中阐述的各国共产党要实现布尔什维克化必须具备的12个基本条件。（参见《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11～313页）



整风运动期间出版的整风文献和编印的历史文献集。

文件。当然，现在世界处于战争形势下，战争消息不能没有，但可以少播一些，比如印度打仗的消息可以少播一点，苏联打仗的消息也可以少播一点，而教育材料要多播一点，延安整顿三风的报道也可以多播一些。华北送来了整顿三风的报告，可以由延安转播出去。可以多做一些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

现在，国民党也利用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来骂我们，在报上写文章骂我们。但我们还要继续反下去，当然我们所反对的主观主义等与他们所骂的完全不同。我们首先要使在座的同志，还要经过在座的同志使延安所有的干部都懂得，我们现在做的是件有很大意义的事情，是做一件有全国性意义的工作，做一件建设党的事，使我们党的工作更完善更健全。现在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要把我们的学风、党风、文风改变，扩大正风，缩小和消灭歪风。中央各个部委除了一些日常的必要的工作外，其余的全部精力就是做这个工作。在这一点上，是否能做好，当然现在还不能断定。现在各机关各学校也还有一些同志没有认识清楚这一点，没有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件重要事情，没有把这个工作当成一项中心工作。我们说在最近三个月内要把它当作一项主要的工作，其他工作是不是停止呢？日常

的、必要的工作那是不停止的，要在日常的必要的工作不停止的条件下把它当做一项主要的工作。不紧要的工作怎么办？不紧要的工作就把它暂时停止。学校里面有许多课程，那些不紧要的也可以停止。比如在中央党校，就是把全部精力来搞这个事情，十八个文件^[1]，加上四个^[2]，共二十二个文件，要学两个半月。中央研究院也要停止其他课程学这些文件。其他学校，按照不同情况，或多或少都可以停止一些课程。各个机关也可以或多或少按照情况停止一些不紧要的工作，就是说除了日常必要的工作外，要把二十二个文件的讨论、研究，以及工作检查、思想检查，放在第一位。学校规定用两个月，机关规定用三个月。学校两个月如果不够，延长半个月，半个月不够，延长一个月。机关三个月不够，延长半个月，半

[1] 指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中规定的整风学习的18个文件：一、毛泽东2月1日在党校的报告；二、毛泽东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的报告；三、康生两次报告；四、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五、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六、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七、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八、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九、毛泽东关于改造学习的报告；十、毛泽东论反对自由主义；十一、毛泽东农村调查序言二；十二、《联共党史》结束语6条；十三、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十四、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二章第二、第三、第四、第五节；十五、陈云论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十六、红四军九次代表大会论党内不正确倾向；十七、宣传指南小册；十八、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

[2]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1942年4月16日《关于增加整风学习材料及学习时间的通知》中增加的4个整风学习文件：一、斯大林论领导与检查；二、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三、斯大林论平均主义；四、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政策。

个月不够，延长一个月。总而言之，要把反对主观主义这件事搞得彻底，一定要搞好，我们必须要下这样一个决心。如果搞得不好就再搞，再搞没有搞好还得重搞，要搞彻底。有人反对就要说服，说了不服，还要再说，一定要使其心悦诚服。总而言之，一定要干到底，一定要整顿三风，来一个彻底的思想转变。这个转变已经准备很久了，从遵义会议以来就在准备，特别是去年七月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颁布以后，到现在已经有十个月了，做了很多准备工作。现在再来一个三个月的突击，在突击以后，就要转为经常的工作了。在突击之中，除了一些必要的工作外，统统停止。必须使高级领导干部有这个认识，有这个决心，也要使所有的同志有这个认识，有这个决心，做到思想一致，行动一致。

如果不是这样，那就难得很。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干部教育中是有很大毛病的，特别是在学校教育中把方针完全搞到另外一边去了，研究马列主义搞到违反马列主义方面去了，方法也是违反马列主义的方法，这个毒害相当深。现在的主观主义的毒害是有历史的，也有最近这个时期产生的，都相当深。历史的毒害是遗留下来的。最近教育方面又有许多东西搞得不好。因为思想庞杂，思想不统一，行动不统一，所以这个人这样想问题，那个人那样想问题，这个人这样看马列主义，那个人那样看马列主义。一件事情，这个人说是黑的，那个人则说是白的，一人一说，十人十说，百人百说，各人有各人的说法。差不多在延安就是这样，自由主义的思想相当浓厚，也可以说在某些部门中间非常浓厚。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共产党员是不应该有的。但是现在有没有人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呢？没有人指破这一点。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各种干部，新干部，老干部，男干

部，女干部，文化人，各个地方来的干部，从事各种不同的工作的人在一起，就有了毛病。这毛病，如果不经过这几个月的工夫，将指定的这二十二个文件研究好，并贯彻到自己的实际行动中间去，是很难克服的。要把理论和实际行动联系起来，把文件上讲的东西和自己的行动联系起来。什么是实际？个人的历史实际，机关工作的历史实际，各个同志所想的、做的都是实际。对它们可以先来一个研究，在研究中、在检查中来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能够达到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目的。就是说，现在有许多违反马列主义的东西，要在这次教育中、检查中去掉，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用主要的精力去做，否则，这个目的也就达不到，那就难于应付时局困难，打起仗来，把延安失掉，就要哇哇叫，鸡飞狗跳，那时候，“诸子百家”就都会出来的，那就不得了，将来的光明也就很难到来，即使到来，也掌握不了它。

全世界的共产党，除了苏联共产党之外，只有中国共产党有根据地，可以教育与训练自己的干部。现在也许还感觉不到这有什么好处，如果延安失掉了，就会知道延安的好处了，有那么多的窑洞，还有二十二个文件可以阅读，可以讨论，更会想到这个时候吊儿郎当不注意学习是不应该的，那时候就会后悔的。延安失掉了还没有什么，张家也要独立，王家也要独立，那就不得了。所以就是延安失掉了，反主观主义也要搞，作战也要搞。总之，一定要搞，搞到哇哇叫也要搞，打得稀巴烂也要搞。要能对付以后的困难就得赶快搞，我们现在就要读这些文件。中宣部那个决定上说要写笔记，党员有服从党的决定的义务，决定规定要写笔记，就得写笔记。你说我不写笔记，那可不行，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说纪律是铁

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这是上了书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上就有。我们的“紧箍咒”里面有一句叫做“写笔记”，我们大家就都要写，我也要写一点。斯大林的十二条，不写一点笔记就研究不清楚。不管文化人也好，“武化人”也好，男人也好，女人也好，新干部也好，老干部也好，学校也好，机关也好，都要写笔记。首先首长要写，班长、小组长都要写，一定要写，还要检查笔记。看文件一定要动手写笔记，现在已经有许多同志动手写了笔记，有许多在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写了笔记。我们说犯了错误不要紧，只要认识自己犯的错误，并且能改正，这就很好，就是很好的同志。现在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在写笔记，这是很好的现象，犯了错误还要装老爷爷那就不行。过去有功劳的也要写笔记，不要把功劳变成一个包袱背在背上，一切都不在乎，这样，只会把功劳变成一种很重的负担。也许有人说，我功劳甚大，写什么笔记。那不行，功劳再大也得写笔记。也许又有人说，我天文地理都懂得，三角几何都晓得，看这么几个文件还用得了三个月，我三天就看完了。还有的人说，这算什么，我不用看也可以考。能够这样当然是很有成绩的，但我说不然。为什么说不然？二十二个文件是何等之文件，是世界革命一百多年的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中国革命二十年经验的总结。斯大林的十二条是十七年前写的，没有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斯大林能不能够写出十二条呢？不能的，不然为什么马克思的时候就没有写出十二条呢？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也是积近百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革命的目的，就必须实行这个报告所讲的，必须实行干部政策的四条。世界革命是从马克思主义产生时算起，中国革命是从共产党产生的那一年算起，五四运动就没有算进来，只讲二

十年。中国共产党这一点经验也是经过艰难困苦得来的，不要看得那样容易，没有二十年的曲折，没有二十年的斗争过程，就不可能产生中央今天的这些决定，也不可能产生中央宣传部四月三日的那个决定。有同志说，这些决定好得很，早五年出来就好了。我说，你的话不错，早二十年出来就更好。如果中国共产党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没有主观主义，没有宗派主义，没有党八股，那岂不是更好，那岂不是上策。世界上有没有这种上策？没有的！什么事都需要经验，什么好的政策都是经验之总结。刚刚读了几年书的青年，就神气成那样，说什么三天可以读完，不看也可以考，不需要学两个月三个月。又有人说自己走过了二万五千里三万五千里，还学什么，我说走得再多也不行。水手是世界上游历最广的人，天天都在走，周游全球，但单是走不写笔记，经验就总结不起来。中央制定一个文件有时要搞六七个月，至少也得几个星期，好像我们这些人总是蠢些，人家总是聪明一些，我们写起决议来总是不能很快搞出来。所以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许多同志轻视斯大林的十二条，轻视中央的决议，轻视马列主义，这一点一定要讲清楚，不要轻视它，要写笔记，要讨论，要反省。康生^[1]同志在前天动员大会上讲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是批评别人，自我批评是批评自己。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但作为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干工作要有一个重心，今天我们教育工作的重心，在自己考虑一下、研究一下，自己反省一下，重心在自己，自己正确的东西便把它扩大，不正确的东西便把它清除、取消。要使我们所有的学生、干部都了解，在整顿三风时重心在自己。要帮助

[1] 康生（1898—1975），山东胶县（今胶州市）人。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总学委副主任。

别人，首先要提高自己，自己不进步，要帮助别人是难的，这一点要讲清楚。我们在座的同志要以身作则，自己进步，要反复研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历史、自己现在的工作，好好地反省一下，要做模范。一定要这样做。无论什么人都要这样做，都要研究二十二个文件，要熟读，要搞通。我们对这些东西要表示态度，到底是赞成还是反对。如果以为这些文件不合马列主义原则，那就应该提出意见。如果以为没有违反马列主义而是站在马列主义立场，没有违反党的政策、党的原则而是合乎党的政策、党的原则的，便应表示拥护，表示赞成。要把中央的决心、高级干部的决心、中央学习组同志的决心带到下面去。一定要这样做，并且要进一步实行好。反对自由主义，反对主观主义，不要像在江西时反对“机会主义”那样，说什么吃辣椒也是右倾机会主义，而要反得正确，反得彻底。我们中央的同志商量，中央机关全部动员起来，帮助整个延安整顿三风，许多干部去帮助各机关各学校。除了日常必要的工作不停止外，中央机关全部动员起来整顿三风。中央机关如此，各机关学校更应该如此。三个月研究文件，一个月检查工作，开他几次会议，如组织会议、宣传会议、其他会议等。这次整顿三风，由中央的同志分头领导，边区一级由任弼时同志负责指导，军委系统由王稼祥、陈云^[1]同志负责，中央直属各机关由康生、李富春^[2]同志负责，学校（党校除外）由凯丰^[3]同志负责，党校由我负责。在这次学习

[1] 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学习组副组长。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

[2] 李富春（1900—1975），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

[3] 凯丰，即何凯丰，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

检查中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是改变作风，团结内部，就是决定上写的改变观点，改变思想方法，改变作风，团结干部，团结全党。

在研究、讨论文件和检查工作中，会有许多干部表现积极、热忱，会有那么一些人也热心，也搞，但和平常差不多，也会有少数人比较更差，叫做落后的。大多数地方大体上都有这三种人，积极热心而又正确的，平常的，落后的。这些人我们不能平均看待。在干部中间实行平均主义是不好的，平均主义是使积极分子、平常分子向落后分子看齐。我们要使落后分子、平常分子向积极前进分子看齐，要使落后的、思想意识和行动比较差的、不正确的同志向正确的积极的同志看齐，使平常状态的同志向积极的同志看齐。没有这样的引导，使积极的和落后的混同在一起，对积极的没有鼓励，和落后分子一样看待，这是错误的。那谁愿意积极呢？那便没有斯达汉诺夫^[1]了。苏联为什么要提倡学习斯达汉诺夫？因为他积极，要使别人向他看齐。我们要采取这样的态度，号召所有的人向积极分子看齐。当然在做的时候也要注意不要夸奖得太厉害、不适当，使人以为某些人领导特别喜欢，某些人领导特别不喜欢，那就搞不好。要使全体都向前，向积极的看齐，要有团结干部、团结全党的精神。

还有搜集问题、研究二十二个文件和检查工作的问题。各机关学校自己开会讨论，解答问题，同时把这些问题反映到中央来。我

[1] 斯达汉诺夫（1906—1977），苏联顿巴斯的采煤工人，煤炭工业中的著名革新者。由于他运用新技术和改进劳动组织，1935年8月30日创造了在5小时45分钟内用风镐采煤102吨的纪录，相当于当时生产定额的十四倍。这一先进事例很快得到广泛传播，并发展成为群众性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称斯达汉诺夫运动。

们希望有两种典型，一是最好的，一是最坏的。把这两种意见两种情况报告中央。学习中发生的问题各单位自己解答，解答不了的开会讨论，再解决不了交与中央答复。关于搜集问题回答问题便是这样。要把干部中的积极分子、平常分子、落后分子分开，对思想有问题的、党性有问题的人要特别加以注意，采取和他们个别谈话的方法。这个方法西北局实行过，还有许多机关实行过，产生很好的效果。再一种方法是开干部会。进行个别谈话，开干部会，用这两种方法来做工作。干部会怎样开呢？我昨天和王首道^[1]同志谈了，他所在的机关中，小组长、科长等有二十多人，其他干部有六十多人，一共八十多人。我以为可以两星期开一次二十多人的会，一个月开一次八十多人的会。在二十多人的会上，把中央学习组的精神、要讨论的内容系统地告诉他们，可以展开讨论，大家发表意见，按机关的情形也可以十多人或八九人来开这样的会，一星期一次最好，不能的话便两星期一次，这些人是其他人的直接领袖。其他的人一月一次会，这样的会人太多，讨论恐怕很难，可以报告一下，把二十多人的会上讨论的情况向他们说明，须要采取这样的方法开会。同干部发生联系，一种是和干部谈话，一种是开会。用这两种方法我们可以知道各个同志想的是什么，有什么问题，什么事他们不满意，什么事他们满意。现在还没有到检查工作的时候，有些事到那时才能讨论，比如讲先批评领导者、后批评被领导者这样的方式方法问题。上次邓发^[2]同志报告职工会的经验，先批评领导者的缺点，大家肯讲话，如先批评被领导者，便把大家吓倒了，不

[1] 王首道（1906—1996），湖南浏阳人。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

[2] 邓发（1906—1946），广东云浮人。当时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敢说话了。检查工作要鼓励大家发言，如同中央研究院副院长^[1]讲的，大胆说话，有的放矢，只要不违法犯罪，又是在规定的范围以内的，说话是许可的。正确不正确是指说话的内容，有的对，有的不对。说得不对，是在说的过程中发生的，应该允许，说错了的，以后可以纠正。在讨论中发生了问题，要先批评领导者，后批评被领导者，这个方式比较好，像职工会的办法。总的责任，这次搞得好不好，整个归中央负责，搞好了算一功，搞不好有过。各部门搞得好不好，行政首长负主要责任，不是按照过去办法由党支部负责，这次规定行政上负责。个别谈话解决了问题没有，干部研究二十二个文件写了笔记没有，检查工作没有，作风改变没有，讨论的目的达到了没有，成绩少或者没有成绩，这责任归行政首长负。今天在座的同志都要负责任，希望好好考虑一下，研究一下，同自己领导的部门的干部好好商量一下，交换意见，达到整顿三风的目的。别人整三风，我一风也不整，如果党员是这样，那是不好的。你是共产党员，便应服从党的决定，你一风不整，行吗？整两风也不成，我们讲是一定要整顿三风。要整顿三风，一些偏风也不让有的，整了两风半，还剩半风，行不行？不行！一定要整三风，这叫搞到底。我们要担负这个责任。这里方法是重要的，首先要宣传，宣传部的决定提供了方法，即研究二十二个文件，讨论二十二个文件，检查工作，这样才能搞好。这不是容易的事。

听说有个别机关学校安排得很紧，一个文件研究两天就过去了，这是走马看花。许多文件须要一条一条加以分析研究，一个搞完再搞第二个，这时候别的先不要看，专讨论这一个。有些可以两

[1] 指当时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的范文澜。

三个合起来研究，但也要先一个一个地研究。斯大林的十二条搞通了很不容易，许多人想一把抓，结果没有抓到。要一条一条地搞，要用分析的方法，搞了一条，再搞第二条，这样搞下去，先剩下十条，再剩下八条，最后全部“消灭”。先逐条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全部才能明白。这次我们要搞出些名堂，使全党面目为之一新，这就须要在座的同志负起责来。整顿三风搞得好不好，对目前，对将来，对领导整个革命，关系很大，我们一定要下决心把这样的事做好。



《毛泽东作整风报告》(油画)

准备应付反共高潮 继续抓紧党内教育

(1942年4月21日)

周：

一百零九条^[1]已收到。中央已根据你的材料及估计发了准备应付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指示，同时将你的材料通知远方^[2]及各地干部，并在延安干部中作报告。日苏战争时机当在五月至八月内。在爆发前，我们一面准备应付反共高潮，同时继续抓紧党内教育，以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为中心，认真进行改造作风、巩固内部的工作，这无论是为着应付目前困难与迎接将来光明都是必要的。

毛泽东

四月廿一日

[1] 1942年4月18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对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进行了分析，并对时局作出估计，列举了近三个月以来国民党领导的反动事件109条。

[2] 指共产国际。

给萧军的信^[1]

(1942年4月27日)

准备本星期六开会^[2]，请你稍等一下出发，开完你就可走了。会前我还想同你谈一下，不知你有暇否？我派马来接你。月报^[3]1—14期收到，谢谢你！

[1] 这是毛泽东致萧军信的主要内容。

[2] 指1942年5月2日开始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3] 指《文艺月报》。

延安文艺座谈会请柬^[1]

(1942年4月27日)

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此致

胡一川同志^[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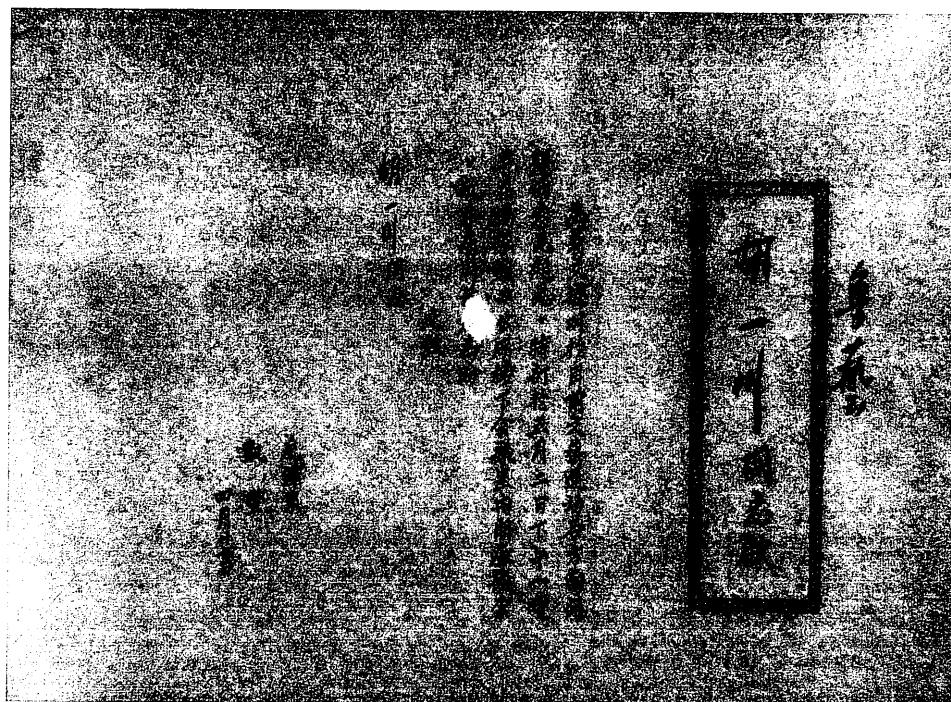
毛泽东

凯丰

四月廿七日

[1] 这是毛泽东和凯丰发出的邀请100多位作家参加文艺座谈会的请柬。

[2] 胡一川（1910—2000），原名胡以撰，版画家，曾在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任教。当时受邀参加文艺座谈会。



1942年4月27日，毛泽东和凯丰联名发出的邀请胡一川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请柬。

复周恩来电^[1]

(1942年5月7日)

我们正从军事、财政各方面准备对敢于进攻者施以痛击，已组成联防军司令部，统筹晋西北与陕甘宁边区两处军事。

[1] 这是毛泽东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16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 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 7 号兴力工业中心 5 楼 09 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 16 开

页 面：536 面

版 次：2013 年 10 月 1 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 年 10 月 1 日 第一次印刷

2013 年 11 月 1 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 套

全集字数：2015 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 卷 港币 \$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